

《吴碧柳评传》

刘国铭

- 引 言
- 一 中国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铸就了吴芳吉持中纠偏，特立独行，爱国爱民的伟大人生。
 - 二 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奠定了吴芳吉德化教育的根基，穷苦民众知识渴求的内驱力，引发吴芳吉的教育激情，促成为国呼号，造就人才的学术追求和教育实践，世称教育家。
 - 三 伴诗教而成长，创新诗而名扬，为社稷而育才，借杏坛而辉煌，愤发而成著名诗人。
- 第一章 二南韵出碧柳歌 民族精神育神童
- 第二章 爱国直书民疾苦 杏坛传道德化人
- 第三章 婉容词促新文化 明德执教留芳名
- 第四章 军阀乱世哭柳潜 炮弹横飞伴书声
- 第五章 诗吟赴蓉酬学子 以身殉学壮师魂
- 结 语 几水波澜的洗礼，鼎山灵气的熏陶，中西文化的兹养，自由思潮的煎熬，促成了著名诗人、现代教育家吴芳吉。我为他而自豪，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说 明：1. 作者初衷：①以吴研会方针“普及宣传与学术提高并重，普及宣传为主”为指导思想。②写别人没写过的。③有人写过，须涉及时，换一角度。④有争议的问题，表明态度。2. 时代定位：吴芳吉所处时代的认定，取张岱年等之说：中国有史以来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3. 文体：采用散文体。4. 体式：以诗提头，每章用吴芳吉代表性的诗篇开头。5. 章目安排：每章目录，仿诗体，用两句。第一句从诗人落笔，第二句从教师落笔。

2012年10月5号

《吴碧柳评传》

引 言

1920年,24岁的吴芳吉在为他尊敬的挚友梁乔山作的传里,指出:“作传的真义是:一面对于死者,要述其未尽的志趣;一面对于生者,要可作后来的观摩。”[1]我还从未给人写过传记,今天是逼上梁山了,试着为吴芳吉作传,正好沿着吴芳吉的思路落笔,企求能在述其未尽之锐志笔趣,展其可效之雄才大德两个方面,稍稍有些新意。

关于吴芳吉的传记,目前已知的有吴宓的《吴芳吉传》[2]、刘朴的《吴芳吉传》[3]、文守仁的《吴芳吉传》[4]、庐前的《吴芳吉评传》[5]、莫健立的《吴白屋先生传》[6]、刘咸炘的《吴碧柳别传》[7]、施幼贻的《吴芳吉评传》[8]、朱静如的《白屋诗稿评述》[9]、宫廷璋的《吴芳吉新体诗评》[10]、吴泰瑛的《白屋诗人吴芳吉》[11]、黎汉基的《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 吴宓与吴芳吉》,作者谓之“俩吴生的双人传”[12]。这些传记,多数虽以“传”命名,实属作者在吴芳吉英年早逝时写的吊唁性质的纪念性文章,生平简介,文字不多,洗练简洁,情真意切。有的评传,作者择其所好相机留下自己的见解,不无真知灼见,虽然也有少许显见的不足,多属于各抒己见的见仁见智。有的是吴氏后裔对先辈的追忆,抒发崇敬颂扬之情,文笔流畅,文学色彩较浓,且偶有失实。黎本虽未标明评传,却是无其名而有其实的,且注重考证,史料充实。通过叙述俩吴生的情谊波澜所透视的是是非非,

论及两人的人生轨迹，确实算得上归属“评传”了。“俩吴生传”，虽然对吴芳吉也有欠妥之笔，但基本上是扬吉抑宓，揭开正人君子面纱后面的虚情假义和道德失范，也有张扬背后的自省和心灵叩击。称得上是一卷学术型的研究文本，很有价值。施本是一本难得的著作，不但饱含对吴芳吉的崇敬之情，而且确实体现出作者的学术功力，只不过，直到成书时（1986年）国内还未理顺“打倒孔家店”的是非，更未清理“破四旧”、“批林批孔”的思想、政治影响，在这大背景下，作者未能跳出否定孔子的框框，评定吴芳吉就难免有偏颇之笔。朱本“评述”，名符其实，是对吴氏诗稿的评说，言之有理，情在其中，浸透着对吴氏人格的颂扬。宫本“诗评”多见大家之笔，实属难得。也有的传记留下了当时党派之见，给作者的稀微印记。上述所有传记文本，凡涉及1913年吴芳吉从宜昌回四川的那段历史，都有一个共同的失误，即误用了吴芳吉“自订年表”里“沿江乞食以行”的记载。不过，这不能怪罪于这些作者。可以认定，大约是吴芳吉自己的笔误所致。有的作者，自己演释了“沿江”一些故事，则非吴芳吉的“笔误”了。[13]

这些关于吴芳吉的传记，作者自度取舍，各有千秋，于认识吴芳吉的志趣与传承吴芳吉的大贤和学术，都有益处；对本人试笔为之作传，更有帮助，特别是黎本“两吴生传”对笔者受益颇多。顺此，对各位方家表示敬羨和谢意！近些年来，特别是成都吴芳吉研究会成立十多年来，他们研究吴芳吉的诗词、诗论及其诗德、人品，作了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们2010年出版的“吴芳

吉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一书里，我们从中受到多方面的启迪，也是应该致谢的！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为吴芳吉研究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率先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白屋诗选》[14]和《吴芳吉集》的重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重庆文理学院）及其中文系、吴芳吉研究所和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巴蜀书社。《吴芳吉集》虽也有个别注释的不确和文字的疏漏，然瑕不掩瑜，它的编校贺远明、吴汉骧、李坤栋三位方家，将同《吴芳吉集》一起受到人们的尊敬，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遗憾的是，吴汉骧、贺远明已先后辞世，李坤栋方家还在从事研究工作，必将有新的成果，我们预祝他取得新的成果。

不容遗漏的还有二事。一是，吴芳吉工作了五年的湖南长沙明德中学，至今还保持着对吴芳吉的那份浓浓的敬仰、爱戴之情。吴芳吉是明德老校长胡元倓 1920 年去上海聘请的，不久又把其家眷从四川江津接去。吴芳吉和妻儿一起住在环境优雅的宿舍，心境特别好，写了一副门联贴上：“南国香草地，西方美人居”。吴芳吉英年早逝时，虽然早离开明德，全校师生仍感震惊，万分悲痛，学校不但举行了追悼会，胡校长还留下悼诗，曰：“以身殉学先吾死，果力精心愧弗如。回首昔游余隐痛，秋风凉露检遗书。”更为难得的是，1939 年，年近花甲的老校长，借在重庆办事，专程到江津县聚奎中学谒吴芳吉墓，凭吊他得意的名师，在墓前留下著名的悼诗：“落英已满地，此株方盛开。诗人墓咫尺，疑有魂归来。”直到现在，明德还保存着对吴芳吉的美好记忆，吴芳吉的诗魂、师德焕发着耀眼的光彩。

另一件事是，吴芳吉于 1929 年与沈懋德、吕子方、彭用仪一起创办的重庆大学，2011 年 3 月成立了吴芳吉研究会。党委副书记肖铁岩教授任名誉会长，原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邓时泽教授任顾问，原校长助理任廷枢教授任会长。重庆大学党委在建校 80 周年之际，回顾办学历程，认定重庆大学之有辉煌的今天，离不开吴芳吉为学校定下的宗旨：“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在重庆大学校园内不但能瞻仰到吴芳吉的塑像，看见创建者的群雕，更能目睹长 30 米，高 6 米的大型丰碑石屏，镌刻着吴芳吉的十六字名典和校训：“耐劳苦，尚简朴，勤学业，爱国家。”重大正在吴芳吉教育思想的指引下，开创新的业绩。

这一切，激励着我走进吴芳吉，走进吴芳吉的生活，走进吴芳吉的诗情，走进吴芳吉的杏坛。这才有在众多方家之后，怀着忐忑不安之心境，提笔为吴芳吉著传。不知能否补众论取舍遗下之未涉于万一，再提供一种思路，或许于拓展吴芳吉的研究有所裨益，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大文化）大花园，添上一朵小小的花儿！

从吴芳吉出生到初识世态，正是中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亦即从晚清皇权到民国政府。中国的资产阶级已从明朝中叶开始孕育萌芽，到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后的产生、成长，登上了最光辉的全盛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初始的思想启蒙之后的巨大政治变动。开启了近代中国历史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论战时代，被中国当今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15]，造就了好大一批文化精英、学界名流、业界巨子、政界领袖。这种启蒙和变动，是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逐渐走上历史前台的思想变化和身份变迁而出现的。具体地表现在资产阶级分裂为改良派和革命派，他们在思想趋向、政治述求、斗争方式上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虽然改良派和革命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他们毕竟都是资产阶级，但是还是要通过自己掌握的报刊或著书立说，各明其志，各述其理，针锋相对，直接驳论。改良派和革命派争论的交点，不论他们是否有明确的理论自觉，却正好是列宁所指出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是否进行武装反抗和是否改变生产关系。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16]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醉心于跪拜呈情，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革命派则要借助于暴力，敢把皇帝拉下马。借用马克思的话说，改良派只知挥舞“批判的武器”，而革命派坚持使用“武器的批判”。[17]把用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称作革命，正是中国资

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进行武装反清时流行开来的。在实际的斗争中，革命派不屑于改良立宪之类的把戏，用革命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终于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封建王朝，也宣布了改良派的破产。可是，一方面改良派凄然以失败告终，但人心不死，不少人改头换面，另谋他图；一方面，革命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不久即被袁世凯夺走了胜利果实，还妄想称帝复辟帝制。革命派中的一些人满足于有了一块“民国”的招牌而不思进取，也不知进取，有的甚至失去希望，看不清方向而消沉颓废。中国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一场历经十多年的政治世变，留下的依然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用吴芳吉 13 岁时的忧患语言来表达，中国基本上还是处于“民无适从”的状态。[18]对于辛亥革命，毛泽东后来作了极其确切的科学总结：“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19]人民继续探索着变革社会的新的方略和呼唤着新的力量的引领。

在中国历史经历巨大政治变动的这段时期，正是我们的主人公吴芳吉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而经历从“神童”到“乞讨”这种天上地下的折腾磨难，铸就他一身的胆识、韧劲和满腔的血性，逐渐成长为抗拒强权，不畏显赫，反抗欺辱，追求公正，同情弱者，渴望平等，爱国爱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从文化层面讲，我们的主人公正好碰上中国废科举、兴学堂的好时期，处在中西文化交汇、融通状态中。吴芳吉不但享受了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给予的丰盛滋养，而且受到世界文明的熏陶。用他自己后来总结的话说，“余每自喜，生长中国，侧闻孔道，不知前生如何修结。又值世界交通，生命扩大，自梵天史诗，波斯神颂，古如希腊诸哲之叙述，近如美洲九子之咏歌，以迄芬兰、罗刹、诺曼、摄题之风，或直接或重译，胥得一一而尽读之。俾余得以周知人类感情之变，藉探世界文化之根。” [20]10岁那年，他怀揣着一颗稚嫩的孝心，手捧自撰诉状，独步从家乡江津到府城重庆，救出被诬入狱的父亲。懂得把个人的命运和社稷庶民的盛衰荣辱联系在一起，写下“造化而无我应无，造化而有我终有”，和“呜呼碧柳知不知，尔身日日在争战”的诗句。这是何等高瞻远瞩的见地？这是何等忧患警醒的觉悟和抱负？我们的主人公更特别声明，这就是他“弱岁以前之人生观” [21]。当他13岁在做一篇《论公德公益》的作文时，落笔就是：“处社会之道，须遵守法度而护爱之；有利公众，则肩任之。我国所以团体不能结者，不知公德公益故也。” [22]俨然以社会主人公的自觉、自律警世。还是在这一年，吴芳吉在另一篇题为《读外交失败史书后》 [23]的作文里，几乎是再现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痛陈对卖国求荣的封建王朝的声讨鞭鞑，对侵略蚕食我国的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社稷民生万分焦急，悲愤地写下“我欲泣之！”小小的吴芳吉写道：“苟能讲国际以待外交，谈理财以实府库，立宪法以安国家，建学校以植人材，练海陆军以护国体，兴工商场以利交通，宗教所及，法律即及，侨民所在，护兵即在，何至冥冥然与外人决事哉！”就因为这篇见识超常、构思周密、充满激情、文笔遒劲的即席政论，13岁的吴芳

吉在乡里，在学界，在省城，被誉为“神童”，受到各方面的推崇、夸奖。

当时，吴芳吉的业师萧湘（萧绮笙），对这篇作文除了眉批、旁批之外，最后还有四百多字的评语，这里我们照录下来，对于认识吴芳吉是会有帮助的：“阅卷一日，精神疲倦极矣。及至此卷，先翻其篇幅，累累然五页之多，令人愀然生厌，几置之矣。徐又聚而数其字数，则盈盈然一千四百二十余字也，堂哉皇哉！皇哉堂哉！‘东都’、‘西京’，以二十余年之身，仅数万言。今乃以二小时而宏阔若此，岂非倚马才？又从而疑之。以疲倦之精神，而加以轻且厌之心，其文必鲜佳境矣。乃一翻阅之，甫竟一行，则精神为之一振，急提笔加圈。阅至‘弊一’‘弊二’等处，精神为之一振，提笔加圈。阅至‘台人生番’句，精神又为之一振，急急加圈。阅至‘自古以来’一笔，精神为之大振，急圈之急批之。阅至‘而所割之地’一笔，喜极，精神又一振，急圈急批，又反恨诸生之不能及也。阅至‘以上所述’一笔，精神踊跃，不知如何振荡，圈不及圈，批不及批。阅至‘其瑕皆具’一句，忽然心痛，又不知何以大圈小圈之，淋漓满纸也！洋洋大篇，而法律加此分明，以视梁卓如笔，东塗西抹，自谓文家者，终不能梦见此文法也！以诗论文，有李太白之豪放，兼杜子美谨严。何物神童，文心狡绘乃尔，使我精神为之振荡也，咄咄怪才！”[24]

我们的主人公就是戴着这顶“神童”桂冠。通过省里预考和京师复试，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农家娃娃能由国家选送出国“留洋”，那种荣耀和喜悦，远比以前的乡人

才子考取状元更胜万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会想到，入读清华不久的吴芳吉，竟会因为为抗拒美籍教师的无理而被学校开除的同学鸣不平，受到校方的极端对待，也要开除吴芳吉，除非吴芳吉写出悔过书。然而，吴芳吉认为，为同学鸣不平，无过可悔，坚持不写。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对峙中，结果可想而知。一方是握有大权且有美籍教师虎视的学校，一方是一个求学无助的少年，势力悬殊太大。俗话说：“小指拗不过大腿”，正是对通行强权社会的无奈写照，输家只能是吴芳吉。

吴芳吉被开除了！

吴芳吉在美帝国主义用枪炮残杀中国人民而榨取的血和汗铸成的黄金白银开办的所谓“退款学堂”的美籍教师的高压下被开除了。

在功名、金钱重于泰山的万恶社会里，同学黑了他的心，学校除了他的名；亲友鄙夷他，社会抛弃他。一时间，在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竟然没有吴芳吉这么一个少年的容身之所，他只得步履蹒跚，靠两只脚丈量回家的路程。“神童”从天上掉下来，饱尝“叫化”之苦。还好，我们的主人公毕竟是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成长的，懂得从苦难中修身，从灾难中奋起，懂得只要自己不自暴自弃，就会争得光明的前景。当他在这苦难中读到《鲁宾逊漂流记》时，又多了一份西方的营养。他更悟出了一个道理，只要敢于奋斗，哪怕是一个人处于荒山野岭，渺无人烟，他也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下。后来他在回忆这段苦难时写道：“癸丑之夏，余以义愤之故，

连清华当局，时余虽囊篋萧然，踟躅孤身，不顾，遂归蜀。乞行至宜昌，困屯艰苦，数月之久，阻不能前。凄清逆旅，落寞身世，触景伤怀，悲愤不能自己。”柔情韧性愤发，写下《忧患词》九首，首首皆用“人生何处非忧患，寻乐还在忧患中”[25]结尾。是的，战胜困苦本身就包含着最大的快乐。然而，没有战胜苦难的勇气和毅力是寻不着这样的快乐的。

本来，吴芳吉为友鸣不平而被除籍之清白冤情，是很清楚的，却自今还有人另持非议，相信当时表面上与吴芳吉保持着“兄弟”之交而背后使绊子的另一个“吴生”吴雨僧（吴宓）多年后在《自编年谱》[26]里羞羞答答的“供词”否定“悔过书”的说法。我们只好在这里重又为吴芳吉多费一笔，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如果揭开事情的真象，我们就更应该为吴芳吉的钢正不阿、光明磊落的人品和勇拒外辱、不惧强权的民族气节高唱赞歌了。施幼贻在他的论文《白屋诗人吴芳吉》里，是这样说的：“吴被开除是因为学生何鲁、黄秉礼为外籍教师所辱，他故而据理抗争，拒不‘悔过’所致。”[27]吴芳吉在成都教书时的学生文守仁在他的《吴芳吉传》里，对这种事情的记述比较详细。为了弄明白情况，我们不怕累赘，多摘引一些文字：“有广安何鲁奎垣者，适以病未应考，及瘳，依章请补试。奎垣长于数学，时外人之任教数者，多滥竽充数，往往不能解题，奎垣屡讥之，以是积恨不获。奎垣因谒白校长某。某者，曾正文公督两江时以幼童遣至国外受学者，于本国语文多不谙。时年已高，颇畏事，竟徇外人议。奎垣忿甚，语侵之，遂除名。（尝闻碧柳先生言，事后闻奎

垣急不择言，不期冲口出曰：老而不死。）外人大幸，迫离校。逡巡间涌至者若干人，弃置其衣物，左右提挈如提畜物状。观者目裂，以为外人无故凌辱华生，实忍无可忍者。事闻于氏，极不平，于会餐时慷慨陈述，众议向校方理论。学校当局即向教育部请予抑制。教育部不察，乃拟惩肇事者，群情大哗，相率离校，校舍为之一空。于时教育总长范源濂恐致物议，乃为调和妥协计，派员至各生寓所劝导，倘能具书悔过者，得复学。至氏所，氏以无过可悔，谢却之，遂退学。” [28]

对于这段历史，吴芳吉自己后来是这样说的：“某以民国元年九月考取幼童留美。适清华风潮发生，某为四川学生代表，被除学籍，嘉会遂失，后湘乡范公静生出而翰旋。谓填写悔过书一纸，可返校，他省学生代表之返者十余，某以替人代致不平。无过可悔，竟谢却之。” [29]

吴芳吉为之打抱不平的何鲁，也是出生在比较贫寒的家庭，经历清末和民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大动乱，饱经了旧社会、旧时代的风霜。1911年即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到清华读书碰上美国籍教师的无理而当仁不让，表现出一个炎黄子孙的自尊和气节。张益龙在《教坛拔双凤的数学家何鲁》里，是这样记下他在清华被除学籍的：“早在清华读书时，他即因反对美国女教师侮辱中国人而愤然离开学校。” [30]

何鲁被开除，同学们起而声援，是吴芳吉当时在清华的同窗好友刘朴吹响的“集结号”。刘朴在他写的《吴芳吉传》里说：“已清华四川生黄秉礼、何鲁，用忤美利坚教授，除籍，复使役夫凌辱逐之。芳吉赫然约同学代表，省推一人，已为四川代表，其起诤于执事，又皆降籍。于是众 美利坚势，不敢言。朴迺摇膳堂铃，即集同学膳堂，发不平，

推代表，复在诤于执事，更求业师京师明德大学校长湘潭胡先生元倓，
托故清华大学监督兄任教育总长湘江范先生源濂，拨其机关，遂动执
事。代表填书，悔过归校。芳吉曰，‘我本无过，不填悔过书！’弃之……”

[31]

朱静如在他写的《白屋诗稿评述》里，对吴芳吉的行为作了如是
评价，他说：“‘无过可悔’，简单的四个字，却有千金重的份量。无法
估计的代价，为了秉持良心，维护真理，把持住士大夫那种‘有所不
为’的操守，他葬送了眼前最‘快乐无忧之日’，葬送了留学的美梦，
葬送了以后可成为名人学者的光明前程。”朱静如感慨：“先生那时不
满二十岁，但是所表现风范，却是孟子笔下大丈夫的气度。‘无过可悔’
是一种不淫、不移、不屈的精神表现。也可以说‘造次必于是，颠沛
必于是’的行仁境界。”[32]吴宓的《吴宓自编年谱》记录辛亥革命的
清华复课后的情况，[33]说：“宓回到清华后，大有沧桑之感。”他列举
了“辛亥年之著名教师”未到校了之后写道：“庸劣之美国男女教师则
全在。革命时，安居北京美国公使馆。”吴宓认为清华当时的学潮，“何、
黄之鼓动，仅共临时之导火线耳。”那么什么是根本原因呢？吴宓是这
样说的：“学生在共和国中，有享受自由与尊重之权利，今所谓自由与
尊重者，又何在？——学生此种感情不平之心理，实为民国元年秋清
华大风潮之主要原因。”应该说吴宓对学生争“自由与尊重的权利”，
对“庸劣之美国男女教师”，“感情不平之心理”的感知是较为客观的，
可信的，这可能是中国炎黄子孙骨子里铸就的民族感情基因的自然流
露。而且，在学潮闹起来之后，那些支瞎子跳岩、躲在幕后撑阴教的

始作俑者，要吴宓一起背着吴芳吉私下里向学校“输诚”，并“报告学生动作”时，吴宓并未麻木到不能自知，尚能“大惊，心中自思：此非作‘汉奸’邦？不道德之甚矣！”从此，长期自愧“心怀鬼胎”。说明中华民族的儒德内省在吴宓那里也还未泯灭殆尽。不过，吴宓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地道，既说与陈达等去向校方“请罪、领训”，又说“并无填写《悔过书》之事”。难道在吴宓看来“请罪”不是“悔过”？难道“罪”比“过”的严重程度还低？难道吴宓的智商会低下到不懂得“罪”和“过”的有一项词性，是在不同领域的专用语。“罪”属法的范围，“过”是属道德的范围？孰轻孰重，吴宓似乎应该懂得。或许还会有人说，关键在于有没有“书”这种形式，那就是舍本逐末，未免太吹毛求疵了，这无非是一种笨劣的开脱。只能让人更看清那心灵深处的阴影。还有一点使人非常遗憾，《吴宓日记》，从1910年到1948年近50年，洋洋洒洒十几大本，在缺失的三、四年里，碰巧就有1912年秋以后到1913年，使我们无法从日记里读到清华学潮的逐日记载，而只能从《年谱》这种后来追忆的文体中看到那段对“两吴生”都是非常重要的经历，这里又恰好从字面上否定了“悔过书”之说。

我们想再从《清华大学校史稿》的记载[34]，看看它的背境，或许对看清美籍教师的霸道有所帮助。我们知道，1901年9月，帝国主义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并向中国政府勒索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即到1940年，加上利息共达九亿八千万两。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庚子赔款”，其中美国分得三千二百多万两（合二千四百多万美元）。美国为了“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

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1906年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

“要通过‘退款办学’，来麻痹、消弭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宣统三年四月初一(即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多数学生因害怕战争即四散回家。11月9日起，学堂宣布停课。半年后的1912年5月1日清华学堂重新开学，学堂更名“学校”，“而学校的一切措施依然如故，辛亥革命对于清华学堂，只不过是革了一个名称的命而已。”“而有关清华的重大事宜，最后还是得听从于美国驻华公使馆。”美国教员占了一半以上，“他们在校内享有较高的待遇，是校内最有影响的势力。”而这些教员，“大多数是中学教员和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有的教学水平很差。”可是由于他们与美国公使馆的关系密切，“尽管不受学生欢迎，校方也不能将他们辞退。”在这种大背境下的学校，何鲁、黄秉礼他们与美籍教师的矛盾，就只能以何、黄的被开除来解决了。这也不难理解，素来痛心于清政府外交之丧权辱国的吴芳吉，要起而为何鲁鸣不平。同时也能懂得吴芳吉遭连累而拒绝填写“悔过书”这种大义凛然“不惧官府，不怕洋人，不计个人得失、挺身维护国格与民族尊严的高贵品质和无私无畏的精神。”这也能佐证施幼贻在《吴芳吉评传》里的分析是有根据的，他说：“当时，由于国势陵夷，外国教师对待中国学生极为专横，简直没有把中国学生当人看待。”[35]梁寒操在《吴白屋先生遗书跋》里，这样称赞吴芳吉：“经最高教育当局疏解，始许除籍学生各填悔过书复业，而先生独不为屈，宁舍不易得之留学权益，慨然别校，以独

求其心之所安，则豪杰之志气，又非俗子所能有矣。” [36]黎汉基在他的“两吴生传”里，也有公允之论：“吴芳吉不向清华校方权势低头乞求，毅然决定辍学，与另外七位学生代表看风使舵的表现，确确实实有所不同。这种行为是否无可批评，言人人殊；但其中并无投机卖弄的成分，为的只是个人的正义信念，却可断之不谬。这种勇于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英雄傲骨，正是其他人欠缺的。” [37]不过，黎本在这里对吴芳吉的称赞，指的是“勇于为自己行为负责”，而众人推崇吴芳吉的，更在抗击外辱而“不悔过”的气节。所以我们看到，因为立论的基点不牢，黎本的赞语也就倾斜而得出另一种结论，说吴芳吉“失去了名誉、地位、尊严” [38]，甚至认定“清华中途辍学，是吴芳吉一生最大的挫败和耻辱。” [39]

事实上，让我们的吴芳吉一直蒙在鼓里的，还有同学们的失信和欺瞒。最初鼓动起为受辱同学何鲁、黄秉礼鸣不平的同窗，后来一个二个地陆陆续续照校长的要求写了悔过书，有的还很不光彩地一面同大家一起谋划如何与校方理论，一面给校方通风报信；有的同学的家长背地里找后台、拉关系，私下做交易，心安理得。甚至于吴芳吉的好友吴宓，也在欺骗他。这一切，我们的主人公却不知情。就这样，保持着一身清白和民族尊严的吴芳吉，愤然拂袖离开了清华学堂。

吴芳吉并非孤傲固执之人，他入清华之前就深受《李二曲集》的熏陶，懂得一个人要光明正大，心怀坦荡，洁身自好，有功不傲，有错就改。他认定这正是他人生观的一部分重要内容。10岁那年，他写到：“时永川唐先生宪斌好言李二曲学，某受其影响尤深。” [40]又说：

“弱冠之年，始得《李二曲集》读之，至悔过自新一篇，大为感动。其略曰：‘悔而又悔，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至于日新之不已。’此真入德之门，而立自己之基。”[41]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吴芳吉常以李二曲教人具有改过自省的人品要求学生。吴芳吉在清华坚持“无过不悔”，正同“有过必悔”构成为人之高尚品格，字字千斤。

吴芳吉受李二曲的影响重要的还不在于为人处事的道德自律层面的指向，而是在于国家民族层面的大是大非，根本问题上，民族气节的深层情操感化。李二曲即李颢（1627—1705）是明清之际的哲学家，出身贫寒，自学而有盛名。清廷屡次征召，力辞不就。康熙召见以死坚辞。反对清廷以社学禁例钳制思想，提倡自由讲学，认为“立人达人”、“移风易俗”、“拨乱反正”、“施乾转坤”（《二曲全集》卷十二）全在讲学。因触犯清廷忌讳而自毁保洁。这种抗拒强权的精神对吴芳吉的心灵起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几年后，他在为他崇敬的革命家教育家梁乔山作传时，就是用李二曲的“成语”来赞扬梁乔山的“仰不愧天，俯不愧人；昼不愧影，夜不愧衾；在天地为肖子，在宇宙为完人；今日在名教为圣贤，他日在冥漠为神灵。”[42]

吴芳吉还为梁乔山写了一副对联：“为国十年劳，遯世埋名，直到弥留时间，过眼生前无乐境；望乡千里远，抛家别母，谁教骨肉恩爱，伤心死别在天涯。”[43]

在吴芳吉去清华之前，心中装着的偶像，最初铸就吴芳吉爱国抗辱秉赋的，绝不仅仅李二曲一人。

比如还有丘逢甲（1864—1912），他是吴芳吉非常崇拜的诗人，但他不只崇拜他的诗，更崇拜他的诗蕴含的崇高的人品，崇拜他的民族气节。

丘逢甲本是台湾苗栗人，笔名仑海。光绪进士，授职业部主事。因不乐仕宦，以亲老告归，主讲台湾衡文书院、台南府罗山书院、嘉义县崇文书院。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得悉清政府对日有割让台湾之议，大愤，即刺指血书“拒倭守土”四字。召集士绅联名电争，被拒。《马关条约》签订后，为抵制割台，推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自任副总统兼大将军，派人内渡，谋取清政府谅解，同时全面动员，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他的诗中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的悲愤、无奈，更有“卷土重来未可知，江水亦要伟人持”的抱负和期望。吴芳吉后来《论诗答 湘潭女儿》有曰：“并世有诗人，君爱丘逢甲否？汉廷自弃珠崖，十万雄师解纽。我曾踏雪莫愁，伤心廊庙芜莠。愿将岭云海日，与君为俦为友。”[44]

吴芳吉的业师萧湘，更是他崇拜的革命者。萧湘（1875—1918）1905年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师范，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萧随即加入。是年11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萧等被迫回国，以教育为掩护，与同盟会密切联系，鼓吹革命。1907年，萧湘家乡四川荣县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失败，知县王孝先下令追捕萧湘，萧受在日本时的同学邓鹤丹邀请逃到江津，在聚奎学堂讲授国文、时务课，成了吴芳吉的老师。萧上时务课，每讲到清廷的腐败、外交的失败，往往声泪俱下，学生无不感动。吴芳吉后来有言“善歌

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绮筌先生之谓也”，他说萧湘在聚奎“不过三年，然至今日，话起先生之事，无识与不识，犹令人有振聩发蒙，顽廉懦立之慨，何教泽之感人深也！”“举今人所言社会主义，文艺复兴，革命潮流，大同郅治之说。聚奎初小诸生，固无不知之，无不好之，无不习闻而饱见之矣。”[45]也因此，才有吴芳吉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才有吴芳吉对中国同盟会的了解，才有吴芳吉对孙中山的敬慕、追念。吴芳吉有幸受教于萧湘，为萧湘的革命经历所感染，誓效业师的为人、志向。吴芳吉在清华坚持不从校方的无理要求，不向侮辱学生的美籍教师低头，坚持不写悔过书，是民族尊严不容，而非仅仅遵纪守规的道德使然。吴芳吉宁愿放弃个人出国留学的美差，不顾个人得失，也要严守民族气节，维护国家尊严，保住是非大节，这样的“怪才”，正是我们应该学习吴芳吉的根本品德，也正是吴芳吉人品存在的最大价值和现实意义。有人为吴芳吉失去留学机会而惋惜，其心或许可以谅解，但论事失去前题，失去大节，苟安何为！

至于那种认为吴芳吉离开清华是他一生的最大“挫折和耻辱”，就更不知从何说起了。我们看，说“挫败”似乎还有那么一丝在理，因为吴芳吉本想去美留学，现在去不成了，不是受了“挫败”吗？可是，正是这一“挫败”彰显了吴芳吉舍个人利益小我而卫个人大节、人格、国格尊严，抗拒强权、维护正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质。我们认为，在政府和人民分离的情况下，人民抗拒强权有理，主持公道合情。再说，吴芳吉是在刚写完《读外交失败史书后》，痛陈帝国主义势力侵略、吞食中国后，去清华就碰上中国清廷用人民的血汗钱作所谓

的“赔款办学”的美籍教师又欺负中国学生的。他能不气愤？他不能站出来打抱不平？他能不要求撤换这位洋教师？他有可能接受写“悔过书”这种侮辱吗？想想，吴芳吉的行为当知“辱”从何来？何“耻”之有？当时的中国，绝不缺少软骨头；最为缺少，最可尊贵的是有骨气的人，特别是有民族气节的人！后来与吴芳吉同时在成都教书的刘咸忻，在他 1932 年写的《吴碧柳别传》里写道：“碧柳之不可及者，乃不在其激昂而在其坚实，不在其血，而在其骨。”又说：“碧柳之诗之可贵者，亦不在于激昂，而在坚实，不在气而在骨也。”[46]我们还看到，当时，也正是在吴芳吉谋事困难的时候，吴宓留洋回国在清华主持文学院，邀请吴芳吉去任教，吴芳吉谢绝了。为什么？是吴芳吉不想挣钱糊口、养家？不是的，他说：“不欲为仇讎效奔走。”[47]这就是吴芳吉，是具有一身硬骨头的吴芳吉，这就是在人格层面上参不得半点假的吴芳吉！你可以说他过分了，你可以说他不近情，但他就是他，他就是吴芳吉，就是光明磊落的吴芳吉，就是不知雕饰的吴芳吉。

吴芳吉回川没多久，有友人悲感国势垂危，函告“北方政府将托日本人代行管理，甘肃新疆割予俄德”，惊呼“亡国之祸不意及吾身而竟见之”，主张“吾等惟有逃之南洋”。吴芳吉在日记里写道“吾大不赞许。”为什么？他说：“人而以逃为计，又何以为国哉！”他决心“四夷敢来，吾与之一决战可也！”[48]后来，据《江津中学九十年》记载，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执掌江津中学的吴芳吉，忧愤至极，消息传来已是深夜。当即奋笔疾书，写成《日军占我沈阳》抗日诗歌，“此仇不报任彼猖，枉在人间走一场。”11 月 12 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

吴芳吉联合各校在城内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他率领师生高呼：“打倒日寇，收复失地，宁为沙场鬼，不做亡国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吴芳吉决心投笔从戎，毅然只身赴渝，准备参加支前部队，东下参战。江津县长谷醒华携学生代表，赶赴重庆，力劝吴校长回校，主持校政。时值友人穆济波从南京来到重庆，劝吴芳吉，深情地说：“以从军精神办学，以一人化千百人，积二、三十年时力，与日寇战，不更胜于赤手空拳乎？”吴芳吉终于回校继续“教育救国”了。这就是吴芳吉的一生，这就是吴芳吉的人生！

在这里，使人想到如钱学森这样的顶极科学家，不怕美国的胁迫、利诱，坚持回到祖国的壮举、大德，是多么值得颂扬啊！一个没有骨气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一个没有骨气的民族，是没有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吴芳吉拒辱维尊，在今天不是仍然有褒扬的现实意义吗！

还有一种说法，说吴芳吉因为在清华支持学生闹学潮吃了亏，吸取了教训，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不支持闹学潮的学生了。这真有点风马牛，不知从何说起！

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人们逐渐认识到光有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不行，还必须有文化思想革命。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大师们回顾清末明初的方方面面，说的中国有史以来出现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的客观原因。我们看看大师们是怎样说的。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的“总序”里，作者张岱年是这样说的：“中华学术，源远流长……综

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张岱年接着写道：“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对于张岱年说的第三次思想活跃期，他说：“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那么，处在清末民初的吴芳吉当时又是怎样感知他身临其境的时代的呢？吴芳吉用“思想自由之极”来概括张岱年他们说的“思想活跃时期”。这可说是不谋而合。相距七十多年的隔代思想家对同一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特征的相近看法，大体一致，只不过，大师们的表述是在几十年之后的反思，且定性积极——“活跃”，并细分了有史以来的一、二、三次，而吴芳吉的认定却是在当时，并没分史上之第次，且稍有倾向，含有指偏的内容——“自由之极”。吴芳吉在他的《昨年之一般舆论界》里，是这样说的，“自昨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发起所谓五四运动以后，舆论界之发达，乃至不可细数。盖自东周以来二千余年，始复臻思想自由之极了。”[49]

在1919年前后所掀起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客观形势要求下应运而生的思想文化革命。对于从小盼望破解“民无适从”的吴芳吉来说，他的头脑是清醒的。1917年，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思想文化领域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了另一种可资借鉴的新形态。吴芳吉认为“新文化有他自身的价值，无论如何，永远不会磨灭。”为什么？吴芳吉说：“既处现代之社会，习现代之风俗，感现代之政治，怵现代

之人心，此稍有感觉者不能自外……”因为“任何诗人，无不受他的时代与社会的影响”，吴芳吉自己当然也不能例外。不能不说，这是符合唯物史观的表述。因此，吴芳吉不但支持新文化运动，在《再论〈诗的自然文学〉并解释〈春宫的文化运动〉》[50]中，明确宣布：“新文化运动，我们是赞成的。”而且他早就以实际行动参与其中，用他后来被誉为“白屋体”新诗为武器，为新文化运动助阵，冲锋在前。在《答上海民国日报记者邵力子》[51]里，他说：“以根本论，我对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是极端赞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吴芳吉在这里说的“赞成”，有一个前提，指的是“以根本论”。对于吴芳吉的“白屋体”新诗，当时就受到郭沫若、梁启超、黄炎培、于右任、这些大师的赞赏、推崇。因为他的“白屋体”新诗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实实在在地在跟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主旨。因而，被世人誉为继黄遵宪之后的“诗界革命”的践行者。只不过他既不同意一棍子打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又不认同全盘西化的主张。并对“西化派”、“守旧派”、“突变派”一一作了不可取的分析，而走了一条持中纠偏、特立独行的道路。既没有如那些写所谓白话诗的诗人写不下去而回头再固守平平仄仄平的作家、诗人；也不像弃诗从政走上官老爷的不光彩的宝座，如投“福安部”之类的君子。吴芳吉不是不支持新文化运动，而是保持着对新文化运动的独立见解，因而也确实是不与“闹学潮”的人一起去“闹”。闹也有自己的闹法，比如公开著文立说，比如与持异义者论辩。他发表了《谈诗人》，发表了四篇论吾人眼中的新旧文学观等等。用我认同的我们的年青朋友，重庆文理学院的杨钊教授的话来说，吴

芳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为是保持着特立独行的纠偏姿态。以即不向两端的“之极”靠拢，而坚持、宣扬自己的见解。

吴芳吉在《再论〈诗的自然文学〉并解释〈春宫的文化运动〉》一文中，明确说明他把“春宫”加在“文化运动”之上，并非反对文化运动，而是看不惯一些“言行不合的人”借文化运动以授其奸，“公然藉着文化运动来做投机事业”。创作《婉容词》而引起轰动、受人刮目相看的吴芳吉，最厌恶“一切卑鄙龌龊的举动，与兽欲一样的。”对借着“个性解放”胡作非为，玩弄妇女、嫖娼买春，甚至披着学生导师、领袖的外衣与学生一起残害妓女，更是深恶痛绝。这些人玷污了新文化运动，吴芳吉反对这类人，当然不是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认为：“欲求文化运动有好的成功，首求努力文化运动的人有很好的人格。”[52]吴芳吉不与人格不佳的人为伍，怎么也说不上不支持闹学潮。吴芳吉还对传播无政府主义的人，如吴稚晖、李石曾、刘思培等，均有微词，说他们是“乡愿”，这些人当时不也是运动的积极分子？

吴芳吉在1918年3月初2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陈独秀辈，大呼文学革命益厉，推翻周秦以来数千年文学，谓为有美观而无实用，绝不认以文载道之说。其徒甚众，咸以北京大学为根据地。然矫枉过正，是由白昼见鬼，操刀杀人，欲救其弊，非以大力与之对垒，旗鼓相当，未易言也。”[53]吴芳吉并非认定古文化白玉无瑕，而是不赞成“矫枉过正”。当然，深究起来，当社会思想一经形成“潮”的时候，要以正面冲突的方式去反对“矫枉过正”，往往会因为书生气十足或自视清高而被抛弃。吴芳吉的悲剧，也可从这里看到影子。吴芳吉

还说陈独秀是流氓，以至于有机会交流不是回避就是欲与之论争。比如在1920年4月21日的日记里，吴芳吉写道：“今日校中又请陈独秀演说，偏不屑听之。”[54]不但如此，我们在吴芳吉1919年2月29日的日记里还看到这样的记载：“今夜席上，原请有北京大学之陈独秀。因陈于明日赴广东筹办西南大学，挹清诸人拟请西南大学预科划归中国公学故也。吾拟陈独秀至，就席上痛骂之，看看北大教授究有甚么威风。乃闻陈至中途，又为他人拉去，殊可惜也。今年元旦，陈独秀曾著《告上海言论家文》一篇，为同济医工学生魏嗣銮等逐条驳回，而骂其无一点科学知识，彼竟不能答复云。”[55]这些，似乎更多的是带有较浓厚的感情色彩。不论我们对吴芳吉的这种心态，作何评论，总归不到不支持学生闹学潮去。

从理性层面看，我们注意到吴芳吉用“思想自由之极”来概括中国的“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似乎并非简单的判定，而是建立在其深刻的思虑基础上的。我们知道，任何事物，不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亦或精神领域，到了“之极”的份上，就必然走向失“度”。用吴芳吉的话说，叫“过与不及皆无当也。”[56]吴芳吉似乎认定这“第三次思想活跃时期”之活跃，已经到了自由失度的地步。对于思想活跃，吴芳吉从不同角度作了记录。从微观看，还在1915年吴芳吉在上海，5月初2的日记，记下他对他身边的人的评论：“吾诸友中，雨僧则主国家主义，子俊诸友则主极端的社会主义，子一则主实得主义，只要可以进身，虽卑以下人而不顾。鹤琴、醒华辈，则主得过且过，

放荡不羁之主义，如善波等则主致人于我之主义，受众则主厌世主义。”在这些人身上的“主义”，看来并非是有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的“学说”意义上的词语，主要是指对生活、对人生的一般处事态度。这已既可说明人们思想之“活跃”，又可看出吴芳吉观察之细微。吴芳吉说要“一一而研求之”，弄清楚“何者适于今日，何者适于将来，何者可施于一身，何者可施及于人。”吴芳吉是确有主见的。[57]

从宏观上看，当年新文化运动中的“国粹派”固守老祖宗的张法寸步不让，拼命坚守于这个极端，而“全盘西化”派又持另一个极端，月亮都是西方的圆。两者都失度了。吴芳吉说“迷信西洋者，如相思病；诤言保存国粹者，如枯癆病。”[58]这就是说，吴芳吉不但在当今的大家们之前几十年已经感知到当时中国思想上的活跃，而且还意识到，在这思想活跃中潜藏的问题。

1918年2月5日，22岁的吴芳吉在日记里写道：“学者之主张既多，民益莫知所适。新学界说未立，旧日篱藩已决，人人怀疑，于是无道德之信仰。人人喜新，于是争在学术上出点不实在之念头，其最大之病，尚不在全国无统一之学术，而尤在个人无真正之信仰。即如家庭之中，一方面欲行欧洲之个人主义，而一方又无魄力冲破家族主义之限制。”[59]从“民无适从”到“莫知所适”，说明这时的吴芳吉还是在从众多的学说里，寻找适合国情的治国方略。后来他在《新群》社与曹志武一起研究社会主义，走访俄国朋友了解列宁党的情况。可是最后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一则曹志武在他之前已先逝，而他自己也因没安定的生活，而荒于研究。

吴芳吉对“之极”说不，他还判定：“此后欲为文学谋所以建设者，必在不雅不俗，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不激不随之间。苟不解得此义，则万难为最后之战胜。” [60]不过，就某种社会思潮而言，当它一旦形成，就有如山洪爆发，伴随着滚滚洪流必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因有泥沙混杂，鱼龙俱下才形成洪流滚滚。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人类社会都是相似的。这大概也可以说就是吴芳吉希望于纯正之纯正，而必然会受到委曲的客观原因，要在急流中保持洁身自好而不湿衣衫并不容易。直到几十年后的前些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吴芳吉指出的“之极”思维才开始得到纠正。才有对于“学衡派”，对于吴芳吉的较公允的评价。具体讲，是先有姚雪垠于1980年1月15日写给茅盾的信，在提出编写“大文学史”的建议中，具体提到“有一位较有才华的诗人吴芳吉，号白屋诗人……在当时很引人重视……既然在社会上发生过较大影响，要研究一下原因何在。”建议吴芳吉入他所说：“大文学史”。 [61]接着陆陆续续有专家从不同的视角抛弃“之级”思维，扩大视野对相关问题作了论证。比如罗成琰的《激进与保守——重评五四时期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辩》，比如张宝明的《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 [62]。

吴芳吉在清华“吃亏”后，确实也吸取了教训，不过不是对于“学潮”，而是待人、交友。比如对于世称“两吴生”的兄长吴宓，弟弟吴芳吉就保持着不即不离，既尊重他又不“之极”而惟命是从；既保持

个人的主见，又不走上“之极”而分手。吴宓办《学衡》，吴芳吉办《湘君》呼应，但不合流。吴宓在清华主持研究院，请吴芳吉任教，吴芳吉表示感谢而不赴任。当然这里还有“不为仇讎效力”的因素。吴芳吉对吴宓请求评诗，是有啥说啥，好就是好，差就是差。而且是用他吴芳吉的评诗标准论是非。还有一点，吴芳吉在聚奎学堂读书时，业师萧湘用他接触到的世界文明晓之以学生，一仿美利坚、法兰西之所为制，措学生自治，自定宪法，举总统，设议会，练国民军。吴芳吉还当选过“总统”。[63]到清华读书，详悉“庚子赔款”是怎么回事，知道“退款学堂”是怎么回事，更知道侵略者为“师”之霸道、无理。又受到一次民族主义的教育，又练了一回民族气节的功夫，又从“吃亏”中讨到教训，眼睛更明亮了，脑子更聪明了。

吴芳吉还从当时的业务范围对他接触到的刊物进行梳理，也可以反映“思想活跃”或说“思想自由”的情况。在1920年他写的“昨午之一般舆论界”里，在认定国内“思想活跃”、“自由之极”后，先列举了当时世人推崇的西方名人：在经济哲学上：1为马克思，2为克洛泡特金（克鲁泡特金，引者），3为托尔斯泰，4为罗塞尔（胡塞尔，引者），5为柏格森。在文学艺术上：1为易卜生，2为萧伯纳，3为莫伯三（莫伯桑，引者），4为泰果儿（泰戈尔，引者）[64]。

对于这时期的中国名人，他联系五四运动，在这年（1920年）三月三号的日记里，写道：“若就文化运动之时期言之，则其发轫固不仅在今日。”他略论道：“康有为之维新主张，梁启超之通俗文字，章太炎之革命鼓吹，尹几道（严复）之西书翻译，皆为文化运动之先导，

其功俱不可没。”吴芳吉不认为五四运动就是“白话运动”，他说：“今乃以文化运动之事业，止于白话，以白话运动之功勋，止于胡适、陈独秀，真可发笑了。”[65]这里，我们要说明为什么没有把吴芳吉所处的时代定为新文化运动，一则是吴芳吉生于1896年，逝于1932年，显然这个时间段是超过了一般史家论述新文化运动的上限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吴芳吉在这里讲的“文化运动之先导”与张岱年等关于“思想活跃的时期”的分析相吻合，亦即与吴芳吉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思想自由之极”相吻合。吴芳吉还在日记里记下了1919年“所出著名之杂志”：

报名	出版机关	销数
《新青年》	北京大学一部分教员	七千
《新教育》	江苏教育会	三千
《新潮》	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	六千
《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学会	五千
《少年世界》	少年中国学会	二千
《建设》	旧同盟会孙系（是孙中山主办，引者）	五千
《新中国》	研究系一派	二千
《解放改造》	上海时事新报一流	一万
《每周评论》	即《新潮》、《新青年》一流	二千
《星期评论》	即《建设》及《民国日报》一流	一万
《民风周刊》	广州无政府主义一流	一千

同时，吴芳吉还记下“舆论界中之比较能作文者”及常发文之刊物：

两极	《民风》
胡汉民	《建设》
胡适	《新青年》
张东荪	《解放改造》
蒋梦麟	《新青年》
杜亚泉	《东方》
杜山次	《东方》
曹志武	《新群》
杨亦曾	《新群》
汪敬熙	《新潮》
魏嗣銮	《少年中国》
宗白华	《少年中国》
朱剑农	《太平洋》
朱执信	《建设》
唐仲凯	《建设》
戴季陶	《星期评论》
沈玄卢	《星期评论》
陈独秀	《新青年》
钱玄同	《新青年》
李守常	《新青年》

傅斯年	《新潮》
罗家伦	《新潮》
刘南陔	《新潮》
宋介	《曙光》
曾慕韩	《救国日报》

显然，吴芳吉在这里的分类，并非学术上的理性判断，只不过是情理上的泛泛之言。即使是学术上的“主义”，也不就是它的所有者的定见，或是吴芳吉的准确判断。而吴芳吉也深知这些只不过是认识过程中的见解，并非定论。所以才要“研究之。”

吴芳吉还说在 1919 年与《新群》携手的杂志有《建设》《新青年》《新潮》《新教育》《新中国》《少年中国》《少年世界》《解放改造》等。[66]

吴芳吉参与编辑《新群》杂志的编辑主要人员，当时的思想观念按吴芳吉 1920 年初在《去年之〈新群〉纪事》里写道：“中国公学自民国四年停办，直到去年乃待筹备复兴。《新群》杂志，即中国公学之编译社所设也。杂志主任为周淑楷。淑楷与吾以天人学会关系，因邀我来助之，共有编辑九人，在上海者五，在北京者四，上海之同居者淑楷外，为志武及我及梁乔山、刘南陔。淑楷专任一切应酬，每期作文，多关于国际纪载，志武则专著社会主义，梁乔山专评政治，刘南陔专论经济。吾则专于作诗……杂志内容，为社论、学说、翻译、诗曲、小说、纪闻六栏”。其宗旨为“研究社会主义及鼓吹地方自治……《新

群》内部诸事，惟志武与我主持一切。” [67]

吴芳吉从 1909 年 13 岁，在《读外交失败史书后》的课堂作文里，痛感“民无适从”，到 1918 年 22 岁，在 2 月 5 日的日记里，忧虑“莫知所适”，整整九年时间，国家社会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但社稷民生的基本状态并未改变，中华民族仍然为中国向何处去苦苦思索。吴芳吉对国家前途更是忧心如焚，仍然处于探寻救国方略的苦闷之中。吴芳吉说：“学者之主张既多，民益莫知所适。”他认为：“最大之病，尚不在全国无统一之学术，而尤在个人无真正之信仰。” [68]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在“活跃”、“自由”的思想中，有了可供选择而从之的“主张”，但还缺“信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看，就是需要解决把这种“主张”变为符合中国实际的方略，并用以武装民众、凝聚人心，变为大众的行动指南。

在构成当时思想活跃或说思想自由的“思想”内容里，社会主义是影响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的影响，是通过知识精英们的传播到社会、到群众而实现的。吴芳吉正是在接触、参与这种种“活跃”、“自由”的思想、学说、主义的过程中，进行着学习、比较、筛选、研究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倾心注视着孙中山的行踪，关注着俄国的动向，关注着十月革命，把他们的“革命”与导致这种行动的主张、思想、学说、主义联系起来。并把导致这种革命的主义、学说，与中华民族深厚精深的优秀文化元素进行比较、思考，立足于祖国大地，从纵横连接的各个方面加以梳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就是在这时，通过他们的天人学会，上海的周淑楷邀请吴芳吉编辑《新群》杂志诗歌栏目，他不但获得进入上海这个中国当时文化金融、政治中心，深入了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最佳平台，而且得以和梁乔山、曹志武等一批文化精英共事。更因与梁乔山、曹志武思想志趣相近，情感追求相投而成为知交挚友，有了共谋张扬救国救民方略的默契。

《新群》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及鼓吹地方自治”，梁乔山专评政治，曹志武专著社会主义，吴芳吉负责诗歌编辑。周淑楷专任一切应酬，内部诸事由吴芳吉和曹志武主持一切。因而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吴芳吉和曹志武两人晚上均要共同读书、阅报、议论形势，读得最多的是哲学。胡适的《哲学大纲》、笛卡儿的哲学。两人常常携手出游，两人一起拜访俄国革命政府远东司令波达波夫。两人共商救国大计。曹志武“不能为诗”，却最爱听吴芳吉朗诵他的诗。一次听吴芳吉朗诵《婉容词》竟然“泣下”。有人说“吴生诗非新非旧，非驴非马，其转语之痛改”。曹志武竟气得“拍案叱曰：‘此乃所以为吴生诗也！尔可前枪毙之？’”腊月的一天，两人去吴淞访古，坐在岸边大石上观海，见有潮头一线，自远而至，大声激岸，衣履尽湿。曹志武一跃而起，说：“吾思得唐人句中，神似此境者也。”吴芳吉接过话头：“吾且思得子所思矣。”两人将所思之诗写在石头上，相互一看，皆为皇甫冉诗句：“岸明残雪在，潮满夕阳多。”两个相视而笑，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情趣之投可见一斑！[69]

《新群》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及鼓吹地方自治。”对于社会主

义，这是当时一切进步刊物都要声张的，是形势使然。特别是《新青年》杂志创刊后，“社会主义”一词几乎征服了所有的政治派别，甚至连军阀都以谈“社会主义”为时尚。当然，曹志武他们是在真心研究社会主义的。不过，他们还未能从“社会主义”中，清除掉杂质，比如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当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无政府主义也一起传到中国，一时鱼龙混杂。在《新群》宗旨里赫然标明的“鼓吹地方自治”，就是当时无政府主义推行的政策。要用地方自治来反对王权，反对中央集权，或者美其名曰以地方自治达到最后的统一。

社会主义之能征服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精英，是有其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

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使得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换句话说，就是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相对于陌生的资本主义文明来说，中国人更容易和社会主义产生思想和感情上的共鸣。在儒家经典中可以找到“世界大同”理想的大量描写。最有名的是《礼记》的《礼运》中关于“大同世界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还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佛教的极乐世界和西方的净土观念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我们还可以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看到农业社会主义的影子，从康有为的《大同书》看到大同社会主义的元素，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看到民生社会主义的内容。[70]

曹志武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在《新群》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社会问题之面面观》，[71]开宗明义就讲“我国的社会，是几十年遗传下来的闭关时代的旧制，与现在的新时势、新潮流、很不适合。如不将此种根本错误竭力矫正，则国家与人民种种的危险困苦，是无法可以挽救的。”他说，“于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布尔札维克主义、阿拉克主义、工团主义种种研究，种种宣传，都应时势之需要而起。”他分析了各种“主义”的主张，从“马克思说生产的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一切精神生活的形式”，简单地归结为“马克思派只从经济一方面着手”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而认定具有不足之处。而在稍后的《新群》第一卷第三号上，曹志武在《达尔文与近代社会思想》[72]的长文中，对马克思的思想的研究，已经进了一步。在认定达尔文学说对社会思想的方方面面的巨大影响之后，划分了社会主义的不同派别，说：“社会主义派别甚多，其在现今社会思想上有绝大势力，而以科学的理论为其主义之根据者，为马克思派。”进而论说道：“马克思之学说，根据于其所谓‘历史唯物观’。谓社会内物质生活之生产的方法，决定一切精神生活之方法。社会之组织，以经济之生产及交易的方法为基础，而政治法律思想及其他一切，均建立于此基础之上。”接着分析说：“惟经济之形式为固定的，而社会之生产力，前进不已，在一时代内，若社会生产力之前进，已超过其经济的形式之限度，则必冲破此形式，而社会内之政治法律思想，亦自然随之起相等之变化，如是者谓之革命。”接下来，曹志武判定：“故社会主义者，以为欲使社会内特别势力不再发生，永远维持平等互助的关系，

无他法门，只有使社会各个人之经济情形，一律平等而已，以此为其理论上之根据，故以生产器具归社会之公有管理，为改造社会之惟一方法。”引至这里，我们想说，在八、九十年前，曹志武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有一定深度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宣传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因此，当时受控于反动势力的一些地方邮局，下令不准寄送《新群》，而在其他的地方《新群》大受欢迎。

我们今天来重温一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论述，或许并不多于。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73]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74]的理论的核心内容。

被吴芳吉称为他们的导师的梁乔山，又是怎样在评论当时的政治、

时势的呢？在《新群》的第一卷一号、二号、三号，连续刊载了梁乔山的三篇论文，一曰《新生活之要素果何物乎！》[75]，二曰《军阀政治评论》[76]，三曰《俄苏维埃共和宪法评论之评论》[77]。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里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8]梁乔山似乎是有意地用他的语言来宣扬马克思的思想学说，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开篇就说：“因地球之公转而有寒暑之异，吾人于其寒也，故必有衣。因空气之流动而有风，温度下降，凝结为冰雪。吾人不堪其露宿之苦也，故必有居；动物非求饮食必至于死，吾人于其饥渴也，故必有饮食。”说到这里，梁乔山顺理成章作出结论：“衣食住为吾人需要至切之物。”接下来，梁乔山论述了人类为了解决这个“衣食住”的问题，古今中外生出了许许多多的理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义”，比如国家主义、君主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制定了各式各样的宪法、法律，总之，“自私产制成立以来，而保护自产的法律”，是“无所不用其极”，确解决不了广大民众的“衣食住”问题。梁乔山也涉及了各种道德层面的主意的利弊，什么“权利人类全数计算说”，什么“义务各尽所能说”，什么“利己说”，什么“利他说”，什么“互助说”。期图以正确的观点破解资本主义喧嚣不已的“正谊人道博爱平等”，提供互助、利他。宣传人生不能“专在求衣食住之满足”应更求“在以至高无上之理想养成……怀抱至正之

主义”，说“社会主义时代则社会之安宁秩序，全望吾人之义务心以维持之。”

梁乔山的第二篇文章，是抨击“民宪制度下之军阀政治”的，他说：“自武昌振臂一呼，数千年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力，均移于多数武人之手。而此多数武人者，或起自绿林，或出身仆役……只知强暴掠夺……七八年来，国家遭滔天没顶之祸，吾民处水深火热之中。”梁乔山当然不是反对辛亥革命。他就是孙中山同盟会的军事干才，他是不满于那些假革命之名而营私的伪君子，不满于国家不能统一，不满于民众之受苦受难，不满于“致成无政府之状态，而召外人之干涉”。对于这种现象，孙中山是这样说的“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其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79]对此，梁乔山提出了两条主张，一是“组织地方自治，由地方政治之发展，进而影响于中央政治”。这是符合《新群》的办刊宗旨的，也就是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主张。二是“普及小学教育”以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准和政治觉悟。这是当时“教育救国”思潮的反映，它对吴芳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乔山的第三篇文章，是为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的宪法张目的，是要打破对于俄国苏维埃政权“全世界均视为洪水猛兽”的现象而写的。文章肯定俄新宪法“全文大要皆根据马克思宣言（指共产党宣言，引者）”，并逐条进行对照比较。批评攻击言论，纠正糊言乱语，同时也正视出现的实际问题，而且认定“列宁政府除促全世界之革命而使全世界实行社会主义以外，实不能解除其各种困难也。”这大概是

梁乔山从他的认知，感悟到马克思论证的是全世界主要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的俄国一国取得胜利，这种实际与理论的差异而造成的困难。

吴芳吉在这思想“活跃”、“自由”的时代大气候和《新群》里这志同道合的知交小环境下，从他的业务职责出发著诗论艺，尽情发挥他作为诗人的灵性，抒发他的审美见解，为新文化运动创造着新景象。同时，利用中国公学这块园地，以他的诗歌作为教材，进行着为诗为人的诗教，践行着他立志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志向，以德化人。

吴芳吉自己的思想，也是同他认定的时代特征——“思想自由”合拍的，即是说，他的思想也是自由的，甚至于有时也有“之极”的表现，这在对人上，比较明显。比如他对有的人的批评，似有人身攻击之嫌，似乎除了李大钊、孙中山、毛泽东、鲁迅、郭沫若、于右任等少数几个名人之外，其他相当的著名人物，他都涉及过，都有微词、非议。在接触社会主义时，同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比如他就宣称，他主张个人无政府主义。不过，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多费些笔墨。

无政府主义思潮，最早是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于欧洲形成的，它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施蒂纳和号称“无政府主义之父”的法国蒲鲁东。六十年代后，其主要代表人物则是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们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斗争。宣称一切权力是“屠杀人类智慧与心灵”的罪恶，鼓吹个人绝

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认为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在二十四小时内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建立所谓“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的“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社会。[80]这种思潮，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直接破坏工人运动和暴力革命，起着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它从产生之日起，就曾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而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无情批判。列宁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提纲里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并说：无政府主义“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81]

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紧密相连的。正像当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欧洲觉悟的工人运动的同盟军一样，从反面的意义上说，中国的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成了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反动思潮，竟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找到了土壤？辛亥革命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时，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的社会条件，虽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对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对于严重对抗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也是清楚看到的。他们“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82]这就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由来。上述情况，对于长期活动在日本、法国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更是深有同感。正如列宁所分析的，当时在亚洲“些不注意群众斗争的准备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人，看见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期迁延下去，就陷入失望和无政府主义的境地。”[83]这些人，也一样感受到了这一“新世纪”的“社会革命大风潮”的来临。现实的斗争迫使他们考虑：为什么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欧洲，仍然充满不平等？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有国家和政府的存在，而有国家和政府，就意味着有剥削。为了避免这场社会革命大风潮，达到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空想”，这些人就地接受了正流行于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成为一套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成了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者。如果说，那时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被称之为中国的“主观社会主义”，那么，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假共产主义。两者都是时代的产物。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开始就受到一些革命民主派人士的批判。如一九〇六、〇七年间《民报》上就有《政府说》（作者铁铮即雷照生）、《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作者梦蝶生即叶夏声）、《刺客校军人论》（作者寄生即汪东）、《仇一姓不如仇一族论》（作者阙名）等文章，就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而发表的。[84]

吴芳吉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就有在中国首先举起无政府主义旗帜

的刘师培(刘申叔)、吴稚晖(吴敬恒)这两个渠道。他在清华时不用说博览报刊,广纳知识,即使是拂袖回乡后,他的朋友吴宓和我的朋友的朋友如吴稚晖等,仍然源源不断地给他邮寄刊物书报,吴芳吉在1915年5月初3日的日记里记下收到吴稚晖从伦敦寄给他的报刊[85],在“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里还对刘思培的“癸丑记行”进行了批判。[86]

吴芳吉在《谈诗人》[87]里坦然宣称“我是主张‘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人”。虽然这是用来说明他之所以“甚么文社学会”都不参加的。同时他也说了“这个人无政府的主义,也就是我与文学立论之根基”。在同年先期发表的《提倡诗的自然文学》里,还谈到“自然文学的情状,则似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是不相信要靠政治的。”[88]说归说,做归做;说是虚,做是实。吴芳吉在那个时候能靠什么政治呢?可是他作为诗人,在《护国岩词》、《两父女》、《婉容词》等诗里形象地透视出的政治倾向,难道还不清晰、明白吗?他宣布的“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难道不是用诗的语言最生动的政治表态?原来他这里所说的“不相信要靠政治”,一则是那时确无可靠之政治,再则这里他明确说的是与文学的关系。显然,吴芳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在借用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个词,说明他作为诗人,在诗的创作这个“情状”问题上的主张,与无政府主义这个政治理论术语所表达的质的界定无关。然而毕竟不能说吴芳吉完全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是形式上的,表面的,而非本质的。也就是说,吴芳吉主张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假,“个人”追求诗人创作自由是真。亦即吴芳吉讲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与政治理论指向的无政府主义在本质

上不搭界，不沾边，没有关系。可以说吴芳吉是从诗人创作的客观规律，说他主张个人无政府主义的。

人们知道，当时的政府的确腐败。清王朝以及接着的北洋政府，对内欺压人民，对外阿谀奉承，老百姓都咒骂政府不管民生死活，只顾讨好洋人。正象吴芳吉 13 时写《读外交失败史书后》就声讨的那样，一个好端端的祖国，被出卖得七零八落，吴芳吉直呼“民无适从”[89]。无政府主义数落政府的罪过，进而说不需要政府，一般人来看，似乎无可厚非，况且，到共产主义不是国家都要消亡吗？正当人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时候，贩卖假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也被吴芳吉顺手拿来了。这也就是吴芳吉没有从正面直接阐明诗的创作的个人心灵感受这个客观要求，而转了一个弯，从旁借用了“无政府主义”，算是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了牵连。但吴芳吉是诚实的诗人，不是滑头的政客，他并非在根本上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他特地在“无政府主义”前面加了个“个人”来否定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内容、政治指向。他在为梁乔山写的传记《一个文化运动家梁乔山的传》里，更跟梁量体裁衣，定制了一块“精神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招牌，显然也是他自己认同的。因此，我们说吴芳吉说他主张个人无政府主义，只是吴芳吉在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小插曲。正是在吴芳吉的《谈诗人》这篇文章里，说他“主张个人无政府主义”是要人们“把文学愈弄愈好”。为此，他还拿社会主义来为他作证，说：“犹如社会主义，其所以打破贫富阶级，不是望社会中人人受穷，乃是望社会中人人享福。”[90]吴芳吉是要用社会主义来救世的。

在这里，“个人无政府主义”这个词，是吴芳吉写下的，而诗人创作的规律，则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与《谈诗人》同年刊发的《提倡诗的自然文学》里，吴芳吉重复了他给学生讲“唐诗比较文学”时的一个观点，他写道：“诗!不是一个学问，是一种生活的表示。依生活以表示成诗的人，叫诗人。借诗，以表示生活的事，叫诗料。诗人所归往，诗料所装点的地方，叫诗世界……”[91]，这和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美学家别林斯基的说法如出一辙：“诗歌是生活的表现，或者更确切点说，就是生活本身。不仅如此：在诗歌中，比在现实本身中，生活更显得是生活。”[92]别林斯基还说过：“诗人的个性越是深刻和有力，他就越是一个诗人。”[93]又说“诗人从心坎里复制大自然……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诗人用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思想给大自然添加生气。”[94]你看，吴芳吉想用“个人无政府主义”表达的意思，与别林斯基的说法不是殊“词”同归吗？

诗是现实生活所激发的心灵的声音。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诗的多样性。吴芳吉所敬重的我国古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同生一个国度，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但他们在创作上却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因为他俩都是用“个人”的心去体认现实，用“个人”的灵魂去感知生活。在历史记忆的时空，遗留下来的往往是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杰作，而被时光流失的却是平庸仿造的赝品。没有艺术个性的诗人是不合格的。由于诗的创作是诗人个体对特定对象的“个人”感受，著名诗人的艺术个性才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仿效性。

诗的生产是一种创造性的、反映生活的个体的精神劳动。这种精神劳动，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不仅允许而且还十分必要充分表现出劳动者本人的风格、精神状态和面貌。两个诗人即使是根据同一个题材进行的创作形成的诗所表现的主题思想、艺术形象、意境格调、语言节奏、音韵安排等等，不仅不会相同，如果都是佳作，反而表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艺术独创性。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情趣爱好、文化修养和创作思路，他们用个人的耳朵谛听、用个人的眼睛观察，用个人的心灵感受，用个人的方式获得现实印象。能否用个人独特的艺术触角感受个别事物来反映一般本质或它的某些方面，则表现了诗人的才气和艺术地把握现实的才能。文学创作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现象表现本质的。个别性始终是文学创作行动的出发点。因为，在艺术上共性只有通过个性才能表现得生动；本质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显现出丰富。个别性是同独创性紧紧连结在一起的。诗人在发现个别性中，发现自己的个性，表现个别性中又表现自己的个性。诗人给现实对象以强烈的主观色彩，把对象以个性化的形态再现出来，这就是诗的创作特点。这个特点，不是“政府”可以规定的，也不需要(无)政府来操盘。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中的自然和社会便是诗人心灵的外化和对象化。诗人不但在个人的作品中塑造了客观世界，而且还塑造了个人的灵魂和形象。诗的个性化的过程，就是诗人的风格逐步形成和成熟的过程。对于吴芳吉来说，就是“白屋体”形成的过程。“白屋体”中的现实主义主要是由现实生活及其矛盾冲突所引发的诗人的真情实感的迸发与倾泻。是吴芳吉“个人”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审

美观念和性格气质在艺术创作上的综合和集中体现。从生活和诗的根本关系上讲，诗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从诗的创作本身的特性考察，诗更注重诗人“个人”心灵的震颤，感情的冲动，想象的飞翔和“个人”内心世界的坦露。这正是“婉容词”、“两父女”、“护国岩词”、“笼山曲”、“巴人歌”等吴芳吉的优秀作品，一问世即引起老少妇孺的争相吟诵，以至至今华人世界的耄耋翁妪仍然能背诵的重要原因。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里说过一段非常深刻非常精彩的话，似乎是事先为吴芳吉的观点作的论证：“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95]

吴芳吉不但是从诗的创作规律去说他主张个人无政府主义的，而且还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出发，去“改造”来自西方的无政府主义。那就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大同世界”的理想，去匡正“无政府主义”的空想。也就是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否定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有了属于他的个人无政府主义。

对于在社会主义学说创建过程中出现的假社会主义和假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一一作了批判[96]，如所谓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是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招摇过市的。列宁、斯大林同无政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才有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97]

辛亥革命前夜，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曾经出现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起源。当时，传播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有三部份人。一是以刘师培、张继、何震为代表的《天义》派；一是以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为代表的《新世纪》派；一是主要活动于国内的刘师复派。此外，还有一些深受无政府思想影响的如章太炎等人，也在《民报》上宣传过无政府主义思想。[98]

中国这些高喊革命而最早贩卖无政府主义的头面人物，都是些什么人呢？说来真是莫大的讽刺。这些人并不是简单的什么知识分子，而是几个买办官僚和封建政客。就说刘师培(即刘申叔)，他是《天义报》创始人，典型的封建士大夫。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爱国学社成员，为表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改名光汉。1904年在中国白话报上以“激烈派第一人”署名，发表“论激烈的好处”，公然主张“无顾忌”地“实行破坏”，“鼓动人民”成为“激烈党”、“激烈派”。1907年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在东京举办所谓“社会主义讲习所”，创办《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反对民族革命。1908年为夺取同盟会干事职权，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被拒遂变节。1909年为清官僚端方收买，曾参与镇压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1915年追随杨度，参加发起筹安会成了“六君子”之一，为“得了那皇帝的相思病的袁老头儿”[99]称帝造舆论，成了政治上的“走马灯”似人物。吴芳吉还批评刘师培的“癸丑纪行”“陈词芜杂，如烂货滩”。[100]

吴稚晖(即吴敬恒)从1901年起曾两度留学日本，在东京就读高等

师范，回上海后参加创办爱国学社，1905年参加同盟会。次年与李石曾等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发刊《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武昌起义后归国。“二次革命”失败，与蔡元培再赴欧洲。1924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后主张清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吴稚晖他们办的《新世纪》上，李石曾在《无政府》这篇近4万字长文的最后，概括了他们提倡的中国版无政府主义的要害有四：

（甲）无政府者，无强权也。政府借军备，而行强权。无政府尚人道，而反对之。故无政府以无强权之名，反对军备，而行人道之实。

（乙）无政府者，无制限也。政府借法律，而施制限。无政府尊自由，而反对之。故无政府以无制限之名，反对法律，而行自由之实。

（丙）无政府者，无阶级也。政府借名教，而定种种阶级，以至有贵贱，而社交不平。无政府贵平等，而反对之。故无政府以无阶级之名，反对名教，而行平等之实。

（丁）无政府者，无私产也。政府借资本，而分种种区别，以至有富贵，而苦乐不均。无政府主共产，而反对之。故无政府以无私产之名，反对资本，而行共产之实。[101]

刘师培在他创办的《天义报》发表署名申叔的文章《人类均力说》[102]，被他们吹为“最高理想”，极力主张人类均力，提出“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

到“人人独立，人人不倚他人，人人不受役于人”，才能“适于人性”，“合于人道”，也才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显然，这种极端平均主义，在人类社会里，打着“无政府革命”的旗帜，贩卖假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今天也无需费笔墨去批判吴稚晖、刘师培的所有谬论。

吴芳吉讲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与刘师培、吴稚晖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有什么区别呢？从吴芳吉《一个文化运动者梁乔山的传》[103]概括如下：

目的是：除去当时的万恶政府，到达“大同世界”。

途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条件是：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清清白白，正正直直的做一个人”，一个“善性完人”。

手段是：“就工农的本身，组织进行”，“群策群力大众革命”。说“菩萨不能超度众生，惟群众自家超度”，称赞“俄国今日之革命，最是有组织的……他革命的现象，虽发生于今日，而革命的精神，早蓄养于先年。”

吴芳吉借梁乔山写道：“他认定个人为世界的起点：假如各个个人，能够修身，自然能够家齐；各家的个人能使家齐，自然能使国治；各国的个人能使国治，自然天下是太平了。”大同世界就有了“基址”。吴芳吉归纳说，“总之，‘个人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便是做人的问题。”这个“做人的问题”，不但同无政府主义在中外社会革命中的绝对政治本色区别开来，也在思想层面同列宁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104]区别开来。从这里，不难看出，与其说吴芳吉是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

响，不如说是吴芳吉在通过为梁乔山作传把他们的观念与无政府主义区别开来。接下来，吴芳吉还把“无政府主义”的标签贴到中外一切伟大的圣人身上。他这一贴，我们看到，一方面不能不说吴芳吉却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牵扯，与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空想；另一方面，吴芳吉又确确实实给“无政府主义”注入了属于他们的新的内容，使“无政府主义”这个外壳，有了新的内核，这就是他说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吴芳吉是这样说的：“我以为世界之大哲人、大诗人及真正觉悟之人，无论古今，莫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同志。纵使没有明言，亦莫不具此理想。”吴芳吉举例说：“那透澈的苏格拉底 Socrates，怪诞的载金斯 Diogenes，直截了当的希都鲁 Theodorus 及宏深博大的释迦牟尼之流，固然是无政府主义之同志先生，就是被现在无意识的笑骂，使人不敢为他叫冤的孔孟，也是无政府主义的同志先生。”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初步的结论：

吴芳吉受过无政府主义形式上的影响，而他绝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吴芳吉追求社会主义救国，而他还没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门槛就过早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吴芳吉的长子吴汉骧，在他写的《忆先君吴芳吉》一文中，对他的父亲吴芳吉，是这样说的：“父亲虽然没有接受马列主义，但他确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同情劳动人民的爱国诗人。”[105]应该说这是非常客观的、公允的、理性的，没有丝毫的感情色彩，更没有近些年那种借为家人写史，而编织“丰碑”，拨高以“耀祖”的非“君子之道”。

注释：

[1]见《吴芳吉集》，贺远明、吴汉骧、李坤栋编校；（四川）巴蜀书社 1994 年 10 月出版，第 388 页。以下凡引自《吴芳吉集》只注页码。

[2]第 1359 页。

[3]第 1361 页。

[4]胥端甫编辑《吴白屋先生遗书补遗》第三卷，第 138—144 页，（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 59 年 2 月印行。

[5]庐前《吴芳吉评传》载《民族诗坛》总第 18 期 1940 年。

[6]周光午校刻《吴白屋先生遗书》第一卷第 11—21 页（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 23 年影印。

[7]同注[6]第 23—28 页。

[8]施幼贻著《吴芳吉评传》重庆出版社 1988 年 7 月出版。

[9]朱静如《白屋诗稿评述》（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 70 年元月出版。

[10]宫延璋《吴芳吉新体诗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课印行。

[11]吴泰璞《白屋诗人吴芳吉》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年 10 月出版。

[12]黎汉基《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 吴宓与吴芳吉》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年 8 月出版。

[13]吴芳吉 1929 年写的“自订年表”说：“民国二年再自北京归蜀，赖云阳邬君苍之助，得自宜昌，后乃沿江乞食以行。”而在吴芳吉到宜昌后续写清华同窗、亡友刘君竹的《忧患词》的说明中，又有“乞行至宜昌”，是说从北京到宜昌靠乞讨为生，而没说从宜昌归蜀是乞讨。在后来发现的刊载于南京钟山书局 1935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国风》杂志上的，由周光午校阅的《蜀道日记》，吴芳吉逐日记述了在宜昌“靦然行乞。所得，差足附川江轮回蜀。”后因故改“雇民船”回到重庆。详细地记叙了四十四天的行程。

我们认为逐日记叙的日记较事后回忆的“年表”更据有可靠性。“沿江乞食”应为笔误。

《蜀道日记》可见江津吴芳吉研究会会刊《芳吉春》2011年第三、四两期。

[14]吴芳吉著《白屋诗选》江津师专中文科选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

[15]参见张岱年作总序的《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16]见《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

[1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出版。

[18]第363页。

[19]见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0]第553页。

[21]第1—2页。

[22]见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选编《吴芳吉诗文艺》第150页，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23]第361页。

[24]第367页。

[25]1069页。

[26]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894年至192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2月出版。

[27]见《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83页。

[28]见《吴白屋先生遗书补遗》第139页，（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29]

[30]见《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302页。

[31]见刘国铭选编《吴芳吉论教育》第161页。

[32]同注[9]第15—17页。

[33]见《吴宓自编年谱》第111页—120页。

[34]见《清华大学校史稿》第1—24页。

[35]施幼贻：《吴芳吉评传》第16页。

[36]《吴白屋先生遗书补遗》第三卷第2页。

[37]黎汉基：《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吴宓与吴芳吉》第27页。

[38]同注[37]第48页。

[39]同注[37]第50页。

[40]第2页。

[41]第566页。

[42]第405页。

[43]第1346页。

[44]第178页

[45]第591—592页。

[46]见《吴白屋先生遗书》第一卷，第27页。

[47]第547页。

[48]第1211页。

[49]第1322页。

[50]第424页。

[51]第 657 页。

[52]第 657 页。

[53]第 1212 页。

[54]第 1349 页。

[55]第 1330 页。

[56]第 页。

[57]第 1083 页。

[58]第 670 页。

[59]第 1207 页。

[60]第 1299 页。

[61]见 1980 年 3 月 10 月香港《文汇报》，又 1980 年《新月报文摘版》1980 年 5 月号。

[62]见本书末“参考书目”。

[63]第 591 页。

[64]第 1322—1323 页。

[65]第 1334 页。

[66]同注[65]。

[67]第 1320 页。

[68]第 1207 页。

[69]第 534 页。

[70]参见《世界七大宗教》36—44 页、《中国历代哲学文选》第 643—645 页；洪秀全诗云：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兽畜

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后;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648—662 页;735—745 页。

[71]该刊第 1—7 页。

[72]该刊第 1—13 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81 页。

[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537 页。

[75]该刊第 1—6 页。

[76]该刊第 1—8 页。

[77]该刊第 1—7 页。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2 页。

[79]《中国历代哲学文选》第 735 页。

[80]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81]《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18 页、219 页。

[82]《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426 页。

[83]转引自《新华月报》1980 年第 6 期 91 页。

[84]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三卷。

[85]第 1084 页。

[86]第 527 页。

[87]第 406 页。

[88]第 382 页。

[89]第 361 页。

[90]第 412 页。

- [91]第 386 页。
- [92]《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 456 页。
- [93]《别林斯论文学》第 138 页。
- [94]《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 241 页。
- [95]《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648 页。
-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0 页。
- [97]《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171 页。
- [98]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 [99]吴芳吉语，见第 389 页。
- [100]第 527 页。
- [101]第《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 178 页。
- [102]同注[101]第一卷下册第 907 页。
- [103]第 387 页。
- [104]《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18 页。
- [105]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津文史资料选辑》1985 年第二辑 66 页。

二

吴芳吉带着母爱的温馨和从母读《诗》、读《书·禹贡》，背《周南》、《召南》的童趣，以及国家受辱、民族遭难初知的民族文化意识和家国心性而入聚奎学堂，有幸受到萧湘等革命志士的教育，民族意识和家国观念迅速升腾，很快有了《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这样充盈悲愤情感的理性表达，从而获得“神童”的赞誉。谁知，戴着“神童”光环的吴芳吉入读清华学堂却遭受入侵者的欺辱，被逼到“乞讨”的绝境。这种从神童巅峰跌至乞丐谷底的至极艰难困顿，绝不是旁观者所能感知的，也不是凡夫俗子能挺得过来的，更不是软骨头所经得起的。然而，对于吴芳吉来说，这种天上地下的折腾，却是一次飞来的难得历练机遇。身处艰难而知事，战胜困顿而成长！当时聚奎、清华这两所学校在一、二年内给予吴芳吉的比较效应，使吴芳吉懂得了太多的绝非课堂上教得出来的知识。使吴芳吉深深感知不同的教育给予教育者心灵的不同影响，烙下了不同印记；使吴芳吉看穿了用“神圣”包裹着的教育里面埋藏的施教者的用心；使吴芳吉感受到了才输入中国不久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别样滋味！这也练就了吴芳吉在是非、善恶面前不容丝毫调和的鲜明情怀；练就了吴芳吉骨子里容不下半点虚假的特质；练就了吴芳吉对教育的独特感悟！

当吴芳吉拂袖清华后于1913年5月离开北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湖北宜昌——回蜀的必经之地，“资斧告罄”，“孑影只身，枯索欲绝”，只得“颯然行乞”两月有余。[1]既“悲身世之飘泊”，更“感

家国之倾圮”，“惆怅莫知所止”。然而，当他“步至江边”，眼见“浩瀚洪流，心胸顿觉开朗。”吴芳吉敞开心扉拥抱长江，让浩瀚洪流冲刷、拍打，净化心灵。竟然将数月来郁结于胸的忧愤凄楚，冤屈隐痛，一股脑儿交给了滚滚奔腾的长江，付之东流了！此时，吴芳吉清华的同窗、亡友刘君竹的感人肺腑之言，忽然萦绕斯人脑际：“人生何处非忧患，寻乐还在忧患中。”

于是，吴芳吉迈出轻快的脚步，走向宜昌化缘涉足的街头巷尾，去找他乞讨新交的朋友“老伴”，“话渔樵事”去了。果然，“老伴已先在，席芦而坐，垂竿枯待。”寒暄之后，“老伴”随口而出：“先生当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哉！智者之慰藉，知己的心声！刚从奔腾的江流获得了大自然给予无穷力量的小青年吴芳吉，又从姜太公式的长者给予的人文关怀获得无比温暖的亲情般期许！苦难是一所伟大的学校。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好有一比。太上老君本想用他的八卦炼丹炉，熔炼治服桀骜不驯的“泼猴”。不曾料到，经过烈火冶炼的孙悟空，却熬出了一双火眼金睛，艺增百倍。吴芳吉所受的苦难，当然不是天神所设，却也是当时社会所处时代之世态使然！则夯实了后来成为伟大诗人和教育家吴芳吉的至善人格的根基。

将目光从注视个人的遭遇移向大自然，移向黎庶的吴芳吉，庚即“收拾行李，雇定民船”，背着他的行囊、书笈，搭上归舟起程回川。从八月七号到九月二十号在四十四天的逆水行舟中，写下两万多字的日记，不但记录了三峡的悬岩峭壁、奇峰异景，江流的翻滚狂涛，滩

中险恶。还记下船夫拉纤撑船，棹击巨浪涉水斗滩的苦涩憨态，用生命谱写的生存赞歌。更记下了两岸的文物古籍，历史遗训和世态人情，时势风云。特别是他手不释卷，苦读深思赋诗撰联的闪光实情，和他行善育童，启迪乡僻，施教于人，关注社会的生动记载，透视出吴芳吉骨子里关怀民生、同情弱者、鄙视强权的基因和一位杰出教育者的本色。

吴芳吉在这些天读了些什么书呢？日记里记有《刘基卖相》《法文咏月诗》《三国演义》《出师表》《鲁滨孙漂流记》《泰西五十轶事》《白香词谱》《南风歌》《击壤词》《道德经》《石达开遗诗》《白居易乐府》《花月痕》《吟云》《莎士比亚诗》等等。

船经入川第一站码头黄陵庙，靠岸短休。吴芳吉与因水涨流速过大不敢下驶滞留于此的渝州老翁拉家常，“谈此季收获”。交谈中，老翁评时局动乱，认为“离乱之时，总要存善心，作善事。切不可乘此时机，妄行妄动，第一要守本分。功名富贵，皆是大梦一场。”吴芳吉听后深为感动，说“老人此言有道理，可为师表。”老人接着说盼有“真命人出现”。吴芳吉以为不妥，接过话头说道：“皇帝者，残酷无人理之大贼也。总统者，皇帝之转称，亦一大贼也。……皆有强权，无公理之物。”吴芳吉在这里，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总统与中国封建王朝的专制皇帝，相提并论，似非理性的分析，而是情感的流露，却包含有可贵的真理因子。我们知道，吴芳吉在聚奎书院读书时，该校的进步老师们曾效仿西方民主制度管理学生，吴芳吉还被推为大总统，颇受学生欢迎。然而不久前，吴芳吉在清华所受的冤屈，正是美籍女

教师仗其国势所为。因此，在“皆有强权、无公理”这一共性判断上，把皇帝和总统等量齐观就再自然不过了！吴芳吉进而论及“世界亦有大和平之一日”，他说：“苟能光明心地，以诚存心，……人无彼此，境无苦乐，世界即已大同，奚用百年后为哉。是以行其道也，则瞬息可至。论其势也，恐百年亦早早矣。”老人称谢曰：“闻先生此番议论，恍如茅塞顿开。数十年来之梦，一旦得悟也。”吴芳吉是多么看重“以诚存心”啊！这不能不是在清华受同学欺瞒和离校后受亲朋白眼的直接反映。

几天后，当有同舟乘客因夜间见有一巨星起东方，疑预“有真天子出现”时，吴芳吉以诙谐的比喻答道：“真天子即是我。”这使乘客不解，问其所以然。吴芳吉论道：“天者，大公无私之谓也。观其寒来暑往，春生秋穫，四序循环，无一丝一毫偏袒之心以及群生，其一秉大公，可知也。”吴芳吉进而论及：“吾之心，亦一秉大公者也。天能公于人，而不能正人以公。天下人之私心犹勃勃焉，日盛一日。是天犹不能完其公也。”吴芳吉接着又说：“余既能公于人，而人与余接者，余亦能使之公。则天之心，不及我之公。”吴芳吉据此推之：“谓余为天父可也，况天子哉！”说得听者皆笑，一时无言以对！吴芳吉顺势抬举听者道：“谚有之‘知音说与知音听’。君等愿勿笑我。”难道，这不是一堂既能破除迷信，又能启迪心扉的极其精彩的教人为公的伦理课！

次日，船遇“兵舟狼卒”欺扰，吴芳吉又一次感慨“彼等以强横为公理”，荼毒人民、蹂躏地方。竟然忆及吴敬恒们宣传的无政府无强权。吴芳吉写道：“念念至此，极忿忿不平。恨不能一拳击列彼等恶物，

以消此怨。”迨至船过长寿，闻“溃卒劫掠四乡”，吴芳吉写下一联，“哀哉公理不如强权，清高都成齷齪。总之圣贤尽是禽兽，盗贼就算英雄。”自认为：“此联描绘世态颇尽其妙！”

吴芳吉不但爱憎非常鲜明，而且善于从劳苦民众身上吸取滋养，以修其身！

十三日，吴芳吉见“舟子终日操作，黑汗如流，犹不得一憩。挽纤者尤可怜。肩上则挽船，头上则烈日如火。足下又犖确难行。赤身露体，往还于危岩悬径上。渴则俯江边牛饮，浊水如泥。”吴芳吉既同情又感叹！这些苦力长者年近五六十，少者仅十来岁，行一次船要劳累一个多月，而所获“不过得千余文”。吴芳吉反躬自省，“谓吾到处奔波，日日在劳愁焦感中，苦无复加矣。乃竟有较吾苦千万倍者。”进而判定“以今观之，苦乐判霄壤矣。”吴芳吉更深虑社会之状，想到“舟子虽苦，犹日所饱食，夜能安眠。力资虽微，差足糊口。彼哀告无门，转死沟壑，天涯沦落，饥馁相寻，而举目无亲，进退不可者。尤不知其有若干矣。”吴芳吉悲愤地考问：“茫茫众生，茫茫身世。天道何知，生机何在。”他只能道出已知的现实：“今而后知此世界乃一黑暗惨酷之地狱矣。”吴芳吉有此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实得益于被逐出清华后的人生体验，心已从高高的学府下涉至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真可谓祸兮福所依，锤炼着吴芳吉这血性青年的品格根基。

十四日，吴芳吉在青滩上岸买回饼干等，分与船夫共享，船夫们则“报以梨”，吴芳吉身处此境，心情特别高兴，曰：“融融一船，固不啻一家兄弟也。”随即投身纤夫之中，与之为伍。共同奋斗。当船夫

奋力拉滩时，他在崖边“立石上”当起了呼号子的引领，“大呼努力”，这一呼，力凝一处，“舟子奋身而进”，並“竭力大呼前进。”迨至滩过休息，吴芳吉竟然同船夫们谈论起哥伦布的故事来了，摆起西洋的龙门阵，逗得“舟子皆欣欣然曰愿效之。”使苦力者得以享受精神的快慰。吴芳吉在宜昌登船前就买了些时令药物，入川界后又上岸买药，这些药品并非只为他个人用，而是专为上船救急所备，同船乘客和船夫，多有求药解暑、治痲者。大家竟敬称吴芳吉为“医生”，吴芳吉说：“此二字极佳，吾极愿受。”並表示：“更愿得天下病夫而尽活之。”使人想到中国的一些名人，如大体与吴芳吉同时代的鲁迅、郭沫若等都是既想到以医术救治体弱的同胞，更想到以学术提振国民的精神。

不仅如此，19日，吴芳吉还同乘客一起助船夫拉滩，並“作歌高唱”，让船夫和之。“余唱一句，舟子及诸客呼一声。而舟进一步。”这种种场境，展示的是知识青年与辛劳苦力融为一体的生动画面。在这里，已经不存在天壤之别，这大概就是吴芳吉几年后在《谈诗人》里，提出脑力劳动应该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设想，最初的人生体练的升华吧！

吴芳吉在日记里，记下了他领呼的号子：

行人何珊珊，荒径何漫漫。

穷岩绝壑，独自往还。

行行宣得已，莫作等闲看。

君不见满眼荒芜，荆棘遍放园。

又不见愁云惨雾，暗淡锁西川。

努力努力，向前向前。

振作精神，一帆出夔关。

君不想尔双亲倚门穿望眼，又不想尔妻子泪尽不堪眠。

梦魂难接，相思不断，何苦久留连。

努力努力，飞到家山。

须知道，断流仅赖投鞭。

向前向前，莫负了猿儿鹃儿，为我把行钱。

船至归州，吴芳吉上岸，不料有妇孺尾随围观，便“买饼数十，分给诸儿，诸儿大喜。”吴芳吉见相处融洽，就“写字试之”，并“教其当时刻爱清洁，不可学污浊言语，不可学骂人。”又进一步教之“彼此一群，总要长者慈其幼，幼者敬其长。互相敬爱，乃不失小孩人格。”吴芳吉回过头来又针对妇女们说，“对于子弟，不可溺爱，亦不可刻薄，总要送入学校，使其学礼节，明事理方可。”听了吴芳吉的教诲，围观妇孺“皆欣然唯唯。”吴芳吉见状，似乎感到自己尽了一分施教于人的责任，一分为人的本分，心里又添了一分喜悦。

八月二十七日，船到庙基子大滩，乘客登岸待行。吴芳吉见农妇即与之接近，欲“与谈本地风土俗情。”室外牧儿成群，驻足围观。有的私语，有的笑对，有的木立。吴芳吉觉得这些十来岁的小孩非常可爱，遂想到他读泰西故事里普鲁士国王独游山中遇乡间儿童，问国王一事。就借此“试群儿”，却多不能答、有的开口，也是马对牛。吴芳吉叹道：“得普鲁士国王容易，得普鲁士之人民难。无惑乎德人程序之

高，为我国所不及也。”这或许就是吴芳吉从教的又一诱因。

船宿杨度，吴芳吉上岸一游。见两乞儿，裸体伏沙滩上，手中一碗半腐饭菜，身战慄不能步，即心痛地让两乞儿“将鼻涕拭净”。一问，知均是失去父母无人收养的孤儿，大的八岁，小的才六岁。吴芳吉十分感伤，或有因为乞丐之怜，用他在宜昌讨来之钱，给了两弃儿各“铜圆数枚。又以汗衣二件分给之。”吴芳吉的这一善举，也感动了旁观者。

“叹为仁人”。吴芳吉竟自语曰：“此吾所以自怜耳。”这种能将心比心的怜人，这种受难不忘受难人的善心，实则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德性。客观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没有受难之时。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何处无须救济之人，吴芳吉自己不就是从“神童”佳境，跌落至乞群的吗？吴芳吉的怜人之举，一传十，十传百，到“傍晚，市中乞丐，闻余事，群来告哀，悲声震地，约数十人。余皆有以慰之而去。”

船至李渡，“有二童推舟来卖豆腐，仅十二岁，甚伶俐。余特买二十块，以志爱怜。”这只是一种善举，试想，二童的豆腐如不能卖出，岂不是不能赚回钱糊口，还会亏本吗？吴芳吉是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善行之机的。古语说，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这些，使我们似乎看到了“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感性生成环境！亦使我们懂得 1916 年吴芳吉在重庆《答某生》中说：“欲干功业，断非一人之力所得致之，大凡境遇艰危，立身高洁者，其人不朽，其诗亦不朽。”[2]出之有据，言之理确，既教其人，更勉其己。

前几天，船抵载溪，即瞿塘峡入口，因江水未退，上下之舟数十首停泊待纤。

吴芳吉趁机游白帝城，在昭烈帝廟，不但与夔州佛教会副会长续铨老僧谈“昭烈兴亡遗迹”，受到老僧的另眼相看，以礼相待，陪同观览，宴请留宿，还与老僧“谈佛教本旨”。老僧说“释家与孔子之道同宗。”吴芳吉对曰：“不仅此也。”看着老僧有些惊诧的样子，进而论及：“凡世界宗教，无不教人趋于善，步于正。千言万语，总由良心上演释而来。而其归根，亦从良心上说法。故世界宗教，无不相同。所异者，教名也。显之时了，产之地也。”吴芳吉关于“良心”的说法不无道理，或许正是吴芳吉读康德的书，从那里借用来的，康德给良心下过他的定义，说良心是人们自己意识到的内心存在的道德法庭。这就是说良心不过是自觉地遵守道德信条，道德戒律，不愈轨。不过在康德这里，尚未涉及道德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别是阶级性问题。吴芳吉则是从世界宗教的共性所言。当然，我们不能苛求 17 岁的青年吴芳吉，说他没有科学的宗教观。吴芳吉对宗教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比如，当老僧为佛教的衰弱，请教吴芳吉时，吴芳吉给老僧讲了两个六条。要知道，这不是在学校课堂上上课，作好准备后照本宣科，按教案“索骥”。而是即兴交谈啊！吴芳吉说，第一，在恢复祖教道德；第二，振饬纲纪；第三，实行初宗；第四，扫除迷信；第五，禁绝陋习；第六，建白世界。並告诉老僧说，“此六端为精神上之办法。”接着吴芳吉又告诉老僧“实质上之办法”。一是兴教育，二是辟言论，三是厚势力，四是友邻教，五是正俗说，六是裁假僧。续铨老僧听了

非常高兴，表示“待世事稍定，当一一行之。”並称赞道：“先生虽儒冠，亦佛祖弟子。”吴芳吉听老僧这一恭维，连忙声明：“余素不奉仰宗教。”态度何等的鲜明，坦诚！懂佛、知佛、讲佛，而不信佛，假佛以为我所用，为道德建设服务。在吴芳吉的书笈里还有《道德经》、老子、庄子也是他熟知的。吴芳吉是真正的无神论者，称得上是唯物主义的信徒。吴芳吉还进一步说：“释迦、孔子、耶稣与夫谟罕默。皆非余意中人。”初生之犊不怕虎，敢于藐视神灵和先师。並说只不过是老僧问，“聊以解清夜寂寞耳。”这种轻描淡写的不经意之谈使听者感到亲切，没有宿儒的架子，把人我分开。这当然只是吴芳吉的表面应对之词，实在他是在借此以宣传他的宗教观，科学的宗教观，把施教于人的社会责任，做到宗教寺庙里来了。把教育摆在挽救宗教衰弱的第一条，可以说明吴芳吉是把宗教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的，也才有“扫除迷信”的话题，才有在宗教里区别科学与迷信的必要。这也反映出吴芳吉对教育的深思和倾情。

刚与老僧论及佛教本旨，又有守军头目王栋臣来问“将兵之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吴芳吉，本性乐于施教，遂即解之。王东栋认为：“将兵，不外严明两字。”吴芳吉说：“否否。非根本之谈也。”王栋臣一听，急了，希望吴芳吉指明其理。吴芳吉说：“将兵之道，以信为重。朋友以信交，将卒以信聚。有信然后有纪，有纪然后严，严然后明。”王栋臣问道：“信当如何下手。”吴芳吉答道：“欲见信于人，必先立信。”怎样立信呢？吴芳吉点明要害：“夫能以身作则，虽无军令即自严。不待指挥而自明。不动而威，不施而德。”吴芳吉解析道：

“若徒恃长官之声势，凭军令之赏罚，以为驱驰。此乌合之众，必不能久。倒戈之事，固所常闻也。”王栋臣又说：“信何由立。”吴芳吉见王栋臣不能理会立信之理，就以岳飞戒掉酗酒之陋习使军队严明无敌，既取信于高宗，又振摄敌人。使金人无可奈何。直叹“憾山易，撼岳家军难”的事实，告诫王栋臣，说“阁下欲立信，当学岳飞为人，而后有济。”

吴芳吉在白帝城，不但有深层次的人文关怀，还触景生情，对峡中风景，大自然的灵性，更赋予智者的调度。谁会想到，这时的吴芳吉会拿此时此地的景况去与美国黄石公园和名噪于世的瑞士风光相比。认为“吾蜀风景亦不稍减于瑞士与黄石公园”。他希望能有“一二有为之人出而提倡，仿瑞士办法，到处敷设”。何处建一楼，何处立一亭。哪里宜筑桥，哪里宜辟花园。或在深山中修避暑胜地，或于近水处兴游泳场。更进而街繁处创建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学校、摄影馆、旅馆、饮食店等等，“各设其宜而置之，补山移水，使天然景物，各得穷其胜。”吴芳吉这一联想，真有借世界风光之景，再造山峡之妙。不但如此，吴芳吉浮想联翩，思想在无限的时空中纵横飞驰，认定：“则成都之青城，嘉定之峨嵋，夔州之巫山，剑州之剑阁，新都之桂湖，重庆之花岩。与夫蜿蜒之岷沱，秀丽之涪陵，嵯峨之凌云，浩瀚之瞿塘，仅足以俯仰流连，雅人心志者。”他说：“若托孤之白帝，工部之草堂，薛涛之井，桓侯之庙，更足以资凭吊，感沧桑。聚诗流，集词客。令人感慨歔歔，或歌或泣。”这哪里有一丝一毫受辱危艰，乞食垂命的影子，这哪里是行船过客的偶思。倒像是身处盛世的文化使臣的

旅游景观设计。不仅如此，“安如罗马之戏园，米兰之大寺，巴黎之铁塔，邦埤之古城，垣河之佛寺，埃及之石像，不现于吾川乎。”我们不知道，深圳世界微缩景观，重庆洋人街的建设者们，是不是受到过吴芳吉奇思妙想的启迪，却乎有那么一些无法否认的共同之处。这大概也可以说，人类文化确实确实存在毛泽东说过的“源”和“流”的关系。吴芳吉非常乐观的展望：“举此千里江山，成一级大公园。彼瑞士之风光，黄石之雅趣，不足语也。”吴芳吉并不满足于大自然的客观连接，更寄望于世人的人文关怀，主动自觉的创造。他的设计是这样的：“筑铁路，西达藏卫，北出陇秦，南接黔滇，东亘湘楚。又于金沙嘉陵诸名川，兴航政，办空运。则西欧欧亚之文化，必因此丕变，而启世界和平之曙光。”啊，世界和平之曙光！真难为这位 17 岁的青年。这既是对动乱时局之否极泰来之企望，治乱交替历史发展规律朦朦胧胧感知的反映，又是处艰危困顿之中的学子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们似乎看到今日崛起之中国的建设，在吴芳吉那 17 岁的心灵里已经在孕育了！

吴芳吉离京时，朱烈三因不忍吴芳吉衣不蔽体，送了一件长衫给他。吴芳吉特别珍惜，特别感激，决心要以此明大德之志。还有几天就要到重庆了，吴芳吉专门取出长衫洗净。并发感慨：“何谓博爱，欲人之待我者待人，是其道也。何谓义侠，欲人之助己者助人，是其道也。”啊！原来吴芳吉沿途的义举、义行，既是感恩，又是在修德哟！这是为人之高度自觉、自信使然，这是德性坚定的表现。这之后一连三、四日吴芳吉都有修身感情的记载，可见其“日三省吾身”的身影。

比如，“细思有血性然后有侠肠。有侠肠然后有忠诚果敢之心。果敢非轻暴，沉着非畏葸。”吴芳吉认为“大丈夫当藐视一切，当珍重一切。”他连日同乘客“谈仁义道德”，他认为“仁能感物，人可碎天。”承认道德的巨大力量。又与同船“谈人事苦乐”，吴芳吉认为“乐中多苦，苦中有乐。安乐安苦，节义乃见。”当船抵重庆，吴芳吉回首行舟苦楚艰辛，感触尤深，竟说：“痛定思痛，啼笑皆非，然世事惟难，而欲其不难，则难。既知其难，而安其难，则不难。蜀道虽难，又何足以难我。且巫峡之险，滟滪之奇，古所著称者矣。不履其难，安见其奇与险哉。”这些饱含哲理的感慨，透视出吴芳吉的辩证思维。所以他能处危不惊，经难镇定。见弱者而助之，遇强者而不卑。这又不能不说吴芳吉得益于中华文明传统中的辩证思维因素而吸纳之，消化之，融铸之，升华之。

在州县，吴芳吉的差资又告罄，他想到了学校，就找到县立中学，校长见小青年气宇非凡，以理相待，还与之“谈教育情形甚多，落落不俗”。校长非常看重来访的年轻人，“谓与余投契甚深，恨相见之晚。”吴芳吉告辞时，校长解囊相助。

回到家乡的吴芳吉，经过短暂的休息，疗养，未等身体完全恢复，就带着回川途中，弃儿、乞妇们饥饿病体，可怜处境和求助、企盼的眼神，以及船工们奋力拼搏的身影和短暂交流的愉情，更有那续铨老僧和王栋臣问道求知种种活生生的现实场景烙下的启蒙救国、民生危艰、教育任重的三棱印记，奔向嘉州（今四川乐山）中学，投到他的

恩师萧绮笙的麾下，当上了一名英语教员。有趣的是，吴芳吉到校后，没人理会，可能是受以貌取人的习惯势力影响，见来者其貌不扬，身材瘦弱，年岁娇小，无人问津，直到萧校长亲自出来迎接，才使师生们恍然大悟。啊，原来是吴芳吉！这又给吴芳吉一种别样的刺激，学校是尊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地方，也是造就人才的地方！

吴芳吉虽说有为师的纯情冲动，但这次投靠业师萧绮笙，更多的还是为了生计，也还有避开家乡势利白眼，冷嘲热讽，求得师恩宽慰的因素。在萧绮笙眼里，嘉州并非吴芳吉展示才华的合适场所，吴芳吉的才智应该有一个更为宽广的用武之地，以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贡献他的睿智。因此，不久上海有机会，萧绮笙就送吴芳吉去大显身手了。1918年，萧绮笙似乎已经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去世前五天，给他钟爱的得意门生吴芳吉留下一首诗，把心里的话向他倾诉：

劫火横烧已上眉，笔花舌剑尚纷驰。

狂涛万派无南北，朽骨千年有是非。

名士望尘先膜拜，老夫余泪向谁挥？

每当感慨悲歌日，一念英才一解怀！[3]

吴芳吉从恩师萧绮笙处获得的教益，是无与伦比的，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但有两点，是吴芳吉终生不忘，永远遵从的，一是“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吴芳吉说：“诸生永先生教者至多不过三年，然至于今日，语及先生之事，无识与不识，犹令人有振聩发蒙、玩廉懦立之慨，何教泽之感之深也！”[4]吴芳吉正是追随、传承萧绮笙的精神，而成就了成为教泽感人至深的教育家的！

二是，恩师萧绮笙，不但学也博，识也远，知也明，术也正，“尤在使人严于义利之辩。何谓义？志在天下国家者是也。何谓利？志在富贵功名者是也。志在天下国家则公，志在富贵功名则私。公则明，私则暗。一明一暗，而身之贤愚系焉，而世之盛衰系焉。”[5]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根基，吴芳吉终于成为“不只是一个诗人，而是近代希有的哲人。”“一位巨人，一位至高的道德楷模”。[6]

吴芳吉离开嘉州中学，于1915年春到了上海，经吴宓介绍入上海右文社担任刚于这年刊行的《章氏丛书》的校对工作。大概就那么半把年的时间，就“与社中人忤”而离开了。《章氏丛书》是章炳麟（章太炎）的著作。章炳麟当时就是大名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著名学者，是中国第三次思想活跃时期的活跃人物。这位名人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观念比较复杂，著作颇丰而横竖都涉猎，主张翻新就是左右不投机。他不但坐过晚清政府的牢，也进过袁世凯的“班房”。不但追随过孙中山，入了同盟会，还拆过孙中山的台，另组统一党。南北议和时拥戴袁大总统，“二次革命”又跟着讨袁。《民报》时期鼓吹革命，五四运动后又反对新文化，主张尊孔读经。他先激进，而后又颓唐。吴芳吉的校对身份，多半不会计较章氏的政治态度或思想观念而与右文社的经理发生矛盾，极有可能是因为章氏著作的“文字古奥难解”。吴芳吉虽然不认为“新文化”就是“白话化”，但他是主张通畅流利的。“不雅不俗”“折中新旧中外”的。或许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吴芳吉越位了，涉及了非校对该过问之事，才与右文社经理闹翻的，毕竟吴芳吉是个很有个性的血性中人，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事，

在他那里都可能成为现实。不过，吴芳吉在右文社这短短的几个月，确是难得的“充电”机会，公余遍读《老子》《庄子》《新序》《南国社文集》康德著《人心能力论》《欧战丛书》及世界语书报等，后来他自己追述说：“可以读书，增广见闻，是一大幸事。”并作诗曰：“呜呼人生如朝露！百年行乐奚足数？安得读遍古今书，行遍天下路，受遍人间苦，使我猛觉悟！”当时的生活境况，多年后犹未忘怀，曾在致友人信中说：“当时蠢蠢之志，而吉之所以幸未堕落也。”[7]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从章炳麟这个名人身上，似乎看到了中国历史上这第三次思想活跃时期，或者用吴芳吉的话说是“思想自由之极”的时代的缩影，他一人而比较真实地折射出当时各种思想流派在中国清末民初这个时空大舞台的表演。百舸争流，各执一词，此消彼涨，五彩缤纷。说到章炳麟后期提倡尊孔读经，我们的吴芳吉确是自始至终的孔孟儒学尊崇者，只不过他並不“之极”到不分糟粕精华而囫圇吞枣，比如他就不赞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倡导“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认定如不实现这种结合，天下总有一天会大乱。这个思想见之于文字的确切表达，是在稍后一点的事。

吴芳吉从上海回到老家，又去北京、上海、重庆走了一圈，再回到江津白沙，已是1917年了。这一年吴芳吉与同窗知己邓绍勤在兵荒马乱中虔诚地举行了一次祭孔活动。吴芳吉在《丁巳祀孔子记》[8]一文中，是这样记录的：“民国六年丁巳圣诞，蜀师集于白沙。乡人士畏而迎之，虚学舍舍兵。不足，自据男生学校，犹不足，据女校。诸生

方议祀孔子，闻兵且至，负俎豆以遁。翌日，诸生迁于野避之，欲追祀孔子，则传河北国军又至，有大戮。国军者，尝为独夫袁争帝位至吾乡，诸生故畏国军逾虎，因四散去。时备战既亟，划近效十里，令曰：‘戒严’，无复敢言祀者。”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诸生祀孔不能，吴芳吉祀孔的心却不死。于是“南村邓绍勤乃与吾谋，溯驴溪以入，攀巉岩，逾绝涧，渡深潭险瀑，揭行碎石上，放乎十里之外，以祀孔子。”他俩选择了一个满意的地方，“于是沐手焚香，布衣麻履，北望曲阜三拜，曰：‘夫子之道，莫晦于今日矣，亦莫著于今日矣。夫子之道者，仁之道也。仁者，天地、鬼神、人伦万化之道也。天地、鬼神、人伦万化之道不熄，仁之道不尽，夫子之道不灭，彼邪说诬行，暴政残贼，假仁义之言以盗天下者，特天地、鬼神人伦万化之一变。变无常焉，终近其本。夫子之道，何损于今日哉！某等凉德，幸生二千年后，敢以戎马倥偬废夫子祀？祀亦末也，惟心惟宅。世之祀夫子者，千百其人也。夫子之来也，非必千百其身也。我念夫子，则夫子在吾心。仰观俯察，则夫子弥六合。故曰参天地赞化育也。吾奚自暴弃哉！”施幼贻正是在他的评传里，引述了吴芳吉的丁巳祀孔后，认定：“毫无疑问，吴芳吉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9]对于一位伟大的诗人、教育家，简单地以“唯心”、“唯物”加以判定，现在看来是欠妥当的，虽然任何人都有表明自己对客观事物进行认定的自由。尤其是这种判定又是联系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一并作出的情况下，似乎更欠审慎一些。

平心而论，我们今天来谈论吴芳吉祀孔，谈论孔子，客观环境，

特别是政治环境，学术环境，比施幼贻写评传时，不知要好好多倍。那时，施幼贻或许会不自觉地感到有一顶紧箍咒在脑际晃动，落笔是要多费心思的。

吴芳吉遵从、传承孔孟儒家经典，传承孔子的教育思想的路子是走对了的，今天还应该发扬光大。吴芳吉祀孔，是1917年的事，那时，新文化运动已是初潮涌动，但还没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当已经吹响“打倒孔家店”后，吴芳吉还赋诗颂孔，足见他治学理念的坚强，人格独立的坚定。比如他在《短歌寄醴陵刘雪耘》里写道：“爱君踏雪来，煮茶话孔老。灿灿古文化，其言皆至宝。寄书请问君，群经温多少，群经温多少？”[10]在《鹃声》里，他唱道：“逆望香花朝孔子，晨昏揖拜重师威。故乡儿女总相催。”[11]在《谈诗人》[12]里，吴芳吉仍然推崇“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能这样，就能尊崇他的信条“要有独立的人格，然后配得为一诗人。”

在2010年出版的《世界眼光中的孔子》[13]一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万世师表”。这里录下开篇的两段，视野就会更开阔一些。

“孔子在英、美等国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孔子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他的名字被用来指称东方价值体系。西方的国际战略家把东亚文明称为‘儒家文化’，认为它同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一样，是决定当今和未来世界走向的三种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儒家文化’在英文中写为‘the confucian culture’，直译就是‘孔子主义文化’。”

“孔子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这决不是由于少数人的

偏爱，而应当归因于孔子本人的理想和思想，他的追求和奋斗，他的人格和精神，也是由中华民族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宏伟历史过程造成的，是同他的哲学对中国和东方各民族、以至于世界的深刻影响，以及在当今世界的意义和作用分不开的。”

我们无法猜想，吴芳吉当年是否会想到百年后的孔子，百年后的孔孟儒学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会享誉什么样的评价，但吴芳吉是认识到人类文明延绵不断的发展是永不中断，永不枯竭的，它是由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继承传扬、发展创造而构成的。这大概可以从吴芳吉关于他的自我判定，说他是“悲剧中的乐观人”，“自信此世之终有为”[14]中体会到，也可以从他反复吟诵的《忧患词》[15]感悟到。吴芳吉的这点天分，似乎也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

孔子是一个饱受忧患而又乐天知命的智者。他一生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对于个人仕途的进退、财富的多寡并不十分在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6]，因此没有为个人权力、地位的失落、个人利益的损失而烦恼痛苦。他遇到过许多挫折和麻烦，有时甚至陷于绝境，但他的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始终不改。当然，孔子个人也有忧愁和烦恼，他为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常常陷于痛苦，有时候思想显得消沉，说他想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居住。[17]他还假设，如果理想政治不能实现，他就乘木筏到海外去。[18]尽管如此，他凭着自己的使命感，凭着对于传统文化和人民的责任感，凭着他自己的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始终不松懈自己的努力，用巨大的精神力量，克服种种消极的情绪，用工作和精神追求来排遣烦恼，恰如他对自己的评论：“其为人也，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19]孔子的这些品质，也为吴芳吉所传承。吴芳吉在《忧患词》中所表达的思想，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序》 [20]里坦诚“余悲剧中之乐观人也”，说他“幼遭家难，长逢国变。”自六七岁后生活就受冻饿、金钱、世俗、积习的困扰，不得不应对兵燹戎马、风尘劳顿、名利缰锁、生死关头等凶险境况，还要时时提防虚伪、蛮横、冷酷、圆滑设下的陷阱。吴芳吉面对生活的折磨、艰危孤苦、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而“无悔吝”、“无感伤”、“未坠落”，严守父母之教、师友之助，耻言功利、浪漫、豪奢、虚荣、唾弃、凶淫放纵、偷窃卑污。吴芳吉坦诚：“以余不肖而余犹可救焉”，“明知无幸，故敢自牺牲。”“既是有为，故无须尤怨。”“礼义甲冑，忠信干櫓，吾将持此以永与斯世战争！”吴芳吉对他的自我评定，有一个简明的注释，他说：“所谓悲剧，自断此生之必无幸也。所谓乐观，自信此世之终有为也。”我们不是可以从吴芳吉身上看到孔子的影响吗？

吴芳吉生活在思想“活跃”、“自由”的时代，一直保持着对“之极”说“不”的理性思维品格。骨子里是孔孟儒学中庸之道的血脉支撑。在当时思想“活跃”、“自由”的大潮里，涌动的主潮之一，正是对孔孟儒学的肯定或否定，废或存。吴芳吉不与文化精英们为伍，去这一极，或那一极选边站队，而是以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构想，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与教育救国战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广大的教师同仁同苦同乐。该教的孔孟儒学教之，不适合教给对象的孔孟儒学陈之。

在吴芳吉工作的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根据吴芳吉与几位知交刘朴、刘永济等，倡导修建的楚辞亭，亭柱上自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楹联：“十步之内芳草；六经以外文章。”这说明明德办学的宗旨，正是以孔孟儒学为思想指导的，要以圣德化人，培养学生对国家民族的忠贞美德。而途径则是传承“六经”。

所谓《六经》，就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以后无《乐》。今文家以为《乐》本无经，皆包含于《诗》《礼》之中；古文家以为《乐》毁于秦始皇焚书、六经上说，不过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主张。首先倡此说的是元代郝经，清代袁枚亦主此说，到章学诚才系统地想出这一主张。他认为六经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非圣人为垂教立言而作。他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的命题，反对“离器言道”。章炳麟在他的《国故论衡·原经》里也倡此说。在清末民初的思想活跃期论争中包括的学校教育要不要读经，主要也是指的孔孟儒学经典。我们看到，除思想观念上对经典的肯定、否定的论争外，在制度层面，也随着政权的变更掌权者的易人而经历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的走马灯，对读经的肯定、否定，或废或存各有说法。这些教育制度也碰到“山高皇帝远”的状况，各省、各校对上不能都说不，但自己都在各行其是。客观上，也还有一个推陈出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社会课题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壬戌学制》是1922年公布的，公布之前还做了不少思想上的开路工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后，中国资产阶级多

次酝酿教育改革，1917年蔡元培曾发起大学改制。1919年章炳麟参与蔡元培组建“全国教育联合会”，还邀请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访华、讲演等等。但由于孔孟儒学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实在是根深蒂固、枝叶繁茂，他植根于中国的大地上，光耀在中国文化中，深入于中国民族炎黄子孙的心坎上，绝不是几个精英、几批精英、一场运动、几场运动就把它抹杀得了、否定得了、废弃得了的。到像是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经历“扬弃”的过程，越来越灿烂。明德的楚辞亭就是建在《壬戌学制》公布之后的1923年。吴芳吉在明德讲授国文，他讲了什么呢？下面我们引用明德中学1922年—1925年旧制二十四班学生吴灿桢（旅台校友）《明德忆旧》一文里的一段话，可见一斑：

国文教师吴碧柳，当时选读的课文均为古文诗词名著，先生授课时并泛论国学基础，认为必须选读诗经、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汉书、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资治通鉴等书以及历代诗文、名家的作品。如欲略窥浩如烟海的国学，不妨购阅四库全书提要，我虽未能如先生期望，但四年来已获得若干国学常识。先生又为提高学生对诗词兴趣，常以征对征诗的方法行之。曾有描写学校风景的“柳塘风送读书声”一句征对，我曾大胆应征并获颁《渔洋诗话》一册，使我以后对古人诗词益为爱好。”[21]

对于当时的国学，也即我们说的孔孟儒学，在中华大地的处境，似乎有点像毛泽东几十年后论世界形势的诗句说的：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同时，毛泽东自己还有“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判定，[22]不过说“秕糠”之话，大可不必认真，那似乎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的短命命题。长命百岁的，还是毛泽东在他的许多不朽著作里直接、间接引述、传承的孔孟儒学经典。

写到这里，我们是不是也该原谅原谅那些批评吴芳吉尊孔，以后又坚持不愿为吴芳吉正名的人呢？我看应该。你看郭沫若这样一直追随毛泽东的伟大诗人、科学家还因孔子而经受折腾，吴芳吉又不冤呢！不过，郭沫若又终于随那场文化大革命的短命而复甦了，吴芳吉是否还在冥府盼望郭沫若的赠诗呢？

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吴芳吉自己说他生长在侧闻孔道与世界文化交通的时代，用张之洞的话说叫“中体西用”。吴芳吉享受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抚育。保持着自己对东西方文明的独特见解，用他的话说就是“不中不西”，所谓“不中”，不是丢掉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而是不固守中国文化的消极方面，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不西”，就是不全盘西化，一切照西方的葫芦画瓢。

新文化运动要革的命，当然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儒家文化。自西汉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作为历代王朝教化民众、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吴芳吉要怎样传承？在他去明德中学之前，曾经和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诗友彻夜不眠的交谈中，谈到他的一个打算。他说，待蜀乱平息

后“仍要回去继续我的耕田生活，与教书生活。”友人不解，问：“既是耕田，如何有暇教书？”吴芳吉答道：“我是教的不要钱的书。”友人更是一头雾水，不知其意，怎么是不要钱的教书？见友人不解，吴芳吉慎重的说：“教书是人类的义务，所以不当要钱。”友人又问：“如何去教？”吴芳吉答道：“上午在家中耕田，下午便上街去教。”在吴芳吉看来“田中的五谷，是我享得天权利；街上的教书，是我报答人的义务。”吴芳吉话锋一转说：“做诗也是报答人类的义务。”友人似乎想到了什么，问：“谁伴你去？”当友人听吴芳吉说是他的爱妻儿子伴他去时，忍不住说：“你真是疯话呀！”并抬出工业社会大生产的特征说吴芳吉不懂“分工”的理论，并断定“我恐你田也耕得不好，书也教得不成了！”友人没想到他提的分工问题却触动了吴芳吉思虑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关系问题。表面上看，吴芳吉似乎是想用体现他个人生活实践上的“结合”，使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实际上他是要申斥现代社会的一大根本矛盾，通过提醒友人而提醒社会，或者他也是在尽他当义务教师之责。吴芳吉是这样回答友人的：“其实知识与劳动若不调和，将来之大乱可是难于叵测。”接着吴芳吉分析说：“世界一切的罪恶，都由于有知识的不肯去劳动，长劳动的又没有知识。因不平，而罪恶生出。”吴芳吉说因此他主张诗人也要自谋生活，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应该是提倡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吴芳吉当时说的“自谋生活”的确是从否定“不劳而获”的意义上理解的，这也有把“知识的劳动”排除在“劳动”之外的片面性。所以他说：“若是不求自谋生活，

只是吃人的饭，穿人的衣，这种人既失了生活上的资格，当然不配为生活上的批评。” [23]在这里，最值得称道的是吴芳吉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对于吴芳吉来说，诗人和教师是融为一体的。我曾经说过：“事实上，作为爱国诗人的吴芳吉，是以学校、课堂为主要平台去阐发他的诗学理论和实现他的诗词作品的社会价值的，而作为教育家的吴芳吉，是以他的诗学、诗词作为教材去传承爱国忧民之道，去传道、授业、解惑的。” [24]

吴芳吉的确当过名副其实的义务教育员的，那是在《新群》杂志社作诗歌编辑的时候。当时中国公学缺语文教员，请他去代课，开始只有 14 个学生上课，几堂课下来，学生竟增加至 80 多人，足见吴芳吉作为教师的魅力。但他却是尽义务，而未收“代课费”。

吴芳吉还多次为一承诺选就薪酬低的学校而弃往薪酬高的学校。联系吴芳吉用乞讨的钱接济有难之人，可以看出吴芳吉对待金钱的高尚人格人品品质，为师的示范精神！

关于义务教育，吴芳吉的态度是认真的，不只是有理性思维，而且有具体的设计。那就是吴芳吉于 1928 年撰写的“建设聚奎义务大学提议”。

吴芳吉关于智力劳动者应参加体力劳动的分析，实际上是感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从有其必然，因而也必然造成体力劳动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成为脑力劳动的附属品，进而必然形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立的尖锐矛盾，更进而造成吴芳吉所说的“罪恶生出”。社

会“大乱”。本来，共产主义学说已经指出“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三大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尖锐矛盾，也是共产主义学说理论所阐明的重大理论问题。灭消三大差别是消除社会不平、消除社会弊端的必然要求和必经之途径。吴芳吉从社会的不平已经感知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他个人为解决这个问题的设想，不管这个设想有多么的幼稚，不管这个设想有多么的没有可操作性，总不能说吴芳吉的设想没有前瞻性，没有警示性。而他身先士卒，更是值得称赞的。或许如一个与孔子同时代的人曾经评论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25]是对孔子非常准确而传神的描绘。如果用来说吴芳吉关于脑、体劳力的融合问题，是不是也有准确传神的味道呢？

还应该看到，吴芳吉关于知识劳力与体力劳动的有关问题的论述，是对吴芳吉自己所尊从的孔孟儒学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直接否定。这就是说，吴芳吉的尊孔，信儒是有选择的，是有他自己的标准的，是用社会时代这个大筛子筛选的。

这里，使人想到施幼贻认为“儒家思想中不合理部分”，“大大地束缚了他的思想”。本人在拙作《试析教育家吴芳吉教育实践轨迹》一文中，对此说过：“作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却是应该基本肯定的，对吴芳吉的影响也是正面的，并未束缚他的思想。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洪流中鱼龙混杂，各种社会思潮风起的情况下，一些对吴芳吉的贬斥，早该反正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是顺应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与时俱进的，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有价值的。孔子是中国古

代杰出的大思想家，儒家学派的首创人，又是开创中国私人讲学的大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化教育的发展关系很大，对东方思想到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界，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孔子一生中四十余年从事讲学，他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提出了极其宝贵的主张，对吴芳吉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了吴芳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26]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对立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划分阶级而产生的。一切阶级对抗的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就是脑力劳动者即剥削阶级的代表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克服这种对立的社会条件才会形成起来。这些条件至少有三条：一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消灭剥削阶级；二是空前地提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广泛地吸引他们来参加国家的管理；三是人民群众有掌握文化、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可能性。即使到这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间对立的消灭，并不等于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这种差别只有在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才能消灭。

关于知识和劳动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在后来有过精辟的论述，那是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他在总结五四运动时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比辛亥时期的知

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27]在《青年运动的方向》里，毛泽东重申了他的这个观点，并说：“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28]在这一年稍晚一点、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了“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的政策导向。

后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毛泽东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29]

本来，人类劳动，一开始就包括脑力活动与体力活动两个方面，并且是结合在一起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二者的结合，是人类生产劳动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的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一部分人能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才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脑力

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社会里，科学文化和技术知识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垄断，体力劳动者与统治阶级及完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部分脑力劳动者之间，处于对立的地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进步，强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把大批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加深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当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后，重复着资本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只不过，更增加为反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封建残余服务的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如刘师培、吴稚晖之流，还有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些“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30]的依附于资本的知识精英、诗人。混迹于保守派，改良派、革命派之间的投机知识精英。

吴芳吉正是在接触社会主义的学说过程中，接触到社会分工的理论，感知到社会矛盾的深层次根源的。当然，这里也有无政府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的鼓动和无政府主义自己的言论。客观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在吴芳吉那里，还是感性多于理性，初识未达其真。

吴芳吉关于用他的义务教育来解决体脑劳动的差别、对立问题的设想，虽然只是一种良好的个人愿望，或者说是一种空想，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却是认真的。从吴芳吉的“义务”教育，我们似乎看到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周游列国，在杏树下设坛讲学的情景，但更多的理论来源是“西学东渐”后，西方义务教育思想的影响。

近代意义的义务教育，一般是指一些国家把学龄儿童入学接受一

定年限的普通教育，作为儿童有受教育的义务，家长有送子女入学受教育的义务，国家有开办学校、任用教师、供应教材等让儿童能够入学的义务，并把它写进法律或教育法令，用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强制实行，称为义务教育。

最早提出义务教育主张的是十七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他要求：“为一切儿童，不分等级，财产情况和性别，设置普及的，义务的国语学校。”主张“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进学校”，“不独有有钱有势的人的儿女应该进学校，而且所有城镇乡村的男孩和女孩，不论富贵贫贱，都应该进学校。”[31]最早的义务教育法令，是1619年德意志魏玛邦公布的学校法令。但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普及初等教育为主的义务教育，大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当时是大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有文化的劳动力，兴办国民教育，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工人子女进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又是无产阶级争取教育权的斗争成果。马克思在1866年《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指出：要保护工人阶级的未来——工人的子女，并使他们受教育，“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才能办到，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32]就是要用立法的形式确立义务教育，才能为资本家和工人所接受。

随着生产向机械化、电气化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要求提高劳动者的智力因素。为了使教育适应社会发展，许多国家进行了教育改革，延长了义务教育的年限，由四年

七年增到十年左右。义务教育年限的长短、发展的快慢，普及率的高低，是由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正确的教育政策和措施，也是重要的保证。

吴芳吉提出“义务”教育，绝不是为他自己捞什么好处，而是从国家民族、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思虑。他在为梁乔山作传时写道：“教育能够普及，不患人民没有觉悟。人民能够觉悟，不患社会之不改良。那时节，人人都有教育，人人自会觉悟。社会问题若可以和平的解决，自然少些麻烦；若必经破坏的手续，也可不致糜烂。如此去做，社会上的痛苦，便可慢慢减小。减到极小限度，虽不算为大同世界，亦已相隔不远了。”[33]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教育救国思潮对吴芳吉的影响。

1928年，吴芳吉在《建设聚奎义务大学提议》[34]里，对义务教育作了他的定义，称：“夫所谓义务教育有二解：一、凡人皆当受之教育也。二、学校不征取学费之教育也。前者为学生之义务，后者学校之义务。”这就与世界范围关于义务教育的内涵有了共性。对于义务大学的宗旨，吴芳吉是这样说的：“宗旨：本大学以实行知识公开，教育机会均等，辅助寒士研究各种高深学问及专门技能，以立己立人，建国救世为宗旨。”这是包含中西文化融通的标本，是不中不西，有中 有西的文本。在课程设置上，也是与世界潮流接轨的，又是特别重视本国、本土实际需要的，是从实际出发的。比如规定：“先设乡里最需要者，次及其他。”比如说：“蜀于文学史上人才最多，蜀人之性，亦最宜文学。急应设置文科”；比如：“自重庆商埠以外，数百里间，无

一新式医院。疫疠流行，则百万人家无所托命。急应设置医科，俾乡里无夭殇枉死，中西医亦不尽分。”比如：“东川土薄，不经久旱。十年之间，辄再见饥馑。故预防荒旱，增加地力，研选种子，改良耕具，以及栽桑种麻，养鱼饲蜂，莫不直接关合民生。急应设置农科，俾乡里得以饱食暖衣。”急应设置土木工程科，应用化学科，商科，艺术科等的周到安排。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提及的，一是规定要有“通儒处士”。什么是通儒呢？这是指通晓古今，学识渊博的儒者。什么又是处士呢？这里指有德才而未做过官的人。这是吴芳吉传承孔孟儒学必须的安排。二是规定：“毕业及学位做英、法、荷兰考试制度……惟学士衣帽，无论男女，一律汉唐冠仪，不用外邦基督教服。”这是吴芳吉既要学习西方，又必须保持传统文化的精心安排，是吴芳吉爱国主义情结的具体体现。

吴芳吉在稍后为创建重庆大学而规定的宗旨，则更精辟、科学：“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重庆大学校史办的老主任，重庆大学吴芳吉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程汝强方家说：“吴芳吉给重庆大学订下的宗旨，具有普遍的意义，是说到大学的本质了。”我是很赞成程老的观点的，现在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已是今非昔比，大学的种类千姿百态，大学的分工五花八门，可是有不研究学术的吗？无非是学术的深广度有差异而也；有不培养人才的吗？无非是人才的专业有所不同罢了；有脱离得了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吗？没有，不会有！除非那不是大学，不是高等学府，不是教育组织、我们当然不是主张所有的大学都只准用吴芳吉的十六字为宗旨，清华大

学从吴芳吉入学时的“造就领袖人才”到实行自由教育（又译“通才教育”）到后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35]四川大学，从胡峻的“仰副国家，造就通才”，到吴玉璋的“崇尚学术，启用新派”，到张澜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到后来演绎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36]除了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校长，根据当时的时代要求有自己的选择外，其造就人才，救国为民的本质也是清楚的。东北大学从最初的“兴学育才，御辱图强”，到“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就社会之需要，谋为化之发展。”[37]西北大学的“报以国华适于世用”。[38]设有吴芳吉研究所的重庆文理学院的校训是“进德修业，博文达理”。[39]明德中学一直坚持以“坚苦真诚为校训”。[40]这叫百花齐放，丰富多彩。可花是离不开土壤、空气、阳光的；花必芬芳、异彩。这叫表和里的关系，形和质的关系。吴芳吉在谈他的文学观时，打过一个比方，我们在这里借用一下，或许并非无用。他说：“文学作品譬如园中之花，道德譬如花下之土，彼游园者固意在赏花而非以赏土，然使无膏土，则不足滋养名花。”[41]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其他大学的宗旨或者校训，就只有形而无质，就没有根本意义的内涵。

我们曾经用“德化教育”来概括吴芳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最初是从吴芳吉教育实践的实际中间接感知的，即吴芳吉在教育教学中处处以德化人，成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导师，是以心灵高洁、志向高远、品德高尚开导学生的引路人。当我们进一步思考其所以然时，才领悟到在吴芳吉的思想根基里的文化脉络。用吴芳吉的话说，就是

“生长中国，则闻孔道”；“世界交通，生命广大”；“得以周知人类感情之变，藉探世界文化之根。”一个明晰的思想文化的逻辑链条，紧紧地、深层次地展现在吴芳吉的人生追求、文化融通、教育理念、育才方略中。这个逻辑链条，就是：中国伦理型的文化传统，铸造了中国伦理型的教育传统；中国伦理型的教育传统，伴随“六经”并行，《诗》教为首，在杏坛蔚然成风。并融通人类文化开出的文明之花，结出的文明之果，在吴芳吉的教育实践中展现出一幅幅以德化人的生动情景，构成吴芳吉德化教育的画卷。

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伦理型文化，这是中国文化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特征，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我们看到，虽然也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是“求真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求善的文化”，然而更多的学者把西方文化概括为“智性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为“德性文化”，是更精确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建了一套成熟的道德体系，形成了丰富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以及宇宙伦理的道德规范体系。并有一整套完备的道德教育理论。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在这第三次思想活跃时期，有位“之极”者，被人们认定为复古派的辜鸿铭，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人的精神》[42]的书（有意思的是：这位中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书，却是外文写的。人们还需从外文翻译成中文。），论证中国文化的伦理性质和西方文化的知识特征。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他说的“君子之道”，也就是孔子之道。在这里不但“道”和“德”，在

本质上是同一个意思，“善”和“德”也基本上是一个意思，都是讲伦理，讲道德，讲行善讲追求善，讲以德化人。辜鸿铭当即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批判是理所当然的。辜鸿铭不但维护、宣扬孔教儒学“之极”到连中国女人的缠脚“三寸金莲”，都认为是“美德”。也有敬重他的人如林语堂称他为“怪杰”，骂他的人如胡适之说他是“怪物”。辜鸿铭对“全盘西化”的“之极”主张，用了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否定”的“之极”态度针锋相对，不但写文章，而且到西方去演讲，当仁不让。吴芳吉对当时的思想活跃，用“自由之极”来形容，的确是有根据的，对当时的思潮的把握也是比较准确的。

今天，我们平心而论，“晚清以来，辜氏从爱国爱传统的立场出发，不懈地抨击来自西方的政治压迫、文化侵略和民族歧视，对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那个时代，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真正有勇气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十分罕见。虽然在评价他这方面的活动时，我们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但总体说来，我们应给予其充分的肯定。”[43]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不是仍然需要“从爱国爱传统的立场出发不懈地抨击来自西方的政治压迫、文化侵略和民族歧视”，“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吗？今天我们走上了和平崛起的康庄大道，确有那么一些官员、名人、名星，纷纷送子到西方去寻找安乐窝。也有的人先把钱汇出去，然后把户籍办出去，然后……。是不是也该扬弃“中国人的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向损害中华民族“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的人、的国家说“不”！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在重视伦理道德的同时，并不轻视知识，而

是德、智统一的，只不过有一个主次而以。在这里，“智”是为“德”服务的。《大学》开首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44]吴芳吉任教的湖南长沙明德中学的校名，就源于此。学习知识就是为了完善道德。《礼记》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45]这是讲“道”（德）要达到的境界：天下为公。《论语·学而》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6]就是说把学习知识放在次要位置上。用吴芳吉的话说：“学以养性情，学以变气质，学以安身立命，学以化民成俗者也。”[47]又说：“所谓学者，学以高尚其志气，学以开拓其心胸，学以仁民爱物，学以明体达用而已。”[48]吴芳吉进而认定：“士必先德而后学，有德而无学，尤不失其有德；有学而无德，则无以养其所学，终于未学。……人必修德，犹是焉耳。”[49]

儒家甚至把天地自然也纳入到伦理之中。北宋哲学家张载有一段很精彩的话，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上）[50]他把天称为父，地称为母，把人民称为兄弟，把万物称为朋友，完全把自然人伦化了。

中国伦理型文化绵延几千年，自有其必然如是的客观根据。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伦理道德就是协调人的社会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主体精神的宏扬，人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道德伦理对于增强民族内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群体、协调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并由此而使中国社会得以向前发展。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的信念，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一种协调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关系的观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妻从”就是调节家庭关系的伦理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诚实待人”等就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伦理观念；“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就是关于个人修养的伦理观念。此外，诸如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笃实，克己奉公，见利思义，忠贞爱国等都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精华，也是吴芳吉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52]

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从古到今，在中国人的道德体系中，是否爱国，成为衡量、评价一个人一生的主要的乃至最根本的标准。吴芳吉作为诗人，爱国主义成了他诗歌的主要内容，如《年假别嘉州》《东归席上留赠诸子》《红颜黄土行》《万岁之声》《江津运动会会歌》《护国岩词》《笼山曲》《巴人歌》《仇货买不得》等等，充溢着浓浓的爱国之情。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53]这种感情，是国家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保证。应该说，每个民族都具有热爱自己民族和祖国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吴芳吉来说，爱国主义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吴芳吉正处于中国人民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中，因屡遭列强侵略正处于苦闷中，思索中，呼号中，爱国主义始终是鼓励着中国人民抗击外敌、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儒家语境下的“成人”有着一种很强的社会性意味，即不是满足

于本体性的个人完善，而是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是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传统教育。中国教育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选择、传播、改造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传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教育传统。从理论上讲，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是同步发展的，但是实际上却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教育有相对的独立性，有时教育落后于整体文化的发展，例如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近代科学传播到中国士大夫阶级中，但却没有在学校教育中反映出来；有时教育会超前于整体文化的发展，例如清末民初，教育采用了西方的学制，但当时中国的文化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尤以封建文化为主体。教育不仅对文化有一个选择和改造的问题，教育对自身也有一个选择和改造的过程。中国的教育传统的发展就是对自身不断选择和改造的过程。

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国教育也就是伦理型教育，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说文解字》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中庸》开宗明义：“修道谓之教。”[54]《学记》称：“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55]这些都是从人的道德修养的角度说教育，《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然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

本。” [56]教育就在于格物致知，修身养心，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把个人的学习同国家兴亡的命运联在一起，这是中国教育的传统。虽然当时是对统治者所言的，但历代知识分子都把它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影响到后代，读书报国，教育兴国，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这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一开始就同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成了中国教育的最高理想。儒家从“从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出发，突出强调道德和道德教育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因此，儒家教育就成为连接个人、家庭、家族和国家的纽带。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中国传统教育更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从教育价值观到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渗透着儒家的精神。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教育，就是传承儒家文化的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以伦理道德为最高价值取向。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教育首先要教会学生做人，做一个人格高尚的人。教育之所以被当作一项道德的事业，是因为其根本价值追求在于增进人民的幸福。一本《论语》都是讲人伦道德，讲仁、义、礼、仪，讲什么人是君子，怎样成为君子。

儒家的“仁性”观表明教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人的存在性目的。指一种“成德之教”，儒家的道德现已经形成了一种为多数人认可的儒家伦理的“基德”或“母德”。修身的关键在修德。

今天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如果从这个视角关照道德，那么人与道德就构成不可分割的一体，道德是末，人是本，道德是手段，人是

目的，道德为人，不是人为道德。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对我国学校德育如何做到“以人为本”更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学校德育必须关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人的本质观，要把学生看作德育实践的主体与客体辩证的统一体，并在学生的共性发展与个性塑造两方面要保持协调。

有学者对《中庸》中“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57]，作如是理解：尊德性始终为目的，而道问学则是手段，途径。目的决定了手段的意义，同时反过来，如果明确了目的，则手段本身也就成了目的。即是说，在“尊德性”的前提下，“道问学”本身就是“尊德性”的实践。教学的根本就是成了培养人的德性。[58]

对西方教育来说，关于德性的问题，在古希腊文化中就受到重视了，只是后来被资本主义“钱”的文化所玷污了。吴芳吉是称道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他们的影响也毋庸置疑。他们自称其使命就是教人为善，而致善的途径就是获得知识，最终成为具有完善道德的人。因此，他们通过与美诺的对话，得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苏格拉底提倡追求的知识，还不是真正客观知识，而是有关伦理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的概念体系。

柏拉图也不赞成对待科学的实用态度，而认为科学只是为了使人灵魂更加美善，更加富有德性。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和助手，对道德品质教育，把重点放在道德习惯的形成上，提出从体育到道德教育再到智力教育，这种德智体和谐发展的主张至今仍是世界教育的理想追求。他认为科学不在

于实用，因为“专一追求有用，不能形成高尚自由之心灵”，它是为了个人德性的提高，为了谋求幸福这一至善。[59]

吴芳吉对“德”的理解，立意宏大而深远。至德必善，至德必公。以公论事，以公判人，天下为公。特别是，他对资产阶级嗜“钱”为命，唯“钱”是从，持根本的否定态度。认为是私而不善，恶而不公。他甚至于把父母对子女希望以名（官）禄（利）进孝，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对“孝”的污浊，而加以反对。1917年5月，吴芳吉在家务闲，15日因母亲责其未进孝而陷于沉思。“下午枯坐，急欲著吾《天人之书》，分为《人才论》，《学术论》《真理论》《家庭论》《政府论》，而《家庭论》旨以打破父母万能、亲子尚私为第一义。”他认为：“亲子相处，不以义而以势，不以理而以私，不以教育为基而以债权债务相合。”是不道德的。吴芳吉是孝子，但他一方面遵从传统的孝道，同时又认为应该根据时代的进步，赋予孝道以新的内容，把对父母的孝道，置于对国家，对社会的大德之下。即以重大公而轻家私。他说：

亲者，有债权债务者。子为亲所生养，负债者也。故亲之望子，不望其行道德有学问也，惟望能偿债者足也。子之事亲，但以能偿债者可以为孝也，道德学问亦非所望也。上下交征，要在于私。私在一国，则一国乱，私在天下，则天下乱，此世之所以不治，道德学问所以颓败而无已乎？[60]

这就是说，吴芳吉认为要把“修身、齐家”放在“治国、平天下”之下，相较之下，“修身、齐家”为私，“治国、平天下”为公。“修身、

齐家”，应以“道德学问”为旨归。这里，显然是从思想观念的高度讲的，而非否定子女对家庭父母的孝道包含经济的内容。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教”并行的。吴芳吉就是从三岁始读《诗》，背《周南》《召南》接受教育的。诗教，本指《诗经》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是说：《诗经》中作品虽对王室政治有些讽刺，但并不作直接、尖锐的揭露、故教人以温柔敦厚。这种说法同《诗经》的实际内容并不完全相符。但由于儒家竭力提倡，在封建社会中影响很大。孔颖达疏：“《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宋梅尧臣《还吴与文舍诗卷》诗：“《诗》教始二《南》，皆若贤圣。”明海端《注唐诗鼓吹序》：“古先王成就人才，由今考之，大抵‘六经’并行。《诗》教为首。”后泛指诗歌的教育宗旨和风格。

诗教在于立德、启智、健心、育美、燃情、创新，方法上是对话、交流型，而非灌输。

吴芳吉就是用诗来宣示他的人生观，指导他的教育实践和他的创作的：

三日不书民疾苦，
文章辜负苍生多。

郭沫若最称赞吴芳吉的这一抱负，在《送吴碧柳赴长沙》诗中说：“洞庭古胜地，屈子诗中王。遗响久已绝，滔滔天下狂。愿君此远举，努力轶前骧。苍生莫辜负，也莫负衡湘。”

吴芳吉在《新群》杂志任诗歌编辑时，在中国公学及某师范女校讲授他创作的《两父女》，“闻者颇多感泣”，因而有人提问“此事真实否？”这使吴芳吉想到，需要向学生讲明文艺作品的内容的“真假”这个文艺理论问题，于是他以《红楼梦》为例，论述：

“天下有真幻二境。俗人所见眼前之形形色色，纷拏援攘，谓之真境，而不知此等物象，毫无固着，转变不息，一刹那间，尽已消灭散逝，踪影无存，故其实乃幻境 Illusion 也。至天理人情中事，一时代一地方之精神，不附丽于外体，而能自存，物象虽消，而此等真理至美，依旧存住，内观反省，无论何时皆可见之，此等陶镕锻炼而成之境界，随生人之灵机而长在，虽依幻境，其实乃惟一之真境 Disillusion 也。凡文学巨制，均须显示此二种境界，及其相互之关系。Aristotle 谓诗文中所写之幻境实乃真境之最上者。Illusion is the higher reality.

《红楼梦》之真假云云，即写此二境。又身在局中，所见虽幻，而处处自以为真。大观园及宝、黛、晴、袭、所遭者是也。若自居局外，旁观清晰，表里洞见，则其所见乃无不真，太虚幻境及警幻所谈，读者所识者是也。凡小谈写世中之幻境至极浓处，此际须以极淡之局外之真境忽来间断之，反读者如醉后乍服清凉之解酒汤，或如冷水浇背，遽然清醒，则无沉溺于感情惘惘之苦，而有回头了悟，爽然若失之乐。

《红楼梦》中，此例最著者，为黛玉临歿前焚稿及宝玉出家。皆 Disillusion 之作用也。”吴芳吉还说他的《两父女》是诗，不是小说，举《红楼梦》为例，实类比也，“说他是真的也可，说他是假的也可”。

[61]这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在 20 年之后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话》里讲的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问题。

两三年后，吴芳吉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任教，后又兼任稻田女校的文课，让吴芳吉没想到的是，学生见他就一起唱诵《婉容词》，到使吴芳吉觉得尴尬。吴芳吉当即以诗劝导之：

稻田儿女最矜奇，买得小吴作讲师。
苦我温饱廊下过，嘲人争唱《婉容词》。

莫唱此词动我愁，南来遁隐几春秋。
声华落尽无遮掩，人比寒梅更畏羞。[62]

这真是诗教的典范，诗教的魅力，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华传统教育的魅力。

更有甚者，我们看到，吴芳吉在毕业生座谈会上，吟《新衣引》[63]为毕业学生送行，又用《稻田第九班女儿毕业将去，于其最后一课歌以别之》[64]作为最后一节课的教材。还用诗回答开导升学失意的学生陈鼎芳。鼓励她说：“吁嗟鼎芳勿弃捐，后湖莲叶何田田。”[65]

再录吴芳吉的《论诗答湘潭女儿》。[66]更可见其诗心之执着，诗心之坦诚，师心之高洁，师心之伟大。

—

上古有诗人，君爱屈灵均否？
《离骚》字字幽香，中有芳魂一缕。
我曾打浆汨罗，採得蕙兰百亩。
愿持宝璐琼枝，与君为俦为友。

二

中古有诗人，君爱陶靖节否？
荆卿一詠瑰奇，孤云落落谁偶？
我曾跨马柴桑，唤取东篱菊酒。
願随带月荷锄，与君为俦为友。

三

近古有诗人，君爱杜少陵否？
骑驴飘忽半生，君国一腔白首。
我曾荒宿草堂，解衣长望南斗，
愿绕池树追凉，与君为俦为友。

四

並世有诗人，君爱丘逢甲否？
汉廷自弃珠崖，十万雄师解纽。
我曾踏雪莫愁，伤心廊廟芜莠。
愿将嶺云海日，与君为俦为友。

吴芳吉以其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育人宗旨的教育实践，受到全国许多大学的征聘，求贤若渴。当时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的校长张澜（表芳）为了挽留吴芳吉，不但给吴芳吉写信还给吴芳吉的母亲刘素贤写信，因张澜知道吴芳吉是孝子，希望她劝说儿子留校任教。同时又给吴密发电报，打悲情牌，说：“蜀中聘人不易，吴君若去，敝校必顿生困难，……敬乞允予吴君留川。”成都大学本科一年级中国文学系全体同学集体同时也给老师吴芳吉写信恳求，说：“先生一日之羈

迟，即生等一日之荒废。”可知吴芳吉在成大的声誉之高和在学生中的影响之深。[67]

几十年后，吴芳吉创建的重庆大学的党委书记欧可平教授，为《吴芳吉论教育》题词曰：

重大创始人，中国教育家。[68]

注释：

[1]见《蜀道日记》，以下凡引自《蜀道日记》不再注明。

[2]第 620 页。

[3]第 1265 页。

[4]第 590 页。

[5]第 590 页。

[6]朱静如《白屋诗稿评述》第 55、56 页。

[7]第 684 页。

[8]第 375 页。

[9]施幼贻《吴芳吉评传》第 142—145 页。

[10]第 157 页。

[11]第 218 页。

[12]第 406 页。

[13]施忠连著《世界眼光中的孔子》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3 月出版。

[14]第 553—559 页。

[15]第 1069 页。

[16]《论语》第 73 页，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5 年 2 月出版。

[17]同注[16]第 97 页。

[18]同注[16]第 44 页。

[19]同注[16]第 75 页。

[20]第 553—559 页。

[21]梁赐龙编辑《明德中学建校 85 周年纪念册》第 49 页 1988 年 12 月 20 日刊印。

[22]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载《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李世昌编著，南京出版社出版。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皇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23]第 416—417 页。

[24]刘国铭，《试析教育家吴芳吉教育实践的轨迹》，见《重庆文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

[25]同注释[16]第 164 页。

[26]刘国铭，《试析教育家吴芳吉教育实践的轨迹》，见《重庆文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546 页。

[28]同注[27]第 554 页。

[29]同注[27]第三卷 862 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9 页。

[31]《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知识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出版第 177 页。

[32]《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第二版第 207 页。

[33]第 403—404 页。

[34]第 568 页。

[35]《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 1981 年 2 月出版。

[36]《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编《四川大学史稿》第 1—4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8 月出版。

[37]中国教育报刊社组编东北大学撰稿《东北大学》第 3 页，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月出版。

[38]西北大学。

[39]见《重庆文理学院校史（1976—2006）》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1 月出版。

[40]参见《明德春秋》。

[41]第 453 页。

[4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43]见《中国人的精神》第 4 页，译者前言。

[44]崔钟雷主编《大学 中庸 尚书》第 8 页，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2 月出版。

[45]《中国历代哲学文选》第 97 页。

[46]同注[16]第 3 页。

[47]第 478 页。

[48]第 556 页。

[49]第 641 页。

[50]顾树森编著《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下册第 93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1 年 12 月出版。

[51]《马克思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18 页。

[52]参见注[50]。

[53]《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608 页。

[54]同注[44]第 28 页。

[55]程昌明译注《礼记》第 79 页，远方出版社和 2004 年 3 月出版。

[56]同注[44]第 8 页。

[57]同注[44]第 53 页。

[58]参见刘万海著《德性教育学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 月出版。

[59]参见《山东教育》杂志编《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知识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出版。

[60]第 1148 页。

[61]第 97—98 页。

[62]第 164 页。

[63]第 164 页。

[64]第 172 页。

[65]第 173 页。

[66]第 177 页。

[67]见刘国铭选编《吴芳吉论教育》。

[68]见刘国铭选编《吴芳吉论教育》

三

吴芳吉在中国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因其一篇课堂作文，彰显了他过人的英才睿智，而被誉为神童，又只因为争一口中国人的民族气节而落难受苦，但却保住了无私无畏的硬骨头品格。吴芳吉还因其诗作诗论而享誉世人，又因不愿随大流，既不与文化激进主义为伍，又不与文化保守主义同流，保持着特立独行的风格，创造了开一代诗风的白屋体新诗和他诗、人合一的诗论与实践。

在1923年，吴芳吉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就受到过毛泽东的称赞。当时，一个叫文强的学生，将吴芳吉为学校楚辞亭撰写的对联：“楚辞亭畔无情水，屈子洞中莫逆交”改了。说改，不过是巧妙地颠倒了上下两句的最后三字，成了“屈子洞中交莫逆，楚辞亭畔水无情”。对此，校方认定学生文强犯上，要处分文强。吴芳吉却认为，不能因学生改老师的对联处分学生，况且也改得好。因此，文强免受处分。不久，此事被文强的表兄毛泽东知道了，当即赞扬文强“才思奇捷，落笔非凡”，又说“芳吉知春 芝兰其香”。[1]在这里，毛泽东既夸奖了文强的文才，又肯定了吴芳吉的师德。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强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在“追忆吴芳吉恩师荣诞百周年”的十首七律里，[2]有如下诗句，就是说这件事的：

犯斗狂生终得救，除名校籍免悬牌。

湘中诗友毛书记，座上芝兰点到翁。

记得三年前的8月，吴芳吉应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校长胡子靖诚聘，与同事谢祖尧、刘永济（弘度）一同去赴任时，刚开始新诗创作一年

多点的四川同乡郭沫若有诗为吴芳吉送行，对于这首诗的后两句苍生莫辜负，也莫负衡湘。郭沫若有一个说明：“君有句云：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说的是这两句诗就脱胎于1918年22岁的吴芳吉在永宁中学教书时所写的“戊午元旦试笔”诗里的两句。

郭沫若的这首送别诗，並不是一首一般文人墨客在酒后茶余的随意的应酬之笔，而是胸中存有“不负苍生”共同抱负的热血青年的临别共勉，一对同乡知己的激励誓言。这里有“不负苍生”的共同人生追求，这里有超越屈原爱国爱民的奋斗目标，这里有脚踏实地的为身边民众鼓与呼做起的忠告。也可以说，这是志同道合的两个同乡向世人的顶天立地的召示！

郭沫若从事新诗创作，肯定与“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有关，更正确地说，那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支奇葩。同时，我们看到，郭沫若的这一“新”举动，也正是他读到《戊午元旦试笔》，读到《婉容词》等吴芳吉名著的时候。吴芳吉1920年六月十四日（庚申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记下：“得郭沫若自日本福田来书，评吾《笼山曲》、《明月楼》诸诗为有力之作，而《吴淞访古》一律最雄浑可爱。[3]《婉容词》一首，使之另受一番感伤，寻出一种 sentimental 之眼泪云。”在这年8月《新人》月刊上发表的《谈诗人》里，吴芳吉还谈到收到郭沫若给他的《三叶集》，说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有与他相似的见解。这都清楚地告诉我们，郭沫若送吴芳吉去明德中学赴任的诗，不是一时的冲动之作，而是建立在对吴芳吉的诗品、人品有深入的了解基础上的，认定吴芳吉就是自己文学事业可信赖的同道哥俩。

我们还知道，吴芳吉的白屋体新诗，当时就受到倡导“诗界革命”的文化巨人、改革维新的著名帅才梁启超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在梁启超给吴宓的信中，他这样说：“《壮岁诗》瑜不掩瑕。《哭柳潜》三首纯乎其纯。将来必为诗坛辟世界，请得介绍而友之也。”使人非常遗憾的是，这一信息是在梁启超去逝后，吴芳吉才得知的。吴芳吉十分惋惜地说：“时某以奔丧返家，竟不之答。岂意先生今亦谢世！而某之不自长进，亦永无以副先生望耶！”[4]

与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等一起倡导“诗界革命”的梁启超，显然从吴芳吉的诗里看到了“诗界”的景致，看到了“诗界”之后继有人，看到了“诗界革命”有了开辟世界的闯将，他们正殷切期待的新军。

历史总是爱给人们开玩笑，总会有一些相处于同一时空点的人，阴差阳错地不能相见、相识，留下永久的遗憾。1920年3月13日（农历正月23日），在《新群》杂志社任诗歌编辑，同时授课于中国公学的吴芳吉与同事曹志武都未接受学校欢迎去听梁任公的演说；中午学校校长在兴华川酒楼设宴招待梁任公，请吴芳吉去作陪，吴与曹又没应邀。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来，吴芳吉似乎若有所失，错过了与梁启超结交的良好机会。[5]这是吴芳吉的个性使然。他是一个正直自律、知情达理、血气方刚、忠肝义胆、自主意识较强的血性男儿。在这思想活跃时期，确实有些并无想思而很活跃的人，你方唱罢我登场。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吴芳吉不轻信任何名人，敢于与之探讨，勇于与之论辩。生就一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情

怀。他特别看不起以圣人自居，不拘小节，人品不纯的人。比如：他敢于评驳当时响当当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胡适；比如他十分鄙弃显赫一时而多不检点的陈独秀，甚至骂他是流氓；他愤笔与邵力子论争；他在一篇文章里，一连评论了十多位名人的诗著，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地以他的“真诗”标准，一一作出判定，就有批评“黄公度（即黄遵宪，引者）今别离，气象簿俗，失之时髦”的话[6]；他批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刘诗培、吴敬恒、李石曾。总之，他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一副坦荡胸怀。他的诗，更是指名道姓地斥责当时手握大权的官僚、军阀，毫不避讳，敢说敢当。有趣的是，人们从他近一百万字的遗著里，却找不到他对当时的风云人物孙中山、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革命志士的贬损之词，有的只是关注、敬仰。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位欲以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青年情理中的必然反映。至于文强在他的《文强口述自传》里说“吴芳吉先生是毛泽东的老师”[7]，我们却没找到依据。而且从俩人在湖南长沙活动的足迹来看，他们的师生关系是不存在的。我们从逢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来看，认定多半是文强口述之误。我们还注意到“吴芳吉先生是毛泽东的老师”这句话，在书里是用括号括起来的，不知是否录述者有所保留而有意括之。

吴芳吉对梁启超的诗，是有褒有贬，以他关于诗的评价标准，符合者则褒之，相违者则贬之。褒言其该褒之理，贬言其当贬之据。对

于梁启超的《志未醉》，吴芳吉热情地加以赞扬。称它是“真正的佳诗”。说该诗“通篇字句声韵皆自乐府化出”，“韵多前后重叠，不加修饰，质朴浑成，……全篇所言，皆今人之所欲言，不必道其愤世嫉俗之情，而苦心亮节自见。”並称赞其具有时人好言之“现代精神”。进而推论“此诗精神，雅能代表新国新民（请注意，梁启超 1902 年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民说》）之艺，回忆少而希望多，肝肠热而步履健，今人皆具此志，国事安有不可为耶？”吴芳吉推而论道：“诗之最高价值，非仅俱少数学者之玩味，亦非徒博群众之推崇，贵具能在处处以俱宜，语人人而皆悦。”这评诗的论断，大概既符合“诗界革命”的要求，又合符新文化运动的本旨。吴芳吉对梁启超的《志未酬》，在总体上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无伤大雅的“凑合”。足见吴芳吉评诗之认真，之求实。吴芳吉评了梁启超的佳作，也不讲情面的指出梁氏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虽然“风靡一世，实则全属村夫入城气象，皆未足为真诗”。这就是吴芳吉的为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总是有话必说，有说必尽，不计较其得失如何。”多么真诚坦荡的表白。[8]

吴芳吉是最看重为文与为人的一致的。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谈诗人》的文论，发在 1920 年 8 月的《新人》月刊上。吴芳吉说：“谈诗要分作两面：一面是谈诗，一面是谈诗人。因为诗的工夫，原是两样兼具的：一是诗的修养，一是诗人的修养。”这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吴芳吉说：“充满宇宙虽是诗的材料，但没有好的诗人，也寻不见好材料来。”他做了一个比方，说：“譬如诗人是一个母亲，做出的诗便是他的儿女。没有好母亲，自然教不出好儿女。所以要解决新诗

问题，先要解决新诗人的问题。” [9]他是不赞成口头革命派的。

吴芳吉指出：“凡是诗人，都有他的透底的人生观与宇宙观。” [10] 我们知道，在这一时期还是吴芳吉在探求救世救国救民之理论指导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时的吴芳吉还未获得定形的人生观、宇宙观的哲学基础，即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所以在这篇谈诗人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他用社会主义论说他的观点，我们看到他用个人无政府主义来说明诗人创作的个性特征。我们还看到他阐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对于社会进步的必然性等等理论的同时出现，说明吴芳吉正处于思想理论的比较、筛选、提炼的阶段。

吴芳吉英年早逝，引起政界、军界、文化艺术界诸多名人悲痛不已，纷纷诗赋以悼。于右任感叹“生大文豪天亦难，遇大文豪世不易”。吴芳吉在西北大学任教时，被围城困了二百多天。当时，于右任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可是他们并未蒙面，而是诗韵相通的神交，直到吴芳吉辞世，这位早期的同盟会员，国民党的元老，感慨没能与吴芳吉这位“大文豪”相会。于右任与吴芳吉，还有一件抗议外籍教员的类似经历。于右任考举后曾因讥刺时政遭清政府拿办，后潜逃上海入复旦学院，旋因抗议外籍教员干涉校务而离校。1906年赴日本访孙中山，入同盟会。在于右任吴芳吉骨子里流淌的是同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鲜红血缘。

冯玉祥将军特别赞扬吴芳吉的人品。他在谒墓诗里有云：“在清华不回还，中外人人把头点。”“被围八个月，那是在西安。有米送给人，自己饿死亦安然。”“志士仁人心，既是英雄又好汉。”西安被围，吴芳

吉受困，是冯玉祥的部队去解的围。冯玉祥也未与吴芳吉见过面，也是从吴芳吉的诗认识吴芳吉的。所以 1944 年春，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阶段，冯玉祥将军从重庆到江津开展抗日募捐活动，就特地邀请吴芳吉的两个儿子吴汉骧、吴汉骥去作客，并对他们说：“你们老太爷的诗我读的很多，也很欣赏他的创作道路和品格。他的《婉容词》、《两父女》都脍炙人口”。冯玉祥还到黑石山吴芳吉的母校聚奎中学给师生作报告，特地去拜谒吴芳吉的坟墓，留下《谒墓诗》表达他的敬意。

[12]

黄炎培称颂吴芳吉的诗是“善翻格调出天然。” [13]

至于吴芳吉的挚友吴宓、刘朴、刘永济等，学生周光午等对他的评价，我们就不在这里占篇幅了。

吴芳吉辞世后，虽然还有如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名人，社会活动家留念着吴芳吉，在吴芳吉的诗稿上留下他的追思墨迹，永久的崇敬：“廿年前眼泪，今日尚新鲜。明月楼何在？婉容词有笺。灿然遗手稿，凄切指心弦。幸有侯芭在，玄文次弟传。” [14]但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国家的当务之急，主要矛盾的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成了主要课题，渐渐地人们把吴芳吉遗忘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是火热的建设任务，腾不出手来，更重要的是当时左的思潮不但人们不敢顾及吴芳吉，还被视为曾经妨碍新文化运动，是逆流给予批判。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姚雪垠给茅盾的一封关于编写“大文学史”，并明确提出吴芳吉应该入史的意见后，人们才又开始追思吴芳吉，研究吴芳吉，包括台湾在内的各地都在收集、整理、重

印吴芳吉的遗著。出了一批论文、传记、专著。不知是否出于使论证有据的原因，人们在说明吴芳吉白屋体诗的意义时，往往抬出黄遵宪作为评价的历史标榜立论，说黄开创了“诗界革命”，吴芳吉则继之“诗界革命”。因为黄遵宪的“诗界革命”说，似乎已是历史定论，拿黄遵宪来评说吴芳吉，似乎既顺手、方便，又省事、简捷。

较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刊载于《师大月刊》文学院专号上的宫廷璋撰的《吴芳吉新诗评》，较全面精当地评论了吴芳吉的主要诗篇，并认同吴芳吉“主张革命、主张创作，而革命创作之道则在‘旧罽盛新醴’”之说，还引用吴芳吉关于“诗恒怀四旨：无忠厚之气象，不足以矫偏欹；无热烈之感情，不足以动凉薄；无美艳之辞章不足以滋枯朽；无自由之格调，不足以言创作”的诗论，来比较吴芳吉与清季的何廉昉与黄遵宪。说何氏“虽当时极得曾国藩称赏，而不能表现时代精神，不能表现作者个性，仅为雕虫小技而止。”说“吴芳吉所以胜于何廉昉在其随时随地一切事物皆可入诗”。又说黄遵宪“取当时国事与个人经历入诗，而格律又不拘于古诗，故世称诗体革命”，认为吴芳吉“取材之新尤与黄氏相类，比诸当代党国名人于公右任诗，亦可谓旗鼓相当。”认为吴芳吉的取材“与黄氏相类”，就是就诗论诗了。

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重又评论吴芳吉时，就有更多的学者常常用黄遵宪来提挈吴芳吉。

对于吴芳吉被冷落，当代著名诗人丁芒在《论吴芳吉诗观及其实践的当代价值》里指出：“忧国忧民者遭嫉忌，无权无势者受贱视，独

树一帜者被孤立，先走一步者受嘲弄，当代又有多少改进？”丁芒在从社会视角论述吴芳吉的诗观时，专门论及“人品重于诗品”。他在引用吴芳吉之言：“任何诗人，无不受他的时代与社会的影响”，“所贵于文学者，非仅学为文章而已。学以养性情，学以变气质，学以安身立命，学以化民成俗者也。”“欲究作品之生灭，惟在文心之得丧，不以时代论也。”之后，正确地论说道：“诗人无不受其所处时代与社会的影响，即为诗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影响其时代与社会、化民成俗。因此，诗文成败全在于人品的高低。”并进而结论曰：“吴芳吉道出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诗品与人品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因果逻辑，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并说：“他的诗充满入世精神，始终紧扣现实政治盛衰的脉搏，反映了众多与国家安危有关的重大事件，一股忧国忧民振励精世的气势溢于言表。这正是他的人格的体现，也是他的诗观的体现，至今读来，犹能动人心魂，励人进取。”“他创建‘白屋诗体’真是特立独创。前无古人，旁无其他。而且孤军奋斗一直到死。这不能不承认他的创造的锐气。”[15]

四川文艺出版社原社长，成都吴芳吉研究会的顾问杜谷在《山雄水壮唤诗魂》论文中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就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戊戌政变失败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著《饮冰室诗语》继续鼓吹‘诗界革命’并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要求‘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对进步诗歌的一个概括和理想。黄遵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当时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早年就提出‘我手写吾口’，反对模

拟古人的主张。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表现方法上，他却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如‘复古人比兴体’” [16] “惟有白屋诗人吴芳吉独树一帜，继承并发扬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诗界革命’的优良传统，不但‘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而且对‘旧风格’进行了初步的改造形成‘旧风格’基础上的‘新风格’。这种新风格，亦即时人所谓的‘白屋诗风’。这种诗风，究其精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白屋诗魂，白屋诗艺，白屋诗体”。 [17]

北京野草诗社原副社长、中华诗词学会函授中心导师苏仲湘说，吴芳吉“生活的时代，正是风雨沉沉，夜气如磐的旧中国，他具有一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持民族尊严的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这在当时是不少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留洋镀金，从而飞黄腾达的道路，然而吴芳吉却并不愿意在这条道路上把中国人的尊严一起赔将进去。” [18]

中华诗会原副会长、甘萧省诗词学会会长袁第锐在《改革岂堪成绝响，先贤遗迹漫追寻》里写道：“吴芳吉早期作品，不仅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同时又具有浓郁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其激越的程度，直与投身民主革命的革命家如出一辙。” [19]

成都吴芳吉研究会的理事刘同德认为，白屋诗风“不仅在内容上多前人未解之境，且艺术上能博采众长、含英咀华，自成一格，对中国诗歌发展创新所作的重大贡献，超越了黄遵宪诸家。” [20]

四川大学教授张放明确的认定“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见载吴先生，是明显的失误。” [21] 丁芒诗家说：“最痛心……如果早点拥有吴芳吉，也许少走不少重复的路。” [22]

谷声滢寻历史的足迹，写道：“黄遵宪等的‘诗界革命’随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夭折，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始有吴芳吉继之而起。”[23]

我们从近代到现代到当代引述的诗家们关于黄遵宪、吴芳吉的一些论述，显然是正确的，他们的许多精当分析，不可能、也没必要一一照录，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这里，我们还想补充一点关于黄遵宪的不足，用一句学术语言来表达，就是黄遵宪受资产阶级改良派局限性的束缚，最后竟然滑向保皇派的窠臼。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同吴芳吉同日而语的，用黄遵宪提振吴芳吉，在我看来实得其反。最少在黄遵宪那里，“诗界革命”不能成为全称判断，好在在前面引述的评论一般都是就诗论诗，未有涉及政治态度，为人品德的。因为对于黄遵宪来说，入诗界是没问题的，而“革命”就不那么对劲了。不要说他整个儿一生都不是革命派，只是地道的改良派。就是在他的诗里，虽然主要的部分可以为“革命”的外延所认同，但他的咒骂太平天国的作品，反对义和团的作品，赞扬、歌颂镇压人民革命的汉奸、刽子手的作品，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作品，无论如何与“革命”搭不上界。

难怪在我们前面引述的诗家说的黄遵宪创作体现“诗界革命”时，其主要标准仅指“以旧风俗含新意境”。当然，黄遵宪也写过如《台湾行》这类具有“革命”意义的诗篇。否则，诗界也不会把“革命”奖赏给他。

在吴芳吉的诗、文里，是找不到黄遵宪留下的那种遗憾的。有的只是闪闪发光、摧人奋进的时代之声，引领民众抗击侵略的火炬。

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不愿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

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决心以身殉国。他在狱中，又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4]这里的“杜根”即指黄遵宪。政变发生前，康有为得光绪密诏到上海办报，康氏推荐黄遵宪到北京替自己筹划。黄因故滞留上海，一个多月后，政变发生了，谭诗里的“待杜根”即指等待黄遵宪进京。这里是谭嗣同面向死亡流露出的一点遗憾。

为了说明黄遵宪为诗和为人的分裂，我们还想从另一角度看看黄遵宪的思想根基，看看能否说明黄遵宪的政治主张、政治行动对他的文学成就的深刻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并未收起他们的主张，继续宣传通过君主立宪为资产阶级争得一些权力，他们也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出一些不损害其根本利益的要求，所谓“文明排外”的措施，与其说是反对侵略，不如说是一方面想借以说服清王朝实行改革，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方面，是用来恐吓革命派，说革命一定要导致帝国主义灭亡中国。

梁启超在十九世纪初比他的教师康有为的调门还要唱得高一些。斥责清王朝的伪改革，高谈民主自由，甚至提倡“大变革”、“大破坏”，不过说来说去，还是由“不忍破坏之仁贤者”来实行“无血破坏”。即使这样，与梁启超一起提出“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对梁启超的主张都感到害怕，于1903年以“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署名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即所谓“驳革命书”[25]像梁启超责备清王朝玩火一样，说梁

的主张也是玩火，劝他更加审慎些。黄遵宪本来与梁启超、夏曾右等在一起，他的主张完全可以与梁当面说，又何必必要做成铅字而面世呢？说穿了，实际上是为了扩大影响，让改良派的主张更符合清王朝的意志。这种在“诗”上“革命”，而在“革命”上“保皇”的行为言论，是人品分裂的暴露。虽然黄遵宪用诗的形式纪录过中法战争、甲午之战，留下《冯将军歌》、《悲平壤》、《哀旅顺》、《台湾行》等，但他的灵魂深处所固守的，是清王朝的地盘，并为帝国主义预留了领地。

黄遵宪怎样“驳”梁启超之“革命”呢？

需先说明的是，梁启超是公认的改良派而非革命派，这里的所谓“驳革命书”，所驳的，并非“革命”之论，而是苦口婆心的规劝梁启超改良之过急之言。现在我们顺着黄遵宪的行文看他驳了些啥，又是怎样驳的。开宗明义，黄遵宪认定中国没有“革命”的民众基础，而把真正的民众视为敌人，他举例说：“自张陵创立五斗米教以来，竟以黄巾扰破季汉，其后如宋之方腊，明之徐鸿儒，近日之洪秀全，皆愚妄无识之徒，而振一呼，云合响应，其贻害遍天下，其流毒至数世而犹未已。”这里所举的例子到是有“革命”的味道。不过黄遵宪的视角是与当时的王朝、统治者一致的，而他要告诉梁启超应该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否定的，不可效仿的，应该觉醒的。

其次，黄遵宪认为绝不能借英法而喻中国，说他每一念及梁启超讲“英国查理士第一国会之争，法国路易第十六革命”，就“鼻酸胆战”。现在写信告诫梁启超也是“含泪而道”。这是想利用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以感伤之情劝导梁启超。黄遵宪认为，中国专制是有害的，而且

“专制政体之完美巧妙”已有数千年历史，“虽十卢骚（卢梭，引者）百卢骚千万卢骚，至口瘖手痠，亦断不能立之导之行也。”还说“日本之开国会，非必不能免之阶级，不可逃之夭孽。”

第三，黄遵宪认定：“吾辈今日报国之义务，或尊王权或唱民权，或唱民权以争官权，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迹若相非，而事未尝不相成。”黄遵宪与梁启超毕竟都是君子，不好直接劝梁“尊王权”，只好转弯抹角地说，争王权、民权都一样，不外乎是争官权。一下就说漏了嘴，把内心的小算盘，借“报国”而谋私说出来了。

黄遵宪继续打悲情牌，说他与梁启超的“目的，固与我同”，之所以一再劝导他，并非“阻公之锐气，损公之高论。”当时，革命派曾以严复翻译之《天演论》阐述之“优胜劣汰”为理论武器，论说世变之理，革命之必然。梁启超从他的角度也言及此论。因此，黄遵宪，进言：“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推之，其变态吾不知，其结果吾取断言。”断言什么结果呢？他说：“虑其说为制造祸患之毒药。”黄遵宪又转过来安慰梁启超，说：“祸患未由而弭，此政府之责，非公之咎也。”挚友之情弥深，什么都想到了，连退路也有预案。

接着，黄遵宪劝导梁启超：“若夫后生新进爱国之士，有唱革命者，唱类族者，主分治者，公亦疑其非矣。”为什么呢？黄遵宪告诉梁启超，政府有轮船有铁轨有枪炮，“故论今日政府之弱，可为极矣，而以之防家贼治内忧，犹绰有余裕也。”如果坚持“唱革命”，必然“事无幸成，徒使百数十英豪，万数千良懦，血涂原野，骸积山谷。”这是多么可怕的场景啊！不知道，作为诗人的黄遵宪，可知杜甫描写的现实：“朱门

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知道，他是否心疼这些冻死骨！不过可从他对黄巾、方腊、洪秀全的态度略知一二了。

接着，黄遵宪以“内患”、“外攘”之利弊立论，主张“同心协力，联合大力以抗拒外敌。”并抓住在他之“驳论”前一年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的《新民说》，将梁的军，说“以新民命而立国本，而反纷纷然为蛮触之争，鸡虫之斗……诚知今日大势，在外患不在内忧也。”如果，由内忧外患之孰轻孰重，而得出的结论，到此为止，这无疑还是有道理的。可是，黄遵宪笔锋一转，把茅头指向了“爱国之士”，说：“爱国之士，反唱革命分治之说，授之以隙而予之以柄，计亦左矣。”这一来，黄遵宪不但把“内忧”之责归罪于倡导革命之人，而且为侵略者开脱罪责，是我们自己“予之以柄”，再说，这不是让梁启超也要负他担当不起的责任吗？

黄遵宪认为，唱革命的“新进后生爱国之士”，是“以识时务自命”之“当道”者，他们並不懂得“天赋人权为何物，民约之为何语”“谬以为唱民权必废君主，唱民权必改民主”，如若任其所为，只能为虎作伥，那就成了“中华之罪人，亦大清国之乱臣贼子也。”黄遵宪唯恐梁启超不明白这个道理，还“以史为鉴”，举出后唐高祖石敬瑭，勾结契丹自称“儿皇帝”，灭唐建晋（后晋）和李自成引狼入室，招降吴三桂，吴伙同清兵入关，杀明朝永历帝。始有清。忠告梁启超不要大肆鼓动，“恐议论未定而兵既渡河，楫让救火而火既燎原。”到那时就“无可如何也”。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黄遵宪接着告诉梁启超，说梁主张的“由君权而民权，一度之破

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是不可取的。他说：“仆以为由蛮行而义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就也。”而且他又把历代民众抗官府的义举和社会的动乱一股脑儿称之为“怙恶”，並反诘道：“以如此之民，能用之行革命、类族、分治乎？”黄遵宪再次表明自己的心愿：“平生所最希望，专欲尊主权以守民权，以为其势较顺，其事稍易。”

黄遵宪重提戊戌变法失败的惨景，要梁启超牢记，千万不能再干“媚外人而骗吾民”的蠢事。说梁现在还要“唱革命”，如果有人问我，“仆亦无辞可答也”。那堪“茫茫后路，耿耿寸衷，忍泪吞声，郁郁谁语。”黄遵宪把自己说得处于万难之下，是为了恭维梁启超的《新民说》，他说：“而阿意公之新民说遂陈于吾前也，罄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公尽取而发挥之。”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照此一呼百应，“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东西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先，此列祖列宗之所阴助，回万万人主张托命”，已经“震惊一世”。黄遵宪说梁启超“今日之学”伟力无比，也救了他。黄先自设困境，然后颂扬新民说之伟力。在一般人看来，接下来应该是鼓励梁启超大干一场了。谁知道黄遵宪的笔锋又一转，告诉梁启超：“然正以此故，其责任更重，其关系乃更巨。”结论是“大不可也。”梁启超的《新民说》写了六大问题，黄遵宪在这里，抬了“论自由”，引用“罗兰夫人所谓‘天下许多罪恶假汝自由以行’大不可也”来告诫梁，並说，如果你的学说被无政府

主义用作口实，“以无君无政府为归宿”，你怎么能担当得起呢？说来说去，还是“求公加之意”，多考虑考虑。

黄遵宪的规劝，真是苦口婆心，用心良苦。非斯人不能想出。你看最后更用泪谏血谏以动梁心。说他写这封信是“哀泪滂沱，栖集笔端”，似乎“无数之故鬼亲鬼，亡魂毅魄，乃至亡国之君，亡国之君之妃后，亡国之君之宗族，呜呜而哭，一齐号眺”。说他就怕“遭此革命之祸”，说他“热血喷涌，洋溢纸上”。不论是哀是善，都会有你这位挚友而感到满足！

黄遵宪真不愧是清末的举人，出使多国的外交官。文识古今，理通东西的著名诗人。论诗主张“我手写吾口”（《杂感》），“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人境庐诗草》自序）。1896年，也就是吴芳吉出生的这一年，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中说：“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这便是“新派诗”这个名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后来又同梁启超、夏曾右、谭嗣同等一起，倡导“诗界革命”。清末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高旭曾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遵宪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愿无尽庐诗话》，载《南社》第一集），虽然有点过誉，却显示了黄遵宪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人们以黄遵宪为标准，来称颂吴芳吉，说吴是继黄之后的又一人，也不无道理。我们这里想说的是，他晚年之诗对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持反对态度，局限性就更明显了。

黄遵宪的这封“驳革命书”，真是字字溅泪，句句带血，情深义重，

用心良苦。恐怕铁石心肠者也会动容。

“诗界革命”的发生，是改良运动的需要，也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进一步发展，在戊戌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反映他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客观上，改良运动也需要诗歌为之服务。黄遵宪就是从理论和创作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一面旗帜。不过他的诗和他的主张都没有脱离改良派的樊篱。而且，从他去逝前两年写的“驳革命书”来看，他不但自己掉队了，还在拉梁启超的后腿。殊不知正是梁启超暗中支持蔡锷，起兵讨袁的。

黄遵宪和吴芳吉在各自所处的时空环境下，对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黄遵宪有自己的局限性，吴芳吉也有自己的不足。我们不苟求古人，只希望后来跟进的有为之人，今天走得更好。吴芳吉 1918 年在永宁中学教书的时候，曾经拜托黄介民、吕骨凡等，为他“购黄公度诗”。想来，吴芳吉也在关心黄遵宪。

有一本《梁启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在最后写“真实的梁启超”时给梁启超的总评，在概括了梁的“过人的历史眼光与远大的社会抱负”“深厚的学业基础与惊人的旺盛精力”，“胸襟博大，感情丰富”等等长处后，也说了他的不足，其中有一条为“缺少黄遵宪审时度势、慎密思考的眼光与谋略”，该不会是以黄遵宪的“驳革命书”为据的吧！

吴芳吉自一首《婉容词》享誉华人世界后，又庚即陆续发表了一

批影响诗界的好诗，如《护国岩词》《两父女》《笼山曲》《吴淞口访古》《明月楼词》等新诗，同时还有一批论文面世，如《提倡诗的自然文学》《谈诗人》《再论诗的自然文学並解释春宫的文化运动》《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等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汹涌的形势下，如同投下一颗原子弹，激起巨大的反响，一时间，新文化运动形成多采的狂澜，国粹派的、西化派的，诗界的、文界的、报界的，群起而攻之。众人从不同的角度不自觉地共同推出了新文化运动中以“吴芳吉”标示的一支独具特色的耀眼奇葩。这也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客观效应。

虽然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走了它自己的一条发展道路，吴芳吉逐渐地被边缘化了。但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渐渐地有人以“白屋体”、“白屋诗体”指称吴芳吉的新诗探索。自然地也就有了关于什么是“白屋诗体”的讨论。其间，也还有有关“白屋诗体”的交流。后来随着讨论的深入，更有人想到应给“白屋诗体”找到一个标准，好让人学习；懂得如此这般就是“白屋诗体”，违规越界就不是“白屋诗体”。甚致还有崇拜吴芳吉的好心人想用“白屋诗体”来代替近体格律诗。树一个新诗的标。这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走向了吴芳吉不希望看到的“之极”现象。

2006年，当时江津吴芳吉研究会尚未成立，一批崇敬吴芳吉的晚辈，出于热爱先贤的真情，聚集在江津诗词学会大旗下吟诗赋词，传承先贤美德。这年，成都吴芳吉研究会在青城山举行纪念吴芳吉的理论讨论会。笔者以江津诗词学会顾问的身份伴随诗会会长冯治凡等赴

会。在这次会上成都吴芳吉研究会会长尹朝国等人与江津诗词学会与会代表就如何学习、传承、弘扬“白屋诗体”，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大家就以下两个问题达成基本共识。

一是，学习“白屋诗体”的目的不是要以“白屋诗体”代替格律诗，而是要繁荣中华诗国的百花园。

二是不能为“白屋诗体”设定体制上的标准。我的理解是不能在新文化运动冲破一个旧框框（格律体）之后，又自编一个新框框来把自己捆住。其实制定标准不但没必要，也不好办。进一步说就连马克思主义也只是行动的指南，而非教条。

那么，还有没有“白屋诗体”呢？

成都吴芳吉研究会的顾问戴维新方家在《高举吴芳吉创新旗帜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一文中[27]，有一个命题是：“吴芳吉的历史贡献——白屋体。”他是这样说的：

有没有“白屋体”？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们认为有的，而且是吴芳吉先生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什么是白屋体？我们认为，它是韵律性较强，自由度较大的一种诗体。

应该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易于掌握，既有标准的意义，又不似框框的标准。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

成都吴芳吉研究会的会长尹朝国方家，在《漫议白屋诗风》里，用吴芳吉主张的“八不”之说来解释“白屋体”，这种解释不但出之有

据，诗人本人之论而非他人之说，应该是可信的。“八不”即“白屋体”：不雅不俗，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不激不随。尹会长对八不有一个简明的解释：

雅——高雅（阳春白雪）

俗——民俗（下里巴人）

旧——旧体文言

新——新兴白话

中——中国传统

西——西洋诗体

激——激进、废除或抑制

随——跟随、依样画葫芦

归起来，即：有雅有俗，雅俗共赏；不新不旧，文白相间；中西结合，洋为中用；不激不随，自成一体。

从总体看，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没给“白屋诗体”规定具体的体式，如平平仄仄平之类，而是指明“白屋诗体”意旨的基本方向。这里，我想说“不激不随”的“激”字，虽然在《吴芳吉研究》里还有同人持与尹朝国方家相同的解释，而且还列举了古人诗文为例，我则以为解释为“偏激”为好，更符合吴芳吉的诗观。这里的“随”字，是追风的意思，没主见，更非特立独行，不是一般的跟随，而是追，是追风，趋炎附势。吴芳吉的“八不”都是说的不走极

端，不能“之极”。“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处世，齐家治国，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我们说有“白屋诗体”，因为这首先是事实。“白屋”，不是词书上的词条说的“白屋”，而是吴芳吉的父亲用石灰把自己的房舍抹白，以示清白传家、不与污浊同流。吴芳吉秉承父意，以“白屋吴生”为荣。使“白屋”既是自己家庭地址的名称，又是自己的书斋和笔耕之地，更是自己诗文所有者的代称，才有《白屋吴生诗稿》之类。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的《白屋说诗》的“白屋”，则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杭州国立浙江大学刘大白教授的书斋，“说诗”是刘大白讲授国学以及与顾喆刚等学者论争的文稿集。吴芳吉的诗文《白屋吴生诗稿》自有特定指称。不能见到“白屋”就想到吴芳吉，就想到吴芳吉的诗。

《白屋吴生诗稿》和它的“自序”[29]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所体现的吴芳吉为诗为人必一致的精神，所体现的吴芳吉倾心民疾苦的人生观、宇宙观，所体现的文学艺术既应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必须随时代的变迁而创新的观点，就形成了“白屋诗体”的核心，“白屋诗体”的灵魂，“白屋诗体”的实质，这就是“白屋诗体”或说“白屋体”。没有核心、灵魂、实质的“诗”，排列再好，也只是方块字的积字游戏。正如吴芳吉所说：“诗之佳处不在文体之分别，乃在其内容的精彩。”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要回答什么是“白屋体”，也可以从“体式”上、形式上做一些研究工作。因为内容是要依托一定的形式才能存在的，吴芳吉以爱国爱民为本质的诗，正是通过最能体现这个本质的形式，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但形式相较于内容

毕竟是次要的。黄遵宪骂太平天国的诗、骂义和团的诗、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诗，总不能因为是“我手写我口”而颂扬那是“诗界革命”吧！

什么是“白屋诗体”？有不少诗人、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单是成都吴芳吉研究会出版的《吴芳吉研究》里收集的七、八十篇文章，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这个问题。我草草地读过这本集子，的确受益匪浅。我觉得丁芒方家的《论吴芳吉诗观及其实践的当代价值》是一篇份量很重很重的力作、佳品。我们这里摘录他从“社会视角”和“艺术视角”两个方面剖析了吴芳吉的诗观后的“总体评价”中论述的观点，以资传扬。

通过吴芳吉的诗观，可以透视他的人生观与宇宙观。他是唯物主义者，他的思维中充满辩证法。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精神和自我定位的平民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和谐的融合。他视野开阔，不但面对国家民族，还面对世界，不但博古通今，还通西学。因此，他的立论，多能符合事物发展规律，而较少主观片面之辞。

……

他在“五四”时期就察觉了连当代诗坛也还在发生、还在争论、还有待解决的诸多问题，而且通过自己的诸多实践，加以解决，创造了“白屋诗体”。在他之前的黄遵宪倡导的“诗界革命”，就根本没有涉及体式问题。而“白屋诗体”的作用即使放到当代旧体诗坛来看，依然不失其创新价值。当代当然也不乏创新体式的出现，如自由曲、新古

诗、自度曲等等。我认为，新古诗、自度词，在体式改革方面，意义不大，自由曲广泛吸收了诗、词、曲、民歌乃至新诗的种种特长，加以融合创新，自成新体，可以说是走在改革前面的，较能被普遍接受的新体诗歌。研究起来，除在口语化的程度上稍有不同，自由曲不正是“白屋诗体”的后尘吗？而这两者之间，时光竟相去八十年之久！除了说明五四以后旧体诗界之被抑制、新诗独尊的危害，使中国诗歌整体的发展受到阻滞之外，不正能充分说明吴芳吉觉悟之早、见解之深，白屋诗体不但是当时最先进的足可启导诗歌走向的诗形式，而且是可光照百年之后。吴芳吉以其 36 岁的生命，起码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在旧体诗词走向现代的改革历史上，放射出光华夺目的星光。

原中华诗词学会副秘书长、成都吴芳吉研究会会长谷声灏在《欧风美雨渐 白屋独殊姿》[30]的论文里，反思新文化运动，指出：“胡适、陈独秀等发起和领导的这场‘文学革命’和新诗‘革命’运动的偏颇之处恰恰是犯了”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的“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吴芳吉的“白屋诗体”连同“白屋诗体”的创造者吴芳吉也就是这样入了“一切皆坏”的框框。

从深层次观之，人类的繁衍是延绵不断的历史过程，人类永恒繁衍的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包括诗歌，也是延绵不断的。在新文化运动中如胡适、陈独秀这些自视学富五车的所谓大知识精英，怎么就会要

割裂中国的历史文化，要以“全盘西化”来在他们倡导的革命前后划一条鸿沟，另开他们的历史、另开他们的文化。吴芳吉却是针锋相对，他说：“凡文学之能成立于天地间者，必有数千百年之经过，其经过之中途，皆其先民之心血脑力堆垒而成。后人之从事文学者，自必循此孔道以进，进而至于此道之尽处，吾又为之补筑延长，再以遗之后人，如是步步相续，是为文学进化之途径。故不依循古人之道，则吾必致迷途，不为后人延长新道，则吾先自裹足。” [31]吴芳吉知道，要光大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要开创新的局面，并非容易的事情，也不是靠一、二次运动能运动出来的，所以他说：“文章本千古事。吾人要当挈其悠久光大之文学，以照临于世界。然所贵继续，不贵侥幸，功不必自我以成，效不必尅期以待，百年不为晚，九死不为劳。” [32]胡适等所犯的错误，就是否定吴芳吉所说的“继续”，而“自裹足”。否定历史的人的结果，也必定是遭历史的否定，自断血脉而把自己的足捆绑起来，还能走多远？不过，胡适还是有办法的，他另起炉灶了，走向历史的另一面，没有能够与生他养他的中华民族文化断裂，却与他所鼓吹过的“革命”断裂了，而且在政治上走向了革命的反面。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正与反，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相反相存。陈独秀后来不是也走向了反面吗？吴芳吉在这中国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坚持持中的立场，不犯“之极”之错，时间老翁这个最公正的裁判，不是给了肯定的嘉奖吗！

关于“白屋诗体”，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搅得心绪不宁，百思而不得其解，不知问题出在那儿？希望有高人指点。

1989年3月，四川省原副省长、教育家张秀熟老前辈，为将要出版的《吴芳吉集》（该书为1994年10月出版）题词，他是这样说的：“毕生致力于诗歌创新，而始终徘徊于旧传统的藩篱。但在五四前已异军突起，至今仍令人难忘《护国岩》。全集问世，雏凤飞扬。”（1988年出版的施幼贻著《吴芳吉评传》张有内容相同的题词）这个题词，我理解为是通过《吴芳吉集》而对吴芳吉的评价，大概没问题吧！如果是这样，那么说吴芳吉“始终徘徊于旧传统的藩篱”，该怎样认识？这句话，是否是对吴芳吉人生经历的初始阶段的评述，而已经被“五四前已异军突起”所否定。这样，我的心以就会平静下来了。可是，不少论者在评价吴芳吉的时候，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或直接、或间接的稍带几句吴芳吉的“局限性”之类，认为他并未完全脱离旧传统的影响。甚至说《婉容词》结尾的“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这属旧体诗。《婉容词》是吴芳吉“白屋诗体”的代表著，这就暗含一个问题：“白屋诗体”和旧诗，或说和近代格律诗是什么关系？能否因两句合律的句子而否定《婉容词》是新诗——实际上还没看见有人这样否定，似乎也没有直接说因为有两句合律的句子，《婉容词》就不算“白屋诗体”。是的，如果《婉容词》都不算“白屋诗体”，那么，还有“白屋诗体”吗？如果，《婉容词》就是“白屋诗体”，旧传统的“藩篱”就当另有所指。那么，“旧传统的藩篱”是否该在“白屋诗体”之外去寻找，指什么呢？

丁芒方家的论文，有专门谈吴芳吉“白屋诗体”的“体式”的问题，现抄下，或许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帮助。

吴芳吉所创白屋诗体，基本属旧体的范畴，他从旧诗出发作了自由的发展，与当代的自由曲差似。他的诗论，批评新诗，也批评旧诗，如说旧诗有四病：一好用典故，二违背习惯，三故意矜奇，四随便敷衍。他认为诗能做到达意、顺口、悦目、赏心。“便是一首正大光明的诗”。“纵有文话白话之分，并不妨各行其是。”体式是由诗人来运用的，而不是自找的樊篱枷锁，适用则用，如觉束缚则突破之发展之。（着重号是引者所加）“白屋体诗”正是在他这种诗观的指导下创造出来的。

引者是非常赞赏丁芒方家关于“体式是诗人运用”的说法的，这里，引者的问题是：把“白屋诗体”归属于“旧体范畴”，是不是连“白屋诗体”也不算新诗了，那么，还有新诗吗？回到张秀熟前辈的题词，说吴芳吉“始终徘徊于旧传统”，该不是要“全盘西化”了才是跳出了“旧传统的藩篱”吧？

我们理解张秀熟老前辈虽然是 1989 年的题词，然而评价吴芳吉的标准，却还是用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的标准。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全球化眼光来看，又该怎样理解这个“藩篱”呢？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核心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对此的是非功过，已有许多论述，这里不多言。但到了今天，该怎么认识？汤一介先生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际，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因此，‘国学热’

的出现是必然的。” [34]汤先生是作的理性判断，並列举了一些西方学者论述用儒家学说来纠正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诸多弊端。阐明儒家学说的诸多理论与世界文明的科学融通，还会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成果，贡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而我们知道的只是感性的盛况：孔子学院也已经遍布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现在来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是不是吴芳吉的“藩篱”？如果说是，那不是与民族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的事实来支撑的现实相背离吗？理论来源于实践，事实胜于雄辩。回答是，是说不过去的。如说不是，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说现在不是，以前是；二是说现在不是，以前也不是。我是赞成第二种回答的。我认为说吴芳吉徘徊于旧传统的藩篱是欠妥的。是受了中国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之极”思潮影响的表现。我还认为把吴芳吉的诗，归属于旧体诗的范围，也值得商榷。这有以“全盘西化”为标准之嫌。我们也不是想在否定“全盘西化”之后，来一个“全盘东化”，我们只希望中华民族的子孙不要践踏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而需继承、发扬，希望与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吴芳吉说得好：

人各有志，固不强求。惟果欲救国，仍以中国之道能自救之耳。

[35]

他又说：

彼谓老子之道，可取老子之言尽之曰：“无为无不为。”孔子之道亦可取孔子之言尽之曰：“无可无不可。”而此二语，实为汉族民性之本，是诚先获我心者也……幸各摄心读书，期于远大，而于至德要

道，尤当实践，处处为人类楷模。[36]

现在回到白屋诗的体式问题，用丁芒的体式标准，只要诗人得心应手，写出符合时代要求，不背情理，读者满意，赏心悦目的作品，就是进步的，可取的，也即“新的”，亦即符合丁芒方家讲的吴芳吉诗观的“先进性”、“科学性”、“独创性”。

重庆永川区诗词学会的郭万櫛是吴芳吉的崇拜者，“白屋体”的热捧者，他在《白屋体现象浅议》[37]中，摘引湖北曹成海诗家《河畔春光》[38]的首尾两节：“一夜春雨抹红霞/日半起/披云纱……忙里偷闲挽春住/且仗手/桃李花”后说：“全诗六小节，每节句式相同，清新流畅，这不是正宗的‘白屋体’诗吗！”他接着提到河南女诗人丁梦、贵州杨德淮、诗人齐云等创办的“东方诗风”网站和《诗刊》《中华诗词》《重庆诗词》上的被称为“格律体新诗”或“新格律诗”，发问：“全国众多自由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不谋而合地吸收了格律诗的音韵美和建筑美的长处，开拓了自由诗的一片新天地。这是自由诗发展的必然，还是民族审美观的回归或二者兼有之，笔者不敢妄言。”不过，他却明白的断定：“随着新格律诗队伍的不断壮大，创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她必将与白屋体进一步磨合是可以肯定的。这个诗体必将作为我国诗坛上的一个成熟的诗体而长盛不衰。”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

最后，我们想借用四川大学副校长石坚教授 2006 年在《在吴芳吉诞辰 110 周年暨新体诗歌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39]里关于“白屋体”的论述，结束前面的讨论。石坚教授在肯定：“吴芳吉先生在新诗改革

发展史上为我们探索和开拓了一条富有历史意义的新路”之后，认定吴芳吉对新诗的独特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的‘白屋体’新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白话新诗’，而是继承传统，吸纳民歌，又借鉴西诗的产物”。认定：

“白屋体”新诗基本沿用传统的旧体诗的体裁，却并不墨守成规。他的“白屋体”新诗在广泛吸收诗、词、曲、赋、鼓书、弹词、民歌及外国诗歌运用语言技巧和表现手法，进行蝉蜕式的创新，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他的“白屋体”新诗熔铸百家而成新体，是拥有新思想、新意境的现代诗。

石坚教授最后说：“吴芳吉先生及其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也是四川大学一笔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诗界非常惋惜吴芳吉英年早逝，没能完成他设计的要写一部如荷马史诗、但丁神曲式的中华民族的“史诗”。当然惋惜者也知道吴芳吉的史诗设计，诗的体式是用“六言体”，首尾一贯。人们的惋惜，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信以吴芳吉博大精深的知识功底，敏锐慎思的学术风格和运用自如的汉语音韵，是一定能够按照他的设计很好的完成的。但是不知道惋惜者想没想过，十几万字的“六言体”史诗，在体式上就不好算人们已经谈论的“白屋诗体”了，但肯定会是吴芳吉的伟大创造。

这里，我们把吴芳吉在给吴宓的信中谈及的史诗设计录其要，也是可以开阔眼界的。

今日稍暇，且告兄以史诗计划，但请勿语他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耳。

吉原擬以十年预备，今铖甚早，即欲下笔者，全由光午转示吾兄去岁手书，有以迫促之也（来书谓“千古刹那，吾生已半”，令吉深省）。又原擬篇幅三万六千字（取人生三万六千日意）。而自近日想来，乃嫌太短。决计扩大两倍，为十万八千字。倣《神曲》旧例，区为三部：第一部代表过去，第二部现在，第三部将来。每部事实，各自独立，而精神一贯，条理一贯。其所叙时间，第一部为三千年前，第二部为民国以来，第三部为三百年后。虽相距甚远，若互不相谋，实不外此精神此种性此条理结构所反复循环演成。第一部之主眼，为神禹之肇造，其背景为四川。第二部主眼，为中山之继续，其背景为广东。第三部主眼，为孔子之复生，其背景为齐鲁。

兹更进言第一部计划：先圣删书，断自唐虞。西洋史诗，多半依据经典。今亦准此以厚其胎息。所有材料，均自群经诸子求子。而自禹为开始者，则有数故：一、学术所关。人天危微之分，精一执中之旨，宝中国文化特色。二、政治所关。传贤传子，万古大变。而七旬苗格，尤属王道精神。三、道德所关。殛鯀羽山，乃能干父之蛊。四、功业所关。地平天成，生民未有。若神话美谈，有若石纽之吞卵降生，有若塗山之望夫化石，有若神女之雲雨扬灵（东坡渔洋皆谓神女为助禹治水之人）。有若竖亥之南北远蹠（禹臣，尝穷南北极二億万里），与夫八年于外，四载交乘，佐命有契稷之臣，让位有子高之侣，趣味之丰，道德之盛，岂荷马中人所能追及哉？若发端大事，则

擬取《孟子》皋陶为士，瞽瞍殺人，舜负瞽瞍逃之海滨为始。一自奉法，一自尽孝，一必懲治祸首，一弃天子不为，示中国文明，情理交至，各得心之所安，远非四夷徒尚知识专走直路，而计较利害价值者所及。又即在此第一部中，将吾民族根性，如博大、和平、廉洁勇敢种种美德，一一表现。第二部所云，无非此性之偶尔丧失。第三部所云，无无非此性之依然再见。故相隔虽久，脉络一贯，而以助白俄之复国，建印度之新邦，普及孔教于四海苍生，出弟入孝，不求大同而自大同，为全诗结局。至于体制句法，几经考虑，决用六言。盖以四言莫过周，五言莫过汉，七言莫过唐，惟六言古今罕用，而吾惯用之。又《荷马史诗》，音节为七，兹用六言，数差不远。且弹词嫌俚，赋体嫌拙，骚苦多顿，而乐府长短句苦杂。长短句虽有变化，然篇幅过长，必有滥腔。鲍照《行路难》十余首耳，重叠之调，已觉寡奇。故知伟大者必统一，悠久者必简单。通用六言，统一又简单矣（六言句式只四种：一、平仄平仄平仄；二、仄平仄平仄平；三、仄仄平平仄仄；四、平平仄仄平平。）惟长兄进教之也。

.....意在一年以内，从事第一部之创作，纵不完篇，可成多半。明夏为饥所累，必须再出。意欲在广东寻一职事，使窥其风土，为第二部之预备也。[40]

伟哉吴芳吉！

吴芳吉的史诗计划，旨意主题非常鲜明，篇章结构、轮廓清晰，内容形式充实雅致，背景情节已露端倪，只可惜天不假年，吴芳吉匆

匆离去。我们相信，泱泱诗国，会有后来人！

人们对于有抱负、有成就而过早辞世的英才，总会怀着过多的惋惜，过多的遗憾和无可奈何的深情，久久不能遗忘地年复一年凭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历时越久，怀念之情越深，越浓。而对于吴芳吉来说，更有一种别样的未了期盼之情，期待之思萦绕脑际，似乎有一个殷切而悲悯的诗魂在苦苦地追问：有谁来继启芳吉之志，捧出中华民族的荷马史诗，捧出但丁式的神曲！这也难怪，正是吴芳吉留下他的诗史计划，不情愿地卸下重担，离诗友、爱生而去。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似乎还没看见后来人的身影！前面，我们重又把吴芳吉的诗史设计记录下，等待高人揭榜！！

这里，我们觉得有一件诗人教育家吴芳吉和哲学家诗人毛泽东的一次有趣的神交，或者说这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开拓者的心灵在中华大地上凑出的交响乐。在吴芳吉设计要以大禹、孔子、孙中山先生复生为经，以古代、民国、未来为纬，写一部中华史诗后，毛泽东提出，从孔子到孙中山都要好好研究。一诵诗歌，一讲理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脉络，就有了道的脊梁、艺之画卷。吴芳吉期望的“普及孔教于四海苍生，出弟入孝，不求大同而自大同”[41]的人类美景，不是终有实现之时吗！！

注释：

[1]参见江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江津文史资料》第17辑第122—123页，1997年3月刊印。

[2]江津政协文史委编《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辑》第79—82页。

[3]第1355页。

[4]第274页。

[5]第1341页。

[6]第527页。

[7]《文强口述自传》第59页。

[8]第519—522页。

[9]第408页。

[10]第412页。

[11]第1405页。

[12]江津政协文史委编《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第125页，1991年12月刊印。

[13]第1405页。

[14]见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选编《吴芳吉研究论文选》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15]见成都吴芳吉研究会、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吴芳吉研究》第121—12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16]同注[15]第133页。

[17]同注[15]第135页。

[18]同注[15]第137页。

[19]同注[15]第150页。

[20]同注[15]第156页。

- [21]同注[15]第 161 页。
- [22]同注[15]第 120 页。
- [23]同注[15]第 263 页。
- [24]《梁启超传》第 95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 [2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 330—337 页。
- [26]均见《吴芳吉集》。
- [27]同注[15]第 268 页。
- [28]同注[15]第 232 页。
- [29]第 553 页。
- [30]同注[15]第 109 页。
- [31]第 434 页。
- [32]第 493 页。
- [33]同注[15]第 123 页。
- [34]汤一介：《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载《北京大学学报》2012 年第二期。
- [35]第 694 页。
- [36]第 699 页。
- [37]刊江津吴芳吉研究会会刊《芳吉春》2010 年第 2 期。
- [38]载《人民日报》2009 年 5 月 8 日副刊。
- [39]同注[15]第 38—39 页。
- [40]第 1030 页。
- [41]第 1031 页。

第一章 二南韵出碧柳歌

民族精神育神童

吴芳吉诗：

吴碧柳歌[1]

吴碧柳，吴碧柳，碧柳无奇常有偶。
或在东洋与西洋，或在南斗与北斗。
天地来时相与来，尝向羲皇一携手。
天地闭时相与归，讵随日月共衰朽。

莹莹何洁白，神瑛射琼玖。

造化而无我应无，造化而有我终有。
呜呼惟德邻不孤，碧柳之外有碧柳。

二

一个碧柳身千万，盈天之涯海之畔。
昔日主人今虏囚，今日虏囚后桢干。
兴亡消息古如此，明月常圆节迥换。
莫谓今朝得饱餐，仇雠张吻尔旁瞰。
莫谓今宵得安眠，枕席之下厝薪炭。
呜呼碧柳知不知，尔身日日在争战。

三

海水作云云作水，我生幻化无停晷。

安得阴阳一镕炉，万方碧柳驱同毁。

撇开名利与诗书，无国争战无家纍。

呜呼：享得一日生，近得一日死。

生时之我常惺惺，死时之我亦如此。

在诗之末尾，吴芳吉有一个注，是这样说的“‘碧柳’，某别号，刁先生建勋赐。某自十岁入聚奎小学，从先生读。先生以某生重庆杨柳街碧柳院，远道来学，因取所居呼某为字。时永川唐先生宪斌好言李二曲学，某受其影响尤深。此诗三章，盖即弱岁以前之人生观也。”

这是吴芳吉自己申明他是在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他的人生观。同时说明这是在他“弱岁以前”的事，而且是在他受到李二曲学的影响之后才有的对“人生观”的确定。这个“弱岁以前”的时间，我们可以推论为十岁到十三岁之间，最早写于十岁，因吴芳吉自己说了他十岁入聚奎，诗写于入聚奎后到他十三岁时写《读外交失败史书后》之间。

一个十一、二岁的娃娃能写出宣称为自己人生观的诗，与相继写出的《论公益公德》和《读外交失败史书后》的作文联系起来看，又是不足为奇的，早慧英才必有不俗惊世的作为。然而毕竟还是会引起人们关于吴芳吉是怎样奠下他的思想和文学根基的好奇。

使我们深感惊诧的是，这首诗涉及的具体内容所反映出来的辩证思维，简直可以作为一份辩证法教材的参考资料使用。我们可以断定，当时的吴芳吉还没学过辩证法，为什么又会写出这样的诗来呢？原来，客观物质现象本身就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吴芳吉如实地说出他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对人们生活实际的感受，正好说出了客观世界的本

来面貌。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吴芳吉用诗的形式道出的实情，有如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里的皇帝被童真少年揭穿一样，吴芳吉“猜”到了世界的本真。亦如哲人所言：一个诚实的自然科学家本能地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这是真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个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这种事物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事物本身矛盾运动的过程。世界上没有静止的，孤立的现象和事物。吴芳吉只不过老实实在地用诗的形式表达了他感知的客观现象。这个关于生活、人生观，诗、哲学的话题，十年后，吴芳吉有了理性的回答。他说：“没有透底之人生观及宇宙观”是不能当诗人的，因为“哲学与诗，是并行的”。他认为人的生活有两面，“一面是理的生活，一面是情的生活；哲学是表示理的，诗是表示情的。所以诗与哲学，是发生于同时。”吴芳吉进一步说：“哲学借诗，愈明其生活之理；诗借哲学，愈达其生活之情。”[2]他说这是他“弱岁以前的人生观”，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人生观就是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认识人生。从他的《碧柳歌》看，大致有这样几层意思。首先就是按照客观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生活、去创造。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承认和遵从客观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用吴芳吉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社会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同往来，就是：“造化而无我应无，造化而有我终有”。其次是，承认、遵从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发展，相反相存；人类社会，生死

相随，祸福相依，兴亡“迴换”。“昔日主人今虏囚，今日虏囚后桢干”。第三，吴芳吉用这个道理，这个认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严肃地警醒自己（也可以说是在提醒人们）要居安思危，生活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得安眠”时要提防“厝薪炭”。保持一种进取的精神，迎战的姿态。吴芳吉认为，只要把名利、生死置之度外，就一定能够保持终身清醒的头脑，“生也惺惺，死亦惺惺”，让聪明才智得以发挥。我们还注意到，小小的吴芳吉明智地意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自己只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孤立地生活，任何人也不能孤立的生活。“人”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概念，一个社会概念。所以吴芳吉呼吁以“德”凝聚人心，不能以邻为壑，形成强大的群体力量。“德邻不孤”，邻里友善，社会安宁。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德性”，对吴芳吉的浸润；是不是可以感知到“德性”奠下的吴芳吉教育思想根基的影子。

我们知道吴芳吉的恩师萧湘对吴芳吉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有长长的评语，激动的用词，而对吴芳吉的《吴碧柳歌》却只给了寥寥九个字：“碧柳歌三首，几于天放。”还有八个字是说他和邓褀先读诗的情况。虽然也是好评的感受，但不是直接的评诗，而是说：“每与褀仙读而叹之。”[3]说他们经常拿他的《吴碧柳歌》来共同欣赏，每次都是赞叹不已。是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幼童能写出这样明确称之为自己人生观表露的诗，本来就是奇迹，而诗的内容又的确表达了非凡的认识能力和深睿的思想内容。在成都吴芳吉研究会出版的《吴芳吉研究》里，就有方家赞叹“造化而无我应无，造化而有我终有”实有高瞻远

矚之妙。而蕭湘則用“幾于天放”來評，則有一言難盡，而任人言說之趣。留下空間，讀者玩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而，不是什麼詩都具備這種提供無限空間，任人發揮想像力的品質，任人浮想聯翩的韻味。當然不是，這裡首先是詩的作者年齡的稚嫩而思想的高遠，使人讚嘆；其次就是詩本身的魅力。蕭湘評《吳碧柳歌》“幾于天放”，這沒把話說死、說絕。沒說它就是“天放”，封頂了、完了、全了。而是“近乎天放”，是“天放”而又留有余地，任人發揮，任人遐想。北師大的于丹教授，在她的讀《論語》心得里，解釋五十而知天命。她舉了一個例，說“知天命”有如平常說的“命中有時終須有，命中無時莫強求”。[4]我們覺得于丹教授的這句平常話，對於理解“造化而無我應無，造化而有我終有”，是有借鑒意義的。詩人的詩句，是心靈的火花，想象的韻律，更多時候是很難一字一句的說得清楚明白的。常常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如“飛流直下三千尺，擬似銀河落九天”。要真是如絲過扣地有如“三加二減五等於零”這段鐵板釘釘式的清楚，就不是詩了，而是算術。何況“三加二減五等於零”也只適用於有限的範圍。不過，于丹教授講的“命中有時終須有，命中無時莫強求”是“知天命”歲時的境界；而吳芳吉講“造化而無我應無，造化而有我終有”時，只有十一二歲，距離五十還遠著哩！是的，這就是“神童”。似乎十一二歲的智慧已經達到五十來歲了。

那麼，“神童”又是怎樣“造”出來的呢？

我們知道，吳芳吉在十歲進入聚奎讀書的當兒，即是在寫《吳碧柳歌》之前，在老師的支持下，有過一次步行赴渝，自撰訴狀，到監

狱救出被诬害的父亲的经历。这无疑是他的一次人生体验，一次认识社会现象、感受师、亲关爱的绝好机遇，也为他的《碧柳歌》提供了“诗的材料”。吴芳吉后来论诗时，是这样说的，“诗！不是一个学问，是一种生活的表示。依生活以表示成诗的人，叫诗人。借诗，以表示生活的事，叫诗料。” [5]

我们还知道，吴芳吉出身后的第二年，即 1898 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派，痛感甲午战败，民族危亡，反对签定《马关条约》，以变法图强为号召，以救国图强为目的，主张“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君主立宪）”，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勾结袁世凯阴谋暗算，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结果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遇害、百日维新失败。然而，维新变法在政治层面虽是失败了，但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和影响，日益深入人心，民众的觉醒、民族的升腾，日益高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在各地传播，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也在多方面加强了自己的革命。孙中山的同盟会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6]吴芳吉入读聚奎教他的老师萧湘就是个革命派，而且是在受到反动派的迫害威胁的情况下到聚奎避难的。萧老师明里是避反动政府迫害，暗里却是来传播革命道理，宣传爱国主义。吴芳吉也正是受益于萧湘、唐宪斌等良师之教，充实了他的“惺惺”智慧，才深刻地认识了他所处的社会现实，认定自己“日日在争战”。吴芳吉说他受李二曲的“影响尤深”。李二曲、何许人也？李二曲即李颀，明清之际

的哲学家。出身贫寒，自学成名。清廷屡次征召，力辞不就。康熙召见，以死坚辞。他博通经史百家，于古文学造诣尤深，为学主张“明体适用”，反对清廷以社学禁例钳制思想，提倡自由讲学，认为“立人达人”、“移风易俗”、“拨乱反正”、“旋乾转坤”全在讲学。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李二曲主张的“悔过自新”特别引起吴芳吉的认同，视为座右铭终身践行，后来他说他的“悔教幼年胆气粗，新从贤圣至工夫”诗句，就是指追随李二曲。足见聚奎老师教育对吴芳吉的深刻影响。

吴芳吉应该感谢他的母亲，他也知道是他的母亲给了他的生命，是他母亲给了他的头脑，是他母亲用二“南”、“禹贡”为他的心灵奠下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

吴母刘淑贤，是一位小学教师，这在那时的社会实属很不容易的。吴芳吉出身后受到母亲的慈爱和精心教养。吴芳吉后来提及母亲时，有生动的描述，他说：

儿与母学诗，自呱呱堕地时。

他说：

脸枕着母的腕，手捧着母的乳。

在母的怀中，喳喳似鸚鵡。

他说：

儿的书声，是母所爱听。

母的呼声，是儿所贪闻。

一盏清油灯，一条柏木凳。

夜夜到三更，坐着儿母两人。

母听儿读书，儿傍母缝纫。

是时家在江津，儿方九龄。

他说：

母知儿有天资，教儿汉魏唐诗。

儿读烂陶潜谢朓，李白王维，那及我母诗的希奇！

古诗是文字，母诗是慈悲。

古诗只快意，母诗足忘饥。

他说：

母的笑容，是儿的诗境。

母的和声，是儿的诗韵。

母的精神，是儿的诗兴。

母的一身，是儿诗的结晶。

母或者半是诗人，母或者半是诗神。 [7]

吴芳吉在《谈诗人》里还说过：“不但父母妻子都是你的良师，就是鸡鸭牛羊也是你的好友。” [8]这句看是戏语的话，却揭示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真理。现代教育教幼儿识字，不是就有“鸡”、“鸭”、“猪”、“犬”等的图形字块吗？城里的幼儿没有实物可见，看看图形也是必要的，只不过不如真的活物可作“好友”罢了。

我们知道，在吴母的哺育下，吴芳吉两岁就开始认字，听母亲讲故事的兴趣特别浓厚，能够理解、记住简单的童话故事。三岁就开始读《诗》，并能背诵《周南》、《召南》中的各篇，四岁背《禹贡》。二

“南”是《诗经》中的佳品。《晋书·乐志上》就说：“周始二《南》，《风》兼六代。”宋代欧阳修也说：“《周》《召》二《南》，至正之诗也。”（《王国风解》）清朝屈绍隆的《杜曲谒杜工部祠》诗有句曰：“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诗人。”

本来《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另外还有六篇“笙诗”，以笙奏曲的诗歌，有目无辞，不计算在内。在先秦的典籍里，《诗经》通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以后，儒家把它奉为经典，才称《诗经》。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包括“二南”（《周南》、《召南》）和《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一百六十篇。大都是各地民间歌谣，有的经过润色或修改。这些诗歌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也显示了他们的艺术创造才能。其中有的篇章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剥削、压迫的不满和反抗，表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魏风·硕鼠》。也有不少作品描写兵役、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以及由此引起的征夫与思妇间的怀念，如《豳风·东山》、《唐风·鸛羽》、《王风·君子于役》。大量的民歌抒写恋爱婚姻的主题，大都感情真挚，热烈，有笑声也有眼泪，写得真切而又大胆。还有一些歌谣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鄙弃和愤慨。“风”诗是《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晶莹的珠宝，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

《诗经》的形式以四言为主，多数是隔句韵，但并不拘泥，也有二言、三言、五言及至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子，押韵方式灵活多变。许多诗篇章节反复重叠，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如吴芳吉能背诵的《周南·芣苢》全诗三章十二句，中间只换了六个动词，却于反复吟咏中写出了生动活泼的劳动生活场景。在表现手法上，普遍运用赋、比、兴的方法。“赋”就是直接陈述铺叙，“雅”、“颂”多用这种手法；“比”就是譬喻，如《魏风·硕鼠》用害人的老鼠来喻指统治者；“兴”是托物起兴，即借用别的事物来发所要歌咏的内容，往往可以达到烘托的作用。如《魏风·伐檀》每章都由砍伐檀树发端，引出对剥削阶级的揭露讽刺。《诗经》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特别是一些双声、叠词、叠字语词的运用，更增强了艺术表现力。总之，《诗经》以其“饥者歌其食，劳者都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以使它具有这些艺术方面的成就，给于后世文学以极其遥远的影响，成为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而对于从小学习《诗经》的吴芳吉来说，其启蒙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诗的特点，都可以从《诗经》中找到。[9]

这里，我们还想引述自称吴芳吉的门人，蓝菊荪先生的见解，集思广益，从历史和现代对比发展认识《诗经》。蓝菊荪，江津人，他的著名专著《诗经国风今译》，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是我国第一本全译“诗经国风”的专著。出版社的“出版说明”是这样说的：“本书原名《诗经国风研究（上卷）》，一九五八年作者曾用耕石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但除私人馈赠前辈、友人、学术机构和国内各图书馆外，迄未公开发行。现经作者修订，交由我社重印。除原书“后

记之后”改为“重印后记”外，其余一律用原纸型。原书新刊学界前辈对本书的题辞，则只选用郭沫若、叶圣陶二老的全文和顾颉刚先生的部分手迹。”《诗经国风今译》的译者蓝菊荪在他的“代序”——“关雎译注经过”里说：“‘周南’就是周公统治区域民间流行的歌谣，所以称之曰‘周南’。……历代以来，关于诗经的注疏真是汗牛充栋，不过结论只有一条：就是如何用以巩固封建统治，达到‘诗教’为目的。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诗经是不能够予以全面信赖的，经过删改的东西，必然要带上删改者的主观意识和朝代色彩……其次解释上的问题，这似乎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也并不是漫无标准。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尽可能的资料，把当时社会性质弄清楚，一首诗才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蓝菊荪和吴芳吉都是鼎山几水哺育大的，都是在中华文化薰陶下成长起来的，都是没进大学的门而站上大学的讲坛的。吴芳吉从小读《诗经》二《南》起，通达国学深层；蓝菊荪一身研究《诗经》。郭沫若写诗为吴芳吉送行，郭沫若题词为蓝菊荪出书致贺。[10]遗憾的是自称吴芳吉门人的蓝菊荪没能向吴芳吉叩拜，老师就仙逝了。学生只好常去其子吴汉骧处表示对先贤的崇敬之情。我们连引用带说明花了这么长一段文字是想说，吴芳吉从小读二“南”，亦即读《诗经》并未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而是成长为新文化的传播者。这就是说，从吴芳吉的一生，从《诗经》吸取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精华，而非封建统治的“王道”、“霸道”糟粕。换句话说，吴芳吉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一翻“扬弃”的工夫，虽然还未达到炉火纯青

的程度，却也是八九不离十的了。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三次思想活跃时期，他坚定地坚守着他的主张，是和他从小受的诗教分不开的，也才有他从教以后坚持诗教的辉煌业绩。我们还可以从后来吴芳吉论诗时看到“二南”对他的影响，他说：“骚与诗较，骚最富于神韵，而兼有气象者也；诗最富于气象，而亦有神韵者也。诗与诗较，刚《蒹葭》《伐木》又偏至神韵者也；《文王》《丞民》又偏至气象者也。……神韵气象浑然而不可知，渊然而不可竭者，《周南》《召南》是也。[11]

吴芳吉四岁读《禹贡》且能背。我们知道，《禹贡》是《尚书》中“夏书”的一篇，[12]文字不多，（与吴芳吉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大体相当），意义深远。《禹贡》与《二南》一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蕴儒学经典，历史著作，诸子百家著作，形成了完整的文化思想脉络，内容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将华夏文明的精华充分展现于世。吴芳吉的母亲教儿之高明，就在于吴芳吉牙牙学语就给他讲故事，拨动心灵兴趣，开启大脑窗口，三岁背《诗》，四岁背《书》，让大脑细胞积极活动，大脑能量渐次发挥，使吴芳吉一开始接触中国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的思想，即既能吸纳，又能辨别，知其取舍，渐知渐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自由之极”的大环境下，坚持自己的主见，特立独行。而我们这一代人（我自己），是在西学东渐中呼吸外来新鲜空气时，未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鉴别，囫圇吞枣，没能选择，自觉幼稚可笑。从总体看，闹着要“全盘西化”的结果，使传统文化流失过多，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太少太少。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渐渐觉悟到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具有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走进吴芳吉，初知其成长、成就的渊源，进一步认识到沿袭先辈留下的贵宝文化遗产，是完全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的。我们评述吴芳吉，也是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更多的人通过吴芳吉也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接受一次国学教育。这些坦陈，不会是多余吧！现在我们来看看吴芳吉读的《禹贡》。

《禹贡》，禹贡者，大禹贡献治水之功绩也。《汉语大词典》解释“禹”字，是这样说的：“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姒姓，名文命，鲧之子。又称大禹，夏禹、戎禹。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据传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后被选为舜的继承人，舜死后即位，建立夏代。后世视为圣王。”

这里的“据传”，大概“传”之源不只一个，其中一个神话：上古时候，天下洪水泛滥，鲧偷用天帝的“息壤”，一种无限制地增长的神土，堵塞了洪水，因为未得天地允许，天帝大怒，派人面兽身地火神祝融，在羽山旁边将鲧杀害了。鲧死三年，尸首不烂，肚子里生出个小孩，这就是禹。禹继父治水，得到神龙的帮助。神龙用尾巴划地来疏导洪水，把洪水导入大河，引入大海。洪水终于被治服了。

在这个神话中，天帝的尊严象征着自然的威力。英雄鲧为治水，敢于冒犯天威，虽遭杀害而雄心不死，这种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也成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又说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也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的榜样。

其实《禹贡》是我国古代很早的一部地理著作。《史记·夏本纪》：“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所以《尚书》将记载这一系列事情的这一篇文章命名为“禹贡”。据《史记》记载，禹是黄帝的第五代孙，是远古时代治理洪水的英雄，由于他治理洪水功绩卓著，被封于夏，获得华夏族的称号。之后，以炎、黄部落集团融合为核心形成的华夏族，不断融合两昊、三苗及其他各部落集团的一部分，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先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夏、商、周 3 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自今仍然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用以指称中华民族的代称。我们从吴芳吉的不少诗、文中可以感知《禹贡》等古典给他的历史、地理知识，比如在《读外交失败史书后》里，比如在《蜀道日记》里。《禹贡》里有：“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之说。它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大禹治水不但在各地山川水域作出各种技术性标示，位置，距离，名称一清二楚，权利义务也有记载，这里记的则是：“三百里以内要设立掌管文教的官员来推行文化教育；二百里的人民要勤奋地熟悉武事，以便保卫国王。”一文一武，治国之术。而《禹贡》最后记的就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论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告诉我们，大禹治水，东面到大海边，西面到沙漠地带，从北方到南方，四海之内都受到了国王的德教。因此帝舜赐给禹以元圭，用以表彰禹所完成的巨大功业！

这一千三四百字的《禹贡》所包含的内容，既是知识性的，又是文化性的，也是精神性的，同其他经典传统文化一起，奠下吴芳吉牢

固的中华文化传统的根基。

古语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换个视角看，就是说优美的大自然，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尽源泉，是人类智慧的温床，用吴芳吉的话来说叫：“大自然界是诗人的学校”。吴芳吉的成长，也得益于聚奎书院所在地的黑石山的风光美景。如果说母亲的慈爱家教铸就了吴芳吉的聪慧睿智，黑石山的山优水静则薰陶了吴芳吉的爱乡情怀。

黑石山风景奇佳，石骨嶙峋，林木苍劲，拥有父翁石，涵峪关，八角亭，高岩洞，川祖庙等名胜。山上黑石五百余块，驴溪山腰环绕，美不胜收。吴芳吉有记载：

石畔挺生古樟乔松，校舍参差隐现其间。

登楼四眺，苍苍莽莽朝拱于山下者，江山尽白里也。

山麓有小川环之，曰驴溪，北流汇大江。

近山有瀑布三重，曰高洞，曰蟾鱼洞，曰狗跳洞。

沿岸夹植幽篁，风物佳丽，全蜀学校不及。[13]

黑石山水，潜移默化，吴芳吉终日沐浴其间，对他灵性的启发陶冶，热爱自然的纯朴情操的养成，真是功不可没。吴芳吉曾赞美说：

我爱聚奎好，山水殊灵怪，晨夕欣往还，中藏两世界，上界鸟翱翔，下界石磊砢，可以联两欢，花木娇百态。枕石花荫间，听鸟鸣林外。石意浑多姿，鸟迹旋无碍，地幽松子落，尘久白云在。何须栩栩成地仙，且聆叶叶含天籁。[14]

吴芳吉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和家庭学校小环境的时空交叉综合作用下，迅速成长为神童。下面，我们沿着他写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看看，看这个十三岁的学生，都说了些什么，会被人们誉为神童的。

那是1909年，吴芳吉年仅13岁，在江津黑石山聚奎学堂读书，把一篇一气呵成的读后感，写成了政论文。老师萧绮笙（萧湘）拿着卷子爱不释手，目下“淋漓满纸，洋洋大篇”，边看边圈边批，却是“圈不及圈，批不及批”。末了，深情地写下四百五十多字的赞语，还用班固、张衡“以二十余年之身，仅数万言”，与吴芳吉“二小时而宏阔若此”相比，惊叹“岂非倚马才！”萧老师进而以诗评文，把这个13岁的学生与李杜相提并论，“有李太白之豪放，杜子美之谨严。”又设问自答：“何物神童，文心绞绘乃尔。”神童，恰似儿童嬉戏而出奇者！老师被学生的极其优异而激发的自豪感左右，激动得不能自持，直抒“咄咄怪才！”当即油印宣扬。“神童吴芳吉”，庚即风靡各地！

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吴芳吉在《吴碧柳歌》里的表现，再看这篇作文，就不会过于惊奇。只不过前者为诗，这里是文。这就是说，小小的吴芳吉，诗文两通。

神童，并非生而知之。吴芳吉能即席写出一篇堪称神来之笔的政论文，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他从三岁背《诗》，四岁读《禹贡》，饱读诗、书，深受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滋养，充分领受到中华文明雄宏厚重的伟大感染力，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而自豪；又逢“西学东渐”，“废科举、兴学堂”，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明，

获得初始的东西文化比较。面对当时国弱民贫、满目疮痍的凌夷惨境，与过往盛世时的盛况相较，感触良多，血涌愤懑。前后思之，内外审视，中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又由全盛到衰败，一步一步走向困境，如今受人凌辱、掠夺，任人侵略、宰割的情景，在他脑际浮现，从其笔端流出，有如萧老师所批赞，“淋漓满纸也！洋洋大篇。”

吴芳吉落笔写道：“自黄帝东渡，以昆仑东五千余里之大陆神州，为子孙聚处之地。广政教，兴文物，灿然明备。”是的，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发展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漫长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文学、医学、科技等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接着，吴芳吉扼要叙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

在中华民族公认的始祖——轩辕黄帝之后的夏、商、周以及秦汉时期，当汉族的先民华夏族开发黄河流域的时候，各少数民族的先民们也同时开发了周围的广大地域。当时生活在我国东北部地区的有东胡、肃慎、挹类、夫余、乌桓等民族；生活在我国北部地区的有獯豸、狄、匈奴、鲜卑等民族；生活在我国西域地区的有龟兹、于阗、鄯善等民族；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有戎、羌、氏等民族；生活在我国南部地区的有苗、濮、百越以及海南岛和台湾的黎、高山等民族。他们都从一个个小小的原始部落和地区，不断地通过部落间的交流、争战与联合，一步步实现民族融合和疆域扩张，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中国，和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他们就在这

片广阔、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用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着伟大的中华文明，“未有灭种灭国之说”，并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吴芳吉正是吸吮着祖先的智慧之灵性成长起来的！

一部群雄辈出、英才济济、文明灿烂、雄峙东方的中华民族古代史，在少年吴芳吉的胸中升腾，不由他不对近世的颓败痛心疾首。何以致此？他写道：“苟能讲国际以待外交，谈理财以实府库，立宪法以安国家，建学校以植人材，练海陆军以护国体，兴工商场以利交通，宗教所及，法律即及，侨民所在，护兵即在，何至冥冥然与外人决事哉！”一个 13 岁的少年命笔写来所表达的见解，竟然有这么全面，这么深刻。我们从“立宪法以安国家”看到，小小年纪的吴芳吉不但受益于中华文化，同时也已经吸纳了世界文明。他似乎已经认识到弱国无外交，只有被欺辱的份；国土都不能保，哪里还谈得上用兵保护侨民？！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套治国方略里，竟然有“宗教所及，法律即及”这种非凡人所能认知的深层次国策。读来好似今天的谋士高瞻远瞩之言。真使吾辈汗颜！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现象，如何对待宗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国不但自古以来就有政教分离的良好传统，而且国内的宗教没有教派之间的高下之争，更没有西方剧烈的宗教冲突。在近代的衰败史上，有过国外洋教的入侵，有清政府利用义和团的丑恶劣迹。这或许就是吴芳吉提出运用法律规范宗教行为的认识来源。如果吴芳吉的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为今天国家的宗教政策，团结、保护宗教界广大人士为社会进步、人民安宁、世界和平做贡献而

感到欣慰！

何以冥冥然决事？

吴芳吉似乎已经看到，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是社会制度的腐败，封建帝王昏庸无能和经济技术的落后，农耕劳作不及机器炮舰。

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到一般的官员，他们中大多数不了解世界，用吴芳吉的话说叫“不通外情”。甚至对前来侵略的对手英国，也一无所知。连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杰出民族英雄林则徐，虽有英国“其强非不可制”的气概，但对英军的认识却停留在“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力”的表面，其他闭目塞听的官僚的愚昧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只关心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自身的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至卑躬屈膝，乞怜于外国列强，求得洋人的认可，以便维护其统治，固守王法。

吴芳吉痛陈自鸦片战争始，“同盟之战、中法之战、中日之战、联军之战，皆万失而无一利”，指出均系“不通外情，不图自强故也。”并逐一论其“不审外情”之弊。鸦片战争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外逃，其弟向侵略者投降求和。法国入侵本是我之属国越南，虽为洪秀全几度克敌，而清政府反签约退让。日本侵台、朝鲜内乱，清政府先后处置失当，“反割辽东台湾以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始而利用，继而“根诛”，造成八国联军之祸。一件件的赔款协定，一桩桩的割地让权，好端端的一个中国，葬送在

清政府一帮卖国贼之手。从此，中国社会原有的发展逻辑中断了，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一部丧权辱国史，血淋淋地跃然纸上。

中国近代的外交失败史，既是清政府腐朽无能，“腐败之徒”卖国求荣的历史，又是世界列强、资本帝国掠夺、侵略、霸占，企图最后瓜分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中华民族的耻辱史。

吴芳吉怀着一腔民族义愤，对封建帝王、封建官僚鄙夷不齿，对豺狼成性的侵略者刻骨仇视，对血肉同胞饱寄深情。决欲担当起拯救中国的重大责任，他坦诚自己的抱负：“悲哉中国，我欲启之！”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沉重使命感。

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也曾表现出赴汤蹈火、誓死抗争的民族气节，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方略。正如吴芳吉所言：“有志之士仿效西法，提倡新学。而腐败之徒，又不便之。”所谓志士效西法倡新学，也不过是一桩桩悲壮而可歌可泣的失败史。他们中，前有张之洞，企图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拿“西学”壮“中学”之体，而固守“中学”之本，拾“西学”而用。即是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虽有救国救民之意，只因拾皮毛而不得要领，留下一段笔墨官司。后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变法，康有为说：“要使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然而，虽也大闹一场，震慑封建王朝宝殿，反响却也深远。结果袁世凯背叛，慈禧听政，光绪被禁，康梁外遁，谭嗣同等被害。“效西法”以图变，不过 103 天，也就夭折了。

事实上，当时志士们的结局，也是时势使然，并非他们个人不优秀。就志士们而言，是没能认清问题的癥结所在。客观上，志士们一开始就处在一种限于悖论而不能自拔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志士们要用“西法”来拯救中国；另一方面，侵略中国的恰恰是拥有“西法”的西方侵略帝国。也就是说，那些极大地威胁着中国主权的西方帝国，却正是志士们要去借鉴其思想学说的国家。这里暗含着亡国危机当救与民族尊严难违的巨大矛盾。从文化心态讲，希图一股脑儿抛弃几千年积淀的中华文化，全盘照搬西方文化来拯救中国，首先碰到的就是文化断层使民众，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恐惧和悲愤，民族精神何容？从社会发展看，志士们并未认清西方列强的入侵，本质上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15]所反映的资本替代农耕的历史必然，在中国碰上“水土不服”。这就是历史提出的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也正是吴芳吉所感到的“民无适从”，不知哪条黄瓜能做种的根本问题所在。历史把它留给了后来的智者去解决了。

吴芳吉作文 10 年后，解决这个“民无适从”的问题有了曙光，在“西学东渐”的漫长过程中，出现了最重要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深扎根。遗憾的是吴芳吉英年早逝，没能看到 40 年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有了政权基础。

当时，吴芳吉认为，由于未能效西法、倡新学，“故不特国权丧失、财赋外溢，且纷扰杂乱、民无适从，而所割之地皆为要隘。”在吴芳吉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侵略者扼住我国版图之咽喉，四肢动禅不得的惨状。他写道：“旅顺口在辽东半岛之南，外有黄金馒头之险，内有东

港虎尾之隘，形势天成，为日本所据，遂失奉天辽阳之藩。威海卫在登州半岛之东，与旅顺相峙，刘公岛扼于其口，天测其西，水道其岛东，自英据以来，则直隶海峡之十五岛亦无用也。胶州湾在即墨之东，莒县之北，山东以南之咽喉也。阴岛峙其内，大小营岛耸其外，自德人占据以来，山东之地囹圄其喉也。台湾北倚琉球，西临厦门，福建藩篱即此。日人取之，则闽固不能固而越土亦岌岌危也。珠江一带，其所障者，为香港、澳门，左右相对，广州府在二地之中。香港割英，澳门入葡，则香山东莞亦无所屏而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亦在二国之拳握，不待言也。”我们这么大段地抄录吴芳吉的叙述，是想说明，这位 13 岁的少年，从时间和空间的连接上把握历史，如数家珍似地把一幅蚕食不全的版图，摆在国人面前，立体而有声有色的控诉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他说他深深地忧虑国势衰微，更担心几经失败而无所适从的民众，难以振奋，他只想痛泣！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这位 13 岁的少年，竟然神到从有形的外交失败，追索到由此产生的无形外交的失败，而且他说这种无形外交的失败，已经有些年了。同时，吴芳吉还用世界上已经被侵略者鲸吞，沦为殖民地，完全丧失领土、国权的国家为例，警醒国人。13 岁少年，爱国忧民之切，见解思虑之深达此，足见中华民族终于未亡之必然！

吴芳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已经想到由外交失败导至的赔款割地的要害，在于主权丧失。一个国家的主权，本来是国家对内高于一切和对外保卫独立自主的固有权力，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国家独立的主要标志和基本保证。主权丧失了，只能听人

摆布，不能自主，何言独立？从国际法层面上说，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所标示的基本权力，诸如独立权，自卫权，平等权，管辖权等等，就都只能落空，无从谈起，无法享有。失去了处理国内国际事务本不该受他国干预、限制的最高权力。正因为受制于人，不能自主，才不得不赔款、割地，听命于人。吴芳吉写道：“铁路之权握于人手，是铁路失败也；用人之权握于人手，是用人失败也；关税之权握于人手是关税失败也；操练之权握于人手，是操练失败也；商矿之权握于人手，是商矿失败也。”世界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他们自己的资本帝国主义，这正是“效西法、倡新学”的志士们没有认识到的，也是志士们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正如后来毛泽东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时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 [16]

吴芳吉还把视野伸延到全世界。他认为：“印度之被英灭也，以嗜吸鸦片。埃及之被英侮也，以无财政权。高丽之为日吞也，以无振武精神。越南之为法隶也以尚文，波兰之亡于俄也以少爱群之心。”使吴芳吉特别痛心的是，这些遭“灭国戮种”的国家，“皆各有一瑕”，而我国“其瑕皆具也”，这使他倍感悲凉，更决心启之。充分反映了 13 岁的吴芳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中国人民自古自强不息。只是由于封建专制政权已使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而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在资本帝

国的疯狂入侵、贪婪掠夺下，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一时间，形成国自为国，民自为民，被世人鄙称为一盘散沙。民虽欲爱国，而无法可爱；民虽欲救国，而无法可救。因之，吴芳吉大声疾呼“爱国合群”，以解“民无适从”之虑，以求民可依从之策。这实际是反映了历史呼唤智者引领，团结奋斗，共谋图存。

在挽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中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爱国的知识分子、农民兄弟进行了无数英勇卓绝的斗争，最终把封建制度送上了断头台。太平天国的斗争、义和团的斗争、广州城北三元里民众抗击英军的斗争，都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敢于同一切强敌进行顽强斗争的伟大英雄气概！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近代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吴芳吉忧心的“民无适从”的根本问题，正是如何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反对封建专制，实现政治民主？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这个独立、民主、富强的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又是吴芳吉读外交失败史书后深思熟虑而没能解决的问题。吴芳吉说，他读外交失败史，最怕的是“蹈印度安南等之覆辙”！幸好，经过漫长的卓绝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在40年后迎来了当家作主的好时光，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自主，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如何使国家强大，不受欺凌？吴芳吉断言：“苟能审外情，图自强，则虽启关开隘，他人何敢藐视！而豆剖瓜分之说，何敢倡言而外交又何有失败？”吴芳吉已体认到，国家强盛了才能确保主权无损，才敢

启关开隘，才会有兵护侨。当然，这时的“兵”已经不只是军队的实指，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社会安定、人民意气风发基础上的国家权威之威慑力量。似乎 13 岁的吴芳吉已经料到，70 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必然迈向和平崛起的康庄大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里，我们要说，吴芳吉不是政治家，不是历史学家，仅仅是一个 13 岁的少年，他的读后感，不可能没有瑕疵，然瑕不掩瑜，无需言及，明人自见。其实，即使是政治家、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做到即席之论而无懈可击。

不过，这毕竟让我们深刻感受：独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是能团结和谐、奋发有为的民族；是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的民族；是会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民族。国家强盛、民族兴旺，才能在一切国际交往中底气十足，运筹自如！

后来（1916 年），吴芳吉在他的“弱岁前自传”诗《痛定思痛行》里，对他的弱岁前的那段成长过程，有动情的回忆。这里，选录几段于后。

吴芳吉下笔没先写身世、家事，而写国事：

我生丙申夏五月，黄海波翻黄人骨。

台南鼙鼓冷方收，三韩天地又孤掷。

明年相继失胶州，旅顺威海同横逆。

强国会起倡维新，都门六子痛流血。

接着，从六岁读书，把自己逐年增岁和国家大事连起来：

六岁方读《禹贡》篇，渡海联军陷碣石。

可怜紫竹林下人，翻身入水水不没。

十三去蜀赴幽燕，豆剖瓜分不终夕。

十四临战武汉墟，民军九省张挞伐。

十五库伦烽火高，十六转徙金陵役。

洪宪天子妄称尊，当我十九气突兀。

风声鹤泪命如系，既观其始复其卒。

该说家事了。吴芳吉说他父原为商贾，家较殷实。他出生受到很好的照顾。

我生周岁，哑哑学语。

有亲爱怜，有姆哺乳。

慧心如萌，能识方数。

及生二岁，瑰伟益奇。

邻称贤嗣，族称可儿。

教我识字，天地亲师。

三岁发蒙，《周南》二诗。

家庭的变故，使吴芳吉感受了另一种生活。

迄我六岁，家道失坠。

讼狱连年，死亡相累。

旧欢如梦，繁华如戏。

十岁还乡，依于伯叔。

伯叔喜富，不喜贫蹙。

……

我父在外，忤官下狱。

我母劳瘁，抚我夜哭。

恨我无知，冤不能赎。

衣裳典尽，菜根果腹。

天无绝人之路，人有重情之君。吴芳吉在好人的帮助下入学读书，又有好师资助赴渝救父。

亦有仁人，施钱盈掬。

东山十里，肄于义塾。

朝出暮近，长林幽谷。

淋雨泥泞，稻草裹足。

穆穆龚君，校之会计。

予我十金，不我遐弃。

慷慨出门，寻父之地。

日三百里，腾空如骥。

长跪上书，诉父之罪。

父闻我来，握发拭泪。

探首狱门，疑为异类。

穆穆龚君，感君天赐。

非君拯拔，何以卒岁。

从聚奎读书考去清华，在清华遭害后直到吴芳吉写他这首弱岁诗

的 1916 年，诗里都有记载，这里就不再说了。在聚奎，资助他的会计叫龚茂如，吴芳吉当然没有忘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切行善的人，人们应该善待。历史应该记载，亲朋不应忘怀。

吴芳吉弱岁前的自传诗，洋洋一百七十八句，而关于他在聚奎作文《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而被誉为神童，并因此考上清华学堂，却只有一句：“十三去蜀赴幽燕”，寥寥七个字。这是他的疏忽？不，是大智若愚的常态！

最后，我们要用家乡的老领导、上世纪三代的诗人凌文远前辈的诗来结束本章。

重庆直辖后，凌老在市政协领导岗位上。当时，他一心想借助这个职务之便，从文化入手，更准确的说是从我国的名片——诗入手，做海峡两岸的交流、沟通工作。几年下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比如与台湾的彭邦楨合作出了《两情集》诗，比如当他得知在台湾出版《吴白屋先生遗书》（三卷本）的家乡人周开庆去逝，即写了《挽周开庆先生》，也在此录下。

风骚异代各纵横，禾黍离离昧死生。
花发台澎来好雨，魂牵巴蜀有前盟。
何堪绕尾常携杖，未必围城更索羹。
西望故园杳无际，天涯芳草误归程。 [17]

在诗前还有一个小引，是这样说的：“闻乡人周开庆先生客逝台湾，适

香港谢博士《游重庆》长律，因袭其意以悼之。呜呼！一生忧患存文叔，半世乡情老少陵。于今得此解者，亦甚难矣。”

这次是聚奎中学中 10 班的学生吕有文，怀念母校，写了篇《忆黑石山》，凌老读后，激情赋诗。

读《忆黑石山》一文大快，为续《三英图》以足之
并因吕平先生而奉著者

覆巢完卵惜无多，二战同袍誓灭倭。

一侠倘容留白屋，警钟三百叩长歌。

（白屋诗人 吴芳吉先生）

八年盗寇亦猖狂，留镇靴刀砥一方。

漠代衣冠穷瓦石，千山野渡雁声长。

（考古学家 邓少琴先生）

须眉我亦叹黄昏，枝叶难忘不次恩。

况汝燃灯添一记，音书异地各招魂。

（国画家 张采芹先生）

心期如梦此如何？未应非熊鬢已皤。

往事般般俱化石，青山遥指泪痕多。

(离休后自况并常以况人)

一九九五年九月 重庆[18]

注释:

[1]第 1 页。

[2]第 386 页。

[3]第 1237 页。

[4]《于丹〈论语〉心得》第 111 页，中华书局 2006 年 11 月出版。

[5]第 38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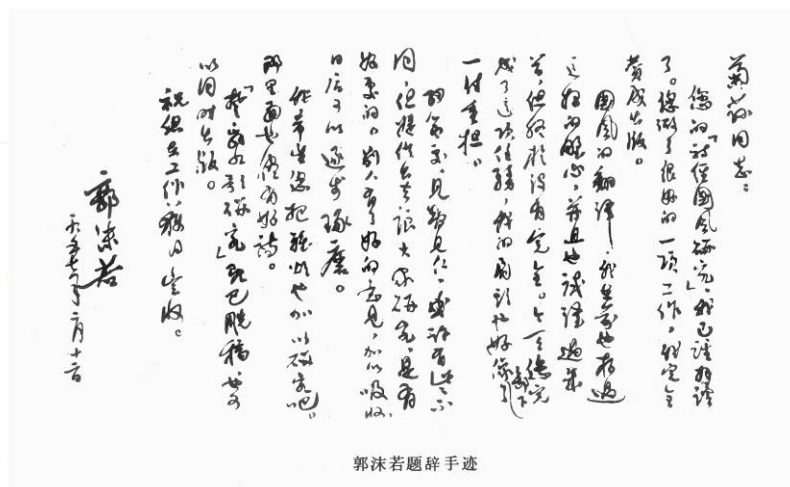
[6]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 3—22 页；第二卷上册第 1—21 页。

[7]第 114—116 页。

[8]第 420 页。

[9]参见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评》。

[10]郭沫若为蓝菊荪题词手迹影印件:



[11]第 526 页。

[12] 《尚书》第 33—43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出版。

[13]第 309 页。

[14]第 304 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26 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79 页。

[17]凌文远《月是故乡明——凌文远诗词全集下》第 345 页，重庆出版社 2009 年 5 月出版。

[18]同注[17]第 452 页。

第二章 爱国直书民疾苦

杏坛传道德化人

吴芳吉诗：

戊午元旦试笔[1]

煮得甘薯胜肉糜，陶然一饱百无思。
贫妻笑著新棉袄，要索郎君竹马骑。

兵戈未定盗披猖，惟有穷家乐事长。
除却惜阴无所恋，一年人比一年忙。

权桎债主影如梭，避债难于蜀道过！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悔教幼年胆气粗，新从贤圣致工夫。
平生不为兴亡感，奇恨儿时少读书！

对于吴芳吉 1918 年去永宁（现四川省叙永县）中学前写的这首诗，诗论者都很重视，因为诗里有被大家公认为是吴芳吉作诗的原则的精髓诗句：“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就连郭沫若也推崇，特别在当年为吴芳吉送行的诗里，引用，认同“苍生莫辜负”，同时提

醒他不要忘记了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的屈子，应该努力继承弘扬屈原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片深情。当时赞扬吴芳吉《元旦试笔》的有黄介民，给了吴芳吉八个大字：“朴实坚强，具有道气。”说他达到了道德的高度。[2]四川省原人大主任何郝炬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吊唁吴芳吉的时候，特“拟吴芳吉诗意”为诗，呼吁关心“民疾苦”：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愧对苍生何！

伊谁识得其中义，受用终生好处多。[3]

人们对吴芳吉的尊敬、歌颂，绝不只是因为他的诗歌写得好，尤其因为他的诗品、人品好，思想境界高，人生追求远大，把一生与人民融为一体。这里，我们录下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吴芳吉逝世后成都文学、艺术、教育界五百多人在四川大学至公堂举行的追悼会上，著名作家李劫人，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的悼词，或许对我们理解吴芳吉关注“民疾苦”会有帮助。虽然，这是吴芳吉辞世的当儿，在国统区人们的悼念，吴芳吉尚未盖棺认可，这才更具说服力的。

各位来宾：今天我们追悼的人，并不是有权有势的达官，也不是退居林泉的遗老，而是穷愁孤愤，抑郁牢骚的一位诗人。觉得我们今天到会的人们，都具了一副惨淡的面孔，热烈的衷肠，在过云淡风凄之中，来追悼这诗人，自然比别的追悼不同，而且很有意义的。至于，我们之必要追悼这位诗人的动机，就是因为他虽是一个诗人，但却不是通常那吟风弄月，抛点闲恨闲愁的诗匠，而是具有杜甫悲天悯人的思想，白香山平易近人的社会观念，逐处要想救国救民，逐处要

想在民众悠悠的冤路上开一条直径，要想在森严黑暗中放一道光明，要想解除人民的烦恼，要想促进人类的幸福。这些惨淡经营的苦心，都一一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不用说，想来大家都是知道的。不幸我们社会的警钟，民众的喉舌，一旦赆志殁了，那么，今后一切的痛苦生活，黑暗状态，辽阳的烟火，海上的风云，还有哪个来替我们悲愤的描写，代鸣不平，或者洒一掬同情之泪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追悼，形式上虽是一部分人的感情冲动，然而，实际上不啻是整个的四川和中国，乃至今世界的父老昆季诸姐妹们应有的悲哀。这样说来，我们追悼吴先生，意义更为浓厚，悲痛更为深沉了！[4]

吴芳吉冥诞一百一十周年（2006年）时，四川大学举行纪念会暨理论讨论会，我提供了一篇《试析教育家吴芳吉教育实践的轨迹》[5]的论文，在人们从诸多方面论述吴芳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之后，从教育视角，论证吴芳吉是教育家，进一步说明“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不仅是吴芳吉作诗的原则，而是他人生观的诗意表达。现在看来，我还坚持几年前的看法。我是这样说的：“吴芳吉生存时代的社会现实，孕育、培植了他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以及改变国弱民贫，报效国家民族的抱负。他用大量的诗词作品和毕生的教育实践，展示了他的这一伟大精神风貌。吴芳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了‘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这一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就是吴芳吉著名的‘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作诗原则的哲学

基础。我们认为，纵观吴芳吉的毕生奋斗，他在 22 岁任教于永宁中学前喊出的：‘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远不只是他作诗的原则，而是他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价值取向。‘不负苍生’体现的精神实质，是吴芳吉教育实践的治学方略、培养目标、人才标准，指导思想。吴芳吉自己表明他的人生观，最早是在 1916 年，当时他写了首《吴碧柳歌》，自注有云：‘此诗三章，盖即弱岁以前之人生观也。’与此同时，他在《白屋吟》里写道：‘传家以淡泊，度日以耕织。布衣暖如云，菜根甜如蜜。茅舍如春风，形骸如皎日。’说明他对待生活的态度。视耕织如春风，使人格如皎日，赤热光明而圣洁。至此，我们看到了‘不负苍生’的原初生活土壤。”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根本看法。内容包括幸福观、生死观、苦乐观、荣辱观、恋爱观等。人生观是世界观亦即宇宙观（吴芳吉多用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社会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文化素养不同，人们对于人生的价值、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等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在阶级社会里，各种人生观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最主要特点是个人主义，一切从自我出发，一切以个人为中心，把剥削他人和追求金钱视为人生的根本目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特点是集体主义，一切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把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视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视为人生最高的目标。因此，无产阶级人生观又被称为共产主义人生观。当然这只是词书上对人生观的一般理性规范说明。在现实

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人生观总是较为复杂的，总是会随着生活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社会大气候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或是前进着的，或是停滞着的，或是倒退着的又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保守的，或甚至是反动的，而且对于任何人来说，人生观都不是单纯的、简单的，并非纯而又纯的，一般是就大方向而言，基本方面而言。我们在引言里曾经说明吴芳吉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又说过，吴芳吉的长子吴汉骧说他父亲没有接受马列主义。这些，对吴芳吉宣示和遵从的“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抱负和人生追求并无大碍，并不矛盾。吴芳吉长子吴汉骧的话，还应从解放后的政治生态环境对人的要求总是要以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为标准的习惯性来考虑。接没接受马列主义不能只是贴标签。汉骧老师从小受到父亲吴芳吉的严格要求，总希望儿子在道德上达到“至善”。解放后，特别是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人们对人的要求，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更是以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为口头禅，不如此，自己也会觉得低人一等了。汉骧老师在文章里说他父亲吴芳吉没接受马列主义时的心态，我不便瞎猜，但从我们在重庆师专共事所见来看，汉骧老师是非常积极认真的人，一直追求进步所以他终于在晚年 70 岁，1986 年加入了共产党。对于马列主义，就多数人而言，有一个不自觉地感性践行和自觉地理性坚守的问题。一般来讲，劳动人民、贫苦群众、受经济状况决定，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平等，赞同团结，但他们并不一定有马列主义的系统理论的支撑。这正如一个诚实地自然科学家本能地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一样，亦如马克思把《资本论》的书稿念给工人听工人能听懂一样。

吴芳吉在从事诗歌创作之初，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他在写“戊午元旦试笔”之前，写了四首“咏史”诗[6]，以其爱憎的无比鲜明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从历史的多视角关照“民疾苦”的，他是怎样探索为“苍生”塑碑的。不论是写收复台湾的抗清名将郑成功，还是写为国除侵略元凶的朝鲜英雄安重根，亦或是写美国的总统林肯，还是写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我们知道，虽然以诗言史古已有之，然吴芳吉这里选了不同国籍的四个人作为一组，而中心意旨却是一致的。他的着眼点，一在爱国、卫国，一在爱民、为民。

我们知道，郑成功（1624—1662）是南明抗清名将，更是收复台湾的名将，为了捍卫大明，屡与清兵作战，反对其父降清。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带领战船三百多艘，进攻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经过九个月的围攻，迫使荷兰总督揆一投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他招致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州流民渡海安置，广设城镇，大举屯田开垦，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爱国功臣，终因连年劳屯，年不饶人，于收复台湾后五个月病逝。对于这样一位收复台湾的功臣，吴芳吉写道：

国破已无人，违心况有亲。

帐前走远笔，马上华阳巾。

社稷余翁仲，海天哭老臣。

台南山色晚，不见汉遗民。

“咏史”诗的第二首，写除凶英雄安重根。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是日本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元凶。就是这个元凶，从1885年起，四任日本首相，确立了君主立宪

政体的近代日本天皇制度。他极力主张侵略中国和朝鲜，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夺取中国领土台湾，并将朝鲜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1905年12月到1909年6月，任朝鲜总监，加深朝鲜殖民地化。1909年10月，为同沙俄商谈吞并从朝鲜到中国哈尔滨的广大区域，26日抵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英雄安重根枪杀。吴芳吉写的咏郑成功的诗说“国破已无人”，就是指台湾被日本侵占，没有如郑成功这样的爱国英雄抗击，只见“社稷余翁仲，海天哭老臣”。

吴芳吉咏安重根的诗是这样写的：

倭寇下朝鲜，千秋一荡然。

烏飞萸子国，花谢牡丹团。

大将肯开拓，英雄甘永眠。

辽河风露重，无伴语君前。

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朝鲜人民祖祖辈辈耕耘的祖国河山，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千秋一荡然”。田土荒芜，花木凋谢。在侵略者的残酷统治下，哪里还有老百姓交流言谈的自由啊？

吴芳吉“咏史”咏的第三人是美国的第16任总统林肯（1809—1865）。对于美国总统，有什么值得吴芳吉关注的呢？林肯出身于美国肯塔基州一贫苦公民家庭。曾当过伐木工人、店员、邮递员和水手。虽未受过多少正式教育，但勤奋好学。当然这并非主要的。重要的是在奋斗争取到任州议员时，公开反对奴隶制、因而成了一个政党领袖，后又加入共和党。1858年发表有点儒学味道的“家不和，必自败”的

讲话。还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以其维护联邦统一、废除黑奴制度的功绩和优秀的品质，赢得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钦佩与爱戴，成为美国近代史上与华盛顿、杰斐逊齐名的“三大伟人”之一。

吴芳吉是这样咏林肯的：

柴门动朔风，碧血已云空。

品望唐虞上，经纶汤武同。

爱民原至性，高位不忘穷。

华表百千丈，留来棲断鸿。

知道了林肯的简单经历，诗的语意就清晰了。“高位不忘穷”是不是有点关心“民疾苦”的味道？吴芳吉还让林肯享受我国汤武的荣誉：“顺乎天而应乎人。”

吴芳吉咏的第四位历史人物是贞德。

贞德亦即冉·达克（1412—1431），是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法国的女民族英雄。她的父母都是农民，为人正直勤勉。贞德参加了保卫法国领地城镇的拉锯战争，她鼓励战友，指挥突围，英勇冲杀，击退英军，解救奥尔良城，人称“奥尔良姑娘。”后因有人背叛，在英军狱中受尽折磨而英勇不屈，被宗教法庭以“异端”、“妖术”罪判处火刑。但在她忠勇爱国精神的鼓舞下，法国人民奋勇战斗，终以法国失地的收复和领土的统一而结束战争。1456年，教会为她恢复名誉。后来每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是法国为纪念她的节日。

吴芳吉咏道：

王气何曾尽，风云龙一呼。

胆寒西夏贼，纓冠女儿乌。

铁甲扶危運，花旗灿版图。

于归烦火燧，蜀嫁海西隅。

咏史诗四首的韵味正萦绕脑际，我们赞叹 20 来岁的吴芳吉史学知识的根基厚重，我们赞叹诗人如椽韵笔的深广灵性，我们更赞叹吴芳吉眼光的远大高洁，我们更赞叹吴芳吉人生追求的情纯理端！人类同处一个地球村，从《咏史》里，我们不是看到了吴芳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具有国际主义的意义吗？“人民”这个词，在吴芳吉那里似乎是没有国界的。这是不是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列宁说过的“工人没有祖国”的深刻含意，这不也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题中之义吗？

本来我们在《读外交失败史书后》里，已经认知了吴芳吉历史视野的理性论述，现在又从《咏史》感悟到吴芳吉用诗的形式表达的历史人物油画的至美至善。不同的是，前者是悲叹祖国国势衰微，呼吁有识之士起而抗争，成仁取义。后者是颂扬为国为民的义举善行，期盼有志之人效而勇为。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领略了吴芳吉作为“人”的情和理一致的高尚魅力。

吴芳吉到永宁中学教书，有三个原因，一是生计所迫，二是教书报国的抱负，三是诗人的本能冲动，歌颂蔡松坡（蔡锷）将军的责任召唤。

关于颂扬蔡将军之事，还得从吴芳吉拂袖清华回川说起。那是 1916 年，当时蔡松坡统率的护国军，战事平定，吴芳吉的国内外朋友争相

函求。认为蔡松坡将军所领导的护国战争，是民国史上最有价值的战争，都希望他能亲自到川南去考察，用吴芳吉的诗歌天才，再现当时战斗的实况。只因为江津距永宁路途遥远，永宁又处山区，往返困难重重而迟迟未行。

仁者多助。吴芳吉说：“七年（即公元1918年），蜀南永宁中学忽邀我襄教于是，因慨然冒险往。自合江而赤水、而永宁，而纳溪、而泸州，放览山川，周围千里，皆古战场也。”[7]有趣的是，永宁中学曾是蔡松坡将军的军医院。学校安排吴芳吉住的一室，曾有五六十位伤兵死于该屋，是许多人都不愿住的地方。我们从吴芳吉与长老谈宗教已经知道他是不相信有鬼神的，是个无神论者。有安身之处何乐而不为。

戊午年腊月，吴芳吉自永宁归乡，特地到蔡松坡将军指挥的护国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凭吊，“一时热泪交迸，不能仰视。”第二天又巧遇蔡松坡将军驻扎大洲驿时为军队供应农产品瓜菜的老者，吴芳吉与之进行了长谈：“迺老人坐榻上，煮酒挑灯，请话护国岩故事。且饮且酌，且倾听，且疾书，就老人所述之者述之。”[8]很快，吴芳吉的《护国岩词》草就了。

我觉得，说《护国岩词》是歌颂蔡松坡将军当然是对的，然而从借此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却是在拥戴孙中山歌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的功勋，歌颂南京国民政府。是在申斥“梦想当皇帝老儿”（吴芳吉语）的袁世凯。是在唤醒民众，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进步情感。

我们知道，1915年袁世凯伪造民意，加紧推行复辟帝制的活动，

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称帝，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号召人民共同“戮此民贼”。12月25日蔡松坡在云南首先举行武装起义，成立护国军政府，讨伐袁世凯，以唐继尧为都督，组织讨袁护国军。蔡松坡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川。护国军所到之处节节胜利，接着又有贵州、两广、陕西、湖南等省相继独立。袁世凯面临众叛亲离的窘境，被迫于1916年3月23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1916年6月6日孤寂而亡。吴芳吉的诗，是说到全国人民的心坎上了。

当时，吴芳吉的《护国岩词》还未发表。友人刘泗英读到手抄件，从日本致信说：“得《护国岩述诗》，惊喜若狂。友们争看，此时又入谢祖尧君手矣，恨不能书万本读万遍。吁嗟碧柳，文学感人耶？松坡感人耶？当快读时，是碧柳诗，是松坡战。恍如亲临行阵，见松坡指挥七千健儿，血战川南山巅水涯之间，呼声口令，尽溢纸上，胜读元曲数卷。始以将军之事，终以此日之乱，仁暴之分，兴亡之痛，读此又胜读《桃花扇》一卷。呜呼！其人其地，其事其诗，皆并传而不朽矣。”[9]而在永宁大洲驿的吕汉才说得更简单明白：“有蔡将军之大功业，不可无先生之大手笔以出之。放声一读，令人生得无穷感慨，无数雄心，真有马鸣山崩鬼哭神号之慨。”对于吕汉才的评论，吴芳吉说：“此寥寥数语，评断的当。”为什么呢？“盖在他人评之，犹未是许为知己，惟汉才家于护国岩畔，蔡公人品战绩知之最深，以吾《护国岩词》得护国岩人评之，是乃真能解识者也。”[10]

现在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护国岩词》的精采。

护国岩词[11]

护国岩，在永宁之大洲驿，故松坡将军遊钓处也。戊午腊月，吾自永宁解馆归。舟行三日，过岩下，命停舟往弔之。一时热淚交併，不能仰视。明日，至瀘州，寓中有老者，頰白矣，自言为大洲驿人，松坡驻驿中时，常为采瓜果餽之。因迎老人坐榻上，煮酒挑燈，请话护国岩事。且饮且酌，且倾听，且疾书，就老人所述者述之，名曰《护国岩词》。

一

护国岩，护国军，伊人当日此长征。五月血战大功成，一朝永决痛东瀛。伊人不幸斯岩幸，长享护国名。

二

憶当日，几纷争，闾阎无扰，鸡犬不惊。问民病，察輿情，多种桑麻与深耕。视屯營，抚伤兵，瓦壺汤药为调羹。雪山关，永宁城，旌旗千里无人闻。沙声天外闹薨薨，儿童路上笑盈盈。扁舟点水似蜻蜓，五月薰风好晚晴。芳草绿侵岩畔马，夕阳红透水中云。双双归鹤逐桡行，银袍葵扇映波明。伊何人？伊何人？牧童伴，渔父鄰；滇南故都督，护国总司令，七千健儿新首领，蔡将军！

三

“报将军，敌来矣！蓝田霸失先锋靡。团长陈礼门，拔剑自刎呼天死。妇女輒轮姦，男儿半磔洗。茅庐比户烧，杀声遍地起，敌兵到此不到十里。既无深沟于高垒，将军上马行行矣！”将军回言：“休急急，我有诸军自努力。但教城民缓缓迁，背城好于雌雄敌。”

“报将军，敌来矣！右翼陷落左侧毁。敌人势焰十倍蓰，彼众我寡何能抵？弹全空，炊无米，马虺隤，士饥馁。百姓已过西山址，将军

上马行行矣！”将军回言：“休语絮，风和日暖景明媚。无尔披衣共杀贼，黄昏不勝令军退。”

“报将军，敌来矣！东城已破北城啓。漫天漫地索虜声，如潮澎湃蜂擁挤。蹄跡^蹴跋已動墙，喇叭喧喧渐盈耳。百姓去空兵全徙，将军上马行行矣！”将军回言：“敌来耶？星稀月朗夜何其！束吾行囊捲吾书，执吾纜轡荷吾旗。敌兮敌兮吾知彼。小别也，纳溪。”

四

棉花坡上贼兵满，弹丸纷坠如流霰。巨礮号六稜，令地震摇人落膽。一营衝锋去，應声匝沟畎。二营肉搏来，中途无回转。三营五营但纷崩，浩荡追随如席捲。霎时流血豔长江，马踏伏尸蹄铁软。“吁嗟众士听我言：计今惟有向前赶。尔乃共和神，国家幹，同胞使者皇天眷。三户可亡秦，况我七千身手健！连长退缩营长斩，营长退缩团长斩，团长退缩旅长斩，旅长退缩司令斩，本司令退缩听人斩！战战战！敢敢敢！”

五

進营门，“报将军！”“尔何人？”“我乃江上野农民，业採薪。”“尔何云？”“北兵偷向江南侵，艨艟二十四，舳板如鳞。”“来何处？”“二龙口下马腿津。”“遠几许？”“四十里弱三十羸。”将军上马令疾行，遥见岸北敌如雲。方待渡，趁黄昏，将军下马令逡巡：“一列伏石根，一线倚荒墳，后翼伺丛林，伐鼓在山村，机关礮隊據高墩！”月黑风阴，野静潮横，急湍拍拍岸沉沉。艨艟二十四，舳板如鳞，得意一帆江水深。礮轰轰，槍砰砰，鼓登登，霧腾腾，琮琮铮铮，飒飒纷纷，一阵

马鸣山崩，不辨哭鬼号神。北人从此不南侵，是之谓得民心。

六

今日者，岩无恙，只苍藤翠竹增惆怅。犹是军，犹是将，犹是丁年，犹是甲帐。何为昔爱戴，而今转怨谤？只为西南政策好，谁知反将内乱釀？互猜疑，互责让，互残杀，互敌抗。一片天府雄国乾净土，割据成七零八落骯髒浪荡。顾山高水长空想望，益令我思良将！

吴芳吉说此诗是民国八年元旦瀘州旅店中作，“雪山关”，川黔交界处。“蓝田霸”，瀘州上游三十里。“陈礼门”，隶川军师长刘存厚部。“棉花坡”，纳溪城外。“二龙口、马腿津”，皆在江安县下游。

这里，我们再把另一位教师周一生先生用诗的形式颂扬蔡松坡将军的诗录下。这是距吴芳吉的《护国岩词》七十年后一首《赞蔡锷》[12]，两首诗角度不同，精神一致。

（一）响应武昌起义

秀才少师梁谭君，赴日学军拯斯民。

赵义武昌昆明应，都督云南多革新！

（二）护国再造共和

巧斗袁奸脱险境，举旗护国撼“龙廷”。

勇征蜀道飞捷报，再造共和享盛名！

（三）孔明星陨

军帐披衣起夜半，喉疾难耐二月寒。

国贼喜除惊噩耗，痛惜星陨五丈原！

我们知道蔡松坡即蔡锷 1882 年出身湖南邵阳，1898 年入长沙时

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戊戌政变后至上海入南洋公学，次年赴日学习，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1911年初至云南，与同盟会籍革命党人多有联络，武昌起义后发动昆明新军响应。1916年11月8日因积劳成疾病逝，与黄兴同葬于长沙岳麓山。周一生先生的颂诗的最后一句，是说蔡将军有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吴芳吉后来来到长沙明德中学教书，去后首先到岳麓山凭吊他崇敬的蔡松坡将军。其实，还在吴芳吉的《弱岁诗》的《思故国行》第三首，就是吊念蔡松坡将军的。[13]

还在吴芳吉去永宁之前，恩师萧湘上门鼓励他：“子诚文学革命之健将，文学革命不在道理之能揭出，而在笔下之能做出。笔下果做得来，不革而自革之。譬如行兵，不仅宣布羽檄，昭示敌人之罪，必真能战得杀得，则不怒而威也。”[14]可以想象恩师的激励会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吴芳吉倾心“民疾苦”，既有自身所处环境急得改善的昭示，又有血气少年荣辱经历的刺激，更有祖国遭难，民众受苦，社稷离乱带来的揪心。还在他从清华拂袖归家不久，于1916年7月给吴宓的信中[15]，先提道：“诸友同学数载，一旦临小利害，望望然去之，诚为可痛。然而不足怪也。”吴芳吉是把个人身世之祸福荣损不放在心上的，他关心的又是什么呢？他写道：“世道之衰微有以使之，若乃憔悴伤嗟。无可措手足者，天下大愚，莫过于此。”他忧心的是国家社稷之世道。他说：“且宜思所援之。”他痛感：“世道之衰微，非一人致之众人致之也；非

一时致也，百年積之也。”要改变国家的现状，他认为：“一人之力不足，積人之力赴之；一时之力不足，積年之力为之。”他认为尧舜治世之道、汉唐元明之象，今已不可效。为什么，他说：“吾人之气量学行有未到耳。”这是吴芳吉从北京回川沿途数月的耳闻目睹必然得出的又一深刻印象。也是吴芳吉从教以助青少年启蒙的诱因。

正因为如此，吴芳吉非常重视不失施教于人的机会。这年11月，吴芳吉在重庆《强国报》作事，有“某生”函求指教，吴芳吉晓以大义：“足以今日学诗，当学古人为人，而后学诗。”吴芳吉说：“大凡境遇艰危，立身高洁者，其人不朽，其诗亦不朽耳。”吴芳吉立即以自己学习的亲身经历告诉“某生”，“以吉所知，邱公仑海之诗，则自子美放翁之以后，足以当之。”接着，吴芳吉具体讲解如下：

邱公，我台湾人也。甲午丧师，割台湾于日本，台人起义抗之，举公为大元帅，督师十万以征倭寇。明年，朝命解散，公内渡为粤人讲学罗浮山中，激励尚武，以雪国耻。辛亥革命军兴，诸将皆出其门，以公主粤政。会师北伐，至金陵而卒，台湾偕亡。《嶺雲海日楼诗》，公之遗也。自甲午迄辛亥。二千余首，空灵雄健如其人。吉受读公诗于宗兄雨僧，叹其峥嵘豪放之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情而为至人，至人而为至文，足以挽流俗，匡末运，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作也。[16]

吴芳吉对“某生”的教育指点，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个别教育。就其内容来看则是一个典型的诗教范例。教要学诗的人先学为人，再学为诗。教人学诗，是学该学之人之诗。教人学人，是学该学之人的

民族大义、民族气节。是学该诗作者之爱国情怀，以身许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吴芳吉总结说：“邱公之诗，乃英雄之诗。”当然，这里的学诗、学人的先后，并非时序的安排，而是思想情感的倾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导思想问题，着眼点问题；为什么学诗，为什么学习；怎样做人，做怎么样的人。对于一位好教师来说，从知识层面讲，叫做应该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不是只给求学者以知识，而是应该给求学者以获得知识的方法。从思想品德亦即精神伦理层面讲，就是应该通过知识的传授，潜移默化地使受教育者感悟到应该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这是吴芳吉德化教育的一次初始尝试。

这里，我们要多说几句。前不久，我们创办的重庆市益才学校的几位校董事，去宝岛台湾观光，得知台湾人民为了不忘记，那段被日本侵略的历史，为了纪念抗击侵略者的名族英雄邱逢甲，在台湾，不但有以邱逢甲命名的街道，以邱逢甲命名的书店、商店、宾馆，还有逢甲大学。逢甲大学的校史说：“民国 40 年代，台湾中部地区部分仕绅倡议在中部地区另建一所大学。创办人萧一山、丘念台、杨亮功等于 48 年 10 月开始筹备创办，命名为‘逢甲工商学院’以纪念丘逢甲先生”。学院于 51 年 8 月正式开学，69 年 6 月改为“逢甲大学”以忠勤诚笃为校训，秉持“全人教育”的理念，注重德智体群美的均衡发展，坚持勤教严管的传统，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漫步逢甲大街，思念英雄逢甲。似乎看见吴芳吉与邱逢甲携手阿里山上，日月潭边，两颗中华优秀子孙的心，在一起跳动，跳动：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日子不远了。为此，我写了“宝岛游感赋”一题二首：分已有时当好合，雄

图再振更无前。[17]

吴芳吉离开《强国报》回到江津白沙，友人张仕佐函问，吴芳吉于1917年8月复函，又是一封从历史入手忠告为人当救国的大义之论：“足下诗，请以诗论。夫能察乎世道人心之变，以观古今人诗，而立诗之极则，致于平治之用者，孔子之后，吾未尝闻之。今吾人学力不足，且不必高谈及此。然学古人之诗，则必学古人为人。足下近习杜诗，当知杜公忠爱、每饭不忘君国，其人品节操，高出千古，故其诗之雄寇千古，无以加之、秦汉以降，文章叛道日远。吾人今日，首宜求树人救国大计。徒拘拘于雕虫小技，非所望也。”[18]

在去永宁前，吴芳吉还应友人刘泗英之请，为他审阅《溶川事略》，[19]溶川系刘泗英之兄长。友人为兄长所作之传，应该说是不太好评的，吴芳吉则坦诚以待，有啥说啥，毫不隐晦。首先指出“通篇至情，原无可议。”兄弟之情深，谁会非议呢？然吴芳吉指出，不能“所扬之者，实以没之也。”接着指出“首尾立言，皆太著虚。”进而尖锐地提醒：“泛泛之人，何足传记？”并指出：“所谓文必奇者，非妄造黑白，欺人欺己也。”吴芳吉接着就文字方面的问题进言道：“次则冗语宜删，行文能删去一字，便删一字，能省郤一句，便省一句。卒至遇删无可删，省无可省，篇无冗句，句无冗字，其文虽非极品，亦有可观。”至此，我们又看到一种为师批改作业的德行。不过这是友人之间的交谊。最后，吴芳吉自谦道：“吉不文，亦不敢自作聪明，惟望彼此用功，以救同人之失。”“救人之失”，也是吴芳吉教育实践所遵从的教育理念，正是孔孟教育思想“长善救失”的德化教育原则的运用。助人至善，

救人之失；以德化人，化民成俗。

我们在引言里曾经提到，国家自鸦片战争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批志士仁人提出的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对吴芳吉也产生过影响，这都源于国家现状太使民众担忧之故。吴芳吉说：“念教育前途、贻误乡里子弟”，“此心耿耿，固时望诸君从大处着想从实处做事也。”下面，我们看看吴芳吉是怎样从大处忠告同学的。

天下治乱，系于人心风俗，其始也，由人心酿成风俗；其继也，由风俗转易人心。其力至大，其流至速，而其几至微。诸君苟于交谊贞固，存乎一心，心心相属，自成一种风尚。日久势厚，自然新俗以立，旧俗以去，所向无不感化，是即报国救群之大端，勿以为身在商场，无关邦国之要也。而入手之道，尤在提倡简单生活，毋好虚华，毋作虚事，毋求奉养太过。人能淡泊，自然善念自多，恶念日减。去年尝告诸君，经商不过谋生之一门路；而立身大节，要必本于道义，亦即此意。若惟饮食游戏之图，是自甘于行尸走肉，有何生趣？枚乘之言曰：“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蛾眉，伐性之斧；甘脆肥脓，腐肠之药。”盖人贵求乐，而求乐当在于心。苟求乐于物，未有不为物役者也。吾国贫弱之源，固甚多端。人民生活复杂之病，实为主因。惟其生活复杂，于是奢侈淫邪，由此而起。惟其奢侈淫邪，必争求所以饱其私欲。于是官贪兵横于上，盗贼骚乱于下。遊民滋多，生业不振。咸欲人劳我逸，人瘦我肥。積数十载至今，一齐爆发。乃有所谓行贿问题，党派问题，枉法问题，复辟问题，种种怪象。其不幸而失者，且假夷人之力，但欲保其身家，残害

邦国而不顾。此中妙谛，盖有物驱之不得不然，即生活复杂故耳。次则必求言行合一。今少年通弊，好为无责任之言。譬如哀伤国事，便肆口漫骂，政治如何纷乱，社会如何齷齪，徒诿其咎于人，彼则毫无过失。而察其实际，其行之纷乱，心之齷齪，固亦相等，此最可痛心者。故伤国之衰微，则我宜愤发。鄙世之芜穢，则我宜清高。庶几言行合一，具有人气。夫鸡鸣狗吠，犹有天职。人若巧于诿咎，徒作无责任之言，宁鸡犬之不若哉！[20]这是一篇劝世文，规劝友人关心国家大事，担当社会责任；这又是一篇时评，对于知识阶层的通病给以无情地揭露，并指出正道。其列举之社会怪象，似乎我们今天的社会也能找到亦有感觉。时代不同了，社会不同了，人受经济的影响还是规律性的；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人的劣根性亦然，变亦不大，似乎不只慢半拍，这大概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使然。更何况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还并未消失。教育的责任大焉！就在前两三年，我们不是也看见吴芳吉说过的现象：“今之时务，不但善人难得，亦且今人不敢为善。一人为善，十人非善，虽有善者，将亦害善累人，憚而远之。” [21]

吴芳吉对于国家之灾，是敢于担当的，他说：“中国若亡，吾断不肯远遁，必攘臂而起，赴边杀敌，以了此生。逃避南洋之说，决不赞成。国家既灭。当与同尽，今日所不尔者，则以时期未至，尚非千钧一发之时，故仍发愤读书，以储真实力量，作日后更大之牺牲也。” [22]这是吴芳吉去永宁中学之前回复吕谷凡邀他一起去南洋避难的信。眷眷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吴芳吉是要用教育来培养“强盛国民”以振救

政府。

吴芳吉临赴永宁中学前，给邓绍勤、邓成均，极其鲜明地表示：“忧国宜忧在心头，爱国宜爱得长久……至于立身处世，除上所陈者外，只求同流而不合污。其第一步功夫，当先问自己究为何如人，行何如事，既有把握，然后可以语于不合污也。” [23]从大处的根本观念，到小处的行为规范都想到了，核心在于如何做人，做何如的人！吴芳吉还从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论说了在学生中建立坚强的信念的问题，他在《与王梦余》的信中说：“道德之化，惟信仰也；宗教之教，惟信仰也；法治之治，惟信仰也。苟失信仰，虽有道德、宗教法治，举失其用矣。……故野蛮人必有信仰，文明国必有信仰，一日失去信仰，一日丧失良心。” [24]吴芳吉这里讲的信仰，显然是指热爱国家热爱民众。做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所以他又说：“人格教育以为今日之急矣。” [25]

我们说吴芳吉去永宁教书是受三个因素促使，如果分开说，生计问题，不去永宁也可解决，先不说他们“天人学会”的朋友一直在资助他，而且在吴宓的撮合下，是有君子协定的。靠教书谋生也并非只有永宁可去，当时萧湘就主张他去聚奎，荣县也邀他去教英语，因为那里正缺英语教师。诗颂英雄蔡锷，不一定要住在永宁教书才可为，如记者似的走一趟亦可完成。反过来讲，生计也确是一个问题，国外的资助，由于大战的原因，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状况不好，黄金贬值，友人负担加重，吴芳吉不忍心拖累朋友。教书，几所学校的综合情况，永宁较好，特别是好友鹤琴在永宁。颂扬蔡锷将军不但是

友人之托，更是他不负苍生的一次具体活动，住下来了解比一次采访更有明显的优势。就这样，1918年夏天，吴芳吉到永宁去了。八年后，吴雨僧邀他去北京，吴芳吉说：“无论作客何处，常欲兼顾两种条件：一要使薪俸可靠，庶无旦夕缓急之忧；二要使诗境常新，应有山、川风物之助。”这里缺了教书这一条，原来吴雨僧就是要他去教书的，说了就合拍了，他只能用那里的环境不适为诗来搪塞。吴芳吉意志所指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不能教书，不但有违他施教回报社会的抱负，也不能实现他的诗歌的价值。不能没有学校讲台这个平台。他是要用他的诗作为教材来教育学生，又是要借讲台这个平台来实现诗的最大价值。这二者，正好是吴芳吉作为诗人和教育家的天然合一的客观必然要求。

吴芳吉到永宁去，不但带去了具体的诗颂英雄的任务，还带去了从事教育的启蒙后生的使命，更带去了“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人生抱负。

吴芳吉去永宁任教，是在嘉州从教的尝试经历后，校长萧湘的去职殃及学生吴芳吉的教职，有了一次人际关系的体验，这个人际关系在当时也是吴芳吉不去聚奎而去永宁综合考虑的因素之一。然在职责业务方面，则并非只是一种冲动，而是胸有成竹的。去永宁前，吴芳吉给恩师写过一封信，讲到他对全国形势的一个根本看法，和社会应为受教育者提供用武之地，以解决学以致用，解决从业的问题。他首先说：

文学革命之言虽多过当，亦不可概抹煞之。[26]

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吴芳吉从教的指导思想，亦是并非不支持新文化运动，而是既不赞成“过当”，又不“概抹煞”。这同他对整个国家思想活跃，只是不倾向“之极”的总体态度一致的，对思想文化方面如此，对教育事业亦如此。接着吴芳吉讲到解决“毕业无用”的问题。他写道：“学生收纳，亦为今日司教育者第一问题。今中学以上学生毕业而无用者极夥，苟长此幽废，其害使社会多遊民，使学校失信用，使迫于久饥寒而濶入军宦二途，始欲利用宵小保其身家，继则转为宵小利用而身家不保，作奸犯科因以日出，人心风俗因以日坏，此大可忧也。” [27]吴芳吉在 90 年前考虑到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教育行政机构还在解决的重大事宜，不然何以要把学生的就业与学校的业绩挂勾呢？从此，也可以看出吴芳吉教育思想的先进性。其实，这个先进性，说来也简单。只要从实际出发，关心“民疾苦”，不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个读书——就业的问题就是谁都会发现的。关键在于要有一种机制，要有总体安排。吴芳吉当时所处的地位，是只能想到，而无实力和权力解决的，不过，我们会看到，吴芳吉还是从他个人能力范围在尽力而为。

如何培养学生，吴芳吉不但与恩师萧湘讨论，还和永宁的挚友赵鹤琴、泸州师范的曹玉珊讨论，他认为，“除实践简单生活，尤须提倡尚武精神。”吴芳吉具体解释他所说的尚武精神：“所谓尚武精神者，不必善射荡舟，抚剑疾视，要得有担当，有毅力，耐劳苦，经锻炼，习俭习勤，养成雄厚直朴之气，则无论处家治国，皆为良材，社会之中坚以立。”吴芳吉进一步从联系国家安危论道：“今人痛国之危，辄

诋政府之非。不知民为邦本，既无强盛国民，焉有强盛政府？” [28] 这里，我们既看到吴芳吉教育救国的观念，“既无强盛国民，焉有强盛政府”，又看到他教育思想的一贯性。我们看到他创建的重庆大学的校训“耐劳苦，尚简朴，勤学业，爱国家”，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雏型。吴芳吉要造就“强盛国民”来振就政府，使之强盛起来。

吴芳吉较为看重永宁中学的，是永宁所处环境特点对民众形成的心理素质和民风民俗。“永宁僻在边隅，凡浮嚣恶劣之俗，尚未深入青年之心。引导归正，较他为易。”而且，“昔年杨沧白在永施教，提倡改革思想，造就学子，至今多有可观，惜其宗旨偏重维新。”民众希望吴芳吉去“注重国学而光大之”。吴芳吉认为：“永宁虽山陬索处，然与尘世远隔，使精神少些激刺，多些怡养，潜心滌念，从事学问，未始非君幸福。” [29]

吴芳吉抱定“在蜀教育界中暂为韬晦”的决心到永宁中学上任了。去后即公布了他的十六字“教义”：“无巨无细，必负责任，无暗无明，不容苟且。”这十六字，既是吴芳吉为师的自律，又是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他自己的雄心是：“一乃心力从事社会教育，教得一人，是犹吾之精灵脱出一人，教得千万人，是犹吾之精灵脱化千万人也，岂不快哉！” [30]他认为“纵不能为圣贤，亦当为豪杰，……以削社会之不平也。”

吴芳吉到永宁中学不久，就感到“学风窳败，士气不振，孤陋寡闻，出人意外，竟与吉初衷违矣！”这里的“意外”，可能是指原以为“本校为杨公沧伯奋遊之地，后生小子受其陶镕导化者深，必有发扬滔厉之士崛起其间者。” [31]这里的“初衷”，可能是指他的“韬晦”。意

外也好、违衷也好，首先得面对现实，针对实际情况做好工作。当他与同事谈到他的感觉时，一位名元著的老师给他介绍了一个“志大且慧”的学生姚骠姚仲良。其实是一个优点、缺点都很突出，很有个性的学生。元著老师说“姚生尝作日记，用自观省，诸生百数，无或为日记者，凤毛麟角，尤罕见也。”吴芳吉自己是坚持写日记的，他当然知道写日记对于修身、治学的好处。所以他对姚生的这一自觉行为，深有好感。于是他向姚生要来他的日记研阅，的确发现姚生的长处“立身志道，溢于言表，慎交戒酒，赋以忠贞。”当夜即“振衣肃起，为之敛容，抚笔致辞，为之鼓舞。”吴芳吉真是一位负责任的好老师，“无巨无细，必负责任，无暗无明，不容苟且”，他这一抚笔所致之辞，尽然成为一封洋洋两千七百字、情理并茂的德化教育的个案短论。

《与姚生书》开篇直指其事，说：“闻弟（我们注意到，吴芳吉与学生以兄弟相称，或许更能收到以情助理的功效）将贸然赴成都，强索乃母多金，以作旅费，不日首途矣。此或传闻失实，是真是假，吾不暇计。”既然是传闻，吴芳吉当然不会作肯定的判断，而处于被动，接着深情地说：“兹请以吾所友爱于弟，责望于弟者，为细述之，苟不嗤为常谈，曲予从听，且从吾言而促弟之反省，则吾兹所言为不虚言，弟之友我为不虚友，弟之与我皆幸甚也。”这就是吴芳吉作为一位好教师的实践，把自己摆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以商量的口吻，真诚地态度，进入正题，首先晓之以大情大理：

吉尝以我国一线生机，端在今之少年，国之信不亡者，赖有少年以继其后。夫先我而生者，则既耄矣；后我生者，则未知之。惟吾辈

少年，丁此存亡绝续、千钧一发之际，举凡匡救之功、平治之道、非少年谁属？诚以少年之世，来日长，去日短，体魄充，精神健，遗艰投大，百无一畏。彼老年之所以称憾而未能者，在吾少年靡不能之。故窃谓人当年少，为世间莫大福利。是以昌为“少年中国”之论，以为少年者，国之元气，少年不死，吾国可以不亡。频年以来，放逐江海之表，驰驱戎马之间，九死一生，莫敢遑息者，正欲诏诸少年，各自努力，期于远大，以赴国家之难也。

吴芳吉用少年在国家危难之时的责任，在救亡图存中的作用谆谆告之，以唤醒姚生的觉悟，打动姚生童心，激发姚生的志气，使姚生思改过、思平治、思存亡，努力于远大，立力于赴国难。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这种英雄主义的教育、这种以德化民的教育，是与吴芳吉用诗歌所表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吴芳吉人生观的生动体现。

吴芳吉还针对姚生“家固殷实，不愁废学”，“无家庭担负之累”，鼓励姚生“抖擞精神，专心向学为国尽力。”

吴芳吉进一步联系教师的天职，联系他的抱负，深入地多视角地开导姚生。

诚以今之少年，幸不终陨落者，不过二分之一，而真有远志者，不过其半。夫以中国之大，世变之殷，乃继其后者，寥寥若是。是少年之难得，即中国之难振。吾爱中国，固爱少年。中国无少年则已，苟有少年，吾义当匡之、助之、培之、覆之、亭而毒之，诲而不倦，以之救一少年，则国家偕进一度。

吴芳吉进一步指向姚生说。

吉之诱启吾弟，岂为弟一人哉：弟为国家少年，辅弟，正辅国也。惟然，望弟者奢，故责弟者厚。今之世，非犹古之世也。古之世者，人心未倾，天道犹著。彼时之民，虽悠悠忽忽，历百世而无害。今也，人欲胜天，天相违，人相食，故非有真学问、真德性、真精神毅力者，不足战胜以图其存焉。存者，存之也，存其所以立也。立者，立之也，立所与立也。一人之存不足存，须为众人之存；一人之立不足立，须为众人之立。不为众人之存，是曰苟存；不为众人之立，是曰苟立。吾少年耻之也。

吴芳吉在作了一番为国当仁不让，努力于成仁取义的最高境界的教育后。又针对姚生天资聪慧，进行辩证思维的暗示，指出：“吾弟聪明人也，知存与立矣。然惟弟聪明，知之而不行之，则聪明误弟矣。”并具体提示：“每见弟以聪明而读书，不求甚解，此大误也。……窥足下性情，往往驰心于外，浮而不实，见一异书，则欲披读，卒之，竟无一书读了。……望弟善用聪明，成其宏通真实之学，以图拯救国家也，奈何不自警策哉！”吴芳吉还是把他对姚生的具体教育落脚在“拯救国家”。这是否是小题大作呢？这是方向问题，这是人的根本问题。这是否是空洞说教呢？这不是空洞说教，这是实实在在的身份认定。不过这类问题，任何时代都有，只不过表现不同罢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教师，需要好教师，需要教育，需要好教育。我们现在在思想文化战线存在的反对崇高，反对所谓“愚忠”，不讲理想，只企实惠；不讲群众，只图个人。甚至明星官员的出国定居热等等，就是失之大而求之小，忘了公而只顾私。

接着，吴芳吉对姚生“惟血气为盛”开导，血气要分是非，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味盛气，使气。吴芳吉说“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所不当辞；非义所在，虽一毛之拔，所不当为。”同时指出“弟好为人争辩，必求一胜，是一无谓之至，徒自苦身。”又对姚生因元著老师曾是自己的先后同学而不尊重一事，告诉姚生：“礼教，吾国之大经也，君子重礼教而辨名位，所以立纲纪也。……视礼教为不足重，则其几虽小，而其弊大矣。”

最后，吴芳吉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我爱足下深，不能不为足下虑。我爱国尤深，尤不能不为少年虑。”吴芳吉苦口婆心地谆谆教育引导，似言犹未尽，他总括说道。

要之，弟受病处，半为聪明太过，恍若了了，不思求是。故学问只尚皮毛，道德只在应对。是一般浅俗时髦之所趋崇，岂尔我神圣少年之所法效！悔过自新之道，曩既为弟言之。今所望弟者，仍以此为进德之门，更以平心静气为行德之阶，知行合一为升德之堂，民胞物与为入德之室。士必先德而后学，有德而无学，然不失其有德；有学而无德，则无以养其所学，终于未学。《礼》曰“甘受和，白受采。”惟甘与白，而后能采与和。甘与白，犹德也；采与和犹学也。善和者无甘则不调，善采者无白则不显。人必修德，犹是焉耳。

吴芳吉给姚生的这封信，是针对姚生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写的，然而信中所阐明的道理许多都具有普遍的意义。比如“国之信不亡者，赖有少年以继其后。”吴芳吉就是为国家之后继有人，才立志从教的。教育的意义也在于此。比如，“吾爱中国，固爱少年。”这是说给姚生

听的，更是吴芳吉志向的表白。哲人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吴芳吉爱姚生、救姚生，并非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民族的托付。比如，“善用聪明，成其宏通真实之学，以图拯救国家。”聪、愚，是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的综合反应。志向远大者，“愚笨”也会磨练而聪，世有笨鸟先飞而捷足先登者是也。目光短浅者，常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象。正如吴芳吉在给姚生的第二封信[33]所指出：“与其有聪明者误于聪明，不若无聪明者之能实求学德。”教师的天职就是要做学生的转化工作的。虽非人人能点石成金，但确实需有人能化腐朽为神奇。好教师的功德就在以德教人，化民成俗。至于先德后学的关系，这是从吴芳吉当时论证后延续至今的教育课题。当然这个先后，并非机械的，时序的，而是有机的、并行的，是寓德于学。这在根本上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不是“德”“学”的具体安排问题。吴芳吉后来在给聚奎中学校长戴叔墉的信[34]中说过：“夫所谓学风者，必先有学而后有风。风必生自乎学。”这里的“学”，不是知识与道德对应的“学”，即不是智育与德育对应的“学”。而是指学校教育的学，是学校的学，是讲学校的风气，是讲一所学校，只有在办学的过程中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是办学者的办学思想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特色。比如蔡元培办北京大学，以学术自由为宗旨，兼容并包，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先河，自今仍有深远的影响。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很能说明他的办学思想。当时他聘中国有名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任教。许多人反对。因辜鸿铭仍然留长辫、穿长衫，保持着清朝的服式，与民国的着装相左。蔡元培回应说辜鸿铭外语好，

是聘他教外语的，搪塞过关，实际是贯彻他的学术自由的宗旨。不过，到今天，北大也还没有梳理好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是什么？这从北大的校训可以看出从蔡元培以降，这些年，变了好多次。吴芳吉创办重庆大学时提出的办学宗旨，“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已经 80 多年了，重大至今仍然坚持着，没有改变，据说也无意改变！当然也不是说它的内含没有随时代的发展而充实、发展。

吴芳吉戊午年元旦喊出“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后去了永宁中学，没多久当他在永宁过重阳节的时候，一方面总结他的作诗妙诀为“新、真、仁、神”，另一方面又充满信心地宣称：“吾信吾诗必传，为中国新文学界正宗也。”[35]谁想到他的这话还真的被言中了！

吴芳吉在永宁中学教书，没有能够韬晦数载，而带着他的教育实践所得，又去了上海。在这里，不但他工作的《新群》杂志社的同人中有梁乔山、曹志武这样的优秀文化人，而且主办者中国公学同时还是一个教学单位，他还担任学校的国文教员。他去上课之初听课者只有十儿人，没几天就增至八十多人。这对吴芳吉是很大一个鼓舞。

没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永宁中学的三名学生，听说吴芳吉老师在上海工作，就背着家里贸然结伴到上海，找他们的好老师帮忙，求学谋职。三个学生好不容易到了上海，路费用尽，吃住无钱，总算找到了吴老师。吴芳吉见学生如此窘困，只好将他们留下。

旧中国的上海，是繁华之地，但只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几个才读几天书的贫困青年，要求工作谈何容易。带着对学生的同情

和怜爱，吴芳吉竭尽全力，四处奔波，先在中国公学恳求校长，让学生免费读书。这个如意算盘，被校长以学校经费拮据，对贫困学生免费“助学”早已停办，无能为力，给回绝了。吴芳吉又到一些工厂求助，年纪小，厂里不要。到印刷所，做印刷排字工作，学生不会又做不了。凡能去的地方吴芳吉都去了，都是无功而返，一无所获。吴芳吉又说服学生报考免费学校，如能考上，可以勤工俭学。一边读书一边工作，食宿都可得到解决。由于几个学生文化程度太低，又缺乏自信心和勇气，最终落空。吴芳吉仍未放弃，一边工作，一边教学，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为学生寻找工作。到了四川同乡会，又到了回教青年会访问纱厂用工情况，也都无望。一晃半年过去了，正如他在 1920 年 3 月 8 日给父母的信上说：“永宁之潘生、吕生、王生三人，在此半年，未得家中一钱。” [36]拖累得吴芳吉的处境日益艰难，负债不少，每月工薪难以维持。后经老师们劝导，三个学生终于决定返回家乡，以积学识，待有机会再来上海。学生回家的路费也是吴芳吉在学校借的。1920 年 3 月 16 日，学生踏上了返乡之路，临行，吴芳吉和几位老师，语重心长地教导学生，又是安慰，又是鼓励，又是祝福，又是叮嘱，充满惜别之情。船要启动了，吴芳吉总是放心不下，又回到船上，帮学生找好铺位，教给他们一些远行的生活常识。开船了，吴芳吉站在江边，目送渐渐远去的学生，怅然若失，仍有一份内疚之情。吴芳吉对几个只教了一年的穷学生，却用半年多的时间为他们奔波谋生，吴芳吉能说不是一个好教师吗？能说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吗！

没想到吴芳吉永宁苦口婆心地开导的学生姚生，也到上海来了，

他是到上海中国公学来读书的，师生相见倍感亲切。姚生家庭较富裕，但是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地，所需的费用姚生也难支持，不时找吴芳吉老师帮助。或给姚生担保伙食费，或为姚生代买书报，或给一些零用钱。而吴芳吉的工薪并不多，有时还遭办事人员扣发，也是时常负债。用吴芳吉的话来讲，叫“内忧外患，两面交攻”生活艰难。吴芳吉教育关心学生，不仅管三尺讲台，还管课后，不仅管校内，还管校外，不仅管在校，还管离校后。真是爱之深切，无愧“天地君亲师”！

注释：

[1]第 52 页。

[2]第 1224 页。

[3]《吴芳吉研究》第 30 页。

[4]《吴芳吉研究》第 30 页。

[5]见《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

[6]第 3—4 页。

[7]第 67 页。

[8]第 63 页。

[9]第 1283 页。

[10]第 1284 页。

[11]《新羣》杂志一卷三号（一九二〇年一月出版）载此诗，题作《护国岩述》，题下序去：“吾自民国五年归蜀，适护国军事方平。国内外友人争来书相嘱，以斯役为国民史上最有价值之战争，因命我亲赴蜀南一行，以考察当日现象，而为诗纪之。以其萬山阻隔，伏莽叢萃，而未能也。七年，蜀南永宁中学忽邀我襄教于是，因慨然冒险往。

自合江而赤水、而永宁、而纳溪、而瀘州，周围千里，皆古战场也。闻永宁中学是时为松坡之军医院，而吾下榻之一室，曾有护国军士五六十人死于其间。校人畏鬼，深为我惧。然吾处之日狎，且因此而得诗甚多。兹篇《护国岩述》，亦《永宁集》中之一也。原序如下：‘护国岩在永宁之大洲驿，故松坡将军游钓处也。戊午腊月，吾自永宁解馆归，舟行三日，过岩下，命舫舟往弔之。一时热淚交迸，不能仰视。明日，至瀘州，寓吸老者，頌白矣，自言为大洲驿人，松坡驻驿中时，当为采瓜果食之。因迎老人坐榻上，煮酒挑燈，请话护国岩故事。且食且酌，且倾听，且疾书，就老人所述者述之，成《护国岩述》。述成，更大酌一杯奉之。老人笑曰：是述乎？是哭乎？吾曰唯唯。是亦述也，是亦哭也。民国八年一月七号白屋吴碧柳。’”

[12]周一生《中国革命史述评诗》第6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13]第25页。

[14]第 页。

[15]第618页。

[16]第619页。

[17] 宝岛游感赋：（一）公度斥倭割大湾^①，仙根悲愤泪潜潜^②。今朝有幸游疆域，企盼同胞大聚欢？

注：①“公度”即黄遵宪。1895年，黄作《台湾行》诗，有“城头隆隆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句。“大湾”即台湾，参见《辞海》“大员”词条。

②“仙根”即丘逢甲。1896年，丘作《春愁》诗，曰：“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潜；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台湾本地人和福建、广东籍的台湾人，当时共约四百万。）

（二）炎黄一脉五千年，华夏同宗跨九天。阳错阴差家两地，龙盘虎踞各扬鞭。星

移斗转风云变，月缺花残终有圆。分已有时当好合，雄图再振更无前。

[18]第 628 页。

[19]第 624—625 页。

[20]第 626—627 页。

[21]第 631 页。

[22]第 628 页。

[23]第 634 页。

[24]第 629 页。

[25]第 1282 页。

[26]第 1220 页。

[27]第 1220 页。

[28]第 1235 页。

[29]第 1243—1244 页。

[30]第 1268—1269 页。

[31]第 638 页。

[32]第 637—641 页。

[33]第 642—644 页。

[34]第 1042 页。

[35]第 1263 页。

[36]第 651 页。

第三章 婉容词促新文化

明德执教留芳名

吴芳吉诗：

婉容词[1]

婉容，某生之妻也。生以元年赴欧洲，五年渡美，与美国一女子善，女因嫁之，而生出婉容。婉容遂投江死。

一

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
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

二

自从他去国，几经了乱兵劫。不敢冶容华，恐怕伤妇德；不敢出门间，恐怕污清白；不敢劳怨说酸辛，恐怕亏残大体成琐屑。牵住小姑手，围住阿婆膝。一心里，生既同裳死共穴。那知江浦送行地，竟成望夫石。江船一夜语，竟成断肠诀！离婚复离婚，一回书到一煎迫。

三

我语他，无限意。他答我，无限字。在欧洲进了两个大学，在美洲得了一重博士。他说：“离婚本自由，此是欧美良法制。”

四

他说：“我非负你你无愁，最好人生贵自由。世间女子任我爱，世

间男子随你求。”

五

他说：“你是中国人，你生中国土。中国土人但可怜，感觉那知乐与苦？”

六

他说：“你待我归路渺，恐怕我归来，你的容颜槁。百岁几人偕到老？不如离别早。你不听我言，麻烦你自讨！”

七

他又说：“我们从前是梦境。我何尝识你的面，你何尝知我的心？但凭一个老媒人，作合共衾枕。这都是野蛮滥具文，你我人格为扫尽。不如此，黑暗永沉沉，光明何日醒？”

八

他又说：“给你美金一千元，赔你的典当路费旧钗钿。你拿去买套时新好嫁奁，不枉你空房顽固守六年。”

九

我心如冰眼如雾。又望望半载，音书绝归路。昨来个他同窗好友言不误，说他到绮色佳城欢度蜜月去。

十

我无颜，见他友。祇低头，不开口。淚向眼包流，流了许久。应半声：“先生劳驾，真是他否？”

十一

小姑们，生性戇。闻声来，笑相向。说：“我哥哥不要你，不怕你

如花娇模样。”顾灿灿灯儿也非昔日清，那皎皎镜儿不比从前亮。只有
牀头蟋蟀听更真，窗外秋月亲堪望。

十二

错中错，天耶命耶？女儿生是祸。欲留我不羞，只怕婆婆见我情
难过。欲归我不辞，只怕妈妈见我心伤堕。想姊姊妹妹当年伴许多，
奈何孤孤单单竟剩我一个？

十三

一个免挂牵，这薄情世界何须再留恋？只妈妈老了，正望他女儿
陪笑言。不然，不然，死虽是一身冤，生也是一门怨。

十四

喔喔鸡叫声，哞哞狗声咬。铛铛壁钟三点渐催晓。如何周身冰冷
尚在著罗绡？这簪环齐抛，这书札焚掉。这妈妈给我荷包，系在身腰。
再对镜一瞧瞧：可怜的婉容啊，你消瘦多了！记得七年前此夜，洞房
一对璧人娇。手牵手，嘻嘻笑。转瞬今朝，与你空知道！

十五

茫茫何处？这边缕缕鼾声，那边紧紧关户。暗摩挲，偷出后园来
四顾。闪闪晨星，灏灏零露。一瓣残月，冷挂篱边墓。那黑影团团，
可怕是强梁追赴？竟来了啊，亲爱的犬儿玉兔！你偏知恩义不忘故，
你偏知恩义不忘故。

十六

一步一步，芦苇森森遮满入城路。何来阵阵炎天风，蒸得人浑身
如醉，搅乱心情愴。讶！那不是阿父？那不是我的阿父？看他鬓发蓬

蓬，杖履冉冉，正遥遥等住。前去前去，去去牵衣诉。却是株江边白杨树。

十七

白杨何桺桺，惊起栖鸦。正是当年离别地，一帆送去，谁知泪满天涯！玉兔啊，我喉中梗满是话，欲语只罢。你好自还家，好自看家。一刹那，砰磅，浪喷花；鞞鞞，岸声答。息息索索，泡影浮沙。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只玉兔双脚泥上抓，一声声，哀叫他。

对于吴芳吉的《婉容词》，自她 1919 年来到这个世界至今，一直有人关心着，而且是沿着越来越趋于理性这样的路径发展着。对于“婉容词”的关心，褒也好，贬也罢，一开始就不是以孤立的个体形式现身的，而是以新文化运动中的典型指标性文化现象出现的。一时间，她似乎成了区分新旧文学观的试金石，歌颂她的被划归保守派，即旧派，反动（似非政治概念）派，申斥它的被视为激进派、亦即新派，西化派，不过从文化视角看，“新派”的含意还要广大些，拥有更多的民意。而在一般的民众中，包括普通的知识分子，则是一遍赞扬声，没有什么理性的表达，只有一份纯情的激动。在我国有史以来的这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知识精英们对《婉容词》性质的认定，同样表现出两种“之极”的思潮。平心而论，今天作为事后诸葛亮的我看来，当时持否定态度的亦未必就是死心踏地的守旧派，持肯定态度的也未必就是勇猛冲锋的时新派。然而，无论如何，《婉容词》都是新文化运动中一支奇葩，是开一代新风的标志性佳品。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总体上，谁也无法否定它的伟大、创新，它

的不可及。因为《婉容词》降生的那个时空交叉的态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论哪一首诗，不论它是所谓的新诗还是所谓的旧诗，它已错过了《婉容词》享受到的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那时九域天空的风起云涌，那时上海交通文化之便捷发达，那时《新群》团队的同人情重，万事俱备，婉容带着中国妇女太多的忧伤，步履蹒跚地走在昏暗的路上来到江边，无可奈何地然而却是勇敢地跳进江里。激起不尽的波涛冲向大洋彼岸，冲向四面八方。《婉容词》的作者吴芳吉成了舆论的中心人物。他自己对当时的处境在《无题》诗里借韵陆游、灵均、杜甫而言自己，还是比较贴切的：“不幸生时遭国变，偏从拙处见诗工。” [3]

有人说吴芳吉的诗，“只算非古典主义的旧诗，不是白话文学的新诗。”有人说吴芳吉的诗，“有违背新文化的条例，赶急改良，莫作新文化的妨害”。吴芳吉的挚友吴宓也从海外送来教训。说他的诗“夹杂俚语，毫无格律，而思想浪漫，更甚新派”。[4]还有人登门商榷。这些对今天的过时之论，吴芳吉当即作过有力的回应，还伸展开去的长篇大论就有《谈诗人》一篇，《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两篇，《吾人眼中的新旧文学观》四篇，有如机关枪似的在短短四五年从上海辩论到长沙，详尽地回答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他所关注的诸多问题，坦诚地一一指名论事地论说是非。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全面地回放一遍当时的情况，这不但不是本书的任务，更不是笔者力能所及，只就直接涉及《婉容词》，啰嗦几句。

宫廷璋大约写于 1933 年的《吴芳吉新体诗评》里认为：“如《婉

容词》、《两文女》、《明月楼》、《笼山曲》、《浴普陀海岸千步沙作》，则与当时流行之俚语诗同类。此为诗学革命时期，摆脱一切旧诗束缚，略带西洋诗体，而大半近于以文为诗。” [5]

客居台湾的乡人周开庆，与吴芳吉是聚奎中学的先后同学，吴芳吉是第一班学生，周开庆是第九班学生。1920年后他们始有联系。周开庆后来在台湾收集吴芳吉的诗文出版，曾请于右任先生题诗，这就是后来流传的于右任先生“吊吴白屋先生二首”，说“生大文豪天亦难，遇大文豪世不易”，这是1962年的事。这时，周开庆还因此有一首七绝跋诗：“江津幸产大文豪，几水鼎山天亦骄。论定凭公濡大笔，诗雄並代两相高。” [6]是说吴芳吉与于右任的学养齐名于世。我认为于右任称吴芳吉为大文豪，周开庆说于右任和吴芳吉都是大文豪，这都不只是诗的语言的艺术表达，而是两位先贤拥有的文化素质的准确称位。

台湾的朱静如先生在他的《白屋诗稿评述》（台北文津出版社1981年出版）里，对《婉容词》，联系作者、联系时代，有这样的评论。

在永宁中学仅仅一年的时间，卻完成了两首不朽的名著。那一年先生刚从困扼、饥饿、流浪、负债、失业的遭遇中，初次安顿下来。在诗的创作上，却有了惊人的表现，这十足印证了“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名言。这两首诗，一为长诗护国岩述，一为婉容词。前者，是记述云南起义时蔡松坡率领护国军讨袁的情形，由云南转战四川，在永宁县大洲驿与北军苦战的经过。写得激昂慷慨，义情並茂。並且反应了当时人们在政治方面的热切渴望。另一首为传诵一时的大作品：《婉容词》，这首诗是记载一位留美学生在美洲移情别恋，抛弃

了发妻婉容。婉容在乡下听说后殉情自杀的真实故事。这则故事碧柳用诗的体裁写得悱恻缠绵，迴肠荡气。那时的男女青年，读婉容词，无不声泪俱下。因为这首诗，真正反映了西洋风尚传到中国以来，在古老农村社会所受到的影响而引起反应。婉容的身世与志节，真令人同情感叹。先生以诗史的手法，融会了他那种悲天悯人诗者的慨叹，谱出了这首长诗，为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影子，也为历史作了明确的证明。[7]

应该说这样的就诗论诗的评价还是很公允的。

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结束一直走的左的路线，又经过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理性梳理，在历史上被冷落的《婉容词》连同他的作者，又重新走入人们的视域。

四川省的《星星》诗刊，永川地区的《海棠》，江津县（现在的重庆市江津区）的文艺双月刊《几江》等等刊物重新刊登了《婉容词》。当时的重庆师专（现在的重庆文理学院）出版了《白屋诗选》，成立了“吴芳吉研究所”，接下来成都成立了“吴芳吉研究会”。学者、专家们不但就诗论诗，还展开了就诗论理的热议讨论。有的论者还追索到《婉容词》的原型。这里，我们先录下与吴芳吉齐名的聚奎三杰之一的画家张采芹的一段叙述。张采芹和吴芳吉不但是聚奎的先后同学，吴芳吉在成都大学教书並整理出版《白屋吴生诗稿》时，张采芹也在成都，在成都师范大学教书，吴芳吉还帮助他整理了《采芹画集》。张采芹对婉容原型，是这样说的。

芳吉先生在与我闲谈时，曾谈及写作《婉容词》的经过，当时五

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礼教，反封建，反旧式父母包办婚姻。因之，有很多由中国派往欧美学习的留学生，受新思潮的影响，对过去父母为之缔结的婚姻表示反对，常多遗弃，芳吉先生……深为被遗弃的女子抱不平。[8]

应该说这是泛原型说，说的是那个时代使然之社会现象。还有具体的原形说，一是说就是永宁郊外“婉容墓”里的死者，一是说某官员抗婚的女儿，一是说吴芳吉的留美同学某人。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怎么可能就是某某呢？

这里，我们再选两家的说法看看。

施幼贻在他的《吴芳吉评传》里是这样说的：“《婉容词》是以当时文化界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为素材，集中了那个时期社会上一些类似事件加以概括、提炼，使之成为艺术典型。四川叙永县城郊有婉容墓，吴芳吉 1918 年在叙永永宁中学教书时，曾去凭吊过。这里埋葬的婉容，不一定是《婉容词》中的‘婉容’，但却有这样一个被遗弃而致死的女性，作者只是借用了‘婉容’这个名字。”施幼贻又说：“吴芳吉在 1922 年 4 月致友人信中，还谈到诗中男主人公‘某生’的原型说：‘某君遍函诸友，竟自辩其离婚之是，正见其良心有不自安之故，安则不待辩矣。’”施文还借吴芳吉的话继续写道：“原来作品初发表时，序文还有‘某生者，姑隐其名。’一句，后来收入《诗稿》，把这一句删去了。这也许是觉得有失‘温柔敦厚’之旨吧！但删去这一句，却更显示出作品的典型意义。”[9]

黎汉基在他的《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 吴宓与吴芳吉》里，还谈到

文化启迪的问题。他说：“那时胡适的《尝试集》刚出版面世，内有中译林德塞女士（Lady Lindsay）《老洛伯》（Auld Robin Gray）一诗，但吴芳吉感觉胡译有所不足，计划仿效《老洛伯》原诗的诗体，另写《婉容词》以超越胡译。” [10]吴芳吉与胡适似乎有不解之缘，这里要和他比试比试，庚即又写文章专门批判他的“八不主义”。但是，吴芳吉是对事不对人的，你看，对于胡适，他是想比就比，该批就批，当学即学。我们在吴芳吉 1919 年 10 月 26 日（农历 9 月初 3）的日记里看到：“早饭后，与志武，淑楷读哲学史五篇，读胡适《哲学大纲》十篇。” 28 日的日记又有：“读胡适哲学史十篇”的记载。[11]当然，吴芳吉也在读其他哲学。比如这年农历冬月初七、初八、初九一连三天记有“与志武读笛卡儿哲学六篇”、“与志武读哲学四篇”、“与志武读西洋哲学”。求知欲旺盛的人，智慧之树才会常青。不过吴芳吉和胡适两人的结局都不佳，虽然原因不同。吴芳吉是被冷落了，胡适则是在政治上走向了另一面，文化上钻故纸堆，吴芳吉说他措考据去了。黎书还有一段有趣的文字，说《婉容词》

这样感人的情节，是根据真人真事而写成的。吴芳吉在诗中自注云：“为某君之妻投水，作一篇哀辞。”这个“某君”，根据吴芳吉门生周光午的说法，就是位名叫魏文彬的留学生。他根据吴宓在 1920 年 7 月写给未婚妻陈心一的书函，指出魏文彬为了追求一名变姓女子，狠心抛弃发妻，致令其妻投河自尽，从而断言这就是《婉容词》的所缘本事。由于周光年没有拿出吴芳吉知悉魏文彬事迹的直接证据，难言此说必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像周光年所说的情形，像《婉容词》所描述

的故事，在当时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文化大变革的时代，几乎是天天都会发生的事情：留学生喜新厌旧，硬要离弃自己小脚的妻子，甚至还登报声明，把离婚说得振振有辞。

黎汉基为了证明吴芳吉的《婉容词》不是拍脑壳拍出来的，而确有其时代的现实根据，还专门录下一个旁证，使你不得不信《婉容词》之真。这个例子，也是黎据以批评吴芳吉的好友，被吴芳吉称为吾兄的吴宓的，他说：“最著名的一例，就是浪漫诗人徐志摩，为了追求少女林徽因，在英国强迫已经怀孕的发妻张幼仪离婚；事后还得意洋洋地写了一首题为《笑解烦恼结——送幼仪》的诗，来庆祝离婚成功。在徐志摩和婉容丈夫这一类男人的心目中，他们总认为中国旧式婚姻是不自由、不文明、扼杀人性的野蛮制度，所以离婚是最冠冕堂皇、最无可挑剔的行为，而丝毫不把发妻的痛苦放在心上。”笔者在前面说过，黎汉基的书，总体讲是扬吉的——这是吴芳吉应得的。现在，他又把吴芳吉请出来了。

但吴芳吉认为，这根本就是新时代的男人自私自利的劣行，他们只是利用文化失范的机会，薄幸无情，始乱终弃，让死守礼教的节女蒙受牺牲。旧式节女这一群弱势团体的苦楚，在铺天盖地的西潮的横冲直撞之下，鲜有呼冤叫屈的空间，难得还有吴芳吉这种关怀弱者的诗人注视她们的遭遇，为她们伸张正义，作出最深刻的控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2]

这里说的“文化失范”大概就是说，在东西文化碰撞中，破了旧秩

序而新秩序尚待建立的状况。所谓“弱势团体”，是说得很好的。不过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大概不只是旧式节女，事实上，直到今天，在地球村里，谁又能找到“强势妇女”？君不见，在一些最最文明，最最讲人性、最最讲自由的西方大国，妇女们连戴头巾、面纱的自由都没有吗？那些得了世界小姐皇冠，一些拥有亿万追星族的明星，还有捞足了家财而被称为富婆的少数妇女，难道就真的很强势？大概这种强势更多的还是中国的阿 Q 型。毕竟直到今天，地球村还是男人的天下。毛泽东关于妇女顶半边天的希望，或许真要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了。这才有石天河学者在评《婉容词》时提出的“妇女尺度”。我倾向于从天河老师的“妇女尺度”去理解黎汉基的“弱势团体”。至于说到吴芳吉关怀弱者，这的确是真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大概这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弱者而宣誓不忘本，他又抱定不辜负苍生的人生目的和追求之故。

那么，对《婉容词》该怎样评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就是就诗而论，《婉容词》算不算新诗，这是说诗的形式问题。比如据张采芹说：“当时有一四川人康白情，亦写新诗，出版过新诗叫‘草儿’。对芳吉先生所写的《婉容词》亦很称道，不过稍有微词，认为白话诗中夹有很工整的律诗句子。例如，‘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日斜’。似乎不大妥当。” [13]这样的评论是比较温和的，一曰“似乎”，二曰“不太妥当”。但总是持否定的态度。吴芳吉当时对此，还是基于他对文言白话的总认知回答的，他说：“写诗如行文，至此有如长江大河，波涛

汹涌，一泻非有很完整工稳的句子，不能顿住。” [14]多好啊！此情此景，该用文言用文言，该用白话用白话，顺其自然，符其情理，诵之上口，吟之激情。诗教之义，依其诗的形式，已经收到一半的效果。

再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寓于诗的形式而包含的诗的内容问题，更准确地说，就是诗的主题，意旨，该怎么评价。

著名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因一篇《电影的锣鼓》而受害二十多年的钟惦棐，他是吴芳吉的同乡，也是江津人，而且是江津中学的学生，他在江津中学读书时，正好吴芳吉任校长。他在《从天心函到延安》[15]的回忆录里，对他儿时在家乡读书时的社会情况，有深刻的理性分析，他说：“江津有着‘五四’时期的新文化的影响。封建文化大势已去，这是已经肯定了。但它的社会基础并未动摇，它的政治代表还用最落后而且残暴的形式在统治着人们所生活的天地。特别是它可以打着新文化的幌子贩卖旧的货色。”应该说钟老前辈说的当时的江津社会情况，也是全国社会的缩影。他还说：

吴芳吉先生在江津中学校长任期内所举行的江津秋季运动会，作为新文化体育运动，在江津是开历史的新纪元的，但他的代表作《婉容词》却是和“五四”精神相对立的。《婉容词》反对欧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离婚本自由，本是欧美良法制”。无产阶级则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思想桎梏中所表现出的不妥协精神，不但认为须加肯定，而且要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的文化加以继承。这在《共产党宣言》里是写得很明白的。从吴先生在江津中学校长任期内所得到的信任和支持，以及他后来的荣衰，都充分说明《婉容

词》的主题思想和作者的社会实践是一致的。

按照我的理解，钟老前辈对吴芳吉《婉容词》的评价，所依据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历史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发展的学说。这个学说认定，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总称，即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历史的统一是社会形态。各个社会形态都有其自身的特殊的规律，因此互相区别，同时他们又有共同的规律。所以互相联结。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最基本的规律。这一规律表明每一个社会形态由于其内部矛盾的发展和解决，必然要为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包括它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体现着不同的社会性质。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进步最合理的社会。这就是说，每一种社会形态为什么能依次更替，就是因为能代替前一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制度比被替代的前一种社会形态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先进，更能促进历史前进，更有利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笔者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的，为此，还专门评述过北京大学赵家祥教授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16]，但从未思考过要用这个理论来评价艺术作品，虽然也尝试过评诗集之类。钟老前辈对吴芳吉及《婉容词》的上述评论，在家乡曾经引起过一阵议论。1982年，钟老在给津一中肖嘉辉老师的信中，再次谈到吴

芳吉和《婉容词》。他首先谦逊地说：“我对芳吉先生知之甚少，对《婉容词》，已表明过我的态度。吴先生固以此作闻于世，但对吴芳吉先生的全面评价，当不以此定论。”他说：“对吴先生的评价，肯定其应肯定者，但亦不讳言玉中之瑕，才会得出公允的结论。”他再一次谈到《婉容词》。

正如我对《婉容词》的理解：把它摆在时代思潮的纵剖面上，它的走向是逆行的。而作为词的解放，作为人物刻划与文学撰写中的情景交融，则显示了先生的功力。茶壶里装汤圆，还不是文学。文学是要把汤圆得心应手地在茶壶里倒出来，而不失汤圆的本来面目。随意作比，未知当否？

吴先生从江津这块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经过丰富，又作用于江津文化。因此我建议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考察吴先生。未知你们对此亦有议题否？

这里，钟老前辈讲的“纵剖面”，按我的理解就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讲的，这里的特指就是打倒封建社会接着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资本主义的东西，维护封建社会的东西，就是“逆行”，是不可取的。在这次给肖嘉辉的信上，对《婉容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作了充分肯定的。

在这封信上，钟老前辈还谈到有关的两件事，虽非涉及《婉容词》，却也涉及吴芳吉，把它录下：

一九三一年或三二年的运动会，便是一次很有影响的新文化传播。回想一下，我的一点可怜的体育知识还是从这里受启蒙。如果我

没有记错，运动会歌便是由吴先生写的。歌词至今尚能记其大概——

秋高气爽大江津，

双十节后首良辰。

同学的师友，

同志的来宾，

同会的选手，

同德的乡亲。

此地年年竞赛程。

一回相见一回新。

胜负临堪记，

乐群是新臻。

扬我……之精神，

作（？）我少年……活泼之天真。

津中当有人能记全，尤其是末尾两句。当时我还是小学生，囫囵吞枣似的跟着唱下来，至今也就更加弄不清了。

五十年过去了，钟老前辈还记得当年的运动会歌，是运动会的效果还是学生的用心，可能是二者皆有之。人们常说当年的学生几十年后都背得《婉容词》，现在我们又知道，诗人、教育家的运动会歌也有人背得，或许还有吴芳吉的更多的诗歌为学生、读者背得、记得。

还有一件事，钟老前辈说。“又，文师在世时，曾言他去江津中学任教，是在立三路线失败之后。吴先生知他是共产党员，而一再延聘，亦足见吴先生之为人。” [17]

钟老前辈当然不只谈到这些，这些只是涉及到吴芳吉的事，关于江津文化、教育的事，还谈了不少，不过，那关乎本书又远了一些，不便言及。

持钟惦棐老前辈评价《婉容词》相同的观点的，还有一位江津的名人，王利器，也是吴芳吉执掌江津一中时的学生。后来成了国家特殊保护的研究明史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他也在我们国家革文化的命的年代受到冲击，好些年没事干，有机会回家乡转转。当时我在家乡地方党委工作，曾经同他有过两次“吹牛”，从他那里学了不少治学的良方。他对吴芳吉校长有深刻的印象，非常称赞他的校长，但他认为《婉容词》是为封建社会唱挽歌的，不可取。我不赞同他的说法，可就是想不出多少道理来，他谦和地把我当小弟弟看待，不计较我的不认同。

1983年底，我调到江津师专即后来的重庆师专，今天的重庆文理学院，从石天河（即周天哲）老师那里，知道评价《婉容词》还有另外的标准，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认同。那时，学校中文系选注、姚雪垠题写书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屋诗选》已经在前一年出版了，诗选的前言，是石天河老师写的，署的名是“校注组”。这篇前言是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删节过的，石天河老师把抽下来的部分，加以扩充，形成了《〈婉容词〉新论》单独发表。我们看看，他之论《婉容词》，新在哪里。

人类社会婚姻制度改革的进步意义，绝不能仅仅只从形式上去认识，而必须理解它的实质。自由婚姻比封建婚姻进步，这是事实。可

是，为什么是进步呢？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是人的天性，自由是人的生活目的，婚姻自由是人性的合乎生活目的的解放，所以是进步的。这是一种基于“人性解放”的观点。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婚姻制度的改革，不能只是空谈抽象的“人性解放”，而必须实际地从“妇女解放”着眼。这是因为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里，两性关系和婚姻的不幸，往往总是由妇女来承当那痛苦的悲剧性后果。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这个“天然尺度”的观点，石天河老师进一步推导出“以妇女解放为婚姻道德尺度”，就是说，凡是为妇女鸣不平的就是进步的。就《婉容词》来说，它是为婉容鸣不平的，所以它是进步的。二十年后的2001年，石天河老师又写了篇《重新解读〈婉容词〉》，在基本肯定他前一篇文章“妇女解放尺度”的观点后，进一步联系从五四到解放后，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从“深层的文化历史意义”上详述了“婉容悲剧”。他的最后一条“结语”说。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时，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性的淘洗，还带有传统文化的许多封建糟粕。因而，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反封建的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仍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遗留的重大课题，还有待于中国知识分子与各阶层人民，付予最大的努力。

这里说到的“历史发展阶段”，似乎有钟惦棐老前辈说的历史纵剖

面的意思，是要把“妇女尺度”放到“历史发展阶段”内来考查。提醒人们不只是从一个尺度，而且从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来考查社会的发展、进步，为“妇女解放”创造全方位的条件的重要性，是值得深思的。这也是钟惦斐老前辈“纵剖面”提示的寓意。我认为石天河老师 20 年后重谈这个问题，与当时全国议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留下的后遗症有关，我是更推崇他的“妇女尺度”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诗人凌文远方家，改革开放后与钟老、天河老师都成了好朋友。1981 年写了一首诗，《婉容！假如你还活在今天》发表在《几江》上，不知是不是有意要用它来参加当时对《婉容词》的讨论，诗这样写的：

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掠过蓝天，
古铜色的桥下流水潺潺；
是谁把理想悄悄地撂在桥边，
闪亮在晨光曦微中的是不是她的庭院？

守候林梢的不是诗笔下的炊烟，
是吻罢泪痕的雾在此休憩；
她同知更鸟儿飞向那厢去了，
躺在江心的只剩下失去了光辉的玉兔儿犬。

谁是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

她都不曾也无缘同他会见，
一个长期锁在闺阁的姑娘，
怎么知道美洲在地球的那边？

婉容啊！假如你还活在今天，
在文明与封建的搏斗中，
只要能想想“十里洋场”外的啼饥号寒，
对你的痴情和勇敢难道不应该有一个新判断。

凌老心目中的“新判断”，似乎已经在他的诗里作了提示，你说对吧！

《婉容词》是吴芳吉在永宁中学教书时孕育，而在上海成诗并发表的。天作之合，诗人的作品，不但有了如《新群》这样的无声传媒张扬，更有公学这种生机勃勃的杏坛学子传诵，有的地方还把它规定为中小学的补充教材。吴芳吉的诗，以及他的诗论，又可以作为他的教材直接面向学生传授，实现他作为诗人和良师的有机结合。人们看到，在中国公学到他授课的班来听课的学生，很快从十四人增至八十人。学生们的情感更受《婉容词》丰富而凄楚的内容调动，跟着老师的讲解全神贯注于《婉容词》的场景，身临其境地与婉容的脉搏一起跳动。1919年9月19日，吴芳吉记下他上课，授《婉容词》的情形。

今日授吾所作《婉容词》，连讲两小时半，乃毕。听者盈座，甚至壁窗门隙，都为学生塞满，讲至诗中十五段后，诸生多半泪下。有沈生海鸣者，平素号称顽皮，至是乃潜然悲咽，不复仰视。有张生显

铭，听至婉容决死之际，忽挥拳欲击，大叫曰：“太不平了！”及十七段讲完，至“一声声……哀叫她”，则满堂之人，齐声拍案曰：“好呀！难过的很！”甚矣，文字之感人也。婉容得不死矣。[19]

教师的课，讲授到这个份上，按我们现在的学校管理，量化考绩的办法，该给多少分？90分！100分！120分！该评什么等级？A级！双A级！三A级！该树什么标？优质课！示范课！精品课！该颁什么奖？一等奖！特等奖！超能奖！吴芳吉用他自己创作的诗作为教材，给学生授课，“教育学”上要求教师的那一套规范，比如教材的主题，比如教材的时代背景，比如教材的结构，比如讲授的重点、要点、难点，比如作者的简介、人品等等等等，是不是会比照本宣科的老师来得更容易，甚至于不需要写教案，不需要备课？其实，吴芳吉并不比其他老师轻松，因为他的功夫已经花在创作上了。“教育学”上的规范，只是作教师的常规，课堂上课的常规，是教学的技术性问题。吴芳吉所达到的是教学的艺术境界，是教学的道德回归，是教学的德化，是知识教学的教育升华，是寓德育于智育之中，是不着一词而尽在其中的潜移默化。或许这正是吴芳吉既是诗人又是良师所使然。我们已经从永宁中学看到吴芳吉把对学生的爱，从四川的永宁延伸到了上海滩，这里就不用再多费笔墨去讲吴芳吉的诗品、师德和人品了！

吴芳吉作为教师，他真的不备课吗？答案是否定的。吴芳吉1919年11月5日（农历9月12日）的日记，开头就说：“未晓起，编国文讲义。”[20]我们知道吴芳吉有早起学习、工作、练身的习惯的。这里又是一次证实。11月11日，星期二，吴芳吉的日记记下：“早五钟起，

入厕后，静坐半时，乃天明，编讲义千余言……上午读哲学史五篇，按琴数调，阅报十种。”[21]这样的生活，不是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吗？在吴芳吉的日记里，还有课后自省的记载，这是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应有的德性：“下午，赴公学讲文，授魏禧《大铁椎传》，其起首数句云：‘大铁椎，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与遇宋将军家，……宋弟子高仪之，亦怀庆人，多才善射，长子灿七岁。’吾讲至此，将‘长子灿七岁’之句意为‘高仪之的儿子名灿，年方七岁’，而心中颇怀疑此句之无意识，又以此系《大铁椎传》，何必多叙他家世系？然又以其为魏叔子所作，只得讲去，坛下一生即起问曰：‘此文开端不已说了一个陈子灿么？这个子灿可不就是他罢？’吾乃恍然醒觉，且渐且悔，不知一何昏愤至此，急更正之。诸生亦无他言。”[22]这是课堂上失误的情形。吴芳吉却放不下心，为什么会是这样，该如何吸收教训？有无这个思维过程，大概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动物的所得和所失都是“碰见的”，自然使然。人，人则不同，人不是靠“运气”，不是去碰巧，而是自觉的行为，是自我意识指导之下的作为。当然还有是否是好教师的区别。什么区别呢？侥幸心理和马虎态度。吴芳吉怎样？他写道：“夜间又不寐，回思今日讲文错误之事，却有趣味。盖吾自任教师数年来，未尝有此滑稽之举，吾意此种昏愤，或由树坤（吴妻，引者）之书扰乱神思所致，不然如此浅显之句，安足以误人哉！从今以后，时刻当谨慎矣。”[23]

吴芳吉授课之受学生欢迎，是认真负责使然，吴芳吉的做诗，亦绝非一挥而就，他是特别强调“诗是做出来的”，是“做出”的，不是

拾来的，那么怎么做呢？他说：

吾自一年以来，凡所做诗，必于落笔之前，凝思数日，少者两天，多且半月。如《秧歌乐》、《婉容词》、《两父女》、《寄祝树坤生日》等诗，都是预加思索，不是偶然。盖必拟题定后，继以布局；布局定后，继以造词，造词定后，继以度情；度情都定，然后提笔直书，顷刻成就，再为修饰一番，朗吟一遍，而不觉刺眼拗喉者，于是一诗全定。故提笔做诗不难，而埋头寻诗甚难。诗之好坏高低，不定于临时之推敲，乃视乎平常之酝酿。酝酿不厚，则其趣味自薄。

吴芳吉还批评了一种现象，“今人之诗，日做若干，以涂抹新闻纸上，未见有杰出者，即以日日做作，全无酝酿故也。”吴芳吉还谈到他为诗而“寡于俸”。他说：

昔人谓诗必穷而后工。诗之所贵乎穷者，非以穷能助人诗兴也。乃以穷则事闻，事闻则酝酿有余地。有余以酝酿，虽欲不工，不可得也。吾之乐于此者，吾之俸不及他人之半。然吾之事固闻，吾得以寡于俸，而富于诗。多得一诗，亦抵千金之乐。则吾又何歉乎？[24]

从这里，或许我们能理解吴芳吉常说诗是他的命，又说他要作不要酬的义务教育。在义和利面前，吴芳吉总是选择义而非利。这符合他追求至善之人生的总目标。

吴芳吉处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三次思想活跃时期，也是他说的“思想自由之极”的时期。各种思想的正面交锋，中西文化的直接碰撞，不同见解的无情对待，他自己也是身不由己地处于这种自由的氛围中，

吟诗论理，推波助澜。一曲《婉容词》引来多少敬仰的目光，招至多少带着腥味的口沫，还有更多的惊奇和赞叹！吴芳吉就从刚刚才住了一年把的那洋货充斥、文人荟萃的十里洋场，又于1920年8月被那磨血育人的胡子靖校长硬拉到长沙明德来了。他带着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怀着楚人骚深情，继续着他在上海的吟诗赋词、论争辩伪，直到五年后离开楚地，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和诗论，师艺和师德！还留下了至今也待解的遗憾！

吴芳吉到长沙明德中学后，即组织了“红叶会”，庚即又于1921年组织“湘君社”出版《湘君》季刊。一则为他的论文、诗词创设一个平台，一个阵地，再则以《湘君》配合吴宓之《学衡》，形成文化呼应之势。不过，正如吴芳吉自己所说，两份刊物各有旨趣：“长兄（指吴宓·引者）在南京创学衡杂志，某因创湘君应之。然两者精神虽同，旨趣各异。湘君注重创作，学衡多事批评。湘君但载词章，学衡更及义理。湘君之气象活泼，学衡之态度谨严，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中人恪守典则。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25]为了凝聚同人共谋文化、育人之发展，每年以“红叶会”的形式组织活动。根据吴芳吉“自订年表”记载，第一次“红叶会”是在岳麓山举行的。之后，每年两次“红叶会”，一次在端午，一次在岳麓。均在借纪念屈原而弘扬湘楚文化，凝聚众心。“湘君社”在长沙影响深远，“红叶会”为学界推崇。其主事者即是被吴芳吉戏称之“二刘子”和他本人。所谓“二刘子”，即刘弘度与刘柏荣。后来，“湘君”没出刊了，可是“红叶会”留下来了。明德的红叶会一直延续到吴芳吉离开明德、离开人世。可

见其生命力之旺盛，可见其初始所订之主旨之文化内涵之正确。据《明德旬刊》1934年十四卷三期记载：“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天，曾举行过一次红叶会。那次的红叶会，是由同学自由参加，当时我也参加了，一共约有三四十人，是由俞镇初先生主持的。那次举行了一个寻物件的比赛，却也寻得非常热闹，所以这红叶会的名称，已有了历史了。”接着“旬刊”记下“这一次的红叶会，规模较前宏大，组织也较前严密。……”[26]一位教师能在他工作过的学校，留下永久的记念，永久的活动，这不正是这位教师师德光芒永恒吗！

吴芳吉在明德，还留下了至今尚耀眼的“楚辞亭”，现在更成了湖南长沙的文物，长沙的景观。还有，长沙韩家湖上有条长五里的隄，春夏间湘水大涨时，隄影横卧湖上，如玉带然，初不为湘人重视，自从吴芳吉写了首“五里隄”诗，就成了人们游览的圣地，直到今天。至于吴芳吉为死于洪水的工友撰写挽联，更是传为佳话，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劳心者”是治人的，而“劳力者”是治于人的，有君子、小人之别，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请看吴芳吉是怎样说的。

替我送信跑街、南北东西，号称长沙里手，哀哀烦劳好几年，竟遭惨死，令鄙人如伤骨肉；

像您热心作事，坚苦真诚，不愧明德校风，罢罢老实说一句，虽属卑位，论公道配作元勋。[27]

请注意，这里的“您”字，加了“心”，是行文中敬称之意，体现吴芳吉的真诚敬意。这里的“坚苦真诚”，是明德中学的校训，体现吴芳吉的细心，事事不忘明德学校的环境育人。

前面我们谈到吴芳吉在上海公学讲《婉容词》学生动情的情况，在湖南，吴芳吉到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即稻田女校授课，更出现学生遇见吴芳吉竟群起吟诵《婉容词》，害得吴芳吉好不尴尬。只得写诗开导之。诗曰：

稻田儿女最矜奇，买得小吴作讲师。

苦我缙袍廊下过，嘲人争唱《婉容词》。

莫唱此词动我愁，南来遁隐几春秋。

声华落尽无遮掩，人比寒梅更畏羞。 [28]

一九二二年，明德十七班的学生毕业了，吴芳吉写“新衣引”诗几首，祝之。一九二三年稻田九班将毕业，吴芳吉“于其最后一课歌以别之”。明德十七班的学生陈鼎芬毕业后在南京升学遇到困难，吴芳吉写诗开导。够了，这就是诗人吴芳吉作教师的优越，这就是诗人吴芳吉作教师的尽责，这就是诗人吴芳吉作教师的荣幸。

下面，我们看看吴芳吉的“登涝塘山诗”对我们会有什么启发。

我们知道吴芳吉一生著述颇多，仅在报刊上发表的诗词就有 270 多题 600 多首，其内容丰富而广泛。有描绘祖国壮丽山河的，有抒发亲情友情的，有歌颂革命志士的，有鞭挞军阀罪恶的，有痛斥腐败政府的，更有同情民生疾苦的，呼吁抗日救亡的等等。其中还有不少以学校教育为题材的教育诗，以诗的形式，诗的语言，表述他的教育思想、观点，教育主张以及反映他教育实践活动的。比如《稻田第九班

女儿毕业将去于其最后一课以别之》《新衣引》《西园操》《家书日歌》《聚奎学校校歌》《聚奎学校食堂歌》《别白沙油溪少年》《题江津中学首届运动会》等。

现在仅以《甲子重阳，与明德远脚队七十人登涝塘北山绝顶，爇柴告天，环唱国歌而下》[29]为例，品赏吴芳吉的教育思想，是怎样伴随着他的教育实践浸透在他的诗词的字里行间的。

1924年，吴芳吉借重阳节与学生远足，登涝塘以北诸山留下此诗，一题五首，每首诗不到百字，总计403字，记叙了一次课外旅行登山活动的情况。五首诗的体裁不同，每句字数不一，随着游览时情感的变化，登山时体力、呼吸的变化而变化，末首为一唱一合句式，多用了叠词，读起来铿锵有力，韵味浓浓，朗朗上口，兴趣盎然，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诗的内容来看，句中更体现了吴芳吉所主张的一些教育观点，完全称得上是一首地道的教育诗，充分体现了他提出的教育理论，育人方略。

首先该诗具有浓厚的趣味性、教育性。吴芳吉在诗的开头写道：“独乐不如众乐，乐莫乐兮远脚。”“去去山椒水滨，来来天涯地角。”道出了集体远足的乐趣，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青少年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活泼好动，远足登山是他们喜爱的活动，也是学校体育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将学生带出课堂，走出学校，走进大自然，去到山之顶去到水之边，学生该有多么的高兴。不怕山路崎岖，不怕小道难行，一路上“鹰扬雀跃，清歌曼舞，巧笑善谑”，身心得到彻底地放松，心情十分舒畅，真是心花怒放，乐不可支。队伍编排有序而组

织严密“曾子作参谋，何郎作司令。小吴冠先锋，阿张压行阵。”还有大队长，小队长，人人参加，各有任务，很能满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激发参予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学生自主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主独立的能力得到锻炼。吴芳吉则以学生身份，担任小队长。教育参予师生同乐，使活动更凭添了十分的兴趣，拉近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增进了师生的情谊，师生融为一体，水乳交融。

登山比赛即将开始，诗中写道，司令“扬旗布严令”，目标“遥指云中山，悬崖八百仞，谁能最先登，冠军花插鬓。”胜者野花作奖品。只听那口哨一鸣，众人欢呼，争先恐后，努力攀登，一个个生龙活虎“捷如千里驹，矫如黄鹄雏。顽如田间犊，活如波上鳧。”活显了学生们直奔目标，快捷勇猛无畏的拼搏精神。

“长风振古松”“一步一仙境”。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迎长风步步向前，学生们终于站在高山顶。放眼展望，巍峨的山川，葱郁的森林，碧绿的湖水，稻田禾苗，绿树花香，神州山河，如诗如画，顿感心旷神怡。学子们尽情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享受着大自然恩赐的大好风光。顿生万物在眼底，唯吾辈居其上的成就感。不言而喻，这种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教育，比单纯在教室里受益多多。可惜现在的学校远足登山是太少了，学生们没有这种享受大自然的福分。整天被禁锢在教室，做不完的作业，抄不完的笔记，为着考试升学，升学考试，负担极为沉重，学习单调枯燥，难怪不少学生厌烦报怨，看来这样的学习生活是该改改了。

登山结束，人人手持火把，“携手狂歌，狂歌”“举火舞傩，舞傩”，

一路欢歌，一唱一合，下山而归。吴芳吉短短几行诗句，把整个活动叙述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在摇头摆脑的吟韵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其教育思想的启迪。

其次，该诗将德智体美融于一体。吴芳吉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曾提出“德智体育期参优”的主张，在甲子重阳远足诗中，更突显了这个思想。从远足登山的本身和内容来看，是将德智体美育汇于一体，融于一炉，互相渗透，相互作用。明德校中的这次远足，并不是第一次，而是学校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每两周旅行一次，每次在三十里外。使学生身体得到锻炼，体力、耐力，对环境适应能力得到训练，增强体质，提高身体素质，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为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学生走出学校去到大自然，扩大了活动空间，可以学到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陶冶情操，振奋精神，激励上进。吴芳吉从美育的角度，曾提“主教者，务求环境之优美，助人格以陶镕”，“盖诱启于身心，即俾于学业”。同时智力、观察力、想像力得到充分的发展。站在山巅，不由神思飞扬，浮想联翩，展开理想的翅膀。“上有金碧之云天，下有锦绣之原田，中有五千余载神明华胄之少年”，祖国江山多娇，学生爱国之情不油然而生，自豪感责任感涌入心田。接着几个排比句“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对彼开辟之前贤？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措汝身手之健全？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慰此壮丽之山川？”句句震撼着学生的心灵，催促着青少年奋进、为拯救祖国，为创造美好未来的理想抱负得到坚定，道德情操、志趣、信仰得到提升，句句热切的希望，殷殷的勉励，考问，扣击着学生的心灵，

期待着学生的回答，真是起到了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作用。这正是吴芳吉教育诗的魅力所在，是任何说教方式都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

第三，该诗充分反映出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课堂内外、校内校外的融合。这首诗呈显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在活动中教师仅以一个参加者，一个小队长的身份，一切听从“参谋”、“司令”的指挥，让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来组织、领导活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发挥。这时的师生关系，无论是教育关系，道德关系和心理关系都是处于平等的同志式的朋友和伙伴的关系中，更能达到人情相通，文理相融。对来自教师的各方面的示范感染和教育，思想品德行为的影响，能自然而然地引起学生的共鸣，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学生与学生之间，也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同学之间的友谊随之得到增进。

这首诗还充分体现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相互融合。课堂是对学生教育的主要形式，然而走出课堂，走进社会，走进大自然，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它扩大了学生受教育的空间，延伸了课堂的作用，它调节着学生脑力和体力的互动，增长知识、智力能力。学生还得到了展示自己力量、施展各种特长的机会，使独立活动能力和创造力得到发展。总之，校外活动这种教育形式与课堂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课堂教育所不能代替的。

吴芳吉在这首不到 500 字的叙事诗里，把他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教育理论，育人方略蕴含、渗透于中，诗的字里行间给了我们许多启

示，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全面发展不是像有的人理解的，让学生一个劲的读书考试，考试读书，门门百分，科科优等，也不是平均发展，而是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个方面都要得到发展。正如国务院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所指出的，“坚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育人为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教会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事做人，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难看出，吴芳吉在教育实践中体现出的教育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前瞻性的，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是有借鉴意义的。

吴芳吉在明德中学，获得来自校方、师友、学生全方位尊重的同时，还在社会层面，享受到来自论敌的笔伐之乐。这使他有了充分发挥自己独特见解之机，管你保守派，管你激进派，管你西化派，吴芳吉同样据理力争，连珠炮式地发表文章、发表诗词，在《新群》上，在《新人》上，在《湘君》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笔锋犀利、笔势汹涌，洋洋洒洒的尽情发挥。这是在那“思想活跃时期”的正常现象，换一个角度说，正是这种无拘无束地交流，无所顾忌地对答，才有那思想自由之说。不过大潮之下也有泥沙，虽也属可以理解，但那不怀好意，不着边际的乱弹琴，总不太好吧！

请看在莫健立写于 1934 年的《吴白屋先生传》里，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说“湘共产党猖獗，各校化之，独明德卓然不移。共产党曰，不去吴芳吉，吾主义难行也。出野火周刊抨击不遗余力。” [30]朱静如先生在其《白屋诗稿评述》也有一段类似的文字：“民国十二、三年时，先生在明德中学任教、长沙名校，大受共党思想摇动，只有明德一校卓然不移，共党分子说：‘不去吴芳吉，主义难行。’” [31]虽然两位先生说此话的背景有些差异，但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朱先生没说野火周刊抨击的话。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确有其事，还是主观意测，亦或是某种偏见使然。我们看看当时湖南的政治形势怎样。

两位先生说的这段话的意思是明白的，一是说湖南当时的共产党猖獗。二是说长沙各校的共产党都被瓦解了唯明德“卓然”。三是说明明德卓然的原因是有吴芳吉在。四是说共产党决心要除掉吴芳吉，不然共产党的主张就难于贯彻。五莫先生还说有周刊抨击吴芳吉。

现在我们来看看湖南长沙明德中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它和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它和中国革命有什么关系，吴芳吉在明德中学有什么影响，是否是与共产党势不两立？

先看看当时的毛泽东是怎样评价明德中学的。

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毛泽东曾在以湖南学联名义发行的《湘江评论》第 4 号上高度称颂明德中学：“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他说：

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

难者颇不乏人。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竟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明德继起，校旨相同。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陈宝箴巡抚湖南，以开发湖南自任，时务等校之得以建立，陈氏实其元勋。戊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聚烧了。于是而时务学堂倒了。

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32]

明德学堂是一九零三年建立的，到毛泽东讲它“方兴”时，已是十五岁的小伙了，懂事了。当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创刊，明德中学的《明德旬刊》也接着创刊，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欢呼〈湘江评论〉创刊》的文章。

还在五四运动暴发后，毛泽东便来明德与学生会负责人毕磊、唐耀章、黄少谷、左景銮等人联系，发动湖南学生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接着5月27日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明德代表是唐耀章、黄少谷，6月3日，全市学生总罢课。9月，军阀张敬尧强行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明德、一中等20余所学校学生代表开会，重组学生联合会。1920年1月赴外省驱张（敬尧）请愿代表团出发，明德的唐耀章任副团长，6月“驱张”告捷。1920年7月吴芳吉到明德中学任教。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在明德发展

了党员。12月，明德参加了湖南学联发起的裁兵运动。到1925年“当时，明德师生中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吴芳吉于1925年4月离长沙回四川，并于下期赴西北大学任教。我们不厌其烦地顺时录下明德学校学生参加的一些较大的政治运动，正是吴芳吉在明德中学的时候，大概看得出来与莫、朱两位先生所言大相径庭。更何况，我们在引言里谈到的毛泽东有“芳吉之春”的赞语，那是1923年的事。[33]

现在我们再从明德校史录下一些资料看看明德的整体情况：

明德以聘请名师出人才，以管理出人才，更以明德精神化育出人才。

胡子靖（胡元倓）先生创立明德，以至诚精神访聘良师，开风气之先。其后，历任校长继承磨血精神办学，都是以诚聘名师为第一要义。因之，百年明德群贤毕至，精英荟萃，省内外一流名师大都曾来明德任教，教泽流长，琢育出万千英彦。

创办初期，胡元倓校长聘请自日本留学归国省内外爱国志士、宿学名儒及通晓西方科学的知识分子来校执教，皆一时之选。例如黄兴、吴禄禎、张继、陈天华、禹之谟、李步青，以及陈润霖、曹典球、易宗夔、袁吉六、王正枢、王达、刘师陶、傅熊湘、刘宗向、罗汉滨、王正廷、赵声、苏曼殊、秦毓鎏、陈嘉会、杨德麟、柳大任、陈炳焕、陈其采、文斐、章士钊、柳翼谋、李剑农、李肖聃、胡迈、何衢等等。

“五四”以后的20年代，科学民主思想传播，一批出国留学的校友和国内一批学者慕名而来，又迎来一次名师荟萃的灿烂时期。他们之中有金岳霖、胡庶华、任邦柱、辛树帜、刘永济、吴芳吉、钱歌川、

周谷城、刘朴、喻子贤、曾约农、黎锦晖、查夷平、陈奎生、何经渭、王凤喈等等。

在各项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了一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如任弼时、颜昌颐、余立亚、林蔚、毕磊、刘镇国、查夷平、周小舟、詹乐贫、欧阳钦、朱坚和沈立人、黄乃、余景行等同志。

1934年天津《大公报》经理胡政之对明德的评价：“明德与南开，不啻南北并立之两大学府”，“明德管理之严格，功课之认真，似在南开之上”。明德让他服膺才有肺腑之发，而且是有准确的客观尺度的。这话足以给明德在中国教坛定位。而这个定位之得来谈何容易，明德是私立中学，政府拨款其数目有限而且非常年列入预算之经费，只能给学校财力之不足给予补贴。大部分经费靠胡元倓校长自筹和高学费收入，胡元倓校长个人经历难以想象的艰难和屈辱，而明德始终没有跨掉。还办了明德系列学校：明德小学，明德中学，明德大学。[34]

我们知道，一九二零年明德中学校长胡子靖到上海聘请吴芳吉，吴于七月去明德中学，刚一住下，就在寝室门坊上贴上他写的对联：“南国香草地，西方美人居。”在胡校长的盛情安排下，吴芳吉把全家接到明德，是要安心为他作为诗人和教育家的事业奋斗了。

吴芳吉到明德后，深感校长胡子靖之能关怀教师实为教育事业之福音，更感“湘中文学之盛，在近代中国实推第一。”于是他访灵均、淳溪、求阙、湘绮之遗风，“渐知温柔敦厚之所以立教。其救济吾灵魂与骨气者，为力至大。”[35]于是吴芳吉更加勤奋地工作，专心为师。

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切，他引放翁之诗曰：

邪正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36]

“是非死后有公言。”多么的豁达大度，坦然自若！

1993年10月长沙市政协文史委主编的《明德春秋》收录了唐耀章的文章《我所知道的胡元倓》，极高地评价了明德创始人，明德的老校长，文中谈到：“白屋词人吴芳吉，……为明德负有盛誉的国文教师，胡子靖最欣赏吴的诗词，住室中张贴几满。”並说胡子靖1938年曾到聚奎中学吊念芳吉墓。在同一本书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琮池在《黄舍春秋——母校回忆》里说：“1922年我正式入明德旧制班学习”，“明德所聘教师，不乏高才有识之士，如诗人苏曼殊、吴芳吉，历史学家周谷城……生物学家辛树帜……常常率学生远足采集，语文教师刘永济（弘度）、吴芳吉，才高学博，诗词和唱……”[38]有趣的事，在《明德春秋》里，我们还看到管楚定保存的吴芳吉出的试题：

C37 国文第二次月考题

1. 默写“若乃春风春鸟……莫尚于诗矣”
2. 试略言汉学之长短。
3. 左思“郁郁涧底松”一诗之主意何如？试行之。

（毛边书纸，黑色油印，字是先生亲刻蜡板）[39]

龙云在同一书里有《明德〈湘君〉楚辞亭》一文：“民国十四年以前数年间，长沙有一著名之文学刊物《湘君》，系明德吴碧柳、刘弘度、刘柏荣诸先生主办，刊载各方诗古文辞新作，脍炙人口。其中吴先生之婉容词及一至四论吾人眼中的新旧文学观、长篇巨论，尤为人所三

复吟诵感叹，有洛阳纸贵之概，影响湖南文化界、教育界、学生思想文风不小。” [40]

最后，我们再引唐耀章在《明德校园刊物所述》[41]一段文字，结束本章。

当吴芳吉在明德担任语文教学的期间（大约是自 1920 年至 1925 年，时间记不准确），倡导用通俗语言，写长短句的新体诗，一时蔚为风气。他与刘永济、刘柏荣等，组织了“红叶诗会”。每逢星期日，便带领爱好写诗的同学二三十人，登岳麓高峰，讲述名家诗句，并互相唱和。当时校友李风池任湖南大学会计，经常代备午餐。后“红叶社”出版了纯文艺性月刊（应为季刊，引者）《湘君》。当时的湖南诗人曾广钧等，认为内容特殊，亦多投寄诗词。新刊以吴诗较多。李风池藏有吴芳吉手书赠诗一首，题为《民国十三年元旦》前录于下，以见吴诗的独特风格。诗云：“今年行踪不自了，还往故乡好？还访故人好？故乡风物最清幽，久客应作归巢鸟；故人颜色最温柔，相思密如向阳草。但愿手携故人返故乡，不劳魂梦驰云表；但愿洒扫故乡得故人，不愁天地长荒老。”并附有这样的一段跋语：“元旦无事，书此自问，既不能答，废书喟然，即以此作为拜年片纸可乎！”《湘君》系长方形装订本，由明德发行，因经费不易支持，仅出版数期，现均已散佚。

吴芳吉从上海到长沙的这一段实践，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教师都是卓有成效和成功的！说吴芳吉是著名诗人，说吴芳吉是教育家，也是当之无愧的！

注释：

[1]第 86 页。

[2]此诗计书于七年三月，下笔于八年八月，作成只一夜，而酝酿逾周年。富顺陈铨君评曰：不矜才，不使气，一任白描，为某他诗所不及。

周光午《箋證》云：“證之先生民国八年日记，则先生憶失真。實发端于十月十四日。民国八年十月十四日（己未八月二十一日）日记：“早饭后，诗于蔚然。拟效 Lindsay 之老洛伯 Auld Robin Gray 诗体，为某君之妻投水，作一篇哀辞。构想三四小时，未能下笔。”下笔于十五日，告成于十七日，蓋作成凡三日云。民国八年十月十五日（己未八月二十二日）日记：“枕上诗于怒发，即开首为某君之妻作诗，名曰《婉容之夜》。至午成四百多言，仍以白话为之。”同年十月十六日（己未八月二十三日）日记：“上行继做《婉容之夜》一诗。”同年十月十七日（己未八月二十四日）日记：“晨六钟起，继作《婉容诗》，至午告成，约千有余字，分十七段。……”

[3]第 68 页。

[4]第 544 页。

[5]见宫廷璋《吴芳吉新体诗评》。

[6]见《吴白屋先生遗书》第一卷周开庆《重印〈吴白屋先生遗书〉序》。

[7]朱静如《白屋诗稿评述》第 25 页，（台湾）文津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8]见《几江》1981 年第 3 期第 66—67 页。

[9]施幼贻《吴芳吉评传》第 41—58 页。

[10]参见《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 吴宓与吴芳吉》第 92—130 页。

[11]第 1300 页。

[12]参见《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 吴宓与吴芳吉》第 92—130 页。

[13]同注[8]。

[14]同注[8]。

[15]载《几江》1980年第五期。

[16]见《重庆师专学报》1988年第二期。

[17]见《几江》1982年第2期第2页。

[18]石天河的两篇文章见《石天河文集》第三卷第660—688页，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8月出版。

[19]第1304页。

[20]第1303页。

[21]第1304页。

[22]第1301页。

[23]第1302页。

[24]第1329—1330页。

[25]第545页。

[26]第546页和《百年明德磨血育人》第152页。

[27]见《明德春秋》第101页。

[28]第164页。

[29]第198页。

[30]见《吴白屋先生遗书》第17页。

[31]见《白屋诗稿评述》第94页。

[32]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甲编第577页。

[33]在一些论者的文章里，把毛泽东“芳吉之春”的赞语记为1920年，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赞语是因文强改吴芳吉“楚辞亭”对联而发。而楚辞亭是 1923 年为纪念明德建校 20 周年修建。

[34]参见《百年明德磨血育人》。

[35]第 668 页。

[36]第 632 页。

[37]见《明德春秋》第 19 页。

[38]见《明德春秋》第 122—125 页。

[39]见《明德春秋》第 145 页。

[40]见《明德春秋》第 200 页。

[41]见《明德春秋》第 197—199 页。

第四章 军阀乱世哭柳潜

炮弹横飞伴书声

吴芳吉诗：

哭柳潜[1]

西北大学文科学生，字慕陶，甘肃静宁人，卒年二十五。有诗赋一卷。

柳子性情正，能传老杜诗。从今无处觅，念汝欲成痴。陇水何呜咽，秦关尚鼓鼙。满怀契与稷，后起定谁宜？

待说围城日，辟雍竟饿乡。相邀垂死际，冠带坐堂堂。客泪胡笳发，秋风塞草凉。穷途翻好问，立雪意何长。

与汝道行浅，难将劫运回。坐教秦父老，颠倒逐飞灰。故国殷来日，平生尽此杯。埋愁空复尔，遗志我能推。

柳潜是民初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乱局的牺牲品。

诗，是诗人情感凝炼的投枪！柳潜是吴芳吉的优秀学生。师生在军阀围困西安城近八个月中相依为命，朝夕共难，生死同担。两师生曾经商议妥当，死之将至，两人必整衣端坐，威严待往，像英雄赴刑场，不愧来人间走一趟。有谁料到，学生却死在历经磨难而初露曙光生机已至之时，恩师的感情由起死回生的惊喜陡然遭至始未料及的闷雷震惊，使吴芳吉倍感悲伤，因此他的这首哭柳潜，情感尤为真切、深沉。被梁启超称为“纯乎其纯”，並由此认定吴芳吉“将来必为诗坛

辟新世界”。

我们认为，吴芳吉的《哭柳潜》也是对在西安被围的二百多天里无辜遭害的数以万计的民众的吊念。我们看第一首诗。开头就说柳潜“情正”，为什么情正？因为柳潜传杜甫诗。这仅是传诗吗？寓意并非在诗，而是杜诗传达的爱国忧民的精神。这里，更因师生与杜甫遭遇的类似而产生的共鸣。我们知道，杜甫三十五岁时到长安，本想施展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负，却遇安史之乱，一度被困于长安，写了不少反映当时战乱祸国殃民的诗。比如《悲陈陶》写当时的惨况：“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一死。”写安史叛军的凶残“群胡归来血洗箭”。比如《哀江头》一开头就写他的处境：“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2]已过不惑之年了，连哭出声来的自由都没有，行走也只能偷偷移步。吴芳吉笔锋一转，心系民族危难，企盼互相残杀，欢者自欢，悲者仍悲的乱局，早日有能人起而治之，关注民疾苦，使民众耕者有其田，劳者能饱肚。这和吴芳吉他们的处境不是非常相似吗？这就是吴芳吉崇敬的古诗人那么多而只提杜甫的重要原因。

第二首诗，吴芳吉忆及师生同度患难，共商果有必去冥府的时候，当整冠端坐以待，以勇士赴战场的英姿，迎接死神。这是何等高尚的人格，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这是何等坚强的毅力！这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一对师生，真是情深似海，义重于山。猝死不知虑，待毙实难熬。柳生既有慧可求师之诚，又胜游杨程门之礼。真是情同手足，心在成仁。

第三首诗，吴芳吉以为师之德，宣示继生之志，吊生灵魂安息，

誓承未酬之志。

对于军阀，特别是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武夫，国人是务必除之的共识的。尤其是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之后，更是如此。但在如何除之的问题上，社会上却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典型的是表现在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这就是说，在中国，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对中国的前途的考量上，逐渐分裂成改良派和革命派后，现在随着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国家政治渐渐出现严重的军事化态势，而军事权力又呈局部化和地方化状况，无政府主义的地方自治主张又在客观上起了助纣为虐的坏作用，国家陷于纷争和军阀割据之中，因而战乱不止。军阀已成为那个时代急需解决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历史提出了如何打倒军阀，如何“解决”军阀的课题。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精英们，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思想家，政治家们，用他们的政治头脑思考着这个有关中华民族命运的问题。吴芳吉以他贫民诗人的眼光和为师解惑的敏锐也捕捉到这个与民族存亡休戚相关态势。从他知事时起，就用他的诗的语言为思想家、政治家们提供着大量的客观素材。他揭露军阀的贪婪、残暴，他为受害于军阀淫威下的贫民百姓伸冤叫屈，他指名道姓地鞭挞军阀官僚，他倾其满腔之情歌颂护国将军。

吴芳吉痛恨军阀，也同他亲身的遭遇有关。那是1916年初他和邓绍琴从上海回川，到忠县不幸被北洋军阀张敬尧部队发现，硬说他们是侦探，险遭残害，好不容易才脱身回家。吴芳吉就在从忠县回家的

途中，写下《巫山巫峡行》及《曹锟烧丰都行》，揭露北洋军阀曹锟部队在四川蹂躏人民的罪行的。在《巫山巫峡行》的《附注》中，他说：“北兵入蜀，人民苦拉夫也。”诗中写道：[3]

巫峡昏，巫山晚，猿啼三声肠万转。

将军来时方昧旦，驱马五千兵十万。

棘为鞭，铁为练，破柴门，行调遣。

母伏床头避，妇惊灶下窜。

缚手弃家赴兵站。

老者运粮，少者肩弹。

肩弹最要速，运粮不妨慢。

危岩千寻，狭路如线。

俯瞰深谷，怵怵目眩。

目玄失足，委身藤蔓。

风紧云横，飞石如霰。

拔山摧木，万夫胆颤。

行行复行，三日有半。

鸟飞绝，人迹乱。

军令严，谁能怨？

夜无停宿，日无餐饭。

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

壮男独笑言，背地指天叹。

愿娘勿念，愿妻勿恋。

今生已矣来生见！

入山何所畏，猛虎残食人。

虎不食忠孝人，将军苦吾民。

这是一幅多么逼真的人民受苦受难的场景。北军官兵，如虎似狼，驱使老百姓为他们运枪弹，运粮食，有时行进在水上，“白日牵缆夜持蒿，”和大风大浪拼搏；有时不分昼夜，在危崖绝壁上攀援，随时都有舟破人亡，或坠入万丈深谷的危险。然而，“军令严，谁敢怨？”这些可怜的受难民众，只能够“背地指天叹！”默默地“愿娘勿念，愿妻勿恋，今生已矣来生见！”这是他们绝望的哀号。可是，是谁害他们落得这般境地呢？诗人在诗的最后，以极其含蓄而寓意深刻的五个字告诉世人：“将军苦吾民！”全诗就结束在这里。这里的“将军”，指北洋军阀曹锟。这诗的内容与风格，都颇似杜甫的“三吏”、“三别”只是更加口语化。

《曹锟烧丰都行》[4]是吴芳吉这一年写的《弱岁诗》的第六首。《诗稿·附注》说：“(1916年)二月十日，伪第七师师长张敬尧陷丰都，火之。敬尧、曹锟所部，书曹锟，明祸首也。”全诗如下：

曹锟烧丰都，难为女儿及笄初。

何处阿娘去，荒田闹鹧鸪。

阿爷死流禅，未葬血模糊。

阿兄随贼马，伏枥到边隅。

阿弟独不死，伴我两无虞。

离乳百余日，餐饭要娘哺。
失娘怒阿姊，入怀啼呱呱。
满城灰飞尽，瓦砾无人除。
故居犹不识，朽木两三株。
狼狈丘陇间，十日头不梳。
我欲从娘去，弟幼焉所徂。
我欲弃弟去，骨肉痛不舒。
阿娘如已死，魂魄夜来无？
阿娘如未死，念我惨何如！

诗中描述的少女及其一家的不幸遭遇，不是个案，而是当时的典型事件。在那军阀肆虐、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人物，只要不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各地都能发现。吴芳吉对待诗中主人公的不幸，并没作更多的描绘，只是在诗的最后四句，作了艺术概括，言简意赅，给我们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和思考余地。

《弱岁诗》写于吴芳吉二十岁这一年，即 1916 年，原诗十九首，现存十二首，原收入《白屋吴生诗稿》，后为《吴芳吉集》承收，多数是写辛亥革命以来动荡不安的局势和人民受苦受难的情景，表现了吴芳吉对无辜受难者的最大的同情和对制造动荡局势的军阀的谴责，也是向社会呼吁制止危害民众生命财物的檄文。

《弱岁诗》中的《思故国行》，实际上是由四首诗构成的组诗，以吊念英灵落笔，揭露军阀罪行。其中第一首是吊吴伎君的。吴伎君即吴祿贞（1880—1911），字缓卿，湖北云梦人。1897 年入湖北武备学堂，

次年留学日本，不久加入兴中会。曾提出《延吉边务报告》，证明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力破日本侵略阴谋。武昌起义后，去石家庄与山西革命军联系，策划北方新军起义。11月7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吴芳吉叹道：

公为故国死，不见故国新。

我过石家庄，华表生空春。

应怜吾父老，几载争战频。[5]

第二首诗是悼念宋教仁的。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又作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近代民主革命家。1904年2月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策划于慈禧七十生日武装起义，事泄，流亡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于1905年7月参加同盟会筹备会，8月主持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同盟会成立任司法部检事长。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对袁世凯极为不利。1913年3月，国会开会前夕，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杀于沪宁车站。吴芳吉忆之痛惜：

思故国，我忆宋先生。

经纶天下士，气宇国干城。

……

我公匍匐走，舌敝倡纵横。

精诚动甲马，贼虏一战平。

逐合九方土，歃血共为盟。

……

国以民为本，民以国为衡。
独夫虽不肖，未敢盗大名。
锋芒何太露，独夫心魂惊。
我公竟遗害，我国遂割烹。
我渡黄歇浦，风涛呜咽鸣。
友邦同下泪，孺子怆失声。[6]

第三首诗是吊念蔡松坡将军的，我们已在前一章看到了蔡将军护国的义举和英姿。

自甲午战争后，丧权辱国、祸国殃民、投敌卖国的事太多了，一言难尽。吴芳吉哪能一一皆举，他用第四首诗概括地描述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阴谋窃国，复辟帝制，在人民的怒吼、讨伐中夭亡，而北洋军阀乘乱抢夺地盘，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惨状。忧愤之情跃然纸上：

思故国，我心怆欲悲。
彼猩猩，国务卿。
彼魑魅，勋一位。
彼蝮螳，嘉禾章。
狐与鼠，为民主。
民之贼，督军列。
虎之伥，秘长长。
强者矫，弱者欺。

小人苦饱，贤者苦饥。

前人已矣，后来者谁？

幼我者犹黄口，长我者鬢成丝。

思故国，故国不堪思！[7]

吴芳吉在他后来为《弱岁诗》写的序言里，谈到：“松坡既逝，继之者多奸回不肖。明年，滇军烧成都。又明年，黔军犯重庆。其秋月，黔军复寇吾乡。既破，索所与仇者尽杀之。吾家临大江岸，门外有沙滩，黔军日杀人于是。每闻喇叭声如泣过门外，必牵人就杀者也。吾闻辄往，自人丛中窥之，窥辄惊痛至深夜不寐。凡吾所见乡人之死于是者三百余人。滇黔军以护国始，以犹蜀终。蜀人始知南军与北军等。又是当年所能预料者耶？”[8]这就是军阀!! 吴芳吉这里写的，是1917年9月，黔军王文华攻陷吴芳吉的家乡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11月滇军赵义新又到，连月以来，战乱不息，白沙镇人民转徙无宁日。先是云南军阀唐继尧觊觎四川，在护国讨袁之后，不但不撤回滇军，反而从云南大量派遣部队进川。蔡锷察觉唐继尧的野心，曾电唐责问，要滇军离开四川。唐继尧不听，反而把入川部队从不到三千人，增至三万人以上。黔军也增加到一万二千余人。唐继尧向四川扩张的野心，至此暴露无遗。他打起孙中山“护法”的旗号图谋不轨，包藏军阀见不得人的祸心。孙中山特派他的秘书与章炳麟去云南，催促唐东下，与桂师会师武汉，挥戈北伐。但唐恣意不从，专横自行，不肯改弦更张，结果影响了孙中山护法大业，中途摧折。孙中山当时曾一针见血

地指出：“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

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这句话应该说是很准确的，不过，就如何解决中国的军阀问题，孙中山当时并没有一个正确的主张，他曾经采取了多次权宜之计，一会联络这位军阀，一会联络那位军阀。比如对军阀陈炯明就有过联合—清剿—联合—清剿的惨痛经历，几乎自己也下不了台。不过这也难怪，孙中山虽然坚定地想解决军阀问题，但他自己实力不够才在与军阀的长期合作与斗争中经受沉痛的教训。教训使他冷静思考，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才逐渐醒悟，认识到了要靠广大民众的力量。这才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决定联合共产党、扶助农民、工人、走上与军阀斗争的正确道路，可惜天不假年，他未能看到胜利就抱憾离开了人世。

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在文学理论上提出“八不主义”，被吴芳吉逐一批评，在军阀问题上不做先锋，祭起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了。1922年9月10日在《努力周刊》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一文，针对陈独秀对联省自治的责难与反对，认为联省自治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并武断地认为：“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蔡元培曾主张在军阀统治下建设“好人政府”，后来转而对直系军阀当政，专横弄权，践踏法律采取“不合作态度”，公开发表《关于不合作的宣言》（见1923年1月28日《努力周刊》），并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蔡元培在他的《宣言》里说：“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

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

[9]这位 1940 年去世后，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也确有他独到之处。

以国内有知识的青年或留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群体，一般倾向于依靠实力打倒军阀。有的主张“好汉”不当兵，幼稚地认为没人当兵了，军阀就当不成了；有的主张“好汉”要当兵，如意算盘是当了兵革军阀的命，就没军阀了，这不过是些纸上谈兵，不着边际，实是空想。有的主张用打倒军阀的观念、精神唤醒民众，以削弱或打倒军阀。这是吴芳吉还只有 13 岁就在做的工作，以后他一直以文情并茂的诗篇，具体地投入唤醒民众的呼号中。吴芳吉还意识到面对掌握军权，有枪有炮的军阀，光靠笔杆子是无能为力的。他自己也曾经几次决欲投笔从戎，一是与军阀战，一是与侵略者战，然却不投机，而成憾事。

吴芳吉曾几次批评胡适。然而，在对待军阀的问题上，他们似乎又有些相似的主张，胡适说：“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吴芳吉在《蜀军援湘东下讨伐曹吴已复归州》的诗里，有“愿真割据行封锁，不得大同亦小康。”[10]我们这里想说，这是吴芳吉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一个表现，也是吴芳吉在寻求救国之策的道路上，未能走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吴芳吉是痛恨军阀的，他写了大量的鞭达军阀的诗篇，可偏偏他对大军阀阎锡山似乎情有独钟，你看他在《壮岁诗》里说：“阎百川、薛子良，民主父母邦之光。”[11]在《秦晋间纪行》里又说：“阎公一莅止，三晋日东升。”[12]

在《赴成都纪行》里，有“我思阎百川，晋民在天上。化日信舒长，生事春花放。”^[13]这些诗，都是吴芳吉在被军阀围困在西安获解后写的。从直接的因素看，正因为深深的感知民众受军阀之苦，在西安解围后与吴宓去北京的路上以及稍迟在去成都的路上，举目一看，无处没有百姓的啼饥号寒；相反的，在阎锡山统治的山西，社会相对稳定，阎锡山的军阀本质尚未暴露，相比之下，吴芳吉直观地认为阎锡山统治下的老百姓生活没有军阀的迫害，也就说了恭维阎的话，而且过头了。然而从思想根源上看，这是吴芳吉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后果。克鲁泡特金就是主张以自治为基础而没有任何权威的所谓“自由共产主义”的。吴芳吉在与梁乔山、曹志武商量《新群》杂志的任务，定下的第一条就是：“鼓吹地方自治”，而第五条更说：“我们最后的旨趣：是借径于地方自治以达于无治。”本来，在当时的中国，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精英，不在少数，在金冲及编写的《毛泽东传》里，就能看到，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个环节。我们惋惜的是，吴芳吉没能把在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同时接下的无政府主义抛弃。非常遗憾地看到在他的诗里的几颗刺，是那么的扎眼。人们还记得在袁世凯称帝前后，中国好些省份纷纷宣布独立自主的史实。客观上，对打击复辟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无政府主义的阴影。

对于吴芳吉诗吟阎百川一事，石天河老师在《白屋诗选》的序言里，施幼贻先生在《吴芳吉评传》里，都提出了批评，指出吴芳吉失于没有调查，对阎锡山的本质缺乏认识，同时认为这只是个案。施幼

贻还希望不要因此贬低吴芳吉。对他们的这些看法，我都是认同的。我只是想补充一点：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有无政府主义的帐。《白屋诗选》的选注者认为：吴芳吉“反对军阀混战，并不反对军阀统治”。这里说的“军阀统治”只是对阎锡山而言，是符合实际的。这就是无政府主义主张地方自治的影响造成的对吴芳吉的伤害。

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才有了解决军阀问题的方针和路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决议就是明确地提出：“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过共产党主张的贯彻落实，到终于打倒军阀，到斩断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黑手，更是一个艰苦奋斗，英勇斗争的过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往事了。

吴芳吉的揭露军阀，控诉军阀，唤醒民众，培育学子，是运用他的如椽大笔，从不同的视角、依托各种媒介，或山、或水、或人、或事、或物、或景，一往情深地为民众生计、民族生存、国家存亡、社稷安危，声声呼号。我们还记得他在《读外交失败史书后》里痛心列举朝鲜、越南的亡国，警醒国人不可无动于衷。他又在《弱岁诗》的《红颜黄土行》里再次疾呼：

痛莫痛于亡国，哀莫哀于丧师。

呜呼我国如睡狮，仅当睡醒一振之！[14]

在《儿莫啼行》里，通过一位年轻母亲在战乱流离中的哭泣，描述袁世凯窃国称帝，派兵侵扰四川，给人民造成严重灾难。母亲从她那被婴儿啼哭声所刺痛的心中，流出了被压抑的怨恨：

儿莫啼，儿啼伤娘心。
啼多颜色减，心伤瘦不禁。
朔风凛且烈，气凉夜已深。
忆昨“洪宪”初，兵马来骎骎。
驱男作俘虏，驱女作浮萍。
父老惧为鬼，痛哭走风尘。
愿为太平犬，勿作乱世民。
为犬犹有主，为民谁与亲！[15]

吴芳吉正是以这种慈母痛儿的心肠，凝注着人不如犬的最悲惨的社会生活画面，对残民的军阀发出悲痛欲绝的控拆。在《两父女》里，诗人又以一个少女的口吻，用最通俗浅近的语言，直接记下乱兵虐民的实况：

月光依旧皎皎，眼又开了。
忽想到我妈妈夏天死时，那月光也是这般的好。
想当时阿爸进城卖柴去了，剩妈妈与我，晚饭方烧。
绿豆满盃，南瓜满瓢，方等候阿爷回家同饱。
那蛮兵忽来到，歪起个牛皮的脸，蠢对着妈妈笑。
妈指我柴堆中急逃，只听得妈妈几番骂吵。
便扑刺刺的一刀，便扑刺刺的一刀
等我出来看时，妈妈砍倒，阿爷哭倒。
一櫃儿手纺的绵花，新年的布袍，尽被那蛮兵捲起已跑。[16]

这些诗，是吴芳吉对军阀蹂躏下的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在《壩

歌》[17]里，诗人就是直接指斥、抨击那些军阀指挥下的军队，实在还不如土匪强盗：

蜀山蜀水杜鹃鸣，宁遭贼，勿遭兵。

贼来挺身御，兵来死吞声。

贼抢我者金银，兵废我者织耕。

贼侮我者乡邻，兵丧我者儿孙。

贼掳我，非报怨。兵杀我，更求荣。

贼来老弱犹相恕，兵来妇女失坚贞。

劫运淋漓不聊生，大地兵贼两纵横。

在这首诗里，诗人还指出军阀所以如此横行无忌，是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制度极端荒谬腐朽：

功利何孳孳？疮痍复莽莽！

杀一人者死极刑，杀万人者膺上赏。

对于在长沙与黄兴、宋教仁等创建华兴会，参与策划在湖南武装起义，后又在日本参与组建同盟会，后因悲愤报国无门而投海自杀，以绝命唤醒民众的陈天华，吴芳吉怀着对“大哲人”“大诗人”的敬仰，去吴淞口隔海凭吊，写下《吴淞口访古》：

访古出吴淞，寒云湧乱峰。

海帆轻似鸟，芳草碧逾绒。

征马逢秋健，垂杨映港浓。

湄边人已去，风捲浪花雄。[18]

诗虽是刊在1919年2月的《新群》第一卷第二号上，然创作却是

在之前，用刊发时的序云，系为“免致阿谀之嫌”才迟发的。

吴芳吉的《笼山曲》[19]，更是具有史诗价值的长篇，全诗长达五千四百四十余字，情景交融地记录了军阀扰害四川民众，深刻揭露了旷古鲜闻的军阀残民的情形。他们又是溺婴掳妻：

陈宦谁？旧督师。

督师谁？掳人妻。

掳人妻，浣花溪。

浣花溪畔两口儿，夫出采米妇乳儿。

忽闻门外人高叫，妇出看门儿在抱。

一兵枪儿付溪流，一兵捉妇掀上轿。

又是杀害无辜的青年学生：

上官有轿没有抬，街头捉得学生来。

中有一人徐治华，娇儿年纪才十八。

半天力尽不能行，一刀穿肚便生杀。

这些作恶多端，令人发指的军阀都是些什么人呢？

袁皇死去黎上台，旧日党人纷又来。

不论人，只论党，党中人，膺上赏。

遂将戴戡罗佩金，一做督军一省长。

有滑头，当参谋；有讼棍，当顾问。

有痞子，当知事；有小旦，当会办。

折白党，司与长；龙阳料，州与道。

一时“伟人”争辈出，鹅毛扇子官纱服。

这是当时四川社会的丑态，也是全国许多地方的真实写照。这首诗史的客观效果，必然是激起人民对北洋军阀的满腔仇恨，厌恶这些大小军阀官僚，唤起民众起来推翻这个反动政府。

吴芳吉到明德后，继续用他的诗抒发着对人民的爱，对爱民者的崇敬和对军阀的无情揭露。这时，他有《湘君》作为平台，更方便他的投枪面世，就在《湘君》一号上就有《壬戌正月黄鹤楼下放歌》和《蔡忠洁之死别》。前一首是过黄鹤楼忆及辛亥革命的壮举，有感而发。后一首是写长沙一革命青年，回乡成亲被军吏探知，在新婚之夜不近情理地将其捕走并处死，而作恶的军吏也在不久，不明不白地被人刺死，寓示恶有恶报。这是善良民众的无奈自慰。吴芳吉对这关系国家民族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和一位小青年的被害都倾注了饱满的热情予以张扬，唤醒民众。

《壬戌正月黄鹤楼下放歌》[20]，吴芳吉落笔，回顾了辛亥革命，武昌义士高举义旗，首先发难，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动人情景。

十载我曾来兹，隻塔高耸云霓。

今日我重来斯，一塔久已倾夷。

记得当年塔下，鄂人崛起义师。

记得当年塔顶，鄂人独举义旗。

江汉朝宗滔滔，千古雄风未歇。

志士何所归依？头颅眼泪心血。

书生何所吹嘘？思想毛椎唇舌。
前仆后又继之，造兹灿烂民国。

于时辛亥中秋，裂地惊雷万壑。
健儿神勇如飞，长风振扫枯箨。
六街竞唱凯归，残月城头未落。
迎得都督阆仙，一路天鸡喔喔。
接看先贤满怀激情地写道：

战场杀气萧森，我亦扬鞭驰骋。
人血灿作秋花，映日殷红如锦。
可爱义起句句，还我河山十省。
遂令天下惊闻，谓我黄人梦醒。

鄂人足敬爱哉，同德同力同志。
儿女投笔请缨，父老壶浆箪食。
攘攘熙熙道旁，一日探捷千次。
每闻捷报欢呼，声彻遥空雁宇。

这是人民渴望民主，反对清王朝黑暗专制的一种出自肺腑的行动。

人民憧憬着未来，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乐观情绪，并寄于极大的希望。

嗟彼气象蓬勃，嗟彼人心雍睦。
从兹南北一家，使我衣足食足。
从兹礼义兴邦，光我百代文物。

从兹莽莽神州，任我高瞻远瞩。

这是吴芳吉的欣慰和愿望，也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然而：

举国歌舞方酣，先烈战骨已朽。

欲问先烈姓名，姓名埋没无有。

一朝洪宪移国，民命不如刍狗。

夏口劫灰未消，百凶竟作元首。

只今城郭依然，闾阎残砖断瓦。

可怜先烈高勋，赢得儿孤妇寡。

即此神圣堂阶，杂沓粮茭虏马。

不闻俎豆馨香，苍苍何处去也。

袁世凯给国家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袁世凯死后，政权落入一批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和袁贼的走狗、政客之手。曾经效忠爱新觉罗氏，镇压革命、火烧夏口的清军统领冯国璋，竟然做了堂堂“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並代理总理。其实，且止是个冯国璋，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中，魑魅魍魉鸡鸣狗盗、蛇蝎一堂！

嗟我十载重来，匆匆少壮虚度。

空念家国垂危，还将身手辜负。

山川倘犹相识，有愧汉阳烟树。

俯仰特摧心肝，茫茫大江东去。

未了，先贤自勉不要虚度年华，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无愧于先烈、先贤，无愧于亲友、同人，也才对得起自己的满腔热血。

《蔡忠浩之死别》诗六首，录末二首：

满腔孺慕思，临别不能吐。

此身誓牺牲，久已忘痛苦。

只有一心忘不得，叹息无辜长累汝。

只有一心不得忘，未见中原归故主。

凄惨喇叭吹，吹动空山裂。

断续号泣声，新婚作死别。

方见彩舆拜堂边，转瞬囚车出门侧。

囚车采舆两空花，暮雨萧萧风瑟瑟。[21]

这位长沙革命青年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恨拖累了吾之心爱，更难忘记故土还没回到民众手里！

吴芳吉还在一些篇章中指名道姓地抨击大军阀，大官僚是纵兵殃民的杀人犯，如在《北门行》[22]里就直接申斥湖南的军阀：

他杀尔夫，他杀尔夫！

茶陵谭公子、衡阳赵把都。

1925年秋，吴芳吉到陕西西北大学任新职，又是一路上受军阀侵扰。当时大战未平，陕西军方出关追逐吴佩孚军，从此以往数百里，兵匪横行，出没掠夺，随意枪杀，半路同行的中国公学同事贡沛成畏而折返。没有火车，吴芳吉只得骑驴，冒险前行，过函谷关时，吴芳吉见关门石联曰：“未许田文轻策马，愿闻老子再乘牛。”吴芳吉心里

暗暗笑道。“不知万千年后，亦有谓吴生在此骑驴否也” [23]。历尽千辛，终于到达西安。

吴芳吉到西北大学任国学专科及大学预文科的中国文学史及诗文选读等课。那时，西北大学教师奇缺，这里的学生年龄都较大，有的年龄比吴芳吉还大，虽然吴芳吉的名声也有一些学生知道，但又总觉得他是中学来的，又不是什么大学毕业，内心有种抹不去的轻视。等到吴芳吉走上讲坛上课，一下就征服了大家，好象心都随着教师的讲解跳动。下课后竟有学生调侃：“儒子可教也。”吴芳吉选用的教材，除了屈原、杜甫的作品，李白，白居易的作品，还有丘逢甲的作品，也有他自己写的作品。他的讲解总能抓住学生的心，调动学生的情绪，效果极佳。吴芳吉不但得到学生的爱戴，同时很快得到老师们的称赞，学校的重用。他在8月26日给父母亲的信中说：“男现被推为本校评议会会员之一。此会为全校之立法机关，惟重要职员及教授职乃得为此会员。除校长为会长外，共有会员10人。其九人皆属英、美、法、德、日之留学生，惟男一人无此官衔，亦得参预其间，亦见留学生虽属万能，也有技穷之时，仍不能不俯求吾人，……” [24]我们已经从吴芳吉一路走来的实践看到，他不论是为诗、为教、为学，都是以其严肃认真，以其优异的成绩为人刮目的。当时的人心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留洋”了，但主导舆论还是更重实学，有实学，校长就可以授予“教授”，并不像我们近些年的情况，首先看学历，以至于弄到造假学历的怪风。学历可以造假的，实学却是假不了的。

西安是我国数朝古都之地，名胜古迹丰盛，最适合文人墨客游历。

吴芳吉从小热爱大自然，得益于他六岁读《禹贡》之智慧，对祖国历史疆域情有独钟，自然别有一番思古之幽情。在明德的时候课多较重，平时论事，湘君红叶，诗赋民情，少有空闲，还千方百计遍游湘楚。在西北大学课时较少，杂务不多，正是他探悟大自然之奥秘，华夏民族之聪颖的大好时机。于是每逢假日，必出游各地，不到半年，几乎游遍近郊名胜古迹，而每到一地必有诗赋，或吊古感今，或咏物论时，总是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深情，总是会表露出对军阀的厌恶，对国家民族的倾心。我们看吴芳吉 1925 年重九浴华清池，登秦始皇墓留下的情怀，《骊山谒秦始皇帝墓诗》[25]：

—

出临潼，秦皇陵墓天当中。
驰道已芜碑记灭，独占林杪势穹窿。
晓日何瞳瞳，浩荡来长风。
盗发尔谁子？姓字逐尘空。
千秋呵护有神力，汉家人杰万邦雄。
呜呼大帝安可得，低头默祷入冥濛。

二

我生劫运丁鼎革，坐见神州沦战国。
骨肉年年争未休，里邻处处愁煎迫。
如此版图之广孰能宅？如此子民之众孰能埒？
如此得天之厚孰不悦？如此文明之渊孰不颺颌以感格？
独何心兮成惨裂，復何人兮能提挈？

呜呼！大帝大帝安可得，为此天下滔滔兴灭而继绝。

三

天不语兮苍苍，魂不返兮茫茫。

渭水兮琼纒，骊山兮云裳。

关河百二氣堂堂，此间自古帝王乡。

柿叶渥丹麦浅黄，村庄稀处见牛羊。

荒煙几点问谁藏？大呼文武与成康。

他日要当更谒桥陵去，勺醴泉兮听凤凰。

四

昔闻师友言，瀛寰妙相假。

两川今希腊，三秦古罗马。

哀哉神圣邦，缺残如解瓦。

何处寻但丁，清怀互倾泻。

秋水念伊人，秋风思大厦。

我欲叩阊阖，曲终欣奏雅。

五

此乐应何如？游子还故都。

徊徘不能去，欲去又踌躇。

临风三祷祝，我愿诚非诬。

愿帝再起焚书，愿帝再起坑儒。

愿帝再起澄海宇，芟蕘群蠢挾强胡。

吁嗟民族中兴应未运，华嶽云霞漫捲舒。

吴芳吉的谒始皇墓诗，落笔千秋神力万邦雄，对始皇表达了崇高的敬仰，因为是他统一了神州大地，是他使辽阔的神州大地“书同文，车同轨”。这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的一大大的功劳。未首诗的“焚书”、“坑儒”句，沿此而发，更因对眼前的国家遭军阀割据，四分五裂，思之痛心疾首。考问苍天，何时能统一？怎样才能统一？“焚书”、“坑儒”乃情急之喻，系思统一之谓也。有人借“焚书”、“坑儒”句而指责吴芳吉，说他希望复辟封建帝制，实则皮毛之论，不可取。

第二首诗更是鲜明显示吴芳吉对当时军阀割据，残害民众的深恶痛绝：“我生劫运丁鼎革，坐见神州沦战国。骨肉年年争未休，里邻处处愁煎迫。”观古思今，以古鉴今。这不但是诗人吴芳吉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必然之笔，更是作良师以德化民，以德育人使命的必然之责。当时，整个中国军阀割据，分崩离析，几乎没有一块净土可供安居。比二千年前的战国割据、八方争雄的局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吴芳吉在第三首诗里情不止禁地：“大呼文武与成康”，希望有如西周盛世，有周成王与周康王那样的治世之君，使天下安宁，刑措不用，“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吕氏春秋·不广》）可是，这样的希望现实吗？几时才能实现？他在第四首诗里悲叹，“哀哉神聖邦，缺残如解瓦”。不过吴芳吉必竟是诗人，必竟是育人之师，亦如他以后说过的他是悲剧中的乐观人，所以他想到了但丁，但丁的《神曲》说：“我欲叩阊阖，曲终欣奏雅”。吴芳吉出身在四川，现在又身居于陕西，自然想到吴宓曾经说过“两川希腊三秦罗马”的话。那是说四川之似希腊有四：希

腊人性中和，不趋极端；四川人性秉南北之长，刚柔並具，一也。希腊艺擅雕刻，尤富诗歌；四川美术发达，向为产生诗人之地，二也。希腊好娱乐集会，四川人喜宾客，三也。希腊以山海阻塞，每起局部之争；四川地险，长为割据之势，四也。陕西之似罗马亦有四焉：罗马多古迹，陕西亦多古迹，一也。罗马有大戏院，陕西有梨园，二也。罗马以法制著名，陕西自古多出法家，三也。罗马多征服异国之人，陕西多统一全国之人，四也。吴芳吉在诗里自问，“何处寻但丁”？事实上吴芳吉是有仿但丁、荷马，诗韵中国的数千年历史的雄伟计划的。如果我们想想吴芳吉在明德中学时写的《弘度佳公子》[26]有“第一奇功休让人，开国文章我辈始”的诗句，就更能理解吴芳吉的自设之问了。他的提问是为心中早有的答案而发的。吴芳吉已经以他的《婉容词》做了一回“开国文章”，只是由于他的英年早逝，另一次“开国文章”未能实现。从吴芳吉对但丁的仰慕看，他似乎希望他处在舞台上的这一幕剧，最好是喜剧，至少应像《神曲》那样以喜剧收场。而不只是自己作为悲剧中的乐观人而已。你看他明确地说“曲终欣奏雅”。有趣的是，他在与谒始皇墓同时写的《浴华清池莲花汤作》[27]里写道：“杨妃杨妃听我歌，开元天宝岂足多。何不晚生千余载，熙熙民国浴共和！”可以说他虽然认为开元天宝年间是盛世，但杨贵妃也不过有如他在《婉容词》里所揭示的婉容，只是始皇的玩物，比婉容好也好不了多少！无非是多累了一些丫环女仆，多一些燕窝鱼翅，多一些绫罗绸缎，一样没有独立的人格。吴芳吉对他所处的社会也並非只有绝望，他不是还在企盼“曲终欣奏雅”吗？这也並非纯全是诗人的遐想，还

是有所根据的。依据在“民国浴共和”。吴芳吉一直关心着孙中山的奋斗，关心着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在客观上，特别是近两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有了对铲除军阀的可行方略。中华民族还是有希望的！

吴芳吉在游城西元咸阳，並遍谒文武成康诸陵廟，著有《咸阳毕原瞻邦周陵纪游》等诗，歌讚周之德，文武成康的功业。接着游城南，至曲江雁塔，访皇子坡，玄都观。再游城南，自长乐坡，芙蓉苑，至乐游原。又游至韋曲谒杜少陵宅。韵诗数首。如《访未央宫故址作》、《咸阳毕原瞻拜周陵纪游》、《杜曲谒少陵先生祠》、《过唐东内大明宫故址》，另有《加蒲拉拉 Caperana》、《丙寅元旦率题》、《玉姜曲》、《壮岁诗》等诗，不可谓不丰，吴芳吉在《杜曲谒少陵先生祠》的注云：“拾遗生于太平，死于乱世。吾人生于乱世，或当死于太平。末句暗言此意云尔。” [28]看来，吴芳吉对于中华民族之最终能有翻身之时，定会中兴，始终是抱有希望和信心的：

腊梅香引少陵祠，少陵野老盖何之？

诗思空存稷契想，风光不减盛唐时。

樊川日霁桑榆暖，太乙云开仙仗移。

应与此翁相异处，无穷国运在来兹。

这首诗是吴芳吉和杜甫心灵的交汇，阴阳两界的沟通，是学生向先师的秉承。我们试着把它译出来看看：

梅花淡淡的清香把我引到这个地方，

安史之乱害得你身困险境现可安康。

诗心效法贤臣的美好愿望虽未实现，
但现在也还和盛唐时一样放着光芒。
樊川今天天气晴朗老人都感到温暖，
天际无云借着神灵般仪仗漫步山乡。
崇拜你的后生我和你或许会不一样。
你生在太平死于乱世我能盼着国昌。

1926年3月初4，吴佩孚派遣刘镇华进剿西安，发动十师兵力围城。陕西督办李云龙，师长杨忠，召集败兵五千人凭城抵抗。从这天开始，经过二百三十天，无日不在战争中，城中二十来万人，竟饿死三分之一。吴芳吉作为诗人，作为良师，无以拯救百姓于水火，只有以诗控拆军阀的罪行，为历史作证。西安围城从三月初四开始，到十月将近八个月，吴芳吉对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作了详细的记录。

五月五日，正是端午节，西北大学文科师生举办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二十二年纪念。至十五日，围城已两个半月，学校不得不停课。学生各自回家，学校只许家在外地的师生留校。校内显得十分寂寥恐惧。吴芳吉即组织围城读书会，每天导读二小时，不论流弹横飞，机鸣屋震。吴芳吉的朋友三原胡仲侯君、陇县石雨琴君，住在城内，听说吴芳吉粮尽，送来一些食物，并约他到他们家去同甘共苦。一天早上，大学门外毙饿殍八具，腹仅留皮，腿不盈握。为避飞机投炸弹，师生只得掘深壕备用，每个人都处于战斗之中。吴芳吉却借读书会的力量，安定全校留守的师生，表现出高度的成仁取义精神，高度的为师以身

示范的典范精神，平凡而伟大！

吴芳吉在这样艰危环境中，除了辅导学生，他自己还要勤奋读书，他在六月十日给吴宓的信中说：“古今犹旦暮，围城虽久，意殊未觉。惟诗或不成，路通，吾且不去。若乃巨弹飞鸣，围墙震撼，再之既熟，更不动心。” [29]在流弹乱飞下，仍能够研读而“不动心”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仍读圣人书。

自七月开始，城中军队四出搜捕，人们渐多饿死。全城燃料多已用尽。所以西北大学院内所有唐槐大树，都被城中守军斩伐殆尽。中秋以后，大学师生开始杀马煮草，掘鼠捕雀充饥。吴芳吉与陕县学生樊檄远相依为命，又屡屡得到俄人同事、郗士脱克夫先生之助，勉强尚能度日。当时飞机带来消息，特准外国人出城。但城中教士除妇孺外，都愿与西安人民共患难，同安危。战争固然可怕，但也唯有在战争中可看出人类高贵的一面。高度理性的发挥，无私无畏的大无畏精神，这与残害民众只营私利的军阀真有天壤之别。

守城的陕军首长杨忠与李云龙，二人字号均为虎臣。当地百姓以其毒狠，遂以“二虎”称之。守城时，一守西门，一守东门，就城内巷战。人在枪林弹雨中，有如掉入泛海狂涛逆浪。杨忠守大荔一村，历三月余，军民死伤过半。有些饥民，受不了饥饿恐惧，有两百多人投长安莲花池喇嘛寺水塘自杀，而二虎部过着糜烂享受的日子，屡次征市娼入营歌舞，每次二三十人，又夜间常命“易俗社”中子弟强起演戏。二虎的士兵更毫无军纪，随意放枪射人。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士兵竟以射杀学生打赌。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在操场活动，城上有

士兵指操场内打球的人说：“如果你打中那个拿球的人的手，我输一盒纸烟。”结果真有一个士兵放枪射中。像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当时司空见惯。二虎的罪恶，造成陕西同胞的极大不幸，真是罄竹难书。西安城内老百姓实在难以承受，商议派代表直接去见守军首领，八月尾，在地方势力的鼓励下，人民代表跪见守军首领，恳求长官顾念百姓生民，设法解决出现的问题。守城首领竟悍然拒绝，说出荒唐绝顶的话：“谁教你等生在西安城内。”更可恶的是：有人还得意忘形地说：“吾人已守三月，决再守半年，请问古人有此魄力乎？”百姓实在无法忍受，九月，人民代表再跪求陕军首领，称愿代向乱军讲和，以保陕军实力。守军竟然回答：“尚未到人吃人的地步”。陕军当局计划，拟撤全城屋宇，储作燃料，闢全城屋基，以种大麦，可支持三年无虑。”[30]可是没过多久，二虎料草殆尽士兵减员又多，已是朝不保夕。

10月19日，西安城内商务书馆有人带来消息，说刘镇华某部有一围屯东南城外的营长，只要每人贿以十元，便可放行。並说已经放行了数百人，机会不可错过。于是吴芳吉与西北大学同事商议王孺卿君，含山唐仰虞君、无锡陆理君、胡步川君及樊生几人商议决定一试，並打算直接见刘镇华后，设法接引全城人民。

樊生在郗士脱夫处，借30元为吴芳吉的旅费。同行20人，城东派副官马某伴送，出南城东去，乱草丛生蛇行而前，流弹时时掠发上过。过了好久，马副官说：“我们的防止至此而止，不能远送。”于是告别而去，吴芳吉等再向前二、三里光景，至两军中间之地，四顾荒寒。到刘镇华军队的战壕上，虽然有兵收钱，钱收毕后说：“营长有示，

薄暮方许放行。”过了好久以后，来一长官，另卫士二人，检查有无信件，其实目的在敛钱。不久，又有数兵士来，亦借口检查，凡外套、棉衣、皮衫、统统命令脱下，于是尽扫而光。众人心已绝望，暗暗相约回城。

还走不到一百公尺，又有人追踪而至，鸣枪阻止，竟将帽子、鞋子、内衣夹裤抢去。吴芳吉是近视眼，没眼镜不能走，这不连眼镜也被夺去。最后只得靠樊生牵扶着走，路过一破庙进去休息。当时大家认为黄昏入城，恐怕城中守军看不清楚何人过城，难免遭到检查，商定在庙里过夜。大家围坐佛台下，风冷月白，被劫后的这些人都是单衣。没有一个不颤慄萎缩，这样痛苦挨到半夜，没有想到先后又来兵士六次搜查，最后吴芳吉只有皮裤带一条也被解去。就这样挨到天明，大家狼狈回城。行至南门遇同事新津徐朴生先生，见吴芳吉手提裤腰赶紧解下领带让吴芳吉系好裤腰，狼狈回到学校。西安民众已经忍无可忍，酝酿联络起来自救，召开大会示威，吴芳吉为此写了鼓动诗歌，由柳潜印在布上，歌词曰：“起，起，起，长安市民努力一齐起，起来兮救死！起来兮救死！死到眼前来矣！死到眼前来矣！”事也凑巧，没等大会召开，西安解围，吴芳吉得以重生。

吴芳吉在西安围城期间，以诗记事，写了不少伤时感事寄望于情。遇理于景的诗篇，绘制了永久的画面，让人们特别是青年学子对历史上军阀的祸国殃民多有些感性的认知，对祖国的奋斗、发展经历的坎坷铭记于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传下去融于华夏民族的文化长廊，延绵不断。请看 1926 年写的中秋时节的两首诗：《立秋》、《民国十五

年中秋后二日粮绝》。

先看《立秋》[31]:

满愿新秋节，依然未解围。

褰裳惊骤缓，绝望懒思归。

暮雨连山暗，荒城独鸟飞。

奇冤与谁语？四壁只蚬蚶。

再看《民国十五年中秋后二日粮绝》[32]:

生命何渺茫，此心日恬泰。

知到弦歌辍，坦然归上界。

这两首诗乍看起来，与吴芳吉的多数诗的情调有些不同，情绪要低沉一些。是的，是有那么一种情绪。不过我们知道，这正是吴芳吉忠于事实，忠于自己的主观感受，不作违心之论，秉承客观的天性使然。在处于围城的特定情境，而且是一围就是几个月，衣食无着，举目皆是死尸饿殍的情况下，人的情绪没有一点波动，那就不真实了。而且，这里还有另一种真实，那就是吴芳吉与柳潜商议整冠端坐迎接死神，“坦然归上界”的真实。这不正是后一种真实，战胜前一种“真实”的更可珍贵的真实吗？因为有了这种真实，“奇冤与谁语？”就蕴含着无情考问的笔力！这是把自己摆在民众之中，而非以“稷契”自居的诗人、良师的考问，这是期盼引领民众，凝聚众心的伟力担当起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急切呼吁！

在围城期间，吴芳吉还受到一位受尽磨难来到中国，在西北大学任教的俄国人希士脱克夫的关照，吴芳吉也常为他译诗，为此他写了

一首诗《答西北大学讲师希士脱克夫 Shestocaff》[33]，在诗序中说：“君本武夫，而精研文化，遍通大陆方言，善诗歌。与余同席而食，诗成，辄请余译之。奉旧教，慈祥过人，得钱以赈穷乏，而自奏甚薄。”又说：“君无家无国，处境比余为苦。然围城中，得君解慰极多。”诗有三百字，不全录，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似翁有德邻不孤，且住为翁话典谟。

他们都是扬德以为教的良师，是不会有丝毫偏离为师之德的，你看吴芳吉连对与他同为教师的好友，也不忌讳要用中国《尚书》中有关尧、舜、大禹等开创中华民族立下丰功的明君、谋臣的方略、践行与之交流。

我们再录下几首围城诗，看看吴芳吉记下的惨景和深情。

《石仲麟君之弟雨琴君以斗米至》[34]：

万卷无长策，行终饿殍林。

干渴怀惭喘，飘然来好音。

末世谁相念？斗米万黄金。

欲将粒粒数，持此见君心。

君心江海深，我意愧蹄涔。

亲在不枉死，偷生实下忱。

城空私得饱，忧喜两弥襟。

再看《出门书所见》[35]：

瘦骨何潦倒，沿门不忍看。

救时情更急，死后鬼多端。
恶吏犹催米，秋风又早寒。
苍天胡视听，使我尽凋残。

再有《长安野老行》[36]:

朝逢野老不能言，但垂清泪似烦冤。
面瘦深知绝食久，路旁倒傍酒家垣。
向午归来野老死，头枕树根沾马屎。
半身裸露骨班班，市儿偷去破襦子。
黄昏重过血泥糊，腿肉遭割作鲜脯。
酒家人散登车去，垣头啖啖来饥乌。

这些诗之深刻，反映的围城中的真实情况，与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的古诗人笔下的新乐府可以比肩。吴芳吉是笔墨与泪水齐下，心随诗情颤抖，才做出这有血、有肉、有情、有泪的，属于社会、属于人民、属于民族、属于国家的这些诗篇。

在吴芳吉的围城诗中，除了《哭柳潜》，就要算将近四千字的《壮岁诗》了，可以说这是一首围城的全景图，也是吴芳吉对自身的一个初步的然而精当的总结。虽然诗在形式、体裁上显得有些“杂芜”，但这首先是吴芳吉有意识的安排的，并非新学诗之人的生涩之笔。吴芳吉从来主张，诗随意走，笔到之处，该用文言就用文言，该用白话就用白话，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八言，情到之处任选之。

对于人们的责难，吴芳吉自己在自叙中也作了回答，他说：“诗凡两篇，此乃其前篇也。此诗体裁，最为亲友之所反对，多人之意，率以此诗格太芜杂，而语累冗长。极是，极是。某初以为此，盖感明德胡公之语而起。胡公常曰：‘融异为同，化小为大。’为其教育宗旨所在，此篇体裁之庞杂不纯，亦欲窃取融异为同之意。只手段太低，未能如所愿耳。后篇为十日下旬之作，两篇字数相等，其起结皆用天字。亦兴亡成败之无不有天也。” [37]

这里我们想说，一是作为教师的吴芳吉他似乎一切都是从为师出发，离开明德还牢记明德老校长为明德定下的宗旨。当然，这并不是以人定是非，而是以理定是非，只不过这里的理，是胡校长制定的，所以要言胡公。我们看“融异为同，化小为大”。这个理，不是真理吗？吴芳吉是服从真理的。他在亲友质疑之后作此申明，实在是用真理启迪于人，又是一次为师之责。

其次，我们要说，改革创新不易，人们总是以熟知的模式来评判一切，来认定是非。吴芳吉还是特立独行，按他自己对诗艺的理解操作，好不好，有了作品，拿出成就，就好说话了。你说杂芜，拿出杂芜的理性判断，也是好的吗，至少它是引出你的杂芜理性判断之因，你的判断成功了，他的杂芜诗不也成了成就你的成功之果之因吗？那么这不都是对诗艺对文化的贡献？！你看，一首《婉容词》一个白屋体，不是至今几十年还在引人探索吗？文化是丰富多彩的，诗是丰富多彩的，没有创新，没有改革，不就成了死水一坛？梁启超说《壮岁诗》“瑜不掩瑕”，大家都引以为据，因为梁必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

物，受人崇拜的大名家。不过他並未说明何谓为“瑜”，何谓为“瑕”。可能这是他有意留下的课题。

现在，我们从几个角度看看“壮岁诗”的叙说。先说守军的无理扰民[38]：

不闻政令夸民主，翻新匪首尚萑苻。

萑苻此土尤猖獗，当中两虎声赫赫。

恃城死守足风威，二十万人非所恻。

言和谁家子？词严义激烈。

“通敌”两字冤，恍然归寸磔。

揭露守军的凶残害民罪行[39]：

遂祸患而无终兮，民命其真穷也。

犹假中山以媚贼为功兮，何心肝之不同也？

行者侧目，君者潜叹。

家无壮男，驱妇掘堑。

盗无斗储，当餐送饭。

大家馍十斤，小家钱半串。

沿门鞭挞急，供应不容慢。

南城东关，情何惨淡！

尽室驻大兵，深宵驚激战。

堂前随马溲，酒后索人玩。

闺女逃不得，苍黄枯井践。

兼旬失所依，委弃复何算。

鼓角满城头，黄昏归鸟唤。

顷刻难民集，哭声四五万。

守军淫乐的罪行[40]:

独有辕门乐事喧，烟灯锦褥管弦繁。

待醺中军娇粉队，鸣驺丰夜降犁园。

走卒马夫皆得意，虾蟆陵与开元寺。

作战为民辛苦多，绑票括钱属正义。

但云通敌肆捕捉，但云藏奸私处治。

但云厝薪当藉没，但云储米成罪戾。

煌煌禁令枪空发，街头瞄准击人戏。

《壮岁诗》里处处透视处黎民百姓的苦楚:

邻儿伤重独惧忧，治疗安屯两无由。

儿家病院尸盈满，二寸桐棺军扣留。

.....

惟吾民兮心悲，死莫迫兮饿羸。

弹之来兮有响，饿不顾兮阿谁？

试出门而闻见，何自杀之累累。

莲花池，喇嘛寺，几冤魂，此弃置。夜啾啾兮聆鬼市。

见说市厅敷警岗，禁人寻死不胜防。

徒教贫户增叹惋，一死容易饿难当。

碑林翁愠气倔强，竟日两口片馍尝。

忍死不甘低讨吃，肚皮贴背眼留眶。

.....

不敢侧目，况能揭竿。
一城生命，操彼掌间。
饥荒炮火，虎豹重关。
屠城一死之惨，未若凌迟待死之残。
虽倾东海之荡荡，莫填此恨之绵绵。

.....

经兹战乱，赤土空郊。
搜钱毁炕，拉夫熏窑。
无茅盖而不揭，无柴扉而不烧。
阡陌廛市迷荒塚，沟浍陌阡尽战壕。
饿殍满街蒸疫疠，炎风逆面呕腥臊。
野犬食人肉，白日向城号。
山头无树影，洒落红旗飘。
身非异族，口说同胞。
果何故而煎熬，复何辜而惨遭？

这些字字泪，句句血的浓笔轻描，谁看了不动情，谁看了不气愤，谁看了不为之振憾，谁看了不会与吴芳吉一起考问“奇冤与谁语？”

注释：

[1]吴芳吉说：“梁任公先生读此，致书长兄曰：‘《壮岁诗》瑜不掩瑕，《哭柳潜》三首纯乎其纯，将来必为诗坛辟新世界，请得介绍而友之也。’时某以奔丧返家，竟不之答。岂意先生今亦谢世！而某之不自长进，亦永无以副先生望耶！”

- [2]见《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二）第406页。
- [3]第22页。
- [4]第23页。
- [5]第24页。
- [6]第25页。
- [7]第26页。
- [8]第17页。
- [9]参见《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翁有为文。
- [10]第147页。
- [11]第253页。
- [12]第281页。
- [13]第288页。
- [14]第32页。
- [15]第18页。
- [16]第92页。
- [17]第48页。
- [18]第74页。
- [19]第98页。
- [20]第152页。
- [21]第151页。
- [22]第161页。
- [23]第836页。

- [24]第 830 页。
- [25]第 231—233 页。
- [26]第 211 页。
- [27]第 230 页。
- [28]第 241 页。
- [29]第 881 页。
- [30]第 256—258 页。
- [31]第 267 页。
- [32]第 267 页。
- [33]第 268 页。
- [34]第 269 页。
- [35]第 271 页。
- [36]第 272 页。
- [37]第 256 页。
- [38]第 251 页。
- [39]第 251 页。
- [40]第 252—255 页。
- [41]第 252—255 页。

第五章 诗吟赴蓉酬学子

以身殉学壮师魂

吴芳吉诗：

赴成都纪行[1]

锦城指顾间，明朝心上计。

滌尘浣花溪，痛哭草堂寺。

幼读少陵诗，深识少陵志。

一生爱此翁，发愿为翁继。

洛下吾车迴，耒阳吾舟次。

灊溪吾三宿，杜曲吾频至。

兹游仍为翁，翁事犹吾事。

（老杜所游诸地，今追步殆遍矣）

吾生堪自喜，有友尽高踪。

旷世不能再，而吾躬与逢。

湘上二刘子，涪阳一长兄。

微君勤诲诱，及壮犹顽童。

战伐何时已？音书久未通。

悬知万里外，有此可怜虫。

（二刘子谓弘度、柏荣，涪阳兄谓雨僧）

风雨上龙泉，绝顶瞰诸天。
益州平如掌，青城几点烟。
田亩相稠垒，明镜纷万千。
茸茸散村树，秋色正澄鲜。
恍若临灞岸，回首望樊川。
如何此形胜，祇逐潮流迁？
蜀女甜于酒，蜀土软于棉。
丰功缅神禹，疏鑿何时旋？

（龙泉山顶远望）

花下见成都，近郊闻杵臼。
逢人访太学，告我皇城首。
肃肃东门楼，旒旒江桥柳。
长衢记依稀，犹绕梦痕走。
父在欲来游，怀此空年久。
车马自宣阆，举目殊亲友。
哀哀无父儿，遑遑丧家狗。

（九月二十七日薄暮抵成都市）

1927年8月底吴芳吉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赴成都任教，以他的学识和声誉，他是不愁西席可往的，然而命运总是作弄人。西安围城九死一生，刚去东北大学从教不久，谁知父病催归，及至到家，父却先走，终未能病榻叩孝。现在孤身赴蓉，如何完成父亲的遗愿啊？本来

说好父病愈或办完后事即重回东北。在这蒋介石叛变革命，军阀重组，国未安定，众说纷云的乱世，哪里的青少年不需要教育呢，只好接受成都大学的聘请，辞东就西。到出发时，别子离妻的难舍难分虽是人之情，可常年在外的人，难得归家团聚，更觉离别苦楚难当。月有阴晴圆缺之变，人有饱暖寒饥之忧。吴芳吉一向过的苦行僧式的日子，没有半个子的积蓄，生活逼迫他赶紧赴任。可是，他整日思考的，却不是如何挣钱，而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传道、授业、解惑”的抱负。我们从《赴成都纪行》在《学衡》刊发时的自注，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境界。这个自注，是这样写的：“杜子美诗：‘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题本此。”这就是说，他要以杜甫为榜样，效法文翁，使蜀文风大振，教化大兴。我们知道，文翁是汉景帝末年，蜀郡守。据《汉书》记载，“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仁爱好教化”。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入学者免除徭役，成绩优者为郡县吏。“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蜀郡自是文风大振，教化大兴。后世用为称颂循吏的典故。杜甫曾在几首诗里用过这个典故。如在《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里有“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句。吴芳吉看重杜甫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爱国爱民，大兴教化，大振文风的抱负。赴蓉从教，以杜甫为师，以文翁为范，明经饬行，圣德化人。定下这样的社会担当，一路走来，思绪不断，及至快到成都了，“锦城指顾间”，对杜甫的深情一下如泉涌笔端“一生爱此翁，发愿为翁继”，“兹游仍为翁，翁事犹吾事”有论者认为，“自注”里引述的“文翁”，指张澜，我以

为欠妥。要是那样，这里的“翁事犹吾事”就更不好解释啦。

此时，吴芳吉情不自禁地想起与自己一样崇敬杜甫，刚从东北大学分手的知己刘弘度、刘柏荣，你们在哪里？实因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形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年青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它成立以后从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在从1927年3月起的这段时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千上万地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交通阻断，“战伐何时已？”好久才能得到你们的“音书”啊！

到了龙泉，俯瞰川西平原，远眺青城山，心驰神往，成都的美景，富饶的蜀地，姑娘的艳丽，小伙的可爱，连杜甫游历的樊川，一齐萦绕脑际，使人不得不想到，如果没夏禹疏通九域，哪有今天的景象啊！或许连六岁读《禹贡》时的情景都一起跳入眼帘了！一天，吴芳吉在皎洁的月光下度步，浮想联翩，当即给他的学生、挚友周光午去信，言：“因悟禹闻善言必拜，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襟怀何等，直同此月。宜至今数千年后，其精神流注人间，光辉灿烂于无极也。嗟乎光午！至德至道，充盈宇宙，仰观俯察，不可胜用矣。”[2]不难看出，吴芳吉时时刻刻都没忘记以德化人的教育者职责！

作为孝子的吴芳吉到了成都了，自然想到生他养他的父亲。父亲在世时早就有心蜀府一游，现在男儿到了繁荣喧闹的成都，父来可以有人赡养了，父亲却又先逝了。吴芳吉心中真有一股寡亲少友孤独无助的悲情。

吴芳吉到学校的第二天，见到校长张澜（表方），並庚即上课。据

于 1931 年毕业的赖高翔（名鸿翻，字高翔，四川省简阳人。解放后任教于王恩洋所办东方文学院。八十年代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回忆：“先生到成大第一堂就是我们的课。我们看见教务长吴君毅先生领了一位身材不高，架深度近视眼镜双目炯炯有神的教师进来。介绍说：‘这就是吴芳吉先生。’大家肃然起立。行礼后坐下。先生反向黑板，挥笔如风，写下‘佛云不说，不可说。子曰，如之初之何如之何，’两行大字。然后面向学生，开始讲他学诗的经过。”赖高翔还说他课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记吴芳吉先生学诗始末，还在什么地方发表过，对吴先生的印象很深。他说：“有人问我吴先生教诗的情况，我说八个字的评语：就是‘自述身世，愤惋欲绝’。”[3]一堂课下来，能给学生这样的印象，收到学生发文以赞，足见为师之高妙。吴芳吉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此校规模简陋，不如明德中学。”[4]接着在 1927 年 10 月 1 日给刘弘度、刘柏荣的信谈到成大的情况：“学生以信仰不同，亦有三派：曰社会科学派，曰三民主义派，曰国家主义派。各派所张标语，莫不曰：‘一校之内，不容两种信仰。’实则固有三矣。”吴芳吉认为，“论蜀少年本质，率皆聪明亢激，兼南北民性之长，文学尤其所近，不费唇舌，可导之入于高深之境。”[5]吴芳吉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许多学生要求他去上课，很快他每周的课增至 20 课时，他说：“吾所以愿如此者，以蜀中贤师太少，或有学问而无道德，或有道德而无志气。吾欲为之作一榜样，使知今日之中国，亦有力思自勉于学问、道德、志气合一之人。”[6]

成都大学是在成都高师基础上分出来的。“五四”以后，高师经过

吴玉章的整顿和改革，聘请了一些有真才实学和革新思想的教师。1926年张澜接任成都大学校后，有意效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方针“兼容并包”，“既注意到‘蜀学宿儒’，更欢迎像吴虞、吴芳吉、李劫人这样的新派人物。”[7]张澜是主张学述自由、思想自由的。这符合中国第三次思想活跃时期的客观要求，不过，到了这时，即在蒋介石1927年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厉行法西斯统治的时候，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已经受到了限制，能坚持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有了另一种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保护进步思潮有表达空间的自由，特别是这里暗含了允许共产主义传播的自由。“当时成大教师中，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都有。既有国民党人熊晓岩、张铮、曹四勿、黄季陆，也有共产党人杨伯恺，还有国家主义派的何鲁之、李璜，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四川的著名人士。”[8]不但如此，张澜还不顾顽固守旧派的反对和军阀的威胁，允许学生中的三派同时并存，自由争鸣。这三派是：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国民党的健行社，国家主义派的惕社。在这年三月，张澜还同意三派同台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当天参加演讲会的有成大的教授、学生、社会知名人士以及校外师生一千多人，张澜亲自到场。最后上台演讲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社请来的刘愿庵（中共成都特支书记）。他客气地质疑不讲反帝反军阀的国家主义，怎样才能使国家独立？而对健行社请来的杨吉甫教授讲的“只有三民主义才合国情”，首先予以肯定，说“是对的！”接着发挥道：“我想这个三民主义，恐怕应该是三年前孙中山先生讲的新三民主义，是要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的三民义……”刘愿庵刚讲完，张澜

校长立即起身，带头鼓掌，连声称赞：“讲得好！讲得好！”整个会场也跟着响起一阵掌声[9]。这就是张澜校长提倡、引导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不过事情也有另一面，那就是造成学校人员的良莠不齐，连托派的叶青也得以栖身于此。在我看来，中国的第三次思想活跃期，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逐渐被法西斯“围剿”而变得沉闷、死寂，而慢慢地结束了这一时代称位。

吴芳吉在这样的气氛环境中从教，自然也会受到具有各种不同思想观念的人的品评、关注，甚至于还有慢骂。吴芳吉当然也有自己的主见，去追求他认同的理论。后来，他就在杨伯恺教授处读到《共产党宣言》。据赖高翔回忆：“先生在学校对于年轻的教授，如蒙文通、彭芸生、刘监泉诸先生，都很融洽。对老年的似乎不那么好。他曾经在教室内谈过向先桥（即向楚，当时正兼任教育厅长，引者）先生批评他是‘武秀才，勇于为诗’。吴又陵先生也因为他把邱逢甲来和屈原陶潜相提并论，很不以为然。说邱诗连邵青门都比不上何说屈陶[10]。”或许人们并不完全理解吴芳吉论诗是重诗人合一的。诗好，人不好，不就成了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了吗？邱逢甲乃民族英雄，他的诗是言民族大义的，不是花前月下的雕虫小技。

1927年入读成都大学预文科的黄光时，正好受教于吴芳吉，1931年冬，黄因“九·一八”事变自北京返家，当时吴芳吉正执掌江津中学，邀黄共同治理津中。黄回忆起这段与吴芳吉的师生兼同事情谊，非常兴奋，他既敬仰先生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称颂先生的“旧瓶与新酒”，更赞扬先生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说：“先生在成大

任教时，于授课之暇仍勤于进修，常到校图书室阅览各种文史书籍。”尤其使他感佩的是：“先生本娴于英语，……然亦兼学其他外语。我进修日语时就常见先生在学生座中听课。其专心致志或过于学生。”黄说，他和同学经常邀约晚间去先生家中，登门求教，论诗。而吴先生总会“热情接待从无勉强之态，而且总是严肃地为我们认真修改，给予适当的批评和鼓励。”黄光时特别谈到吴先生批评他的诗有“花月痕”习气，“不是学诗的正路”，指出应该从学李、杜入手。这可是生动的以德化人。黄光时说受此教育，影响很大，他在“九·一八”时写过二首七律发表于北平报纸，吴先生特别称赞：“君诗中‘书生笔下余肝胆，壮士城头弃甲兵；’与‘独怪西南坚壁垒，可怜东北好河山’两联大是好句。”[11]学生感恩溢于言表，先生宽慰勤于担当。我们知道，吴芳吉在拂袖清华，从宜昌回四川的木船上读了不少的书，其中就有《花月痕》，没想到在这里，起了这么好的作用。需知，为师者是应该有广博精深的知识功底的。吴芳吉没进过大学门而能站稳大学讲台，是有大量的书籍作为台阶的。1932年吴芳吉去逝后，家人把吴芳吉的藏书，赠送给他的母校聚奎中学竟有三千卷，其中有相当部分，有吴芳吉的圈点，批注笔迹。

黄光时还谈到一件当时成大的学生对吴先生的无理挑剔的趣事。黄说，有学生对吴先生的诗有意见，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一位名叫周辅成的江津人。说这个人“是个与巴金交往甚密的无政府主义者，常在大学墙报上撰文批评先生，言词非常尖锐。”黄说吴先生：“以学者的态度和师长的风范对待这种攻击，总是非常耐心地解答他的责难。

记得他的答诗中曾有句云：‘君心吾能谅，吾心君未谙’，完全是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这是作教师的应该有的起码的态度，然而又不是许多教师都能具备的。在教育上，常常是一些细微末节的小事，被教育者忽视，而损害教育声誉，损害教师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损害教育应有的成效，损害受教育者的成长。我们今天常用“细节决定成败”提醒人们要一丝不苟。吴芳吉则早在永宁中学时就宣布：“吾在此之教义，所日训于诸生者，为‘为巨无细，必负责任，无暗无明，不容苟且。’”[12]我们在前面已介绍了吴芳吉对姚生的教育，可知真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时光能启负心者。黄永时说，后来，周辅成转学清华攻读哲学，毕业后曾在几所名牌大学任教，“随着学业的精进，他对先生的思想言行逐步有了更深的了解，对自己当初肤浅而又粗鄙的批评深感内疚。先生逝世后，北京的江津同学会曾办专刊追悼先生。周君特撰专文，就此事深自引咎，言词诚恳而深刻，足见人心之自有公论！”[13]

第一期课业结束，吴芳吉回到家乡，去他的母校聚奎，为之撰写校史。不知怎么的，一股吴芳吉不再回成都任教的风，吹到学校。这可把校长张澜急坏了，一连写了四封信，恳求吴芳吉继续任教，言词之恳切，情意之真诚，也只有如张澜这样的大儒方能著就。张校长的信，我们将影印附于书中，这里不占篇幅了。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当时吴芳吉任教的两个班的学生也给吴先生写了挽留函，而这封函件的起草者正是赖高翔同学。他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大家请求吴芳吉继续任教，得张校长的同意，挽他再来。“信是我主的稿，原文已不记得

了。只记得先生的回信有几句话说‘蜀风轻易，淫泆、柔懦、褊厄，两汉至今不易。然明敏豪华，可为之资也。’”赖高翔说：“先生讲杜甫诗出了一些研究题，颇有意思。我已不太记得了。大约有杜甫与孟子、杜甫行踪图、杜工部年表、杜诗地名考等。先生又提倡文字系办个刊物。当时同学很多人投稿。我素来不爱发表自己作的东西，中文系的人，大概除了我以外，都投了稿。但先生却主张不须选择，全部刊载，取名为文学集刊。”吴芳吉在课堂上“只要先生讲授，在坐学生固然欣欣忘倦；教室外的人亦流连不去。”而在课堂之外，又为同学搭起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想想看，有这样的好老师，谁又舍得他离开。看看他们给吴先生的信是怎么写的：

碧柳先生席间：

函文不奉，诲言良深，蕴结比质校长张公，知前期返津，即谋东出，连函切挽，未荷俞允。逖听之下，五情震骇。蜀于中土，向称奥壤，自文翁倡教，相如作诗，余韵所加，渊云崛起。自时厥后芳躅，遂隳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迺清以丁公为督，王甫西来，一时蜀材蔚起，胜于东南。虽迹莫知所底，即张公于本系厝举，亦复一切停屯，切俟规施。

先生一日之羈迟，即生等一日之荒废。惠而好我，深望，剑及履及夙驾西征。敬叩

时绥

国立成都大学本科一年级
中国文学系全体同学屯首

五月二十日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吴芳吉初到成大大时，他的感受。在1927年重阳节，吴芳吉给母亲的信上说：“男女生八百余人，真欲求学者不足十分之一，其余皆有党派，心不在书，教者学者于是彼此敷衍，不能认真。此种学校完全未入轨道。平心而论，实则误人子弟。”[14]在给他的挚友刘弘度刘柏荣的信，吴芳吉写道：“文科课程殊无条理，无标准，今已办至大学二年，读《经史百家杂钞》，犹未毕事，此则任令东北诸生来此教，绰有余矣。”[15]面对这样的学校状况和学业程度，吴芳吉该怎样办呢？他在给母亲的另一封信上表示：“男信以男之精诚信义，必能使之感化。”又说：“亦有力思自勉于学问、道德、志气合一之人。”[16]皇天不负有心人，吴芳吉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他在给妻子的信上说：“吾每周有课十三时，共教五班。其中两班有女生十余人。吾在此颇得诸生信仰。”“在华西大学仅教二日，竟使其沉沉暮气一变而能生动。”[17]伟哉，吴芳吉：仅仅只有一个学期的时间，真不愧为好教师！真不愧为教育家！

吴芳吉为了报答张澜校长的信任，为了不负学生的深情，又回到成大上课去了。黄光时说的回答周辅成的诗句，实际是在这期吴芳吉的一首“献骂我者”的诗里的句子，只稍有差错。吴芳吉的诗，是这样的：

献骂我者[18]

骂我者多，莫凶于蜀。扞烛扣盘之见，浚井完廩之心，恕己量人，积习成性。维

摩诘有言：“菩萨之病，由众生起。众生不病，吾病何有？”固知例有此事，不必求实其人。

感君长骂我，信道以弥笃。
求疵注起居，使我行犹勖。
学校如传舍，师长可鞭扑。
男儿非枉道，那得不危辱？
如君意气矜，只需一转轴。
黑夜顿光辉，苍生皆骨肉。
俚语自丹心，句句可呈佛。

大道不须寻，恒人自觉深。
欹斜原往古，陷溺诘如今？
君心我能谅，吾衷君未谙。
为君一言语，愁余几酌斟。
犹复遭君怒，汹汹如雨淋。
雨淋岂不可？终伤君德音。
与君虽路人，君心即我心。

挞我不还手，骂我不还口。
誉我未为多，毁我岂能久？
几篇今幸留，旦夕伤覆瓿。
我乐性天居，君逐潮流走。

去住隔云泥，虽毁复何有？
我非人类仇，我乃人类友。
焉待告君知，恐君终惭丑。

浩劫空千古，狂澜动九垓。
汉学成枯髓，清吏半奴才。
新邦多丧乱，礼乐犹尘埃。
本根摧已尽，欧风乘我衰。
政俗交加变，人禽杂沓来。
兰芷为萧艾，谁云有好怀？
何以答君毁，忠恕与矜哀。

文章自有真，谤议徒为扰。
李诗投厕深，韩文曳碑倒。
迄今千载余，不曾一字少。
吾行未足观，吾言未足宝。
行鲜苦言多，工夫犹外表。
愿君进勃蓬，愿君怀高邈。
胜义泯冤亲，君好亦吾好。

吴芳吉在这里用了一个“献”字，从内容看，这并非褒字贬用的反语，没有讥讽的意思，而是奉劝，是作者以谦恭的态度，来表明平等交流的真诚愿望。它与“答湘潭女儿”、“寄答陈鼎芬君南京慰其升学之失意也”、“答西北大学讲师希士脱克夫”的“答”字，基本上是

一个意思，是就涉及当事者的某些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启之于思，开之在心，律之在己，愿之共进。因此才有“感君长骂我，信道以弥笃。求疵注起居，使我行犹勗。”才有“君心我能谅，吾衷君未谕。”才有“扞我不还手，骂我不还口。誉我未为多，毁我岂能久？”才有“何以答君毁，忠恕与矜哀。”才有“胜义泯冤亲，君好亦吾好。”吴芳吉本其圣德化人的宗旨，施教于崇拜者，毁誉者，长者、幼者、师生、朋友，真不愧为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吴芳吉在成都大学受到校方、师生的欢迎，绝不只是课上得好，自从他任中文系主任过后，在教学改革，学校管理上也作了有口皆碑的贡献。比如，不效以文言白话为标准的“之极”作法，只认白话答卷的考生，不阅文言答卷。比如主张明析各学科的任务，“不借文字灌输新知”。比如主张“讲而兼导，读而兼作，体而兼用，中而兼西”。比如主张弃欧美三角几何之“混合”教法，实行“分”授。比如主张英语学习多读多看，先求记忆，再自理解。比如强调高低年级讲授方法应有区别。比如主张按年级递增外语类课等等。已有诸多论及，不再赘述。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吴芳吉营造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环境，他的教学工作越来越顺手。这时他腾出时间整理了他集下来的诗稿，在师友的帮助下以《白屋吴生诗稿》命名，出了他的诗集，还写了一篇可说是总结一身的“自序”，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和精神财富。我总觉得读吴芳吉的诗文，犹如沐浴在广袤无际的神州大地，享受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精髓的洗礼。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激情涌动，悲乐

同行。又似置身于深奥精微的知识宫殿，饱尝中华文化光辉灿烂瑰宝的滋养。毛塞顿开，耳聪目明；探颐索隐，荣辱与共。真乃人生一大快事！

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在“自序”[19]里都向我们倾诉了些什么情和什么理。领悟他对时代脉搏是怎样把握的。

吴芳吉说他是“悲剧中之乐观人”。这位英年早发，10岁就敢自写诉状，为父辩冤，13岁即被誉为神童，16岁竟冒天下之大不讳，不买洋人的帐，抗辱拂袖离开清华，23岁时以一首《婉容词》名噪海内外。当他33岁任教于成都大学，借集诗出版，回眸一生之坎坷经历，写下这篇不无悲怆之情的“自序”，确实非同凡响，耐人玩味。

“自序”开宗明义，坦言“余悲剧中之乐观人也”。为自己作如是定位的名人，似乎并不多，吴芳吉因何如此？他写道：“幼遭家难，长逢国变”，自六七岁后生活就受到冻饿、金钱、世俗、积习的困扰，不得不应对兵燹戎马、风尘劳顿、名利缰锁、生死关头等凶险境况，还要时时提防虚伪、蛮横、冷酷、圆滑设下的陷阱。吴芳吉面对生活的折磨，艰危孤苦，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而“无悔吝”、“无感伤”、“未堕落”，严守父母之教、师友之助，耻言功利、浪漫、豪奢、虚荣、唾弃、凶淫放纵、偷窃卑污。吴芳吉坦诚“以余不肖而余犹可救焉”，“明知无幸，故敢自牺牲。”“既足有为，故无须尤怨。”“礼义甲冑，忠信干櫓，吾将持此以永与斯世战争！”吴芳吉对他的自我评定，有一个简明的注释，他说：“所谓悲剧，自断此生之必无幸也。所谓乐观，自信此世之终有为也。”

吴芳吉面对的社会丑态，是当时的生活现实，客观现象，是同龄人都会面对的，概莫例外。只是会因人的地位高下、权势大小，财富多寡而感受有异；还会因人之思虑愚聪、情志指向、处世恭随而不同。

这些社会怪象，不过是如奔腾不息的江河泛起之沉渣浊水，漩涡暗流，而非巨流之主体、本质。而对于当时时代之脉搏，社会之走向，反映在个人，犹如他所言，谓之“身世之荣枯，理想之通塞”；反映在国家民族，则是“国步之夷险，文明之隆替”。吴芳吉说这是此后之事，他还不能预测，而只能自信自己必终有为。

其实，吴芳吉对当时的时代脉搏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这如他所言：“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

有意思的是吴芳吉用“悲剧”来说明自己的处境，又用“乐观”来否定悲剧境况，认定自己“终有为”。这是说，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决定人的命运的是自己的作为。要以战而必胜的勇气，去争得有为，享受乐观，这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仔细想来，什么是悲剧？市面上通用的工具书是这样说的，“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点”。这是作为“剧”解释，还有作为“词”的说明，“是比喻不幸的遭遇”。笔者以为就词意来讲，吴芳吉说的“悲剧”，应该是后一层意思；而就其剧的定性看来，吴芳吉说的“剧中人”又应该是前一种解释。那么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吴芳吉没理解作为文艺专用名词的“悲剧”内涵呢？还是吴芳吉有意借之痛陈自己的不幸，亦或张显自己的有为呢？

让我们追述一下历史。在西方戏剧史上，一般认为悲剧主要表现主人公所从事的事业由于恶势力的迫害及本身的过错而致失败，甚至个人毁灭。

我们知道，吴芳吉经历的种种不幸，如父遭诬害，吴芳吉 10 岁独自行赴渝救父，16 岁在清华留美预备班抗辱离校，在北京受尽白眼，步行到宜昌，讨够了购买船票的钱，才回到四川。23 岁在上海以其世称白屋体诗的《婉容词》投入新文化运动，却遭“新”、“旧”两派夹攻，甚至引来挚友的非议。30 岁任教西北大学，身陷军阀混战，围城达二百多日，命悬一线……已足见吴芳吉遭遇之凄惨。然而，正是吴芳吉经受了这等逆境，感受了世事之恶劣、怆凉，有了切肤之痛，才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呼号于世人，施教于学子，报恩于社会。趁任教于蓉集册面世，其“有为”之功德，世人自见，无需多言。

吴芳吉没有被“毁灭”，也无法“毁灭”。他之“不幸”，正是铸成他作为伟大诗人和教育家的客观条件，也是激励他不断奋进而终于有为的客观因素。客观环境，无论好坏、善恶，均是在人出生前形成的，大凡有为之人均非回避之，报怨之，而是承认之、迎战之、改造之。迎战会有胜有败，改造会有成有失。然无论胜或败，成或失，均会有所收益，均是“有为”之证。在这里，关键在于个人主观方面的操守。一方面，吴芳吉“自信”“有为”，有了“有为”的坚定意志和明确目标；另方面吴芳吉心中装着的不只是“身世之荣枯，理想之通塞”，更有“国步之夷险，文明之隆替”，有了“有为”之坚固根基和不竭动力。这就化“悲剧”而为“有为”，成就了一翻享誉世界，流芳于世的伟业。

终于“悲”未能成“剧”，而只有“有为”；或许，可以不那么贴切地借用《淮南子·原道训》之说：“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

吴芳吉正是在一生中遭遇无数厄运而自立不倒，并成就伟业，才倍受人们的尊敬、推崇的。

关于悲剧，自西方戏剧史以来，有过诸多的专家学者论及。笔者最感兴趣的有如下几则，一是黑格尔之论，他认为，悲剧的特性源于两种对立理想和势力的冲突，最深刻的悲剧性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而是善与善之间的冲突。这破除了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无怪乎黑格尔是辩证法的大师。在吴芳吉遭遇的冲突中，比如与吴宓，谁能分出孰善孰恶？！黎汉基的“两吴生传”，我看它是扬吉抑宓的，但也有人不这么看。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用他那犀利的艺术语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就吴芳吉的一生而言，或者迄止他写“自序”时，我们看不出被“毁灭”，而就其成长过程中的重大遭遇，比如说在清华抗辱，或可说他的留学梦被“毁灭”了，但更重要的是此事却表现了他不畏强权，不惧洋教的民族气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之延绵不断，不正是与民族气节的光辉有关吗？历史不能假设，事已至此，个人留学是小，维护中华民族的气节是大。

恩格斯对于悲剧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悲剧是由“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致裴·拉萨尔》）。吴芳吉处于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三次思想活跃时期，处在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大潮之中，新文化运动之于中国，当然

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这种要求是反映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它的实现非一时一人所能担当，个人之功过，只能融于其历史长河才能作出判定。就吴芳吉而言，他对新文化运动既是赞成的、拥护的，又是参加的、投入的。在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而搏击的过程形成的“合力”中，无论居于平形四边形的任何一边，都是历史前进的助推者。吴芳吉是有功的，“新”、“旧”派的夹攻改变不了客观事实。吴芳吉坚持对“之极”说不，保持持中纠偏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出它的正确性，他是“有为”的，是一位大大有为之人。

从上观之，我们说：悲剧是虚，乐观是实，不幸无妨，有为伟哉！

吴芳吉还说他是“笃信性善之人”。

吴芳吉为什么能成为一名乐观而有为之人呢？他自己回答说，“余乃笃信性善之人也。”他进而阐释道：“惟性之止于善也，故无不可以有为之时，无不可以创造之地，无不可以修明之政，无不可以教化之人。”他认为，“古圣哲之用心，无不在于扶善制恶，以存人之本性。”吴芳吉写道：“君子小人之异，无非善恶之战孰胜而孰败耳。”这种善恶之战的胜败，“在其一人，其人之圣愚系之”。“在其一国，其国之治乱系之。”他断定，“推之至于一民族、一世界、一文化之隆污兴废，莫不皆然。”

吴芳吉以简明的语言，集古今中外先哲之论人性，坦诚自己为什么是“笃信性善”之人。鲜明地宣示自己传承先哲精神之精华，言明他的性善选择。倡导善性，与违背善性的主张和行为作斗争，求得个人之高洁，国家之倡盛，社会之大同。

吴芳吉之信善，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他个人处在社会动荡的大环境，其遭遇之险恶也如上文所提及，他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对国家的安危忧心忡忡，对人民的苦难痛心疾首，他把这一切简单地归因于“恶”，宣示要扶善以制恶。

我们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与动物区分开来、最终脱离出来而成其为“人”，就是在与恶劣的生存条件的斗争中遵循弱肉强食的自然选择规律走过来的。《荀子·王制》记载：“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可是，人的义也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人”无“类”不能生成，“人”的“类”的存在也是在与不利于“类”的巩固、发展的恶行的斗争中实现的。人们看到“人类”的不同群体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进行的争战中，也存在“善”举与“恶”行的区别。我们可以说，这种生存的自然法则，就是人们善恶意识产生的客观条件。古今中外的先哲关于善恶的诸多论述，正是源于他们生存的客观环境。先哲们之伟大，在于他们梳理了在人们头脑中存在的意识，用一定的条理表达出来，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虽然表达的意旨是同一的，但它又因先哲们所处的具体环境而有所区别。所谓“意”相同，“音”有别，“字”不一。比如孔子讲“仁”，墨子讲“兼爱”，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西方有“快乐论”、“功利论”、“禁欲论”，柏拉图主张的是理念论。荀子讲“性恶”，并非他不讲“善”，他是说人性恶，所以才要教人为“善”。柏拉图说得更玄乎，他受制于埃及的种姓制度，提出世界是神按照“善”

的理念制造出来的。理念分为三等，人也分为三等，说贵族、哲人是金子做的，天生的“最善”；保卫国家的战士是银子做的，属二等，从事生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是铁做的，属于最低等（在柏拉图的时代，农奴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不算人）。两百四十年后我国汉代的董仲书为适应封建等级制的需要，提出“性三品”，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

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材，教授学生学习六艺。培养道德情感和意志，使知上下之则，奖善抑恶劝戒其心，懂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除去邪念和浮躁情绪，发扬德治使民心归附。吴芳吉传承儒学精灵，一方面，认为“为善”才能“至公”、“至远”；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性非“性所禀赋”，而是“习所养成”。人性是可以改变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所以能够做到“扶善抑恶”！不难看出，吴芳吉是认同荀子学说的。他说如果不能做到人人讲善，人人行善，以善教化于人，“则人类痛苦永不可除”，“谈学言政。亦必终无是处”。吴芳吉作为教育家，他在为自己的诗集作序时，怎么会忘了治学呢？他说，只有解决了社会的善恶，处理好关于人们的行为准则，关于彼此间的义务和人们对社会、对国家等的义务，也就是解决好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荣誉和耻辱等，要用以治学，造就知善、信善、行善之人，充分发挥“善”的社会功能。

吴芳吉的性善，是其一生彰显的。有根有据，有情有理，表里一致，名符其实。

吴芳吉誓言：披榛辟路使诗之演进无穷。

古语有言，“诗言志”。志者，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之抱负也。吴芳吉用他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诗歌，印证了古人之诗论，他深情地说道：“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以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至时代之所产生之诗，要亦不能自外。”接着吴芳吉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让人一目了然：“譬之乘火车者，既已在车，无问其人之欲行不行，要当载之前趋，欲罢不止。”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文随势变，诗言势音。他说人处社会形势之大变，明智者当然会顺应其变，与时代一起起舞；迟钝者或不想变者或抗拒者，被拖着也得变，迟早之事也，死硬派毕竟是少数，被时代抛弃也就在所难免了。吴芳吉又用人生之常识着比，说衰老必然倾颓，娇逸使人歆慕，这也是无法阻止的。

接着，吴芳吉笔触一转，从历史的演进、政体的变迁论及体制之兴废，揭示文化教育应跟进之使然。进一步说明人的思想生活、文学艺术之必然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道理。他说：“大抵体制之始也清新，其末也陈腐”。这和老子讲的“物壮则老”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是一致的。生、老、病、死围绕着我们不停地循环、更替，“物壮则老”道尽了天下众生生长、发育、死亡的法则，这既是自然界动植物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事物发展的哲理。我们寻求事物发展的过程，应尽量让其处于生长期，不断地吸收生命之源，使之不停地处在向上、进步状态，这大概就是诗随时代而获新滋的道理。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会采取一些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关注民生的政策，而逐渐步入繁荣，久而久之，统治者以为江山稳固了，不在进取，安于享乐，沉迷私欲，走向腐败。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可他们又都走向了反面，最终垮台了。看看“贞观之治”。贞观 11 年（公元 638 年），太宗垂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答：“草创为难。”魏征答：“守成则难。”太宗听后，先从他们各自回答的个人原因做了肯定，说：“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娇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难。”然后指出：“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创业的成就是已经过去的事实，人皆知之；保住过去的成就，则是需要今后慎重对待的事。两相较之，守成更难。为何？就是必须为以往的成就增添新的业绩，不断前进，否则停止了，就会如逆水行舟，后果可想而知。其实，创业的艰辛是属于阳性的，好像登山，要达到的目标已很明确，只要一步一步地攀登，就会渐渐地接近山峰，最后到达目的地。然而一旦登上顶峰，那种成就感、满足感、内心的喜悦，是无法言喻的。可是治理国家，不能到此为止。当你爬到山顶上，向下一看，尽是悬崖峭壁，创业者任重道远，必须小心翼翼，才能平安地返回平地，也就是说爬到山顶之后，不能停在那里享悠闲，还需继续努力作新的“攀登”。关键在于要及时将“创业体制”转变为“守成体制”，谋求永恒的持续的发展，如果有一天停下来了，陈腐了，也就到了走向反面的时候了，这大概就是吴芳吉揭示的历史现象“大抵体制之始也清新，其末也陈腐”的道理。借也说明诗文也必须随时势的发展而变革。吴芳吉进而结论说，这就是“由常转变，变又转常”的规律。

吴芳吉点破了一般的历史现象，该说到他自己之所爱了。他说，就诗词之发展来看，中国之称为诗的国度，中国文化几千年没有断裂，延绵发展而代代创新，就是因为每每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的知识精英总能“除旧布新，披榛辟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吸民众之气息而滋养，而使“诗之演进无穷”。吴芳吉说他自己对诗之“历代体制，不轻弃之，不重视之，但因我便而利用之。”同时肯定“此体制之不能不变”，指出“民国之诗，当有民国之风味，以异于汉魏唐宋者”。因此，才有吴芳吉的《护国岩词》、《婉容词》、《两父女》、《笼山曲》、《巴人歌》、《日本占领我沈阳》、《仇货买不得》等等，给中国的诗坛带来一缕缕清新的气息，一股股奋进的浓情。接着，吴芳吉指出古诗界之弊端，重申诗之非变不可，并回答了他在前面提出的“谈学言政”如何才能有所作为。他说：“所谓学者，学以高尚其志气、学以开拓其心胸，学以仁民爱物，学以明体达用而已。”并从《三百篇》以降，灿烂文明之花“开而谢，谢而开”，传播海内外，叮嘱按中国文化之源《周易》之言“志强不息，厚德载物”，顺应时代潮流谋变，“以救诗亡”。

吴芳吉辟诗新路，倡教之新声。矢志以诗为民，以诗报国，以诗育人，让诗之馨香无穷！

吴芳吉对外来文化，主张“汲引而同化之”。

吴芳吉在多视角地论述了传统诗词之非变不可以后，紧接着论述了他称之为的“变之道”。“道”者，规律也。也就是说吴芳吉从他把握的时代脉搏出发，针对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同主张，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念并践行的思路。

吴芳吉归纳了新文化运动中对古文化的不同主张，“有欲连根拔去之者，有欲迁地另植之者，有欲修剪枝叶使勿为恶败累者”。並一一加以剖析。在今天看来，似乎无需多费笔墨，世人已有基本共识，不过这里涉及的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碰撞，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应如何扬长避短，纳新拒谬，不犯“之极”之偏，却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吴芳吉是在其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言理的，有理有论有作品。不过，即使如此，也还是有那么一些鸵鸟式的人物，睁眼说瞎话，还有一些认识不及而不理解者，如吴芳吉之知交就对名噪一时的《婉容词》有过错判。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人，当时，除了极少数“学者”，如跑到反动营垒去做高官之流者外，大多数还是一个认识问题。不少“全盘西化”论者不是又改弦易辙了吗？然而，这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是到了今天——吴芳吉写“自序”后的80多年的今天，不是也还有人在宣扬“全盘西化”吗？而且，仍然是并非“全盘”，而是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西化”。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有趣的现象啊？！

这里，让我们回头看看历史。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运动。用吴芳吉的话说，那是“旷古未有之大变”。这场运动可分为初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初期新文化运动兴起于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五四运动前后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后期。两个阶段又可通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发起了批判封建旧思想旧文化的“启蒙运动”，这只是中国近代以来追求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内”反对封建主义。本来，封建主义制度已经被辛

亥革命推翻了，但浸透在人们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也是导致辛亥革命胜而复败的主要原因。而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另一方面历史使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亡图存，基本上还只停留在口头嚷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西文化的论战中，有人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他们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化，与“国粹”彻底决裂的同时，主张“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甚至说“极端的崇外都未尝不可”，鼓吹对西方文化“整个接受”。可以说，针对“文化复古”和“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的提出，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文化，走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发展的道路。的确强烈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文化，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动。这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确实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除陈独秀等从西方文化派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外，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者，不仅对传统文化继续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且对西方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也持否定态度。此时的“全盘西化”实指全盘资本主义化，而反对西方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全盘西化”的影响，至今还有新的表现，在“全球化”的幌子下，妄图改变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的确值得警醒。“全盘西化”论者不懂得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不懂得并非中国的封建文化才有糟粕，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也是有糟粕的，而且更不懂得或是欣赏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反动同盟。这就注定了

“全盘西化”论者的不得人心，注定了“全盘西化”论的走入穷途末路。

吴芳吉主张对外来文化“与其怪而异之，不如汲引而同化之”，否定了“移植论”和“拔除论”。他说“新会梁君有言，自古吾民族之与他民族相接，其影响于文学，辄生异彩。”吴芳吉撰“自序”这一年，正是梁任公辞世之时。梁是中国“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与吴可谓忘年神交。吴芳吉早在1925年写的“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里一连举了当时见诸报刊的十多首诗为例分析其真伪，唯独认定梁君的《志未酬》是标准的“真诗”，当任公读到吴芳吉的《哭柳潜》时，喜出望外，立即函告吴宓称“介绍而友之。”只因吴芳吉奔丧返川，未能及时读到任公的佳评和美意，成为终身遗憾。这是两位素未谋面的文友。吴芳吉在“自序”里专门引证任公的见解，是否有意报其知遇之恩，亦或信笔写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相通的。

吴芳吉还以国内晋朝时期，北方匈奴等五个少数民族南下中原，带来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发展，以及国外的佛教文化传入我国而被吸纳，来印证任公的见解，间接佐证他自己的观点，吸纳不同的文化精华于我，既不会丢掉根本，又能“有斐于华实”。吴芳吉说他的诗集，正是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10年以来的诗文变革主张之见证。

史学家说，历史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反思。时间是公正的，吴芳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为，定会随文化反思而张扬！

吴芳吉在以他的方式论述了诗之变，以及变之道后，接着从纵的

贯通积淀和横的互补吸纳，经纬相交构成的文化全景图像，简析古今中外诗史之脉络，重申自己创作之根本目的，和论诗之意旨，只在于“传述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

吴芳吉说：“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他认为，凡是为历史证明的蕴涵于具体文学艺术形式中的共有“原理”，中华灿烂文化之灵魂，是不应该“违弃”的。就诗词而论，比如在形式上“遣韵必谐，设辞必丽，起调必工，结意必远”，是有为的历代诗词大家创作实践习以为常显露而形成的自然之则，是必须遵从而坚守的，不应该借变革而“破坏”。在内容上，吴芳吉秉承历代中国诗人关注黎庶之高尚情操，崇高精神，托志于自然，倾心民众，抒怀于抱负，昂扬进取；寄情于河山，热爱祖国，着笔于战乱，高歌统一。同时，他说要借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之诗以改良吾诗。

吴芳吉从古诗名家笔触所及关涉之广狭，影响范围之高下深浅，价值取向之公私群孤。论述诗之客观作用和铭刻于世的根源。他“以唐诗言之”，分析道“温李诸公，自身之写照者也；元白诸公，他人之同情者也，李杜诸公，世界之创造者也。”

吴芳吉列举的三类大家，是很有讲究的。中国是诗的国度，却以唐最盛，以唐为例极具代表性，典型性。唐代历时不到三百年，却留下将近五万首诗歌，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有五六十位，是历朝历代所不及的。唐之孕育出这么多好诗，这么多伟大的诗人，又是同唐朝之盛况分不开的，如“贞观盛世”。人们知道，盛唐时势所及，国土东北

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国家的盛衰牵动着诗人的灵魂，诗人用吟韵光耀着国家的文脉，是国家和诗人的律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吴芳吉列举的温庭筠、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三组诗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关心现实政治和民生。而他们的区别，则在于关注现实的深广度和个人与之相关的自觉程度和紧密程度不同，而且他们的诗歌的表现形式又各有特点。分别来说，温李以反映个人情感齐名，他们的情诗都很不错，温则更多表现个人的沦落，虽同李齐名，却大不如李。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虽有颓然自放的心绪，也有既近时短，更当奋进的暗意，不然怎么能历久为世人唱诵。元白都是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杜甫的自觉推崇者和继承者，他有句名言“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也是吴芳吉推崇、传承的。元稹践行反映民间疾苦，为政治服务。两人相较，在诗的成就上，白更胜一筹。李杜是人们最熟悉的，两人虽在诗坛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别区，然而这只是就诗的风格而言的，就其诗的内容来说，则都是“济苍生”、“安黎元”、“为社稷”而呼号。杜甫，人称“诗圣”，诗名“诗史”。吴芳吉之所以说李杜是“世界之创造者”，想来那更是因为杜甫的如下高论，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就是在继往开来、相互借鉴、融通中前进的。否则，断而无继，阻隔不通，则绝无发展，绝无前途！

吴芳吉在这里论诗，却把社会主义提了出来，是很值得思索的。有史料说，吴芳吉正是在成都大学任教时，从友人处读到《共产党宣言》的，但是吴芳吉认知“社会主义”却早于此。那是1920年24岁时在《谈诗人》里针对社会舆论写到，“社会主义，其所以打破贫富阶级，不是望社会中人人受穷，乃是望社会中人人享福。”吴芳吉在这两处提到的“社会主义”，显然是从文化视角出发的，也即就思想意识、文化心态而论的。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关系国家”，是说要以社会主义的眼光审视国家的安危，判定诗的“高低贵贱”，要以社会主义的文化心态关注最广大的民众。人们有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素养，胸怀就开扩了，志向就远大了，眼光就深邃了，思想就更敏锐了。吴芳吉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文学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应该追求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也因此，我们曾说过吴氏呼号的“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既是他写诗、论诗的原则，更是他的人生追求，他的价值取向，他的人生观的诗意表达。所以他在这里说：“余既生于中国，凡与余之关系，以中国为最亲也”，他决心“传述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注重躬行，“不必高谈义理，但求为人为文之归一致。”

吴芳吉写中国之诗，韵中国之事，做中国之人，倡中国之精神，与中国同在！今天，吴芳吉定会在冥府与学子一道高歌中华之崛起！

吴芳吉的诗稿是在成都大学任教时出版的，这是他虔诚诗教的大手笔。他朝思暮想的是“化民成俗”。这是他奉献给社会的灿烂奇葩，文化美点；这也是他奉献给莘莘学子的知识宝典、精神食粮。吴芳吉不愧为伟大的诗人，不愧为卓越的教育家。他为何如此有为呢？他答

道：“余每自喜，生长中国，侧闻孔道，不知前生如何修结。又值世界交通、生命扩大……俾余得以周知人类感情之变，籍探世界文化之根，此尤自古诗人未有之幸遇也。”这样的坦诚阐述，客观上已经严正地批驳了那些轻率地说他守旧、保守的言论。

吴芳吉人格之崇高，吴芳吉有为之所在，就在于他把她的一生成就，都视为顺应时代脉搏之使然，而他自身只不过是乐见于斯矣！

1927年，蒋介石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鼓励下，于4月初在上海召集有吴芳吉批判过的原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曾石参加的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全国形势大变。蒋介石的一这行动并非一时之偶然，他背离孙中山修正过后而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言行早为反动军阀嗅知。四川的军阀刘湘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在重庆公开反共，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杀害了杨闇公。随后，又于7月在成都无理逮捕了成都大学特支书记李正恩。虽然，在张澜校长的力挺下李正恩被无罪释放，张澜仍于7月24日以校长的名义出了一张布告，强调指出：“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而且还针对军阀迫害学生，健行社和惕社的学生助纣为虐，警告说：“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某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评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致见训于明达大雅之俦。”[20]虽然如此，就全国形势而言，一所大学校长必竟是势单力薄，或许这也正是张澜后来要组建民主同

盟的诱因之一。1928年，发生了“二·一六”惨案，包括成大6名学生在内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14人，未经过审讯即被枪杀。张澜校长异常悲愤，他不畏强暴，为死者开追悼会，伸张正义，并以“学府失去尊严，教育无所保障”为由，愤然辞职，以示强烈抗议。后来，经师生和社会舆论一致挽留，形成声势浩大的抗议军阀暴行的斗争。连刘湘也致电挽留，赔礼道歉。毕竟学校也是阵地，学生更需要培养，抗议已产生一定效果，最后，张澜还是接受了挽留。

在四川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吴芳吉也受到威胁，不过肇事者说他书教得好，不杀他。在这种情况下吴芳吉同在成都大学任教的川东籍教授沈懋德（巴县人）、吕子芳（巴县人）和彭用仪（重庆人），在他的住处（成都小福建营成大宿舍）商议。当夜他们以酒助兴，抨击时局，痛感中国贫弱。新文化运动后，人们探索救国之策，一时难于形成共识。一个重要根源是军阀乘机而起，战乱不断，百姓受苦，社会动荡。帝国主义趁机培植自己的势力，与军阀勾结，抢占地盘，操控中国政治走向，军阀控制财政，强征教育经费。对人才横加摧残，使一大批远涉重洋去欧美，或东渡日本学成归国的有志之士，满腔热血，走投无路，报国无门，感慨之余，一致主张要按孙中山的遗教去唤醒民众，早日在重庆创办一所大学，发展教育，造福桑梓，使川东青年学子不必远赴京沪就有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培养造就大批德智双全、威武不屈的人才，为拯救贫弱的祖国贡献力量。

重庆大学吴芳吉研究会的常务理事、重大校史办老主任程汝强方家作为主编之一编写的《重庆大学校史（1929.10—1949.11）》写道：“正

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庆学界、商界以至军政人士，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感中华民族濒于危急存亡之秋，自觉集合于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图振华夏、誓雪国耻之道。他们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抱着不同的目的动机，创办了重庆大学。”

要办一所大学，当然绝非易事，如何确立办学宗旨，如何破解社会质疑，如何凝聚人心，如何解决资金筹措，如何解决校舍、师资……等等，沈懋德、吴芳吉、吕子芳、彭用仪四位教授，利用假期返渝，凭着他们的学术地位，社会声望，遍谒重庆地方名流，绅士宿儒，得到老同盟会员、老教育家朱叔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校校长汪云松，以及李公度，温少鹤、李奎安等的支持。四位教授分工合作，进入具体的筹备工作，或操笔成文，或奔走疏通。经过充分酝酿，在重庆成立重庆大学促进会，在成都成立了促进分会。吴芳吉担负了筹备宣言的撰写任务。1927年7月29日《重庆大学筹备会宣言》草成，1929年8月2日重庆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吴芳吉是五十五位筹备委员之一。我们看看吴芳吉撰写的筹委会宣言都说了些什么。

重庆大学筹备会宣言

筹设重庆大学之提议，早在民国十五年。同人念兹在兹，所以一日未尝忘者，以西南交通散便之域，文化输入当首之冲，货殖素号殷邦，冠盖夸于列郡，当有完备弘深之大学一所，以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此盖全川教育发展应有之进程，与吾七千万人最低之需要，不仅一时一隅之计而已。乃有以城市繁华为言者。则上海、广州，固文明之先进，伦敦、纽约，亦庠序之中枢，宁

舍通都大邑而不居，适穷乡僻壤而有当？此不足为吾重庆大学病也。有以人才寥落为言者，则人才之聚，聚于事业，必事业愈兴，而人才愈至，未有事业不举，而坐待人才者。渝中素无大学教育，故大学人才不聚于此。成都所以较胜，即以大学滋多，有以安置人才之故。今使大学竟成，何患无师？有师何患无士？此又不足为吾重庆大学病也。有以经费无着为言者。则今之百政所费，谁为有着？诚欲先有鉅款而后兴学，则实现之期，河清莫俟。征之全国大学成例，何独不然。不闻款绌遂废之者，有人斯有财也。夫重庆富力，远过成都，开源取用，不止一途。或就国、省税款，酌请划拨；或就地方捐税，移转接济，按年递进，由少增多，数微则始易兴，时长则后易继。此亦不足为吾重庆大学病也。有以数量影响为言者。谓重庆创办大学，必有损于成都。实则即此数量，仍患不足。以视英、日小国，多寡何如？况大学成立，基于社会自然之需，不徒籍以润色鸿业。成渝俱有大学，正可相观而善，携手偕行，谋所以成德达才移风易俗之事。诎同业之相忌，实同枯而共荣，此尤不足为吾重庆大学病也。总之，重庆大学之应成立，有其需要，有其可能，已届时机，非属梦想。其款项之如何筹划，地点之如何测量，学制之如何取舍，黉宇之如何兴修，凡兹大任，所贵分肩，明知困难滋多，相期龟勉勿替。至于乡里先达，当代名贤，不忍蜀才之销声匿迹，事事求人；不忍蜀学之落伍后时，长此荒秽；不忍蜀中万千失学之青年，问津无路；不忍蜀之工商百业，无以长进决疑；必予惠助其始，乐观其成，加以教督而不我弃也。谨此宣言，统希明鉴。

中华民国十八年七月廿九

日

吴芳吉虽然是重庆大学的四位同倡建者之一，并且是重庆大学筹委会宣言的撰稿人，又是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可他却放下重庆大学的具体筹备工作，而回成都继续上课去了，直到重大即将开学招生行课，多次邀请、催促，才接受了重庆大学文预科主任、副教授的职务，赴重庆大学上任。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吴芳吉离不开学生。创建一所大学，不是三五个月，一年半载能成的。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同学生在一起，他育人的本性能答应他吗？他的诗，没人吟诵，他的生命的意义不是会受到损失吗？他说过：“我之生命就是诗，不能作诗，便是没有生命。” [21]讲台、学生，是他的诗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因为他不是一般的诗人，也不是一般的教育家，而是诗人、教育家融为一体的诗人、教育家。

其次，是吴芳吉对张澜的感恩之情。张澜一连四封信请他回去上课，不但给他本人写信，还给他的母亲、给他的挚友吴宓写信，还动员学生给他写信。是那么的情真意切，是那么的苦苦哀求。还在1927年冬听说吴芳吉下期不回去上课了，为挽留吴芳吉就许吴芳吉“种种优待条件：1、明年上期即添加薪俸。2、减少授课钟点。3、寒假内预支两月薪金。4、学校欠款三成，可以通融补足。” [22]吴芳吉又是一个为了朋友愿意两面插刀的血性汉子。他多次为了一句承诺，而不就高薪聘请。他怎么会不顾张澜的情面？重大不是还在筹建中吗？

第三，是因为有了前面两点，特别是第一点就成了问题的问题。

这就是重庆大学的建设所回避不了的，而必须依赖当时执掌军政大权的军阀刘湘，重庆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假刘湘之手创建重大，对吴芳吉来说，可说是权宜之计，根本在能建成重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依赖刘湘是建不成大学的。客观上也还有刘湘重视教育的条件。吴芳吉一身都在批判军阀，他的诗，批判军阀是一大亮点，他的爱国主义的一大表现，就是无情地揭露、鞭挞军阀。他吟诵过大军阀阎锡山，《白屋诗选》的选注者，因此批评吴芳吉反对军阀战争，不反军阀统治。那是因为当时山西社会较安定，阎锡山的本来面目尚未暴露，因为吴芳吉最关心民疾苦。重庆的三·三一惨案，成都的二·一六惨案，使吴芳吉对统治巴蜀的军阀，有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认识。对于成都的二·一六惨，吴芳吉告诉吴宓说：“军警半夜围搜各校，在成大捕杀六人，四川高师及他校捕去八人，悉予枪斃。”[23]他能到张澜那里去和学生们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他为建设重庆大学已经奉献了筹备宣言，奉献了可以永远受用的办学宗旨：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

重庆大学在建校八十周年的时候，由党委副书记肖铁岩教授（现兼任重庆大学吴芳吉研究会荣誉会长）任主编的《重庆大学校史（1999—2009）》结束语，有这样对历史的认定和对未来的展望：

80年来，一代又一代重大人始终秉承“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学宗旨，发扬“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精神品格，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构筑起当代重大人向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迈进的坚实基础，给予了实现新的更高的办

学目标的坚定信心。今天，站在这新的起跑线，重大人深感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一定要居安思危、戒骄戒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不断开创学校发展的崭新局面。

吴芳吉没有留下系统的教育理论，然而，他的教育思想却融汇在他的教育教学实践、学校管理实践之中，也浸透在他的诗词作品、文艺理论中，同时还充溢于他的大量书信、日记里，总是聚焦在“德化教育”这个中心上。这在本人选编的《吴芳吉论教育》一书[24]有较好的反映。我以为吴芳吉德化教育的核心是爱国爱民。如果用他“书民疾苦”的人生追求作为指导思想，来解读他为重庆大学制定的宗旨“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是否可以理解为：研究治国之术，造就救国之才，举业富民兴邦，德化社稷安强。如果从吴芳吉追求的人生目的、教育的目的说起，可否把十六字的宗旨换过顺序来理解：办学者和师生必须明确教育、读书都是为了“振导社会”，要使社会达到扬善抑恶，安定有序，明礼富庶，德邻国威。这就需要“佑启乡邦”，通过发展实业，广辟事业，扩大交通，繁荣山乡。要能这样，必须“造就人才”为保障，实行有教无类，知识公开，明辨义利，修齐治平。这就要充实基础“研究学术”，广猎天地奥秘，探源求真，与时俱时，为国为民。我还认为，吴芳吉的这十六字宗旨，是一个整体，目的，途经，保障，基础不能分开，四句话都是落脚在国家、民族上，只是侧重点不同。因为这个宗旨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所以直到今天它也是实用的，只不过它的具体内容会与时俱进地得到充实丰富。如果

我们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吴芳吉为重庆大学制定的宗旨，更可看出吴芳吉教育思想的精深；你看，宗旨的四句话，前两句“研究学术，造就人才”，这是从“学校”这个事物的存在、发展、变化的内部矛盾，也即内部关系，或说内因着眼揭示学校的本质的，或者说是揭示学校需解决的根本问题的，那就是：研究学术造就人才。没有这一条，学校就不成其为学校，那只是一些人凑合在一起的什么群体。而后两句话：“佑启乡邦，振导社会”，则是从学校的外部关系，或说外因着眼揭示学校的本质，或说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佑启乡邦，振导社会”。学校不为社会服务，与社会何关？学校为社会服务，是学校获得社会、国家支持的必备条件。没有服务社会这一条，学校就不能生存，更不要说发展了。这就是说学校必须处理好与社会，与国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这个外因，外部关系。吴芳吉离开明德去西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明德经济十分困难，处于难以维继之时，加之吴宓坚持吴芳吉应该教大学而不是中学，胡元俸得忍心割爱。这就是说，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灭亡，都是事物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毛泽东说：“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5]我们说吴芳吉的十六字宗旨是一个整体，从哲学上讲，不是更有理论依据吗！

吴芳吉在为建设重庆大学操笔之前，曾于1928年2月12日到6月，利用休假，应聚奎学校诚邀去讲演并开馆编纂聚奎校史。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为聚奎撰成包括《聚奎学校沿革志》《聚奎校名释文》《聚奎校旗释文》《聚奎园林志》《萧湘先生事略》《聚奎发起人程

倬云先生事略》《创办人邓石泉先生事略》《管款员周常昭先生事略》《书邓鹤年先生捐金事》《山长程绥仁先生事略》《山长程德音先生事略》《校长邓鹤翔先生事略》《校长唐定章先生事略》《校长夏风薰先生事略》在内的《聚奎学校史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自己意欲创建大学的抱负，以《建设聚奎义务大学提议》的形式，撰著成文。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这正好为创建重庆大学作了实实在在的理性准备。

吴芳吉的这个“提议”是要办“义务”大学，就是现在来看经济条件也还未充足至此，在当时真有点空想的成份。吴芳吉是这样说的，“今之大学，惟富贵人家所能入耳。”“贫苦人家有子弟在中学者，万般撙节，勉可支持”。吴芳吉一生关心“民疾苦”想到读了中学的贫困学生没有上大学的经济支撑，“不得不归于废学”，造成“人才耗损”。原来他的“空想”出自于痛惜贫苦学生之不能与富豪家庭的子女平等受到高等教育。他说：“夫所谓义务教育者有二解：一、凡人皆当受之教育也。二、学校不征取学费之教育也。前者学生之义务，后者学校之义务。”吴芳吉在天之灵如果知道我们国家今天已对大学里的贫苦学生采取了多方面的支助，不知会有多高兴啊！我认为，在客观上，聚奎义务大学的提议，似乎就是重大筹备宣言的初始草稿。你看，吴芳吉为他的义务大学定下的宗旨是：“本大学以实行知识公开，教育机会均等，辅助寒士研究各种高深学问及专门技能，以立己立人、建国救世为宗旨。”这里的“高深学问”是否可以理解为“研究学术”的雏形；“以立己立人”，这不是对人才的要求吗？虽然测重点有些差异，没有

“造就人才”那么明确；“建国救世”，似乎已经预示着“振导社会”、“佑启乡邦”，不会是过余牵强吧！我总觉得这件事情的因果联系确实是成在的，并非莫明其妙。你看，就在义务大学提议之后一年把的时间，有了重大筹备宣言，不能不让人有这样的联想！

重庆大学建起来了，吴芳吉还没在他亲手参与创建的大学上几天课就被家乡的父老硬拖回来执掌江津中学，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以他精心育人的操劳，把一所乱糟糟的学校归顺了，他也因过度的精力透支而过早地回归到生他养他的几江大地。

不知道，吴芳吉知不知道，江津上千人为之送葬，按你游聚奎九曲池时说的“我死后可葬于此，任听树声、鸟声、书声”。让你安息在把你造就成“神童”的地方。不知道，吴芳吉知不知道，成都学界、文界、政界、为你召开追悼会；不知道，吴芳吉知不知道，北京的江津同乡会为你办专刊追悼；不知道，吴芳吉知不知道明德中学也为你召开了追悼会。不知道，吴芳吉知不知道重庆大学庆祝建校八十周年时，宣示继续发扬你定下的宗旨：“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不知道，吴芳吉读没读道，与你一起创建重大时的彭用仪教授 96 岁的时候，在成都为重大校史的题诗：

浮图雄峙壮渝州，二水波涛天际流。

鸿爪雪泥垂借镜，水行叶落找源头。

簧宫开辟规模远，椽笔换来万古留。

留得鲜花茂叶在，芬芳信史永不休。

我们不知道，吴芳吉是否知道这一切，我们却知道，吴芳吉的亲

友，吴芳吉的学生，永远怀念着他。你看《江津中学百年史略》记下：

吴芳吉“1931年，出任江津中学校长，他注重德化教育和学生体育锻炼。他重视学校发展规划，提出“聚奎要下山，津中要出城”，指明了两校发展方向。1932年4月应友人文幼章之邀赴渝讲演，积劳成疾，旧病引发，5月9日歿于德感旧居。有《白屋吴生诗稿》、《吴白屋先生遗书》、《白屋家书》、《白屋嘉言》传世。

你看，江津中学二十九班的王利器，明史专家，北大教授，在他的《王利器自传》里，铭刻着老师：“这一年，学校有比较大的变化，校长换成了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他来了，正当“九一八”之后，首先他把认为象衙门的校门拆了，改建成一座黄河铁桥式的照墙，墙头四个桥墩上都安置一尊牛儿炮，炮对准东方，表示抗日之意。他每周给全体学生讲刘戡山《人谱》，由他亲手楷书，上石蓝印，发给大家。他在这一时期，写下不少爱国诗篇，每一脱稿，亦由他自己楷写上石蓝印，发到大家手里，并在大礼堂为全体学生讲诵。吴芳吉很勤学，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全体学生同时起床上自习。……吴先生的寝室，在我们三年级学生寝室的对面，每天早晨，灯光相映，书声相答，书声朗朗，灯光堂堂，吴先生称之为有朝气。我从此养成早起的习惯，四十年来如一日，真是名副其实的一成不变。这时候，吴先生邀请了吕子方，穆济波、刘柏荣等教授，来给我们开讲座，一时学术空气颇为浓厚。又请来了加拿大的文幼章先生给我们讲直接英语教学法。” [26]

你看《文心雕龙》研究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杨明照是吴芳吉在

重庆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他在追忆吴芳吉对他的影响时，这样说：“1931年春，我是文预科的二年级学生。当时给班上开‘文学概论’课的吴芳吉先生，是著名的《婉容词》的作者，他博学多识，善于讲授。经常板书《文心雕龙》的某些段落，绘声绘色地讲得娓娓动听。从这时起，我便与这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巨著结下了不解之缘。”[27]

你看，1931年就读江津中学33班的肖嘉辉，后来以当上江津中学的老师，他说：“吴芳吉先生在江津中学的一切办学措施，使我六十年来记忆犹新。他是‘千秋诗人’，也是‘一代人师’”，肖老师称赞他的吴芳吉老师“以德化人”，常亲自书写“开口不骂人，熄灯不说话”，“两人并肩，三人成行”，“忍穷不借钱，健儿不受怜”，还规定每周的周三为“家书日”，正式贴出一张牌告说：“懒生懒写家书，关系非同小可也，能忍忘其父母，将何事不可为乎？”并用中英文谱写了《家书日歌》，印发给每个学生传唱，而且“每周都要抽阅、评讲，凡至诚至善者多加表扬，一时蔚然成风，深受社会上特别是家长的赞扬。”[28]或许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只有空论而无实践的空头“教育家”和有如吴芳吉似的重在一步一个脚印的，为教育理论做着扎扎实实支撑的实在“教育家”，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这种各有千秋的份量，还是可以分辨的！

你看，重大文预科二班的学生扬德光说：“我只受了他一个学期的教育，但我们受他的熏陶确实不浅。”这里的“熏陶”出自亲身的感觉，只有半年，一个学期，而言“熏陶”，足见吴芳吉以德化人之无声润物之情深情真，感染力之无往不胜。《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熏陶”

的：“被一种思想、品行，习惯所濡染而渐趋同化。”在吴芳吉这里是“德化”。毛泽东对“化”字有过一个简明精辟的解释，“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杨德光又是怎样被熏陶的呢：

诗人在《论答湘潭儿女》的诗里说到他在中国诗史上所取之数人为屈原（上古）、陶渊明（中古）、杜甫（近古）、和邱逢甲（近世）。据我们平时体察，他对曹植、苏轼的诗文也很爱好。他还在他的诗稿注内说明他所资取于屈陶杜邱四人的，不仅其文，尤在其人，我觉得他所取的是灵均（屈原）忠爱冠骚坛，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陶渊明的恬淡寡欲，不慕荣利，杜甫的感时伤乱，忧国忧民，苏轼的勤政爱民以及邱逢甲的抗击日本，发扬民族精神。”[29]

这是诗教的故有功能，这是吴芳吉教育艺术的自然成果。

你看，吴芳吉的母校聚奎中学，就在笔者的“评价”完成初稿的今天，又展新姿——经重庆市教委批准，由原江津聚奎中学更名为重庆市聚奎中学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聚奎中学再次翻开了学校发展的崭新一页！安度冥府的吴芳吉又该挥毫赋诗以贺了！

你看，江津中学的现任校长，重庆市的特级优秀教师龚彤在“诗坛为奇才杏坛亦先锋——领悟原江津中学校长吴芳吉诗歌中的教育思想”一文，下笔就说：“作为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诗词界改革先驱和著名爱国诗人的吴芳吉已被大多数人知晓，但对吴芳吉先生教育思想的研究就目前而言还没有形成气候。”看得出来，吴芳吉的现时继任人是多么希望研究吴芳吉教育思想一步一步的深入而形成风气，让吴芳吉的教育思想在巴山蜀水、神州大地，结出丰硕之果。龚彤校长在研究

了吴芳吉在江津中学任教的几个月时间的诗歌后，挖掘出其中暗含的教育思想，一为“旗帜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观”，二为“脉脉含情的亲情教育观”，三为“殷殷期盼的成才教育观”，四为“积极健康的体育教育观”。吴芳吉的教育思想有人研究，有人传承，也一定会发扬光大。龚彤校长最后深情地说：

斯人已去，思想长存。芳吉校长虽然身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但是他的诗歌、他的教育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闪烁着无限的光辉。作为后来人，我们在缅怀芳吉校长英年早逝的同时，更应该循着芳吉校长为我们留下的光辉诗篇，领悟、探索教育的真谛，“使读书种子不绝于乡里。”[30]

我们已经看到，吴芳吉研究的队伍在壮大、壮大，吟诵吴芳吉诗歌的爱好者在扩充、扩充，传承吴芳吉教育思想的园丁在行动、行动！

注释：

[1]第 286 页，该诗共 24 首，这里选最后 4 首，见第 291—292 页。

[2]第 1038 页。

[3]见江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津文史资料》第 17 辑，第 125—132 页。

[4]第 925 页。

[5]第 928 页。

[6]第 949 页。

[7]见《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第 297 页。

[8]同注[7]第 300 页。

[9]同注[7]第 301 页。

[10]同注[3]。

[11]同注[3]第 133—136 页。

[12]第 1268 页。

[13]同注[11]。

[14]第 934 页。

[15]第 928 页。

[16]第 947 页。

[17]第 941 页。

[18]第 298—300 页。

[19]第 553—560 页。

[20]参见《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第 293—304 页。

[21]第 1010 页。

[22]第 975 页。

[23]第 979 页。

[24]《吴芳吉论教育》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2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47 页。

[26]见《王利器自传》，转引自《江津中学百年史略》第 68—72 页。

[27]参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

[28]《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第 139—142 页，县政协文史委 1991 年 12 月刊印。

[29]

[30]见《芳吉春》2011 年 3 月号。

结 语

“江津是个好地方！”

聂荣臻元帅如是说。

江津是个好地方，好在哪里？吴芳吉在他 1931 年回到家乡执掌江津中学，以善教善管和他的人格魅力，很快把江津中学规顺了。师心至诚，学子感动，社会满意，庶民称颂。举目家乡山水，人杰地灵。吴芳吉提笔以诗抒情，名曰：“几水歌” [1]。我以为，此诗歌恰能为聂帅对家乡的定评着注。请看：

一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娇。云山四面起，井屋一湾遥。嶺塔端于弦上箭，风帆密似鸟归巢。清趣无尘器，来往杂渔樵。

二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情。大西门外路，长忆艾卿坪。树树枝枝香橘子，村村舍舍湧滩声。风光四季明，归兴一舟轻。

三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宜。国公遗爱寺，中有古莲池。池上小亭留我住，波间花影映依衣。隔岸啜黄鹂，明日是星期。

四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圻。江团青玉盏，竹筍少娘厨。酒贱无须知价饮，街平不必倩人扶。猜拳故意输，爱客谁能如？

五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开。世家多楚产，郡县自隋来，山形百战雄奇甚，民性千年深厚栽。春雷蛰已胎，勉矣出群才。

重庆，是国务院公布的“文化历史名城”，江津是聂荣臻元帅的家乡，也是吴芳吉的家乡。一武一文，已经折射出一部厚重的历史。在重庆直辖之际，公元2003年，市政府遴选历史名人[2]，在入选的一百位出生重庆市三十八个区县的名人中，江津有10人在榜上，占了十分之一，这可算得上是“人杰”了。现在，我们依时序作一简介，领略领略他们的神彩。

江渊（1400—1473）明工部尚书

字时用，号定庵，别号竹溪退叟，九龙铺人。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宣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协助大臣于谦等击退了瓦剌军，保卫了京师。代宗时先后任刑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太子太师、工部尚书等职。曾督修雁门边防有功。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后，江渊被贬谪辽东。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被谕令平反，官复原职，並钦书“北极勋臣府，西川相国家”对联赐予。江渊工于诗，著有《锦荣集》、《观光集》及江津前八景、后八景诗。今江津尚存“江公享堂”。

钟云舫（1847——1911）“天下第一长联”作者

名祖棻，高牙铺青草碛人。清末秀才，曾在县城设馆授徒20余年。对经史百家、西方科技深下功夫，所作《东西洋赋》是当时少有的世界地理和科学普及著作。著有《招隐居》二卷，语极嘲讽，提示外国

侵略者“将一座好神州化作烟世界”。撰写的《锦城江楼联》，现悬于成都望江公园。光绪二十九年（1930年）受江津县令构陷，囚于成都。光绪三十年，在狱中创作《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计1612字，被誉为天下第一长联，显示了他作为楹联大师的才华。

卞小吾（1872—1908）清《重庆日报》创办者

名鼎，稿子乡龙井湾人。早年中秀才赴重庆，结识杨沧白等人。后参加蔡元培等组织的爱国学社，曾三次到上海监狱探望邹容、章太炎，商议革命。光绪三十年返渝，参加重庆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游想会”，利用郊游机会商讨革命大事。并与其次兄子宣将两人祖传田产全部变卖，充任办报经费。同年9月创办《重庆日报》，主持社务，从上海购回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及《苏报案纪事》各数百册，在重庆散发。同时，还创办了东华火柴厂、东文学堂、女工讲习所等。光绪三十一年，被清官府逮捕，《重庆日报》被查封。光绪三十四年，在狱中被杀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被追赠为“辛亥革命烈士”。

漆南薰（1892—1927）国民党左派活动家

名树棻，李市镇人。早年入同盟会，1915年留学日本，师从河上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25年著有《经济侵略下的中国》，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1926年初担任重庆《新蜀报主笔》，撰写大量抨击时政、号召民众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任国民党（左派）重庆党部执委，积极投身大革命洪流。曾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影响了大批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斗争。“三·三一”惨案中被

杀害。

冉钧（1899—1927）重庆和四川地区共产主运动先驱者，重庆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

原名高镒，化名浩然，津福乡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被派回重庆参与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筹备成立重庆市总工会；参与建立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兼任教员；协助吴玉章等改组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委会，开展统战工作。1926年1月任中共重庆支部书记。1927年“三·三一”惨案次日，被军阀杀害。

李初梨（1900—1994）无产阶级革命家、文物收藏家。

李初梨出生在高占深沟子。1915年留学日本，1927年回国参加“创造社”，从事左翼文艺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时，曾被捕入狱。以后，长期担任党的宣传工作和对外联络工作的领导职务。建国初期，关心社会流散文物，文化大革命中，与文物同遭磨难，1983年，慨然将其30余年搜集的书画、拓本、陶瓷、砚台、青铜器等568件文物无偿捐给重庆市博物馆收藏。1990年再次捐献43件文物。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谭祖尧（1902—1927）著名革命烈士

字述尼，高占乡人。1918年考入江津中学，次年转入重庆职中，1922年考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李大钊秘书，同时兼任国民党北京左派党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1926年北京地区的“三·一八”反帝爱国群众运动，被段祺瑞卫士打成重伤。1927

年初，北京地区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他本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与李大钊等党的负责人一起坚持革命活动。1927年4月6日被捕，4月28日与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一起就义。

钟惦斐（1919—1987）著名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

原名钟永发，城关镇人。1937年3月参加重庆救国会；11月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次年转入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调文化部筹建艺术局。1950年开始写影评。1952年调宣传部工作，同年以《〈无罪的人〉为什么不是消极影片？》引起文艺界及观众注目，从此发表多篇影评。1979年调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撰写100余万字理论、评论和美学论文，以犀利文笔，开创影评一代新风。创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曾任会长等职，培养、扶持影评新人，出版有《电影的锣鼓》等专著。

在这里，没有介绍聂荣臻元帅，我觉得聂帅早已为全国、全世界人民熟知，也没介绍吴芳吉，因为本书就是为他写的。

在重庆的一百名本籍历史名人中，著名作曲家施光南（1940—1990）。生于重庆南山，当然不算江津籍，但他的母亲是江津人，江津的父老乡亲没忘记他的江津血脉，说他应算半个江津人，因此推论，重庆市的一百名历史名人中，江津应该是占了十个半。其实，都是重庆的历史名人，都是重庆的骄傲，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正当我们的书稿即将杀青的时候，消息传来，国家的有关职能部门，确认江津为“中国长寿之乡”，还授了匾。这是继上海崇明之后，全国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地级城市，还创下了“中华长寿之乡”评选的

“三个最”——在众“中国长寿之乡”中面积最大（幅员 3200 平方公里）、人口最多（150 万人）、寿星分布最均衡（城镇乡村、工矿区等处皆有），江津目前有 122 名过百岁的老人。据专家们解释，江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百岁老人，成为长寿之乡呢？有一个自然条件是：江津的生态优良，水土富硒，硒是有益于长寿的非金属元素。真是神了！人们常常用直观感受：人杰地灵，来说明江津是个好地方，现在又多了一份科学的证明。还真真实实地又有“人杰”，又有“地灵”，说来也真巧！自然界既不能说是“死”的，也确实具有灵性。吴芳吉就特别热爱大自然，爱山、爱水、爱天、爱地，他所到过的地方，没有他不去的山山水水。家乡的黑石山，家乡的几水，更是他浓情挥毫倾心讴歌的宝地。只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家乡的山水富硒！如果当时有如今日社会条件配合，吴芳吉何至于英年早逝啊！

正是：几水波澜的洗礼，鼎山灵气的熏陶，中西文化的滋养，自由思潮的煎熬，成就了著名诗人、现代教育家吴芳吉！我为他而自豪，他是江津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注释：

[1]第 330 页。

[2]见王群生主编《重庆历史文化名人典》重庆出版社出版。

参考书（论文）目

一、吴芳吉遗著类

1、吴芳吉著《吴白屋先生遗书》（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根据民国 23 年刊本于民国 59 年 2 月出版。

2、吴芳吉著《吴白屋先生遗书补遗》（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民国 59 年 2 月出版。

3、吴芳吉著，周光午校《巴蜀日记》钟山书局出版《国风》民国二十四年二、三月第六卷三、四、五、六号刊出。

4、贺远明、吴汉骧、李坤栋编校《吴芳吉集》（四川）巴蜀书社 1994 年 10 月出版。

5、吴芳吉著，江津师专中文科选注《白屋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6、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选编《吴芳吉诗文选》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 2009 年 7 月出版。

7、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刘国铭选编《吴芳吉论教育》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出版。

二、领袖论著及相关专著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出版。

2、《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0 年出版。

3、《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5 年出版。

4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8 月出版。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甲编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出版。

6、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8 月出版。

7、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8、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

9、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6 月出版。

10、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一、二、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 5 月，1979 年 7 月，1980 年 10 月出版。

11、别列金娜选辑，梁真译《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 1958 年 7 月出版。

三、吴芳吉研究文集、专著类

1、谷声滢、羊村、君朝国主编《吴芳吉研究论文集》成都吴芳吉研究会 1999 年 6 月刊印。

2、《白屋诗风》第 1—12 集，成都吴芳吉研究会刊印。

3、《吴芳吉研究》成都吴芳吉研究会，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

4、宫廷璋著《吴芳吉新体诗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出版课印行《师大月刊》第十八期。

5、施幼烺著《吴芳吉评传》重庆出版社 1988 年 7 月出版。

6、朱静如著《白屋诗稿评述》（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七十年元月出版。

7、黎汉基著《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 吴宓与吴芳吉》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年 8 月出版。

8、吴泰璞著《白屋诗人吴芳吉》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年 10 月出版。

9、蔡恒高益荣《会通中西吴宓的读书生活》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1 年 1 月出版。

10、《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辑》江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刊印。

四、校史类

1、罗昌一、李治烈、石怀湘《聚奎中学》1995 年 6 月刊印。

2、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店 1981 年 2 月出版。

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1911—1928）》，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3 月出版。

4、《明德春秋》长沙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1993 年 10

月。

5、《百年明德磨血育人》长沙市明德中学百年校庆办编 2003 年刊印。

6、《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四川大学 (189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8 月出版。

7、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出版。

8、重庆大学校史编写组《重庆大学校史 (上册 1929.10—1949.11)》重庆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9 月出版。

9、重庆大学校史编写组《重庆大学校史 (1949—1994)》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出版。

10、重庆大学校史编写组《重庆大学校史 (1999—2009)》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出版。

五、吴宓遗著类

1、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 (第 1—6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3 月出版。

2、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 (1894—192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 12 月出版。

六、历史资料类

1、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共三卷五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1963、1977 年出版。

2、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3 月出版。

3、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1989 年 12 月出版。

4、邓力群主编《伟人毛泽东丛书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 月出版。

5、邓力群主编《传人毛泽东丛书诗家毛泽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 月出版。

6、邓力群主编《伟人毛泽东与科学教育（下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 月出版。

七、文化专著类

1、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 1996 年 4 月出版。

2、蔡方鹿、黄海德、向世山、黄小石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成都出版社 1993 年 4 月出版。

3、蓝菊荪译《诗经国风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出版。

4、于丹著《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 2006 年 11 月出版。

5、郭延礼著《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州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5 月出版。

6、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11 年 6 月出版。

7、毛庆耆郭小湄著《中国文学通义上下卷》岳麓书社 2006 年 9 月出版。

8、刘小枫著《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出版。

9、(美) 乔治·桑塔亚那著华明译《诗与哲学：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及歌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2 月出版。

10、吴延嘉沈小德著《梁启超评传》百花州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3 月出版。

11、吴其昌著《梁启超传》百花州文艺出版社 2009 年 7 月出版。

12、吴俊著《鲁迅评传》百花州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3 月出版。

13、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州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3 月出版。

14、冯契主编《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5 月出版。

15、马德邻吾淳汪晓鲁《宗教，一种文化现象》上海人民出版 1987 年 7 月出版。

16、陈麟书，朱森溥《世界七大宗教》重庆出版社 1986 年 8 月出版。

八、教育专著类

1、黄济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6 月出版。

2、睢文龙冯忠汉廖时人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出版。

3、白莉民编著《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教育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9 月出版。

4、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著《外国教育史（修订本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出版。

5、阎光才译（美）迈克尔·W·何普尔著《文化政治与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8 月出版。

6、顾明远著《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3 月出版。

7、王英杰曲恒昌主编《教育人生明志致远》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出版。

8、刘万海著《德性教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 月出版。

9、朱小蔓金生鈇主编《道德教育评论 2008》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出版。

10、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明清分卷、近代分卷、现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出版。

11、胡金平主编《中外教育史纲（修订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9 月出版。

九、论文类

1、罗成琰：《激进与保守——重评五四时期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辩》载《理论与创作》2009 年 3 月。

- 2、张宝明：《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 3、汤一介：《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载《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二期。
- 4、朱晓进：《五四文学传统与三十年代文学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 5、叶绩：《现代中国大学制度之肇创、流变与得失——以北大早期建设及其影响为中心》载《教育学报》2010年2月第6卷第1期。
- 6、顾明远：《中国教育科学走向现代化之路纪实——纪念共和国建设60周年》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 7、杜霞：《国学经典教育的尺度与分寸》载《教育学报》2012年2月第8卷第1期。
- 8、洪明：《读经论争的百年回眸》载《教育学报》2012年2月第8卷第1期。
- 9、翁有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关于军阀问题“解决”方略之考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
- 10、刘国铭：《试析教育家吴芳吉教育实践的轨迹》载《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 11、刘治修《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强大生命力》载《重庆师专学报》2001年第20卷第2期。
- 12、刘国铭《论吴芳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主张》载《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第31卷第5期2012年9月。